

序

李凡夫同志，广东省中山市张家边区濠头乡人，生于1906年，逝世于1990年，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李凡夫同志就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并长期在党的文教、理论战线上担任领导职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党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整整一生。李凡夫同志忠于人民，严于律己，勤于学习，精于写作，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除了奔忙于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之外，还挤出时间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著作、文章，对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本文集，收集了李凡夫同志在各个不同时期写作的专著两部、文章十余篇。这些作品是从李凡夫同志数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由于这些作品服务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们的论述重点和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论述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显示了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良好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文集中收入的《中国与日本》一书，是李凡夫同志早期的著作，写于抗日战争前夕的1937年5月。这部作品以大量翔实的事实材料为依据，深入地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执行对华侵略政策的根源和实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通过妥协退让求得苟

安，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指出当时的唯一出路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全民抗战，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本书出版后仅仅两个月，就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完全证实了书中的论述和预见。今天重读此书，仍能感觉到它所具有的巨大理论说服力，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前的中日政局和中日关系，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李凡夫同志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一部通俗读物。1945年3月在延安第一次出版，1953年7月被人民出版社编入《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重新修订出版。这部作品以史家的手笔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八年英勇奋战终于取得胜利的光辉历程，热情讴歌了抗日健儿在党的领导下为我国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这部作品以丰富的史料和典型的战例描绘见长，它非常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和我军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对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和解放军军事建设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还写了大量评论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文章，《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沦陷区的土地问题》是其中的几篇代表作，这些作品所作的论述和分析，也都是十分精辟透里的。

《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庆祝〈毛泽东选集〉出版》等五篇文章，是解放初期作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为辅导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写的，着重论述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理论观点鲜明，思想针对性很强，从中可以看到老一辈理论家为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论共产主义道德》等六篇论文，写于1962年至1965年作者在安徽省先后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副省长期间，目的是向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思想教育。这几篇论文探讨的是哲学问题，理论阐述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体现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反对极“左”思潮的实践检验，证明其基本思想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其中涉及的若干学术问题，尽管还存在着争议，但作者的看法毕竟也是一家之言，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这本文集还收入了李凡夫同志写的回忆录三篇，记录了作者在上海“社联”工作期间和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期间的峥嵘岁月和战斗历程，文中充满了狂飚时代的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既可把它看作是革命的历史文献，也可以看作是教育青年一代的良好教材。

李凡夫同志生前的一个宿愿，就是希望自己能给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把他的作品收集起来，整理出版，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这个宿愿，同时也是为了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广东中山市委和李凡夫同志生前战友们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李凡夫文集》编委会

1991年10月

目 录

序	《李凡夫文集》编委会
中国与日本 (1937年5月)	
一 中日两国在现阶段能不能做朋友?	2
二 中日两国有暂时亲善的可能吗?	43
三 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48
四 中日关系的前途	53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5年3月)	
第一章 回顾	56
第二章 深入敌后, 开辟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	
一 大战平型关	62
二 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敌寇	74
三 从后面拖住敌人	81
四 由配合“反攻”太原到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88
五 牵制敌兵三十万	94
六 新四军开入大江南北	100
七 武汉失守后的敌后形势	106

八	冀中平原反“扫荡”	110
九	模范的歼灭战在晋察冀	118
一〇	梁山泊古战场的袭击突围与歼灭	124
一一	大江南北游击战的发展	130
一二	广东东江与琼崖的游击战	140
一三	震动全国的百团大战	146
第三章 艰苦奋斗，坚持解放区的抗日战争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		
一	极端困难时期的敌后形势	155
二	皖南事变与新四军发展的新阶段	162
三	给冈村宁次的迎头痛击	170
四	平原上展开“扫荡”与反“扫荡”血战	174
五	骑兵在艰苦战斗中	187
六	新四军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及其他	192
七	香港失陷后的华南游击队	197
第四章 恢复和扩大解放区，发动局部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		
一	敌后新形势	200
二	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与日寇“观战团”的毁灭	208
三	山东反“扫荡”又创造奇迹	211
四	围困、挤走敌人	219
五	车桥大歼灭战	225
六	里应外合收复莒县	231
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前壮大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38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1937年11月）		243

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1937年9月)	252
沦陷区的土地问题 (1940年7月8日)	262
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272
——庆祝《毛泽东选集》出版(1951年10月17日)	
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 (1952年4月10日)	276
理论如何联系实际	282
——重读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体会 (1953年4月10日)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90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发表三十周年而作 (1956年3月3日)	
学习《实践论》，克服经验主义 (1951年5月24日)	298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964年2月)	312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1965年2月)	321
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62年5月)	331
论共产主义道德 (1962年9月)	345
革命的道德观 (1963年9月)	373
革命者的生死观 (1965年7月)	398
回忆“上海社联”斗争片断 (1983年5月31日) ...	406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的回忆	
(1980年10月)	409
由“联大”到“抗大”(1941年4月25日)	414
回忆《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的编写	
经过(1979年10月24日)	421
为纪念广州六烈士题词	423
 附录:	
李凡夫同志生平	424
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必须纠正过来	428
——驳对于李凡夫同志的“批判”和诬陷	

中国与日本

自序

最近论述中日问题的文字已经相当多，就是“真能从国家终极的利害上打算，不为感情或客气所驱使，或一时错误所蒙蔽的”，也不见得“太少”。但是中日问题仍不失为当前一个最严重，最值得我们加深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在日本人正嚷着“对支那再认识”，在“亲善”“提携”的空气高张，在绥东的杀气同样也很高张，在表面上中日关系好像有了转变，而实际上还不知道转到哪里去的时候，为要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中彻底究明中日关系的动向，为要把握中日关系的前途和确定我们应走的路线，我们对中日问题，再“作一番忠实的探讨”，仍然非常必要。

当然，这里所罗列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事实和浅见，假如这些平凡的东西，也能引起国人的注意，也能于目前的解放运动有点滴的帮助，那就算意外的收获了。

这小册如有不妥的地方，诚恳地希望读者诸君多多指正。

五，十五，一九三七。于上海。

一 中日两国在现阶段能不能做朋友？

(一) 从史的发展上观察

中日两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成为敌人？

中日两国决不是自古以来就成为敌人，恰恰相反，中日两国事实上曾经做过长期的朋友。自日本有史以来，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为止，除明末时日本倭寇大举向中国侵扰以外，两千多年来的中日关系，都是很和睦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虽比日本强盛；但中国从来未曾使日本吃过什么亏，反之，日本却从中国得到许多好处，日本的一切文化制度可以说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先进的封建国家（指中国）和一个后进的封建国家（指日本）的一段因缘，这一段因缘，我们现在没有追忆的心情和余暇了。这里要说的是在日本维新以后，中日两国由友人变为敌人的惨史。

中日两国由友人变为敌人的关键？

中国和日本怎样由友人变为敌人呢？这不能不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从中作怪。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已渐渐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在鸦片战争后，渐渐踏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这是中国和日本由友人变为敌人的重要关键。这里有一个

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日本会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却变为半殖民地呢？这个问题，到现在止，还有许多历史家在探究中，现在只能综合一些历史家初步研究所得的结论简括地写在下面：

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发达？

先从中国方面说起。话说中国在封建时代，因为有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而未被奴隶制时代清算的农村公社（日本人称为“共同体”，又称“共产体”）散布在各地，公社和公社之间，互相孤立，“老死不相往来”，所以结果，手工业不能发达，交换关系不能盛行，工业和农业始终无法分家，地租也不能由现物地租顺畅地普遍地发展到货币地租；同时，中央集权式的封建专制政府，为了维持他本身的生存，对于工业和商业又采取包办、摧残甚至取缔的政策，加以中国有好几个朝代都受外来民族的侵袭与统治，每一次受外来民族的侵袭与统治，经济上必受很大的破坏而致往后退。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了二三千年来。一直到清朝末年，工厂手工业才渐渐萌芽，可是根基仍然非常薄弱。就在这个时候，西方的资本主义强盗来了，腐朽了的封建社会，一接触到大英帝国的鸦片烟味和火药味以后，即速开始崩溃。那些由西方陆续而来的强盗，他们并不想中国接受他们的“文明”，依样画葫芦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来；他们只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好向中国吸取多量的膏血，以肥大自己。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共同向中国老百姓压榨。可怜得很，那时中国革命的主体——市民层又是那么没有根基，他们不能负起应负的任务！他们不能领导起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一面打倒外来强盗的压迫，一面肃清封建势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中国悲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

就是这样被决定了。

日本资本主义又为什么能发达？

日本的情形则和中国不同。在日本封建社会里，残留的公社（原始共同体）的遗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班田制度”的崩溃，早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以后）就渐渐消灭了。到了镰仓时代（十三世纪以后），封建制度已有了正常的发展，到德川时代（十七——十九世纪）封建制度已到了最后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胚胎也开始在这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了。工厂手工业（如轻工业的制酒业、纺织业、砖瓦业和重工业的煤矿业、铁矿业、兵器业、铸币业等）已普遍于各地，工业和农业逐渐分家，商品交换逐渐发达，商业和高利贷资本逐渐横行，诸侯和武士们对货币的需要日益迫切，他们强迫农民由现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同时，被封建诸侯压榨得不能生存的农民不是起来“骚动”，动摇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到都市去出卖劳动，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有了这些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前提条件的日本，遇到外来势力压迫之后，便立刻扬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一面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天下，建立明治新政府，另一面则抵抗着外来的侵略，实现了所谓由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并且，日本比中国幸运的地方，是日本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当时的国际情势于日本特别有利。因为日本市场毕竟没有像中国市场那么重要，而“日本又在航路的终点（指由西方到远东），西洋鬼子侵略中国的目标，是以印度为第一，中国为第二，而日本则是最后的一个”。所以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强盗管得开发中国市场，也就没有充分的余力去干涉日本了。同时，俄法正为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所苦，美国又为一八五六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所牵制，所以对日本这小子，只好马马虎虎地放过了。

中日两国由友人变为敌人故事的开始

日本自从幸运地踏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后，中日两国由友人变为敌人的故事便从此开始了。

日本是有名的先天不足的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出世就感觉到缺乏滋养的补品：凡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原料和市场——日本都非常缺乏；可是“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适为过剩”——这个大道理，用不着半世纪后某位先生的慷慨劝谏，彼邦的维新“志士”早就懂得了。他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当然就不会把近水楼台的中国放过。本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都不曾顾到别人生存的，自然日本也不能例外；不过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初期掠夺殖民地的时候，多半采取经济侵略的方式，而日本却因为他本身的特殊条件，他一开始就带着狰狞的面孔，用武士道的精神，向“同文同种”的中国开刀了。他向中国开刀的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整个中国——是大家熟知的。明治维新后不到四年，日本就开始执行第一期的工作（征服台湾）了。在执行第一期工作之前，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英勇”的武士们就提议首先执行第二期工作（征服朝鲜）；可是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进步派”却认为不合程序，“断乎反对”。就是为了“征韩”问题，西乡派和大久保派居然打起架来，结果，大久保派获得胜利，西乡派被迫下台。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大久保派所以反对西乡派的“征韩”，决不是他们有爱于朝鲜或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估量日本当时的力量还很幼稚，未必能和中国一战。所以日本自从大久保领导的“进步派”把西乡所领导的“守旧派”打倒，并进而平定那些“不平之士”的叛乱后，从一八八五年以后的十年间，便拚命准备“征服朝鲜”的工作，因为他

们知道要征服朝鲜，非战败清廷不可，要战败清廷，就非有相当的准备不行（因为当时的大清国在日本人眼中还不失为一个庞大的东西呀）！所以他们十年间的准备，都是以清廷特别是北洋为假想敌。

“倭人”十年的准备到底没有落空，甲午一战，后起的日本居然把庞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了。中国的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一个在崩溃中的封建国家敌不住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盗。但如果作比较具体的分析，却可以指出如下的诸原因：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对中国作战有认真的充分的准备；而中国政府却逆来顺受，满不在乎。虽则受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教训的清政府，也开始“准备”着，可是那种准备情形，说来真是令人气愤。他们不但说不上整个国防的建设，就是枝节的准备，也非常糟糕。清廷的官吏，大都藉“准备”以饱私囊。监察御史安维峻在奏摺中曾说：“中国出使大臣，向以购买船炮为利藪，前使臣李凤苞定造济远等舰，与洋员金楷理朋比为奸，侵蚀至百万上下，济远原价三十万，报销六十万”；而所购的舰，大抵是“或配制不如式，别国所退，或系旧船改造”，这便是当时准备实情的一端。及至中日战争迫于眉睫，英人又劝李鸿章添购快船两艘，却为清廷所阻，为的是慈禧太后要庆祝六十大寿，大建颐和园，须要从海军经费中拨出三千万元之多，以供建筑之用。你看，这样的准备，来和日本的“励精图治”比较，真是“不待交锋，利钝已见”呵！

第二，日本以整个的国力对付中国，而中国则只以局部的力量抵抗。梁启超撰《李鸿章传》说：“当时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

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实亦近之。不见乎外省大吏，徒自划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乃至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梁启超此言虽近於有意替李鸿章辩护，而没有指出清廷从未动员全国力量的事实；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局部抗战的实情了。

第三，李鸿章以一人独当军事外交之冲，假如他真的能负担得起这个重任，而真的能忠于谋国，还犹可说；可是事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对日本的侵略，事前既没有抗战的决心，及至战争爆发，又不能迅速布置，作有效的补救，而且还处处坐失时机，甚至有通敌卖国之嫌。当时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李鸿章，奏中曾有这样沉痛的话：“……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捐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都察院御史易顺鼎奏中也说：“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纵使这些御史言官是言之过火；但依照当时实在情形来判断，李鸿章的误国，实在无可讳言。

第四，在李鸿章一流的“权奸”把持下的清政府，不但没有牺牲的决心，而且也完全失去了自信心，不能采取持久的战略。本来，当时大声疾呼，主张对日作持久战，并且根据事实，明白地指出日人的弱点的颇不乏人；可是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对于那些真正为国家民族打算的人的意见，不但不肯采纳，反而把他

们“革职发军台，以示儆戒”。

有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失败，乃是无可幸免的事，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太值得我们今日注意了。

甲午战争对于两国前途的影响

战争的结果，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于中国的加速殖民地化，有着决定的意义。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马关条约》的缔结，对日本实在太便宜了。依这条约，日本不但夺得了整个的朝鲜，夺得了奉天省南部和台湾澎湖群岛，夺得了二万万两银子，和夺得了在中国内地遍设工厂等权利，而且还开辟了进一步侵略满洲和整个中国的道路。日本把所有从中国抢去的钱，大部分都用在扩张军备和改良工业中，所以，从此日本的财富便有了大量的增加，日本的威风也日益高涨了。反观中国又怎样呢？中国自甲午战败后，满身疮痍，不忍卒睹，清政府的丑态既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强盗们对中国的压迫也就愈来愈甚了。帝俄日本在东北，德国在华北，英国在华中华南，法国在华南，各自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要求“门户开放”。于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更加确定了。

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关系

野心勃勃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然得到了鼓励，从此他奴化中国的工作，当然要更加积极进行了。可是当他战败中国后，马上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关，那就是帝俄在东三省和他的竞争。日本为要战败他的强敌，为要独占满洲，在甲午战后十年间，又以全力准备对俄作战：在军事上，加紧扩充军需工业，建造军舰，改革军制；在外交上，则进行勾结英国。一九〇二年，日英勾结成功；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便爆发了。在腐败的沙皇统治下的帝俄，正像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一样，竟然经不起日

本的一击；日本把帝俄战败后，立刻代替了帝俄在南满的统治，奠定了吞并整个东北的基础。而中国的地位，也就更加一日不如一日了。

由世界大战到济南惨案

在日俄战后不到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然，日本认为这是侵略中国的空前的大好机会。他乘着欧美帝国主义者无暇东顾，便任意为所欲为：一方面武装占领青岛以至山东全境，另一方面更以最野蛮的手段强迫汉奸的袁世凯政府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暴日的要求，虽得到袁贼的汉奸政府不声不响地予以全部的承认；但袁贼的政权不久也就为一部分的爱国军人所推翻。自袁贼失败后，暴日对中国侵略，还是有加无已；同时他开始采取多面的侵略方式：一面扶植中国的军阀势力，分化中国的统一，另一面又向段祺瑞政府举行亡国大借款（西原借款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强迫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一九一八年），企图藉此完全控制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实权。当时的汉奸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虽表示极度的驯服；但是中国全国民众从此不能再“镇静”了。特别是因为受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中惨败的刺激，空前伟大的救亡运动（五四运动）便汹涌澎湃地爆发起来。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反日反汉奸的猛烈表现。当时由北平学生教授的登高一呼，马上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掀起了空前的巨浪，给亲日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日本自遭受这一次猛烈的打击以后，对中国的侵略，在表面上好像缓和了一些，实际上还是毫不放松的。特别是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部分地得到了鼓励之后，他侵略中国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在中国革命的高潮中，日本是躲在英帝国

主义的背后，干着扒手的工作；及至中国革命高潮过去，日本又重行露出他狰狞的面孔，居然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武装干涉中国统一，在侵略中国史上，又开了一次最凶残的血腥记录。

九·一八前夕日本在中国的势力

自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前夕止，日本积四十余年侵略中国的结果，在中国各方面已造成了庞大的势力。在经济方面，日本在华的投资总额，一九三一年时已增至十一亿三千七百万美金，一九二四年还仅有二亿二千万，八年中增加五倍，大有赶上英国之势（同期英国自六亿零八百万美金增至十二亿零二百万美金）。加以日本对华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交通运输业、输出入业、制造工业和矿业上，对于控制中国的生产，有着严重的意义。至于日货在中国市场的充斥，尤为惊人。在“九·一八”前，日本对华输入总额竟达三亿五千七百余万日金，若加上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工业制品，其数当更可观。同时，中国对日的输出，在同期中也达三万万圆。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结果，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性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了。在政治方面，随着经济势力的伸张，日本支配中国的政治势力当然也大大地增加。一方面，一部分与日本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中国人，很容易变成积极的亲日分子，这些没良心的积极亲日分子就叫做汉奸；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受日本掣肘的一部分中国人，即使在良心上不甘心附敌，但因为要顾忌自己的财产事业，很容易忘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暗中牵制抗日运动，而事实上就是无异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这些人可以叫做“畏日”分子或“秘密汉奸”。这些公开和秘密的汉奸，在“九·一八”前夕虽尚未形成一种明显的独立的势力，但培养这些势力的社会基础已比以前扩大，是无可否认的。日本在中国有了这样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势力，进一步大规模

地掠夺中国，显然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在国际上有利于他动手的时候，他就可以动手了。刚好在那时候，震撼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危机使英美两帝国主义内部和国际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无法用全力兼顾远东的利益；危机又使日本侵略中国，找出路的兽性冲动起来，于是日本大举掠夺中国的各种条件都已成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由关东军向沈阳北大营的进攻，展开了划时期的中日新关系。

五年八个月来的血史

“九·一八”事变发生，我国事前既毫无准备，事后又采取历史上所没有的不抵抗政策，疯狂残暴的侵略者遂得在短期内毫不费力地完成了他侵华的第三期（征服满蒙）工作，并且还迅速推进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的工作。现在把五年八个月来的空前严重的国难血史简述如下：

日本吞并东北，不但是已定的计划，而且也有充足的准备。因为日本军阀事前决没有料到数十万东北军竟至毫不抵抗。也许他们在“中苏战争”(!)中很明白的看穿了东北军的弱点，日本军阀就来一般硬劲试试看。真是可怜得很，日本关东军在九月十八日夜里发动后，只消一个晚上，便把沈阳完全占领；不到三天工夫，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也完全落在“皇军”的手中。最可痛心的是后来马占山将军在齐齐哈尔虽奋起抗战，但以孤军无援，竟遭失败，使敌人的铁骑得在我东三省内，如入无人之境。由“九·一八”到锦州失陷，为时不过三个多月，三百七十六万七千七百零余万方里的面积和二千四百多万人口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竟完全为敌人占据了。敌人为要掩饰世人耳目，为要便利统治，在占领东三省后，立刻就把所有甘受利用的汉奸，加官赐禄，成立“满洲”傀儡政府。因为“征服满蒙”的工作，如此容易执行，侵略

者的野心更大，所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便继之而起。可是这次却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奋勇杀敌，给敌人以从来未受过的打击，使华中华南的危机缓和不少。然而可叹的是在三十多天战无不胜的英勇抗战之后，又是孤军无援，自动撤兵，而且还屈辱地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结果，上海附近几百里土地即变为可以驻屯日军的非武装区域，吴淞要塞亦被拆除。得寸进尺的侵略者在淞沪战后，又以全力侵犯热河，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完全占领热河之后，又长驱进犯长城，假如不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和中央关黄等师在古北口喜峰口抗战，大败日军，平津一带恐怕早已划入“满洲国”的版图了。可是在这次牺牲之后，又屈辱地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给敌人奠定了“华北特殊化”的基础。

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字（一九三三·五·卅一）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改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数管齐下的手段。同时，侵略者为要排斥英美的势力，竟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不争气的中国，至此也在“不得已”的情势下，由依赖国联，“长期抵抗”，进而与“友邦”亲善提携了。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之下，一方面对“满”通邮、通车，渐次解决；另一方面，又将全国反日运动严行禁止，甚而连教科书的内容也被迫修订。但是侵略者却不因此而满足，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华北日军又突然提出新要求，结果，签订《何梅协定》。我国在河北的驻军被逐至保定西南，连国民党也不得在河北活动，于是平津事实上又落入敌人的血口中了。

不管我国怎样退让，敌人的进攻还是有加无已，一九三五年冬，日本乘意阿战争扩大，英国困于对付意大利之际，日本又派遣土肥原在华北导演“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分

开。同时，广田外相又提出比“二十一条”有过之无不及的三大原则，要求中国根绝抗日运动，承认“满洲国”和中日共同防共。假如不是全国民众的纷起反对，假如没有“一二九”北平学生的大示威和前仆后继的全国学生的怒吼，则“防共自治政府”的设立，恐怕还不止限于冀东和内蒙古两地呢。

自从广田三原则提出以后，中日关系更加紧张了。到去年底，日本又利用成都、北海、汕头、汉口和上海等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比三原则更具体更苛刻的七大要求，企图一口吞并中国。可是中国方面的实情，已再不能容许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川越大使虽曾与张外长作八次的谈判，也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中日谈判到了最紧急关头的时候，绥东抗战爆发了，“外交谈判”便无形中止；虽则在这期间，西安事变发生，侵略者曾费了很大的气力，企图挑起中国的内战，以达到“以华灭华”的毒计，但由于全中国人民的怒吼，终于使这条毒计无法实现，而以外交起家的日本广田内阁也因“外交失败”而倒台了。

日本内阁由广田换到林銑十郎以后，侵华方式，又有了新的改变，关于这，下面当另节详述。

以上我们虽然只是很概略地叙述了中日两国由友人变为敌人的成因和经过。但是我想这已经很够帮助我们想象：中日两国在现阶段到底能不能由敌人再变为友人了。

（二）从政治上观察

两种不正确的对日观察法

六十余年来，我们从敌人所受到的赐与，实在是够惨痛了。可是到今天为止，似乎还有许多人对于敌人的狰狞面孔，没有彻

底地正确地认识清楚。他们所以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有些固然由于无知；但有些也许是有意的。这里我们最少可以举出两种对日本错误的观察方法：

第一，有些人故意（或无意）把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夸大起来，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只是少数军阀的意思，而不是日本整个统治阶级的国策，于是他们根据这样错误的幻觉，主张中国可以运用外交策略，促进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甚至也有主张中国可以和日本的“稳健派”联合起来，利用他们去牵制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这样的主张说来虽觉可笑，但事实上的确有人这样主张过，到现在止也的确还有人在幻想着，认为这是可行的。前月日本经济考察团儿玉谦次一行到中国来，大受一部分“高等华人”的欢迎，在那些欢迎者当中，就一定有不少人抱着这样的幻想：我们好好的招待他们，和他们携起手来，好让他们吃饱了“支那料理”回到东京之后，更加努力地去牵制日本军阀对中国露骨的侵略。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和当年袁世凯派日本顾问去疏通日本元老派，请他们去牵制军阀，可说是异曲同工。

第二，还有一些人和上面看法相反，他们完全否认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他们认为日本军阀和财阀，急进派和稳健派之间的种种冲突和斗争，全是故意演给中国人看的双簧。

不消说，这两种观察方法都是错误的，前者可以说是巧妙的降敌的汉奸理论，后者则是不合事实的唯心的看法。

对日本内部应有的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日本的军阀、财阀、重臣、官僚、元老，政党，这一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他们有同一的立场，那就是要维持有利于他们的现行社会制度。为了发展或挽救这种制

度，无论急进的军阀也好，或稳健的财阀也好，他们要采用可以发展或挽救这种制度的一切人为的方法，如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实行法西斯独裁等等，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在这种“一致”下面，他们因为眼前利害的不同，他们对于侵略中国，进攻苏联或实施法西斯独裁的时期、方法和准备等具体意见，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异。这种由统治者本身利害而起的内部对立和斗争，常常形成一种非常复杂错综的情势，很容易使那些视力不足的人的眼睛模糊起来。

日本统治阶级的两大营垒

但是，我们只要冷静一点根据事实加以分析，就不难明白：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虽然复杂交错，但大体上却可分为两大营垒。第一个营垒的构成分子是军需工业家、地主、中小工业家，都市农村小资产阶级、少壮军人和军阀上层急进分子。这个营垒可以总称为急进派。他们的利益在于发动战争，和因军费增加而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战争可以使军需工业家的生意兴隆，膨大他们的利润；通货膨胀可以使那些把土地抵押于大银行的地主和对银行负债极巨的中小工业家的负担减轻。少壮军人因为多数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村，而且大抵是小商人、职业军人和没落的地主的子弟，他们亲身体会了农村破产的惨状和受寡头财阀压迫而破产的他们父兄的悲哀，所以他们直觉地要求反对财阀、反对资本家和希望从战争中找寻出路。同时，这些家伙，大都受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很难正确地认识社会的缺陷，而只是混乱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日本型”的法西斯思想。至于军阀上层的急进分子，一方面是受地主和军需工业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受少壮军人由下而上的推动，所以他们就不能不表示特别的急进。这营垒的中心要求是对外强硬，扩大军备，统制产业，和改革行政机构。

第二个营垒的构成分子是金融资本家，输出业者，元老，重臣，官僚，两大政党，和军阀上层的稳健分子。这一营垒普通称为稳健派。本来，这些分子不但在原则上不反对战争，而且事实上是侵略中国的主动者，但是，金融资本家经过这几年来事实上的教训，他们只要想起无底止的军费要求，有立即引起财政全部崩溃的危险，他们就不能不感到恐怖了。输出业者从“生意眼”出发，当然也不愿一味对外强硬，引起无益的战争，使他们的对外倾销不能畅行无阻。至于元老、重臣、官僚、政党和军阀上层的稳健分子，大都是与金融资本家或输出业者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个营垒主要的要求是维持金融寡头的利益，希望无事平稳地继续资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而反对过急的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急进势力的跃进及其原因

这两个营垒的继续不断的斗争，已有相当长期的历史了。斗争而至激烈化的，当以“二·二六”事变和在第七十届议会中“军部与政党之战”两次为最厉害。两次重大斗争的结果，在表面上，急进势力的锋芒都好像被抑制下去了；但实际上，急进势力却是更加坚实地跃进了一步。在“二·二六”事变后，所谓“政治推进力”对政府的支配无疑比前更加强化，所以广田内阁有“弱体”内阁之称；在“军部与政党之战”结束后，“政治推进力”又比前更进一步，所以林内阁甚至有人称之为“军部内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应该分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由财阀所代表的稳健派，对由军阀所代表的急进派原无恶意，不过，当他们利益受到急进派的威胁时，他们当然要动员所有的力量起来反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急进派故意为难到底的意思，只要有可商量的地方都无不愿意商量，换句话说，只要军阀不取唯我独尊的态度，而愿意和资本家妥协的话，他们就可以伸出手来，笑嘻嘻

嘻地与军阀携手，来实现“军”“资”共存共荣的实绩。在“二·二六”事变后如此，在广田内阁倒台后，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军阀所代表的急进派，也因几年来事实的教训，他们（特别是他们现在的首脑部）已渐渐知道徒然虚张声势的表面的强硬是有害无益的，没有财阀支持的“革新”是行不通的，超出于军需工业生产能力的军费开支，或不适合于全生产机构的军需工业的急激膨胀，也是极富于危险性的，于是首脑部便举全力以“肃军”（把旧式的派阀和过“左”的分子除去）。果然，经过“肃军”后的“全军总意”，不但没有像过去那么“嚣张”，而且已渐渐趋向于坚实的前进了。这种倾向是再适合于金融资本家的胃口没有了。因为两方面（军阀和财阀亦即急进派和稳健派）都有妥协的倾向，所以在广田内阁倒台后，更正确的说，在宇垣组阁流产林组阁又发生困难之后，经过了有力者的拉线（据说由平沼负责），财阀与军阀便苟合起来，实现了他们的宿愿。竭诚的加入林内阁，池田的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和军部在经济领域内对财阀的让步（修改马场财政），就是这次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应该占重要的一页的财阀和军阀苟合的具体表现。他们苟合成功后，当前的急务是以坚实的步伐，向着渐进的法西斯的道路前进。关于这，我还可以作较具体的说明：

财阀和军阀妥协以后怎样

本来，在军阀和财阀的妥协没有成功以前，军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统制产业，统制资本，这种“倒行逆施”，当然是财阀所反对的；但是，在他们妥协成功之后，情形就不同，独占金融资本家对“自治的统制”就乐于接受了。实行“自治的统制”，向着“准战时体制”前进，这便是“军”“资”苟合后的第一要着。为要配合这种新情势，调剂两方面意见的新的政治评议机关（御用新党）

就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军阀和财阀（特别是后者）都不便做政治的主体，而必须有政治的代言人。但是，这种任务，政民两大既成政党，都不便负担起来，因为既成政党的分子太不统一了，而且他们又已成为军部攻击的目标。这样，新党的组织，便成为财阀和军阀的共同要求。要产生新党，必须毁坏既成政党，或使既成政党变质。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办法可以采用：第一是连续解散议会，直接弹压既成政党；第二是收买和操纵既成政党的游离分子，使既成政党从内部瓦解。现在林内阁首先采取的是第一种办法，并且同时也在采取第二种办法中。当然，在林内阁任内，组织新党，毁坏既成政党的工作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这项工作，如能在林内阁任内完成固好，不能，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换一个内阁，对于执行法西斯化政策，对于军资的合作和对于新党运动，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这迟早将要到来的林内阁以至继林内阁的内阁倒台后的对策，恐怕早已在西园寺，不，在军阀和财阀们的考虑中了。谁都可以想到，继林内阁而来的，将是比林内阁更加坚实的法西斯化的内阁。执行这职务的，寺内可，板垣可，或其他类似的人物亦无不可。这种内阁的主要任务，将是由扩张军备进而为大陆政策的强行。那时候什么对华“亲善”“提携”的名词，恐怕又要放在一边，而重新采取“实弹射击”的步骤吧！

很显然的，日本统治阶级正以最大的努力来调整他们两大营垒间的矛盾，巩固“军”“资”合作的基础，企图以坚固的“举国一致”的力量来向日本的老百姓和中华民族加紧开刀，虽则这样的局面能否像他们所想象似地顺利地发展下去，那又是另一问题。

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的责任

这样局面的到来，我以为有十二分的可能，然而不是必然

的。使这种可能性不能成为现实性，只有靠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的努力。日本国内工农大众，和一切不以榨取为生的劳动者，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政策，早已表示极度的不满了。在最近一次总选举中，标榜反法西斯的无产派政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社会大众党的国会议员，由十八席增加到三十七席；腐败的政民两党，也因为以反对林内阁为号召，获得了绝对的胜利；反之，凡是拥护政府的右翼小政党无不大大的惨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工农劳苦大众反战反法西斯情绪是如何的高涨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最近因物价高涨，生活恶劣而引起的工潮正风起云涌地爆发起来，弥漫于全日本，这种情势，无疑会使日本政府的扩军政策，统制政策，遭受打击。假如日本全国大众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能够更有组织更广泛地发展下去，对于阻止法西斯政策的进行，是会有着决定作用的。至于根本阻止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强行，中国民众的责任，当然要比日本国民来得更加重大。只有中国民众奋起抵抗，并且只有中国民众和日本民众联合起来抵抗，才能早日实现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目的。

一切严重的不正确的对日认识，一切幻想和日本统治阶级亲善的汉奸理论和由这种幻想出发的行动，对于当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极有害的，我们必须纠正它，打击它！我们必须指出：我们不能靠“外交策略”去促进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解除中国的民族危机；我们只能靠强硬的抵抗去促进前者，解除后者。我们不要幻想可以和日本统治阶级中任何一派联合，我们只能和日本不以榨取为生而且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民众联合。

我国国内的情形如何？

我们不能讳言，我们国内的情形一向是很糟的，比之敌人国内的情形还要糟得多。敌人国内，只有急进派和稳健派，侵略者

和反侵略者的对立；而我们国内则有抗日派和亲日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等等的对立，甚至在抗日派中，也有即时抗日和准备抗日的斗争。内乱不断爆发，外侮日益加深，我在小学时代就常常摇头叹息地写着“国将不国”了。这种“国将不国”的情形，不但“长期停滞”着，而且也日益发展着，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国难空前严重的刺激，由于全国同胞要求和平统一和抗敌御侮的迫切，才有渐渐好转的趋势。然而这毕竟还是一种趋势，这种好转的趋势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虽已巩固一些，在快要到来的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中，也将有进一步巩固的可能；但是，目前离团结全国上下，立刻发动抗战，收回失地，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时机似乎还很远，这种前途还须要全国同胞不断地继续争取！

抗敌御侮的障碍

目前抗敌御侮，收复失地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敌人的蛮强，而在于一部分人仍存苟安的幻想，为扫除这种障碍，我们就得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阻止一切公开和秘密汉奸的活动，打破他们的幻想。

总括起来说，从中日两国国内政治情势来看，目前“亲善”的可能已经很少了，尽管中日两国还有人在这件事继续活动着。不过，我们为要巩固已得的胜利，开展更大的更有望的前途，我们对于那些“亲善”的活动，仍有加紧监视和纠正的必要！

(三) 从军事上观察

替日本打算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算旧帐，但是为要使现在和未来不要一错

再错，检讨过去也是很必要的。不健忘的读者，大概总能记得：大约在两年半前，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中日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突然有人想用便宜的办法，打开“中日间的僵局”，发表洋洋万余言的文章，在那文章里，曾就军事方面替日本周详的“打算”过：

“我们现在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二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这是世上无论任何政略家或战略家所了然无疑的。现在日本如欲东与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与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

接着，这位作者还从多方面加以透彻的发挥，希望日本与中国“结成协调关系”，“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这位作者替日本打算固然十分周到；但他是否想到，假如日本真的采取较软的办法，希望和中国“结成协调关系”；驱使中国去做进攻苏联或美国的先锋，中国民族前途，还堪设想吗？侥幸日本毕竟没有接受那位先生的意见，然而日本政府看了那篇文章，似乎确也有所“感动”，所以不久之后，“中日经济提携”的呼声便甚嚣尘上；又不久，其中包含所谓“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也提出来了。但是，日本在战略上，决不简单地要“消弭侧背面的顾虑”，而是要怎样利用“这处在侧背面的邻国”（中国）的人力物力，以达到它“征服世界”的目的。为要达到这目的，它决不采取“一途”，而是

“两途并进”，即一面要与中国“提携”，一面又要以实力控制中国。广田的三原则，就是要在“提携”的美名下，以实力控制中国的明证。在这三原则中尤以“共同防共”一条，最为巧妙而毒辣。关于这“共同防共”原则本来已有许多人解释过，但似乎还嫌抽象，这里不妨再来考察一次：

中日军事协定的回顾

说到“共同防共”，我们不能不想起在第一节里面曾经提过的一九一八年日本强迫北洋军阀政府订定“中日军事协定”的往事。那时候，东方强盗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一方面，中国有那么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可以听日本予取予求；他方面，俄国革命刚告成功，基础尚未巩固，绝不放过机会的日本帝国主义，便决定大举出兵西伯利亚，同时强迫中国“共同防敌”。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出兵西伯利亚有囊括北满，外蒙和西伯利亚广大的领土的希望；在“共同防敌”的圈套中，中国不但要送人去替它当炮灰，供给军事资源，而且中国广大的领土都要被划入行军区域，中国的军权也要无形中落在它的手中。当时日本方面负责向中国交涉订结这“军事协定”的是旷代的侵略魔王田中义一；而中国方面极力促成这件事成功的是著名的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为要欺骗中国的昏庸政府，曾口口声声说“日本对中国实无野心”，“深望中国当局放开胸襟，勿以从前的日本相视，切实共同提携”。（章宗祥电外交部）。北洋军阀政府在威迫利诱之下，对日本的要求，便一一答应下来了。结果，订立了如下的军事协定：

关于海军方面主要的条文：

一、中日两国海军因敌国势力之东渐，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

次欧战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二、中日两国当局，届基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舰船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调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达共同防敌之目的。

三、中日海军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左记事项：

a. 关于直接作战上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为往来联络之任；

b. 为期军事行动及输运补充之敏活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

c. 关于修造舰艇兵器及军事机具等并其所需材料，应量力互相辅助，其军需亦同；

d. 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中日两国海军如有互相辅助的必要时，经一方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资遣用。

四、中日两国海军于必要时之地点，各自设置谍报机关，又互相交换行动上所要之水路图志及情报。

五、本协定及附属本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关于陆军方面主要的条文：

一、中日两国各派遣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各取军事行动，其任务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军，并排除德奥两国及为之援助之势力。期指挥之统一及协同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二、关于兵器及军需品之供给，虽紧急不得已之物品，可由前方司令互相协定，然其他物品及原料之供给，则应由东京及北京最高补给机关互相交涉行之。

三、关于卫生业务，中国如有所希望，日本应于力所能及之范围内，提供便利，将来情况进展，则关于病院及休养所之设施等，日本亦须受中国之助力。

四、兵器及其他军需材料并原料之供给及两国运输军队，各应担任之输送等费用，均须给价，应随时或军事终了后核算给之。

这个协定，在表面上好像是以“平等地位”订立的；但实际上却无异于承认日本得以军事控制中国。因为中国的“海军”事实上不能开到日本去，而日本的海军不但可以在“共同防敌”的美名下，随意开到中国来，而且还要得到“亲善”的待遇。中国所供给日本的是当炮灰的无辜的生命和丰富的资源（连运输费都要由中国支給），而日本所“帮助”中国的却是把中国人赶上屠场的指挥官和教练员。至于“行军区域”大部分是中国地方，更不必说了。

卖国误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当“协定”签字后，即依照日本的指示，组织参战军（后改为边防军），军火完全由日本供给，（后来日本就利用这些参战军作为“以华制华”的利器，造成直皖军阀的大混战）。假如当时欧战结束得迟一点，苏联的红军抵抗力弱一点，中国大众始终不起来反抗，皖系军阀的势力不在内战中消灭，那么，日本可以乘战胜的余威，藉在中国已造成了的有利条件，完全控制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共同防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不料在旧伤痕没有好，新伤痕还继续增加的时候，竟有那么一个“中国人”（？）自动提议再来一次“协调”，而日本却错认中国人个个都是那么混蛋，竟敢以“共同防共”的毒计，要中国上当。这“共同防共”的原则要比“共同防敌”进步多了。“防敌”还只限于对外，而“防共”却可以兼而“帮助”

中国安内。我们试想，假如中国同意了这原则，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第一，日本必根据这原则，要求中国与苏联绝交，陷中国国际地位于孤立。万一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爆发，则日本必驱使中国人做肉弹，霸占中国的军事资源，以中国领土为军事根据地。同时，我们不难想象，在这战争中假如日本战胜（可能性极少），则必进而灭亡中国，假如苏联战胜，则违背民意帮助敌人攻打友人的政府必为人民所惩罚。

第二，日本必根据这原则要求中国允许直接出兵帮助中国“剿共”，使中国的和平统一永无实现的希望，使日本军队可以侵占中国的任何地域。去年（一九三六年）五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订立《中日华北防共协定》，日本即继续增兵华北数达三万以上，事实上，日本早已藉这一纸“防共协定”，不废一粒子弹便把平津占据了。

因为“共同防共”是这么一个毒辣的，企图“不战而屈人国”的阴谋，所以中国人民就不能不坚决反对！

我们不能自寻死路

总之，日本要在军事上和中国“提携”是怀着不战而亡中国的阴谋，是要占中国的便宜。中国呢？无论从那方面看——从过去历史的教训来看也好，从目前日本的阴谋和眼前鲜红的血迹来看也好，从民族利益打算也好，从政府本身利害打算也好，中国与日本在军事上（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都没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要提携就只有自寻死路！

虽则到现在止，日本还没有放弃广田三原则，没有放弃“共同防共”的要求；但我们政府对此已明白的予以拒绝；在三中全会宣言中，政府已声明决定“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前进了，换句话

说，政府已表示不愿参加国际的侵略集团，与侵略者订结自寻死路的军事协定，而愿参加国际和平阵线了，这是政府极大的进步，是值得我们拥护和值得迅速促其实现的！

(四) 从外交上观察

强国无外交

当去年底中日“外交谈判”宣告“暂时”停顿的时候，东京《读卖新闻》曾用“强国无外交”的大字标题报道这段消息，以表示对川越外交“失态”的愤慨。这样的说法，骤看起来，似乎有点过于夸张；但事实上，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即使不是“无外交”，最少也是外交居于次要的地位。在别的“强国”，说到对外，大都以外交为前驱，以军事为后盾；但在日本，则军事高于一切。假如要用时髦的话来说，则日本可以说是“七分军事，三分外交”的国家了，日本评论家清泽冽也说：“日本最被轻视的分野是外交”，这话决非偶然。

日本为什么不重视外交呢？这与日本的政治机构和在“九·一八”后急进势力的抬头，有着密切的关系。谁都知道，日本军部在日本政治机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而自“九·一八”以后，急进势力愈益抬头，霞关的先生们也就更加不被重视了。

日本外交活跃的时期

当然，日本的外交，也有过活跃的时候；但那样的时候，大抵是在军事准备尚未充分或者是在军事侵略行不通的时候。比方，币原喜重郎是日本近代最出色的外交家，他先后曾做过五次外相，只要提起“币原外交”，至今犹为日本的元老重臣和金融资本家所赞绝。但是，这位出色的外交家最活跃的时候，也不过是

在“九·一八”以前，当军事侵略的准备尚未充分的时候，在那时他的“和平协调主义”才能大出风头，他的“经济提携”，“日支亲善”和“共存共荣”才能喊得满天价响；但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他这一套“和平协调”的把戏，马上就被日本军阀的马靴“断然”地“一蹴”掉了。

军事时期日本无须外交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时止，是日本对中国采取露骨的武装侵略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日本是不讲什么外交的。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员只是替日本的军阀向世界播送些掩耳盗铃的欺骗宣传，向国联辩护说“日本没有领土野心”而已。那时候，日本标榜的是“焦土外交”，这个“外交”口号，虽则由内田康哉外相的口中喊出来，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替日本“皇军”吹的进军喇叭罢了。

武装侵略招来的结果

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收获已经非常丰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国际地位的日益孤立，财政危机的日益深刻，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和日本民众反战情绪的日益高涨，使日本军阀不能不有所顾虑了。于是日本的外交又重新活跃起来。军阀们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只得把内田赶走，另请广田出来播送“回避战争”“万邦协和”的并不新奇的老调，来缓和对英美的矛盾，减轻对苏联的严重性；同时又可以使中国一部分“高等华人”松了一口气。假使那时中国能洞悉日本的弱点，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也决不致向日本继续断送那么多的民族利益！正因为中国太不争气，所以才使侵略者在“协和外交”的烟幕弹下又毫不费力地向中国攫取了无数的利益，才使侵略者竟敢得寸进尺地向我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到后来甚至又向政府

提出七大要求。但这次毕竟因为全国民众的反抗，因为政府接受民众的意见，才使侵略者的要求无法实现，才破天荒的造成了川越外交“失态”的奇迹！

佐藤弄什么花样？

在广田外交完全碰壁以后，侵略者马上又变换花样了，而且这一次花样，似乎比以前历次都要来得巧妙。以前，侵略者虽也说过“和平”“亲善”，但还未曾说过要以“平等地位”对待我们，而今次日本新外相佐藤居然要说：“完全独立国家间之交涉，应以平等地位为根据”，并且还说：“过去一切应付东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这位五年前曾在国联大会上尽量歪曲事实，主张以不平等待我们的佐藤先生，为什么这回毕竟这样客气呢？

“其实，拆穿了西洋镜，一点也不奇怪：第一，五年六个月来，中国所受的教训虽多；但侵略者所受的教训也同样多，它知道虚张声势，极易招来意外的抵抗，避名求实，乃是最好的侵略方式；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所最痛恨的事（在“抗日第一”的旗帜下，全国大团结）已经着着实现，这时候当然不敢用直率的手段，而只能在“平等互惠”的烟幕下，用阴谋手段使中国分化；第三，《日德协定》的成立，不但不能解日本国际孤立之围，反而更加促进了英、美、法、苏的联系，增加了日本武装吞并中国的困难；第四，日本国内民众对军阀执行冒险的政策，已经不满日甚，林内阁为了缓和这种不满的情绪，不能不先放几个烟幕弹作为“越境”之前的“应有布置”。（这是笔者在两个多月前发表在《自修大学》一辑五号上的对佐藤外交的分析，到现在看来还不算错。）

除了这四点以外，那就是希特勒“褐色指道精神”对日本的影响，加强了佐藤外交“亲善”的姿态。

佐藤外交的碰壁

岁月磋砣，这“日德集体创作”的“平等外交”，由佐藤外相第一次宣布（三月八日）到现在，又快要三个月了。除了儿玉谦次领导的经济考察团在中国一度活跃之外，似乎还没有很大的进展。其所以不能进展的原因，一面固由于日本军阀对华政策根本没有改变，所以对佐藤的“过分”宣扬“平等互惠”实在听不惯，处处要予以掣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已不像从前那么容易上当了。五月六日佐藤外相接见外国记者，当我国记者问及“外相在议会中说要以平等互惠为根据与中国进行谈判一层，是否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有将所言演成事实的机会”的时候，佐藤居然以极端悲观的口吻答复：“在我个人方面，将设法寻求种种类此的机会，但恐怕目前无机可乘了吧”；又说，“立时解决存在于华北的政治问题，殊感棘手”！为什么会“无机可乘”？为什么会“殊感棘手”呢？由这几句话，已经完全暴露了“平等外交”的矛盾了，原来所谓平等外交，是一面满口“平等”，一面又不能放弃广田三原则。假如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中国现在已充满了这样的呼声：“你们弄错了，我们并不需要你们改变手段，你们用硬的手段，我们固要抵抗，你们用软的手段，我们同样要抵抗，因为灭亡中国的广田三原则，我们根本不需要”！于是，佐藤先生便“殊感棘手”，“无机可乘”了。

日本外交的窘态

老实说，日本的“外交”，是从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窘态”毕露的：它现在退既不愿，进又不通，也许有人以为我这话说得太过火吧？那么，请等一下，让我告诉你：日本帝国主义“退既不愿”不单是面子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使它不能后退，因为它要是后退一步，不但要远落在别人之后，而且无异宣告自己的破产，那

么，一味“硬干”，一味前进好了，为什么“进又不通”呢？因为要硬干，要前进，无疑会促使中国立刻起来抗战，试问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有这种胆量没有？我敢断定它没有！第一，日本资本家不愿过早发动大规模战争，那是在上面说过的；第二，日本民众反战反法西斯情绪的高涨，那是在上面说过的；第三，中国不像过去的中国，中国各党各派已经开始团结，这是日本最害怕的；第四，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英、美、法、苏都可以成为中国抗敌的友军，这个和平阵线的力量无论如何，要比侵略阵线来得大，这也是日本所害怕的。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要硬干，就只有把三岛作孤注之一掷了。

我们不能乐观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于乐观；我们不能以为日本帝国主义有那么多多的困难，就会从此软弱下去！事实上，决不会这样的！它仍然要硬干，不过它现在正在找帮手，正在使用阴谋。找谁做帮手？大英帝国！因为日本觉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太不够了，非另找新帮手不可。使用什么阴谋？拉拢英国，就是一种阴谋。因为日本看得很明白，中国政府所以能较前强硬，虽由许多因素所促成，但英国对中国政府的撑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日本要压服中国，拉拢英国，离间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再贤明不过的办法了。

英国会不会受日本拉拢？

英国会不会受日本拉拢呢？英国绅士是素来动摇的，不久以前，罗斯爵士还曾两次到东京去求爱，那时日本的气焰正盛，索价非常高，使爵士碰了一鼻子灰回到伦敦三岛去；英国绅士受了这一次教训后，才渐渐改变它的远东政策，才决意支持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但是，英国绅士这种“转变”，是否靠得

住呢？会不会有别的作用呢？当时我国卓越的国际评论家伏生先生，为了警告国人，为了促使英国注意，曾写了一篇《英国在干什么》？在那篇文章里，引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如下：

“我们的故乡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土豪，像狼一般地贪婪；有一个劣绅，像狐狸一般地狡猾；又有一个农夫，像绵羊一般地懦弱。

这农夫一向就被土豪剥削欺侮着。农夫家里的田地都给霸占了，仓库里的麦子，也都卖掉，还了土豪的租了。所剩下的唯一家产，只是两头瘦牛和一匹老马。有一天，这农夫的牛踏坏了土豪田里的一根草，于是这土豪就向农夫提出了要求条件，要教农夫把剩下的两头牛一匹马，全送到土豪家里，作为赔款，不然就得送官究办。农夫原来最怕吃官司的，这一威吓还了得，论理他只有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条件。但在这时候，那位劣绅到了农夫的家里，就向农夫说：‘不要怕，有我呢’！农夫知道绅士先生是和县长打交道的，就胆大起来。不但没有接受土豪提出的条件，而且还和土豪家里的差人，相骂一场。土豪想不到农夫居然敢违抗，倒不好马上就送官。于是那农夫就得意洋洋地说：‘打耳光，陪笑脸，咱老子这回不干了。’

但是结果怎样呢？土豪和劣绅讲好了妥协的条件，土豪牵去了那两头瘦牛，劣绅牵去了那一匹老马。农夫还得向劣绅另行送上一份谢礼，回到家里，却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伏生先生说明：“这是一个比喻。土豪比方那一国，读者心里都会明白，用不到再解释。农夫自然是指倒霉的中国了。但是那位劣绅呢，我的意思却不一定是指着英国，至少我并没有这样希望着”。是的，我和伏生先生一样，并不希望英国做那位劣绅，

尤其不希望我们农夫的两头瘦牛和一匹老马都给他们牵了去，但这却是值得我们十二分警戒的。

不幸得很，土豪和我们所不希望他做劣绅的劣绅，目前正在“讲妥协条件”了。结果条件能讲得好或讲不好，目前还很难断定，因为他们能否把两头瘦牛和一匹老马分赃得平是一个问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条件，（如开放殖民地市场问题等）能否通通讲好，又是一个问题。但是，假如他们真的妥协成功了，那中国就真的倒霉了。

中国应该怎样对付？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我还是引用伏生先生的话，虽则这些话是在七个多月前说的。

“我们为保障领土主权抵抗外来侵略起见，固然不反对任何外国的援助，但是却不可不注重外交的自主。在目前这危急的关头，正确的自主外交，是只有以中国为主体联合一切反侵略的国家，建立远东的集体安全制度。我们固然要联络英国，但是我们尤其要联络美国和苏联，因为美国和苏联在目前都是远东反侵略的主要力量。反之，我们要是仍然倚赖某一强国的撑腰，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便不免自暴自弃，俯仰随人，到最后必然变成了强国外交的牺牲品，和上面说起的那可怜的农夫得到一样结局。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我们目前所万万不可忽略的啊！”

我们一方面要提防不要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要眼巴巴望着人家讲条件，自己却等待着做那可怜的农夫；他方面，我们更应该明白敌人在弄着什么阴谋，它一面虽在唱“平等”“亲善”，而另一面却正在准备进一步宰割我们！

“和平亲善”？请我们的一部分同胞不要再做这个梦吧！

(五) 从经济上观察

一个有力的意见

“任何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在不损我主权与领土原则之下，与我国合作，均所欢迎，惟‘抢的不谈，要的合作’，此种出卖国家利益之亡国合作，我人绝对不能接受，中日两国之经济提携，必须先将政治上障碍排除，方得实现，在冀东察北及走私多项问题未解决之前，中日经济合作，实无从谈起，本人愿为全国国民告者，两国在力量平等之下，始能合作，我人之欲与人合作，务须先有抗战之决心与力量——立法院院长孙科谈话（二、二一中央社）。”

这是我国政府要人中，初次对“中日经济提携”发表反对意见，这无疑是非常正确而且有力的意见。

痛心的事情

但是，痛心得很，这种“抢的不谈，要的合作”的勾当，到现在还由两方有力分子在积极推行中。其所以能够继续不断地推进，一方面固由于目前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势陷于空前的困难，不能不藉经济提携为利诱，以缓和中国民众的抗敌情绪，以准备进一步的军事侵略；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一部分有力分子，始终存有幻想，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人不是本着本身的利害关系，希望从经济提携来调整国交，使他们的利益不受威胁，就是认为中国可以用经济利益来缓和日本的军事侵略，使中国有喘息的余地。

荒唐的理论

这些存有幻想的人，在两年前，当日本还没有向我们提议

“经济提携”的时候，即曾以“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给，或适为中国所需要”（徐道邻先生语）的理论来向日本“劝诱”了；在“提携”了两年后的今日，仍然要说“日本之所长，或即中国之所短，日本所有余，或即中国所不足”（三月十七日《大公报》社论）。

我们试来检讨这种“立论”是否正确？

首先，说“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的人应该明白：除非我们承认中国永远做日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才能如此。因为“日本之所缺乏”无疑是大批的原料，而“中国之所需要”，当然(?)是大量的工业品了？好吧，中国永远供给日本原料，日本永远供给中国工业品，如此“相成相济，以通有无”（《大公报》），中国想不做日本的殖民地又怎能办得到呢？我们现在姑且把这三尺孩童都能明白的理论不谈，我们看看事实如何？

根据事实的分析

在两年前，就有人根据事实，根据精密的统计，证明：“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十分之八九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日本底主要输出品，一部分就是中国底主要输出品，而别一部分是中国底主要工业品。比方，日本输入占第一位的棉花，中国也占输入第一位；而占日本输出第二位的生丝，中国在一九三二——三三两年中，本来占输出第一位；是近来海外市场被日丝侵夺了，才落到第六位的。占日本输出第一位的棉织品和第三位底人造丝织品，目下都已经在中国市场给中国机织业以致命的打击”。（《新中华》三卷五期）。这是两年前的情形，两年后的现在，又怎样呢？请看下表：

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二月间日本主要输出入品的情形是这

样：(单位日金千圆)

输入品

棉花 850、452
羊毛 200、898
石油 182、769
肥料 105、057
机器 91、184
豆类 82、601
废铁旧铁 80、866
橡皮 72、957
化学产品 61、174
纸、人绢 67、107
木材 55、548
钢材 53、258
煤 50、887

输出品

棉织品 483、581
生丝 392、909
人造丝织品 149、170
机器 82、054
铁 76、402
罐头及食品 71、077
丝织品 68、027
针织品 49、988
车辆及其零件 48、871
毛织品 45、956
陶磁器 43、192
铁器 40、302
玩具 36、459

同期中国主要输出人品的情形又是这样：(单位国币千元)

输入品

钢铁及其他 108、033、526
机器及工具 58、358、109
车辆船艇 52、410、592
化学产品 51、902、583
杂类金属品 46、732、126
染料颜料 41、152、409
煤油 39、752、364
纸 38、335、954

输出品

桐油 73、378、654
蛋及产品 41、802、013
生熟皮货 39、201、652
生丝 36、712、890
花边 31、383、601
茶叶 30、661、711
棉花 28、197、719
锡锭块 26、768、934

输入品	输出品
棉花 36、180、793	猪鬃 25、303、746
木材 28、968、775	羊毛 20、022、468
米 26、870、659	芝麻 18、560、438
汽油 22、713、012	杂粮 18、116、324
糖 20、493、931	矿砂 15、437、546
.....	绸缎 12、998、249

我们把上面两个表加以分析，就会明白：我们所最需要的东西，日本不但不能供给，而且是它自己所需要的；而日本的主要输出品，一部分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另一部分也是中国工业的生产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反之，日本所能供给，或适为中国所需要”的理论，实在未免过于荒唐了。

日本要掠夺的和给我们的东西

那么，日本为什么又要和我们“提携”呢？

日本要和我们“提携”，主要是要得到下面的东西：

- 一、我们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棉花；
- 二、我们自己也逐渐需要的煤和铁；
- 三、我们自己不够供给的粮食；
- 四、其他。

日本要和我们“提携”，主要是要供给我们下面的东西：

- 一、我们自己也生产的棉布；
- 二、略略加工的蹩脚的钢铁和机器（原料仍出自中国）；
- 三、不耐用的化学制品和玩具；
- 四、其他。

此外，日本的野心还大哩！他因为没有钱向中国投资，却要

求中国政府整理旧债，即整理中国民众所绝对不能承认的“西原借款”，他想拿这些钱做老本转来荼毒中国人；还有，他想完全霸占中国的有军事意义的航空线、铁路、港湾、矿山和制铁业；还有，他想完全打倒中国的民族工业，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总之，日本是想中国完全变为他的殖民地！

“中日经济提携”的成绩

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想”就了事，而且自从提倡“中日经济提携”两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呢。

在贸易方面，日货的进口源源增加，由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一一·三九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一六·九一，私货的进口，尤为惊人，据估计，日私货的侵入已超过三亿元以上。所以结果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正规商业已经遭受了并且继续遭受着严重的摧残和打击；在工业方面，日本把我们重工业的原料“强劫”以去，把我们的轻工业几乎完全打倒；在金融方面，日本尽量起着破坏的作用，把中国的现银大批私运出口，连我们的海关职员也打得头破血流！

以上还是就全国方面一般的情形而论，若说到华北的情形，就更加惨痛了。关于这，骆耕漠先生著的《中日经济提携》（黑白丛书之二）已经说得相当详细，读者可以参考，这里不必重复多说了。

我们根据事实的分析和两年多来的惨痛经验，已经明白：在国民经济的本质上，中日间的利害绝无调和的可能；假如我们明知利害而仍甘心上当，则只有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只有使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完全破灭而已！

(六) 从文化上观察

不要做傻瓜

一个知识落后的人，虚心地去接受进步人的知识，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批判地去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不但是必要，而且是急需的。中国是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是有相当高度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有些地方要学习日本，批判地吸收日本文化的精华，那是谁都不能反对的。但是，假如你咬住这个原则，不问事实真相，认为“中日文化提携”也“不但是必要而且是急需的”，那么，你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我们必须认识，批判地去吸收别人文化的精华和奴颜婢膝地去接受别人文化的侵略，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为要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大众永远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决不希望奴隶们真的能吸收他们文化的精华，他们只希望奴隶们永远愚蠢、麻木和堕落。所以当他们的侵略殖民地的时候，他们不单是要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他们并且还要进行文化的侵略。更具体的说，他们不单是要用大炮毒瓦斯来屠杀殖民地大众，强迫他们订立卖身契，和控制他们经济的命脉，而且还要拿白兰地、鸦片烟和圣经来麻醉殖民地大众的头脑，使他们懂得“打你的左颊，予以右颊”！自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不能例外。日本对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已有相当效果了。文化呢？也正在“提携”中！

日本拿什么“文化”来侵略中国？

我们要知道中日“文化提携”的内容，必要首先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政策。

日本虽说是“先进”的国家；但是他的东西都是从别人学习而来的，他在“明治维新”以前是学习中国，明治维新以后，则是学习西欧。那么，他现在要用文化侵略中国，究竟拿什么东西来侵略呢？妙得很，他主要的不是拿西欧的东西，而是拿由中国学去的东西，“送回”给中国！

a. 佛教——佛教本来最初是由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可是日本现在却要以佛教来侵略中国。说起这件事，曾经有过一段笑话：欧战时，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条件，当中有一条是“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当时中国的士大夫看到了差不多要笑脱牙齿，他们认为日本的宗教都是由中国输入的，他有什么“教”可以向中国“布”呢？当时外交次长曹汝霖的说帖中也说：“所谓教者，未声明何教，不知所指，大抵为佛教也。佛教来自天竺，至中国后，仍传入日本，焉有由日本布入中国之理”？其实，我们只要冷静的想一想，就不难知道日本的毒计。他是要利用“布教”的名义，在中国内地到处建立寺院，组织佛教团体，侦察中国的消息；他是要拿佛教的信条，磨灭中国人的爱国知识，使中国人忘记了亡国的惨痛，使他们“今生”多吃苦，等到“来生”再来享受幸福！

b. 孔教——尤其妙不可言的是日本以尊孔来向我们号召，在东京大建孔子庙，郑孝胥也用了孔子“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道理，来说明中国应该受日本的统治。为什么日本要向我们“班门弄斧”呢？《新世纪》一卷二期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有人说：孔子是中国人，“尊孔”就是在提倡中国的民族意识。其实这话是太滑稽的。某民族的一种学说，一种哲学，一种宗教，如果是适合于使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同

时也仍可由异民族用为压迫自己民族的工具。这种例子本来是很多的。孔夫子都曾被蒙古人和满洲人用来统治过中国的，这在们，是还“记忆犹新”的：耶稣是基督教的创造者，但他是犹太人。当基督教由奴隶的宗教变成奴隶主人的宗教以后，即使是那绝端疯狂反对犹太人的现代希特勒党徒，却也是还要基督教。

我们中国旧时的帝王，不但曾经用孔教统治过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用过孔教来统治我们的藩邦。当现代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手里，掠夺去了这些藩邦以后，他们虽则骗去了中国的势力，但却保护了孔教，而且还进一步地提倡了孔教。如朝鲜，如安南这都算是彰明较著的。如果孔教可以激发民族意识的发展，各帝国主义者当然是不会做这些傻事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提倡孔教，正是为要抑止那里民族意识的发展。

孔子的哲学，无疑地，是统治者的哲学，是服从的哲学，是愚民的哲学。孔子最厌恶“反抗”（犯上），最厌恶民智的开通。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成现代语，就是：“老百姓可以拿来供驱使，但不可给他们有知识”。在这一点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侵略者和汉奸们特别的欢迎着他。”（新世纪一卷二期《论新启蒙运动》）。

佛教和孔教是日本拿来麻醉中国民众的主要工具，此外，基督教、天主教等，他都会善于利用的。

文化提携的实情

“中日文化提携”本来是在两年前倡议“中日经济提携”时一并提出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为了“谋由中日两国从文化方面，实现国民提携，以为中日提携具体策之一助”起见，曾向大藏省（财政部）提出“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这案是以现行规定为基础，将每年三百万元的固定经费，从昭和十一年（一九

三六年)起增加百万元,以“强化文化工作”。当时曾派遣文化事业部第一课长林安视察中国,伪“满”等各地实情,并草定“文化提携”的具体案,这案的内容大概如下:

1. 北平的人文科学,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虽为学术的协力,然有失于高深之嫌,须考虑直接的国民文化协力的方法;

2. 中国各方面均有“独特的病疫”,一如长江沿岸的风土病,医疗方法尚未发达,须考虑日本医学向这些方面活动,如同仁医院的扩张和补助方法等,须设法直接踏进中国国民的生活里面去;

3. 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最近有激增的倾向,须设法“优待”并“奖励”其留学;

4. 为谋“技术”的协力起见,须派遣技师,积极斡旋。

很明显,从这具体方案的第一条看,日本的“文化工作”,不但着眼在知识分子,而且还要惠及平民了。从第二条看,日本是企图戴起“慈善”的面具,侵入中国长江流域等腹地,来理治中国“独特的病疫”。从第三条看,日本要制造许多“知日派”(日本人称中国的亲日派为“知日派”),替他效忠。最后,他还要用“技术合作”的美名,来操纵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实权。

文化提携的成绩

两年来的成绩怎样呢?

北平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和“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本来在民国十四年就已成立了的。去年为了加紧“宣扬东方文化”,曾大加整理和刷新并添设近代科学图书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除予以同情协赞外,并订购《四部备要》各书二千四百余册赠予该馆。在两方热心“提携”和“宣扬”之下,郭沫若的《沫若文

集》在北平也被禁售了。原因是该书曾涉及中国古圣贤孟轲离婚和孔夫子吃饭的问题，有侮慢孔孟之嫌！

上海的“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是于去年十二月成立的。这图书馆的馆址是在上海四川路福州路转角宏业大楼的底层。共有六间房子，陈设精致，日文报纸杂志特别是儿童画报等相当多，招待也极“亲善”；但是中国人经常在里面看书的却并不多，这我可不懂得是什么道理了。

在日本对留学生的“优待”和“奖励”之下，两年来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学生大大的增多了，据说，最近已超过了六七千人，日本到底对这些留学生怎样“优待”呢？你若果是对日本“亲善”的，你若果是经常跑咖啡店和跳舞厅的，那么，当然可以另眼相看；反之，你若果是真真用功的，或者你是要读进步书籍的，那么，你的脑袋就要挨打。前两个月，就有大批的留学生被打穿了脑袋赶回来！其次，日本对待留学生最毒辣的手段是用阴谋促成“各党各派”的对立和互斗，前几个月，“留日同学会”的朋友们就是受了日本人的鼓动，将“学联会”的朋友们打得头破血流！

以上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文化提携”，但日本认为这未免“偏重学术方面，和中国民众接触的机会太少，因此未获得充分效果”。为补救计，特于去年五月在天津济南设立“产业研究所”，“对于政府开发华北经济的政策，予以侧面的帮助”！去年十二月又在天津设立“第一农场试验场”，并拟在滦县和冀北设立第二和第三场。在岐口则积极进行设立大规模的捕渔场……。总之，日本是藉“技术合作”之名，而行无微不至的侵略之实！

但是，日本还不以这样的“提携”为满足，他还要用武力威吓那些患“恐日病”的人，要他们执行修改教科书的使命，把那些有关于抗日排日，唤起中国民族意识的一字一句，都予以“根

绝”。他想用这样野蛮的方法一下子把中国人子子孙孙的民族意识完全消灭！

试问：这样的“文化提携”我们能够容忍吗？

二 中日两国暂时亲善的可能吗？

中国不应至死不悟！

在上面，我们从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扼要地加以观察，已经客观地指出：除非中国甘心做日本的奴隶，中日两国在现阶段根本没有亲善的可能。这个由事实所得的结论，不，这个由惨痛的教训所得的认识，每个中国人早就应该把握到的了。因为中国受日本的压迫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而是已经有六十多年惨痛的历史了。在五年前，陈振先先生替《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序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警告过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知将来，可观既往，人有其舅死于虎，不久其夫又死焉，不久其子又死焉，而犹望此虎今后之或慈于我而不为之备也，斯真至死不悟者也！”

至死不悟大有人在

可是不幸得很，这样“望此虎今后或慈于我”的人，还多得很！这些人所以如此糊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只“虎”的贪得无厌，而是因为他们过分的害怕那只“虎”。他们把敌人的力量过分的夸大，把自己的力量过分的看得渺小，他们真的把敌人当作猛虎，而把自己当作绵羊或是虾蟆。两年前我读过一篇叫做《对日的两条路线》的文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话：“今日的中国，

正是一只羊，到处是虎，还想偷生吗”？又说：“中国今日真真正正的还只是一只虾蟆”！因为该文作者认为中国是一只羊，一只虾蟆，所以强调地说中国不能抵抗，抵抗便是“一条求死的路”（大意如此）。

不抵抗又怎么办呢？该文作者指出另一条路：

“认定目前的形势，东北四省决非武力所可收复，如此则惟有照××屡电所说的，确立一个最低限度，所谓最低限度，即决心不承认伪满，在最低限度之内，可以忍让，可以委曲求全，逾乎最低限度，则惟有决裂，惟有牺牲，宁死不辱”。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呢？据该文作者解释：这个办法有三个作用：

“其一，在一面极力忍让的时候，一面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做准备的工作，去做充实国力的工作；……”

其二，以我们中华民族忍让的态度，牺牲的决心，奋斗的精神，或者可以感动日本人使之觉悟与中国为敌，不如与中国为友，如此庶几东北四省问题或者可以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以和平的方法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

其三，在一面忍让一面准备当中，等待国际形势的推移。……”

事实胜于雄辩

时光过得真快，自该文发表后，中国事实上又“忍让”了两年多了，结果怎样呢？结果，中国的国难更加严重了！因为，敌人看到你愈“忍让”，他就愈要得寸进尺，愈要向你多割几刀：提出三原则之后，继续又提出七大要求！由此可以看到“忍让的态度”，永远也不能“感动日本人”！“以和平的方法”，永远也不能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

那么，我们换一个办法，不采取“忍让”，而采取“抵抗”的办法，是不是真的是“一条求死的路”，是不是“不能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呢？事实又与那种估计相反！绥远局部抗战的胜利，不但证明抵抗不是“一条求死的路”，而且还证明抵抗可以收复失地！

又一种新学说

自从绥东局部抗战胜利后，使“中国今日真真正正的还只是一只虾蟆”或“一只羊”之说失了根据；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更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大的增加起来。目前似乎再没有人说“尽现时全国所有的力量而一战，已是没有把握，能否集中全国的力量，更是没有把握”的话了；但是继这种畏日如虎论之后，又出现了一种非常乐观的论调：他们认为中国的“非常时”已经过去，现在已入“常时”的阶段，是安心“建设”的阶段了。他们所以如此“乐观”，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地位已经有了非常的改善，所以日本已不能不对我们另眼相看，甚至不能不向我们“伸手求和”了；另一方面则认为日本“军部与资本家合作之新局面，预料将相当延长，而日本外交之暂趋和平，在其本身利害上，盖有其必然的需要”。于是，他们“本此观点”，断定“中日关系，在现阶段下，至少不致再有恶化”，（四·十三《大公报》社评）

中日关系不致再恶化吗？

这样的分析，显然和我们上面的分析相差很远。自然，我们不否认中国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内情形有了相当的好转，因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因此就向我们“伸手求和”，他至多也不过暂时换一副侵略的面孔，改变一下侵略的手段；我们也不否认，日本“军部和资本家合作的新局面”，有“相当延长”的可能；但是“中日关系，在

现阶段下”，不见得就因此“不致再有恶化”；要知道，军部和资本家的苟合局面，虽然极力排斥“观念的急进”！但决不致放弃“实践的急进”！日本第七十届议会通过空前庞大的预算案，最近日伪军在绥东的积极活动，日军在华北的加紧布置，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虚伪的暂时亲善到底于谁有利？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目前中日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中日两国连像日本所希望的虚伪的暂时的“亲善”也不可能呢？我的话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当敌人在国际地位正陷于非常的孤立，英、日谈判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准备还没有十分充分，中国也还没有立刻收复失地的决心和行动的现在，中、日间虚伪的暂时的“亲善”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不过，这样的“亲善”，要是真能实现，到底吃亏的是谁，我们不难想象！

也许到现在止，还有人认为，只要日本暂时对中国不采取军事的侵略，中国即使吃一点“小亏”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中国便可以多做一分准备的工作。

这话骤看起来，好像很有理由；但是只要仔细一想，就会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当然，我们承认，抗敌是需要真正的准备的（怎样叫真正的准备？下一节再说）；但若果一方面对敌人继续退让，另一方面又说如何如何准备，这样的准备，无疑是有益于敌人的准备。关于这一点，立法院委员张西曼先生说得好：

“现今我们祖国已踏进灭亡的阶段。在丧失多数主权领土的事态下而仍憧憬对生死敌人谈什么片面的“亲善”和“邦交调整”，结局必定“割肉饲虎，残躯不保”！以言枝枝节节的物质准备，就是百年也赶不上敌人“先进”的优势，更何堪一再坐视它们深入我

们堂奥准备了它们所要“准备”的呢！自东三省热察和绥北大部盟旗的沦亡，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日蹙。……

“我们暂时可不谈华北和他处的危机，来把“汉贼不两立”的偏安局势分析一下。如果长江流域能够具备民族复兴的保障条件的话，自也无妨选择一个所谓“堪察加”(?)的根据地徐图恢复。不过我们现在就来作这个妄想，却是忘却殖民地身份的糊涂虫。毒恶的敌人已经是“无孔不入”。他们不但节节侵吞我们那些要待开发的经济地带，就是偏远些的新疆、宁夏等处，也都布置了严密的侦探特务网。他们利用了内河航行，租界和毗连区域驻军种种的特权，而在上海、汉口作种种阵地的布置，更是公开的事实。他们准备在“半壁河山”的咽喉心腹要害制我们的死命，要把我们四肢砍断，再来结束这神经中枢不健全的头颅”。(《积极救亡和慢性中毒》)。

事实确是这样，说到物质的准备，我们还可以举例来证明。据军事家的估计，“中国的兵工厂即使日夜开工，每天也造不出五百支步枪；但敌人的兵工厂，每天却可以毫不费力的造出七百支步枪。至于高级一点的器械，不要说高射炮、轰炸战斗机和新式战车，就拿机关枪来说，在同一时间内，我们的制造能力平均还不及敌人的三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我们准备了一个月，其成绩不及敌人一天的准备。器械方面是如此，其他方面（如军需准备，交通器具等），也莫不如此。这样，我们的“准备”时间愈久，即我们的实力愈不及敌人，亦即一旦接触，我们的败亡必愈快”！

再就绥东的抗战来说，假如我军在收复百灵庙、大庙子之后，立刻一鼓作气把多伦、察北完全收复，一定毫不费力；但是中国当时却没有这样的勇气，到现在敌人在那方面的准备更加充

实了。多伦的飞机场、营房、仓库、宿舍等，现正在积极扩大建筑，多伦至沽源、张北一带，军运的繁忙，为以前所少见；日伪军正在加紧训练和扩张中，“内蒙古军”扩编至三师以上；关东军司令植田甚至亲自出马，赴热察视察后，决心在察北增驻日军一旅团，并设“内蒙”司令部……。无疑的，假如我们现在要收复多伦、察北就必要费更大的力量！假如我们现在还不去收复多伦、察北（作为收复失地的第一步），敌人必然很快就要来“收复”我们的百灵庙、绥远以至整个华北了。

总之，在现状下，我们要苟安，要和敌人谈“亲善”，利益无疑要落在敌人的手上，毒害无疑要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一点，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必有的常识了。

三 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问题的中心

当前中、日间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完全把日本请出中国去抑日本完全把中国灭亡的问题。要是这一中心问题不能解决，则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为止，中日间将永远有问题。目前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哪里？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中、日问题的关键在日本，只要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中日问题便可以解决了”。这话若果站在外交家的立场说，当然“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在说官话。这话若果是出自普通人之口，那么，对不起，我们只能这样不客气的对

他说，“你只想取消问题，或者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者可怜你，而并没有指出问题关键的所在”！因为事实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除非我们用铁和血把日本的大陆政策完全粉碎，日本是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的！既然日本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既然日本灭亡中国的整个政策是不会变更的，那么，彻底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日本，而在我们，在于我们是否有抗敌的决心和抗敌的真正准备！

怎样才算有抗敌的决心？

不幻想敌人会自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不幻想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中日问题，抱定“抗敌则生，降敌则死”的坚决的信念，准备与敌人一拼，那才说得上有了抗敌的决心。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抗敌的决心呢？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告诉我们：“即使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表明政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表明政府已经有了“抗战”的决心了。不过宣言又说：“假使和平之期望犹未完全断绝，吾人固仍愿确守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下，求其初步之解决，使匪伪失其依附，主权克臻完整，如是则两国间悬而未决之问题，虽未完全着落，而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之可能，始得露其端倪”。这又很容易使人误会政府抗战的决心尚未彻底，误会政府还存有“和平之期望犹未断绝”和“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的幻想。这种误会，我们希望政府在实践中使它消除；同时希望全国同胞起来拥护政府抗战的决心，使政府真能实现抗战的诺言！

什么是真正的准备？

要实行抗战，当然要有真正的准备。所谓真正的准备，我以为应具备下面诸条件：

第一，要动员全国力量。这个道理是很显然的。敌人以“举

“全国一致”的力量以谋我，假如我们不能以全国的力量来对付，则失败以外无他途。如果说，抗敌救亡，可以委诸几个上层领袖或二百万大兵的身上，那也是除了失败以外，不能有别的希望。因为能真正负责领导救亡的领袖，固然十分需要；但是所谓领袖，原不过是群众的领导者的意思，要是只有领袖，而没有群众，没有全国的力量为后盾，那无论任何万能的领袖都无法独力地负得起这救亡的重任！至于说到二百万大兵，也不能担负起抗敌救亡的任务，因为我们有二百万大兵，而敌人在战时却可以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大兵，我们单靠这二百万大兵，又怎能靠得住呢？如果说，我们的“精神文明”（礼义廉耻之类）可以战胜敌人的“物质文明”（飞机坦克车之类），那么，鸦片战争以来一切被外国强盗压迫的惨史不会发生了。老实说，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不及敌人，无论是物质文明或精神训练；我们所能够战胜敌人的就在我们有庞大的国力，特别是国力中的人力。因为敌人连台湾、朝鲜在内，只有九千万人口，其中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不过十之一二，而我们则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大半都有抗战的决心和抗敌的迫切要求的。所以我们要真正抗敌，要有真正抗敌的准备，就只有动员全国力量，特别是全国的人力。

我们怎样才能动员全国的力量呢？舍实行民主政治以外无他途！这个道理也是很显然的。所谓动员全国力量，除人力外还有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固然非全国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使他们由散砂变为水门汀不可，我们要动员全国的智力，固然非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使大家能尽量发表意见，讨论救亡大计不可；我们就是要动员全国的物力和财力，又何尝不需要藉言论出版等自由之助，才能使全国人民不问贫富，都踊跃输将，毁家纾难呢？由此可以明白，动员全国力量是真正备战的

必要条件，而民主政治则是达到动员全国力量的必要手段！

第二，要立刻联合世界的抗日势力。我们不能否认，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已经和侵略国家的德、意联成一气，缔结了军事同盟；而我们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到今天止，我们还没有和任何可靠的友邦取得密切的联系。如今我们要抗日，要作抗日的真正准备，我们就不但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我们还须联合国际上一切抗日的力量。不过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要和别的国家联合，决不是依靠别的国家或执行别的外交政策。比如说，我们要和英国联合，决不是依靠英国或执行伦敦的外交政策；要和美国联合，决不是依靠美国或执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要和法国联合，也决不是依靠法国或执行巴黎的外交政策。我们要和一切反日的国家联合；然而不是依靠一切国家和受他们外交政策的支配，我们是要以独立自主的立场，和他们联合起来，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第三，要对敌人不再作半步的退让。假如一面空谈准备，一面对敌人让步，就无异取消准备。因为任何微小的退让，都是对自己有极大的损失，对敌人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要真正准备抗战，就不应该和敌人再进行什么“和平谈判”，更不应该在谈判中有半步的退让！

第四，要肃清一切亲日的势力。在今天，亲日势力已成为抗敌救亡的最大障碍，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有把这些势力彻底肃清，抗敌战争才能顺利进行。

以上四点，是真正准备抗战必备的起码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是真的准备，否则便是假的欺人的准备。同时以上四点，是相联而不可分离的，缺少了一点，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正准备，就无法完成抗敌救亡的任务。

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准备

从第一点来衡量，中国民主政治目前还只是一线的曙光。这一线曙光将扩展为太阳抑将昙花一现地消灭，就要看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否在国民的督促下逐渐兑现和快要到来的国民大会的情形如何了。三中全会后的实状如何，是大家明白，我们不必多说；说到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过去缺点很多，实在说不上合乎民主的原则，但自从经过中央政治会议修正后（主要是把国府圈定候选人的规定删去，而增加指定代表二百四十人），却有了若干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国民当然是欢迎的，然而觉得是不够的，“指定代表”不管如何“公平”，与民主原则总有出入；其他代表选举法应该修改的地方（如“经公民宣誓者”的规定，政治犯的没有选举权等），很多还没有修正。我们希望政府还有更妥善的补救办法，以求合于民主。同时，全国同胞，为了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力量，为了促进抗战，和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民主权利的获得，还须努力争取！

从第二点来衡量，也还在希望中。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中，虽已提到“其他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前进”，表明政府已有了和一切和平国家（反侵略国家）联合的倾向；但到现在为止，除了和英国比较有密切的关系外，对其他各国，如美国、法国和苏联，似乎还没有进行联合的切实行动。我们在上而说过，在国际和平阵线中，英国是最容易和侵略国妥协的国家，事实上，他目前正在和我们的生死敌人进行着“对华合作”谈判呢。为了防止我们仅有的“两头瘦牛，一匹老马”不被他们牵去，不，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解放，我们此刻不能再等待，再取静观变化的态度了。我们现在一方面要严防他们联合抢劫，一方面须迅速和其他可靠的友邦（如苏联）切实联合起来，增厚我们的

力量!

从第三点来衡量，情形还不能乐观。虽然政府已有不再退让的表示，这种表示我们当然认为是政府极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欢迎这种进步；但是只要“和平谈判”仍然进行，对于我们总是害多利少的，因为一切中、日间谈判的本质无他，“不过日方企图不但保守业经夺得的大幅中国领土，并且进而统制全中国而已”。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这样的“和平”谈判!

从第四点来衡量，情形更不能乐观了。我们不能讳言，中国到今天所以还不能实行全国规模的抗战，亲日势力的阻挠，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希望全国同胞，加紧督促政府，实行清毒工作!

虽然许多实际情形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中国今天的现状，无论如何要比过去总算好了许多；我们要努力巩固好的地方，极力促进改善坏的地方!

归根到底，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无疑是系于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四 中日关系的前途

我们须要总清算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中日两国，决不是自古以来就成为敌人，中日两国所以成为敌人，完全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从中作怪。在过去，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能发展，结果，日本便渐渐变成了一个侵略者，而中国则渐

渐变成了一个被侵略者；跟着，中日两国也渐渐由友人变为敌人了。六十年来，中、日间的旧帐实在太多了。到现在，日本在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而中国则在被侵略的过程中，早已降到悲惨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假如我们现在不来一次总清算，假如我们不把现状改变一下，那么，中国和日本永远也不能由敌人再变为友人！

我们现在须要求一次总清算，我们须要改变现状，在经过一次总清算，在现状改变以后，中日间的关系就会完全和现在不同了。怎样不同呢？

两种前途

在上面说过，当前中日间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把日本请出去，抑日本把中国灭亡的问题。因此，在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的前途就只有两种：一种是光明的前途，那就是经过总清算后，中国站起身来，把日本请出中国去，结果，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大和民族必然也在这种过程中从法西斯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于是两大民族便可以以真正平等的地位紧密地携起手来，那时候的“中日亲善”才算得真的亲善，那时候的“中日提携”才算得真的提携！另一种前途，是非常悲惨的前途，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起来作总清算，或者在总清算中，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国完全灭亡，结果，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成为少数人支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这两种前途到底那一种的可能性大呢？

胜利一定落在我们手上

从历史的必然来说，日本帝国主义终归有一天要消灭，而中华民族也就终归有一天要抬头的；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知道，假如中国对敌人的侵略始终不抵抗，假如我们始终不起

来和敌人来一次总清算，那么，中国在最近的将来，被日本完全灭亡的前途还是十分可能的。印度的被英国灭亡，朝鲜的被日本灭亡，我们东四省的被日本强占，便是前车之鉴。不过，我们现在到底和印度、朝鲜的灭亡和东四省被强占时的情形不同了。现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候，现在是中华民族开始抬头的时候了。我们民众已经有了抗战的决心，政府已经开始有抗战的准备了。我们只要加紧努力，加紧把民族的抗敌阵线巩固起来，加速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则胜利的把握必然要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应该把握这个伟大的信念，不断地努力前进，最后才能达到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

1937年5月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①

第一章 回顾

抗日战争八年的事实已经够丰富了，但故事还得从抗日战争以前说起，因为那一段历史实在有回顾的必要。

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明显的暴露出来。危机之所以严重，倒还不是因为日本侵略无法抗拒，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当时国民党当局发明了一项对付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办法：“谈抗日者斩！”在这种政策下，身陷囹圄的和因要求抗日而死难的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有惊人的数量。

以中国之大，当时有谈抗日的自由的地方，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区域。“九·一八”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中国红军就坚主对日抗战，随后红军又要求同国民党军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一致抗日。红军的要求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的同意，唯一的出路就是单独抗日。当时红军是处在重重封锁与包围之

下，为了能到达抗日前线，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冲破重围以开赴抗日前线。

首先，于一九三四年七月派出了一支抗日先遣队，向浙赣边境出动。其后，中央红军主力于同年十月也开始突围，为了绕过国民党军队的强力封锁线，改取先向西北进军然后再进行东征的迂回行动——这就是著名的长征。

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不是用简单的篇幅所能说完了的。这是红军有史以来无数次考验中最严重的一次。当时关心红军的人，都替红军担忧；反对红军的人，则断定红军要失败。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当红军到达大渡河边的天险时，不是有人曾经引过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失败为例，认定红军一定要踏石达开的覆辙，而被消灭在安顺场吗？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红军，不仅能克服这一历史上的英雄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安然渡过了大渡河，而且以后还走过了人迹罕至、连世界探险家也没有到过的雪山草地，行程约近四十天，克服了比大渡河更严重的困难。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不想多谈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参加这一长征的十数万健儿，他们的精神，确值得千秋万世所钦敬。他们为了挽救祖国的沦亡，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不管经过多少折磨，遭遇多少牺牲，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时刻不忘的，就是打日本救中国。在长征途中，他们唱着这样的歌：

其一

目前的中心任务，
要打日本兵，
收复华北东三省，

保卫民族。
红军越打越有劲，
团结像一人，
我们的伟大任务，
一定完成。

其二

同志们快快起来拿着枪，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要挣脱日本强盗的束缚，
要创造民主的共和邦。

……

事实上，红军在长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支武装宣传队，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向沿途广大的人民和阻击红军的军队都作了艰苦深入的宣传。当不得已要和追击和截击的部队作战时，红军战士就高喊：

“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

红军这种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对于中国人民和国民党统辖下的军队，是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红军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快就为全国人民所响应，北平学生的奋斗，上海文化界的活跃，全国各地救国运动的兴起，与红军的奋斗正相配合，酝酿着新的时代，形成了新的救亡运动的高潮。

红军为着贯彻党中央的主张，对于当时处于对抗地位的军

队，不仅仅是宣传而已，而且主要的是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赤诚。

当时有人以为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是疲惫之师，红军这种救国主张，不过是无能作战的“缓兵之计”。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了。那时红军的军事行动，只是作为自卫的手段：有时和对方遭遇，打了胜仗，就将缴获的人，枪送回，以这样的忍耐与诚挚来感动对方。红军抵达陕北后，略事休整，于一九三六年春急急东渡黄河抗日，但这一次又不能如愿以偿。为了避免与本国军队进行决战，以期保存双方国防力量，红军又自动撤回河西，通电全国，继续呼吁停止内战。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证明了“缓兵之计”的胡说之破产。

反共将军胡宗南所部，当时对红军还是相煎甚急。一九三六年秋，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进至甘南时，反共军就想乘机取利，派遣十几个师日夜尾追，红军对他再四劝告，没有任何效果。十一月的山城堡一战——这是国内战争最后一次较大的战役——才算给了国民党军队一个事实的教训，停止了他们由南方的进攻。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大汇合，推动了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阶段。当时我们坚信：全民族一致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日子，必然要到来，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接着，著名的“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但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张杨乃联合行动逮捕蒋介石。这就

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后的混乱局面，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日寇、汉奸、托派和亲日派互相勾结，企图乘机挑动大规模内战。亲日派一面竭力煽动内战的空气，调兵遣将，跃跃欲试，一面又电召汪逆精卫回国，以便共同进行亲日倒蒋反共的大阴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使国内分裂和混乱局面扩大，自己好混水摸鱼；而日寇同盟社，天天散放荒诞谣言，以与亲日派配合。

在这种情形下，红军当时为着反对日寇、汉奸、亲日派的阴谋，就挺身而出调解，从陕北急行军南下，不几日就全部出现于西安附近。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努力，使内战危机得以避免，蒋介石的生命得以获救，汉奸亲日派的内战阴谋终归失败。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其所领导的红军为着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对内要说服“左”倾的同志，对外要说服发动事变的友军。后来成了叛徒和特务的张国焘，在当时就是力主杀蒋的人，他曾深夜数次扣毛主席的门，固执地提议：“还是把他杀了吧！”终没有为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所采纳。而一部分友军，又在托匪张慕陶等煽动之下，要说服他们也是煞费苦心的。当时情况之复杂，真可说是瞬息万变，而国家民族存亡，也是千钧一发。正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只破船，稍一不慎，就有覆舟的危险。伟大的舵师中共中央及其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却异常镇静地将船驶出恶浪，化险为夷，使全船的人获救。

这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当时广大群众，目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目睹红军调停斡旋之功，加倍对红军钦佩和爱戴。在西安附近，曾造成群众劳军

和参军热潮。老婆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参加红军的消息，日有所闻。在商县，曾经有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婆婆，送她两个儿子来当红军，一个因年龄太小，被婉言谢绝。老婆婆说：“把我的大娃留下吧。小娃我带回去，过几年长大了，一定再送他来！”还有一个老婆婆送她的独养子当红军，说：“这是我的独子，请你们好好教导他，让他去打日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就在政治上做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大让步，要求把自己变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在红军的部队中，则提出这样的口号：

“为创造模范的抗日军队而斗争！”

于是，整个红军部队立刻变成一个学校，热烈的进行读书、识字、出操、上课……每个指战员都投入了习文练武的热潮，准备在与日寇接触之前，练得文武双全的本领。

日寇对中国的进攻终于开始了。这事虽然早在意料之中，然而芦沟桥的炮声，不得不激起红军全体的万分激动。当时就由红军将领署名，立即发出了通电。在通电内提出这样的要求：

“请求立即明令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抗日先锋！”

等待允许抗日的命令，真使全体指战员等得不耐烦了！八月初，自动集中部队进行改编，进行上前线的准备工作。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在抗日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承认朱德同志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朱彭发表就职通电，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番号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随即举行了誓师大会，立刻向前线出动。

民众欢送的热烈，简直难以形容。远在西安的群众，不顾国民党党部的禁止，纷纷自动前来劳军。西安有五个青年女学生，居然瞒着家里人，秘密地绣了一面红旗，托了可靠的人送给八

路军。

在中央红军北上后留守南方各红色区域的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了，他们即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指令，与国民党谈判，实现了南方的停战，并开赴东线杀敌。在和平谈判中，发生过许多波折，如在闽南区云霄、诏安的游击队约千余人，与国民党军谈判后下山集中，詎料对方不讲信义，竟将他们包围缴械。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形。后经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才决定改编为新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军部成立。散处大江南北七八省的游击队，跋涉数千里，终于开赴前线对日寇作战了！

为了争取抗战的实现，八路军新四军虽经过许多折磨，但怀抱多年的抗战夙愿，终于达到了。

第二章 深入敌后，开辟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

一 大战平型关

抗战初期，日寇来势汹汹，在华北由七个师团遂渐增加到十二个半师团，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三个月内吞灭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有七八十万；但一遇到敌人，就望风而溃，有些国民党军队一退就是几百里，如李服膺在敌人占领大同时，用望远镜还望不到敌人，就拔脚逃跑，直向雁门关以南撤退；汤恩伯在万全（张家口）陷落

后，一直退到广灵蔚县之线，还无法重新组织抵抗，使敌如入无人之境。华北人民遭了空前大难，失望之余，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当八路军还没有到达前线时，河北省的人民就纷纷传说：红军分三路来了，一路到了山西，一路到了绥远，还有一路向山海关开去。这种传说，在当时虽还不是事实，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希望。

当华北战场十分危急的时候，八路军果真来了。八路军是在九月间陆续从韩城和潼关两处开入山西的。在过去对于红军有过深刻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能亲眼看着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上抗日前线，自然感到无限的兴奋。八路军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直到原平下车。这一路上，所过的城镇、车站、村庄，莫不遇到广大群众扶老携幼的夹道欢呼。我们有一列兵车，过太原时，已在深夜十二时，而大批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都拥挤在车站上，整夜不眠地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群众对八路军这样的热忱拥护与期待，自然是对我们全体将士很大的鼓舞与激励！

这时，敌人正分两路南下，一路由大同直下，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因此，八路军也分为两路，一路开晋西北，一路开晋东北，去迎击敌人。

八路军从太原北上，特别是在原平下车以后，沿途所见，就未免使人触目惊心了。一批一批南逃的溃兵，用步抢挑着子弹、手榴弹、包裹、母鸡等，潮水似的涌下来。他们沿途宣传“敌人厉害”，散布失败情绪。我们的战士安慰与鼓励他们，有些溃兵说：“你们吹牛皮，你们自己上去试试看！”我们的战士问他们“敌人有多少？”他们说：“数不清。”又问：“为什么退下来？”有的说：“敌人有飞机坦克……敌人的炮弹比我们机关枪子弹还多！”有的又

说：“子弹打完了，又找不到长官，就退下来了。”又问：“你们打死多少敌人？”他们说：“我们没有见过日本鬼子！”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拚几下？”答：“没人指挥，拚不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情绪。八路军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开上前线，我们每个指战员不但毫不因此而动摇自己胜利的信心，反之，他们却要很快用打胜仗来澄清这种混乱情势。

开赴晋东北的一路，是一一五师。九月中旬，我师主力赶到平型关以西大营镇集结待机。

平型关是山西和河北的接合部，敌人选中了这个薄弱的地方；但我们却有计划地使它占不到便宜。那时，进攻平型关的敌人已经迫近灵邱了。国民党军队一再要求我军增援灵邱正面，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率领主力到达大营后，就亲自乘军用汽车带着无线电赶到灵邱城，这时敌人只离城十几里了。林师长在灵邱调查了敌我情况和地形，依据当时国民党军队溃退和敌人锐进的情况估计，如果采取增援灵邱的办法，就一则使我军仓皇应战，同时有被国民党的溃乱部队破坏战斗阵势的可能，于是就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配合友军在平型关的正面防御，等敌人仰攻平型关时，我军就出敌不意，从侧后予以猛烈的袭击。林师长在灵邱决定了这个方针，就急电在大营待命的部队星夜开赴平型关东南的山地隐蔽，对敌断绝交通，封锁消息。林师长也就赶回部队，做周密的布置。

当队伍到达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和上寨的时候，灵邱失守了。那时国民党的溃兵还是三五成群的往后方跑。晚上，又有一批溃兵，带着机关枪和步枪，到我们驻地的上寨敲老百姓铺子的门，老百姓害怕不敢开；溃兵们就骂：“亡国奴！不开门打死你！”老太婆出来把门打开，给他们煮饭烧开水；逃兵们不吃饭，只抢

东西，把香烟、布匹、鞋子都抢光了。老百姓哭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向我们诉说：“这些人和土匪一样！”我们只好用好言抚慰，老百姓说：“你们才是真正保国卫民的军队！”

二十三日上午，林师长在上寨集合全师连以上干部开动员会议，说明当时情况，我们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注意之点，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带打一个大仗，给兽军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部队一个兴奋！”会议开到这里，就接到友军电报，说敌人先头部队已进到平型关附近，与他们正进行炮战。林师长当即决定以骑兵全部步兵一部向灵邱方面出动，担任牵制和打击敌增援部队的任务，以便师的主力在平型关附近决战。当夜师部就率领主力赶到离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

从上寨到冉庄的路上，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声。这一带的群众，都跑光了。前几天，我们的部队在这里住过，那时这一带群众，不了解八路军，都跑了。我们的同志到山沟里去找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要怕！”最初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八路军”，我们的同志就向他们解释：“八路军就是从前的红军，从陕西开过来的。”他们才知道了。他们就一批一批笑嘻嘻地回到家里来。但这一回重返旧地，不知什么时候老百姓又跑了。那时的群众是没有组织与领导的，他们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同样害怕，见到军队就跑。在黑夜中要找一个向导，或者想从群众中打听前线情形，都很困难。

二十四日晨，平型关方向不断传来的时隐时现的炮声。为着详细了解敌人的情况，旅长和许多团营级的干部都亲自到最前线侦察。部队除派出一部为警戒、瞭望哨并进行封锁消息外，其余都隐蔽待机，并以营为单位，进行战斗动员。党的支部也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冲锋

在前，退却在后”的口号。在动员会议上，战士们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大家都磨拳擦掌，准备打大胜仗。在前面侦察的旅长与师部的电话也很快架通，不断报告情况。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

黄昏后，师部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送来“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在图上标明五路出击的路线，并说明他们除担任正面防御以外，还以八个团由平型关西北出击，要我一一五师依原计划由东南出击。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在烛光下把军用地图详细研究以后，就用电话下达下列命令：

“今晚二十四时出发向白岩台前进！”

黑夜，在倾盆大雨下，队伍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在渡过水流湍急的山涧时，大家手拉着手，七八人一组过。雨又成雪，可是战士们在雨雪纷飞中仍是勇往迈进。他们都穿着夏天的单衣，全都没有雨具。这样艰难地走了半夜，在拂晓前部队先后到达白岩台（距汽车路只二三里地）一线的埋伏阵地，每人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我们以全师主力都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余里长的汽车路以南的山地一线上；同时派出一个队伍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汽车路，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派出另一个队伍从关沟方向出去，以便接应友军的出击。

二十五日，天色微明的时候，敌人进攻平型关的兵力部署已隐约可见，这时从灵邱方向又开了一个旅团（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约四千人的兵力，前面是一百余辆汽车，紧接着是两百余辆大车，后面是少数骑兵，完全联接成一线，走入了我们伏击圈内。

大约五时半光景，战斗开始了。

首先由山上冲下汽车路的，是我某团第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猛子”，他在隐蔽地就命令全连战士们上好刺刀，在上刺刀时，还做了一番鼓动工作，他说：“我们要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敌人，不叫跑掉一个。我们要下决心打胜仗，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堵住，堵不住就会影响战斗。首先我自己就有牺牲的决心。每个同志，也要有这个决心！”

师部攻击的命令一下，我全线部队即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敌袭击。因为在袭击前，我们得到民众协助，封锁消息，秘密运动，所以这时的敌人，一点也没有料到距离他们很近的山坡后面，会有我军埋伏。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短兵肉搏。曾贤生同志领导着他的一连人首先向敌冲杀。手榴弹掷出去，敌人最后面的一辆汽车被炸毁了，其余急急向后转，想逃走的汽车，就发生互撞，汽车挤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有些敌人爬在车轮下顽抗，有些敌人就向西北山坡乱爬，想夺取阵地。这时，我军全线展开猛烈突击，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全是手榴弹声和喊杀声。曾贤生连的同志们，在二十分钟时间内，就用手榴弹打毁了敌人后尾的二十多辆汽车。他部下一个排长，领了两个战士，一连打了二三十个手榴弹，把躲在二十多辆汽车轮下和附近窑洞内的敌人也全数消灭。

这时，敌人虽展开顽强的抵抗，但是有利的地形都被我军占领了。敌人企图夺取老爷庙以北我军的高地，始终未能得手，所以整条山沟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军从高地上向挤在夹沟马路中的敌人猛力投弹，并以不知疲倦和奋不顾身的精神继续向敌冲锋，有些同志两次三次负伤了，也不愿意下火线。因此，无论敌人如何顽抗，终于就歼于我军的冲击下面。而由灵邱来援的敌

人，也被我预伏在由老爷庙到东河南镇一线上的一部主力所消灭，终于无法接近前面被围攻的汽车，也无法夺取我军已占领的高地。虽然天上来了飞机，也丝毫挽救不了被围敌人的命运。因为敌我两军短兵相接，敌人飞机就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我们的指挥员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当敌人飞机来时，就发出这样的鼓动：

“不要怕敌人的飞机，飞机是不能解决战斗的，勇敢向前冲呀！”

“越冲到敌人跟前，飞机越是没有作用。同志们冲呀！”

经过这样激烈的几乎整日的肉搏，终于将平型关以东十里以内的敌人全部歼灭。夹沟马路上，敌人死伤的人马，被毁的汽车，遗弃的武器，狼藉满地，途为之塞。

我们所遇到的敌人是极为顽强的：一方面这股敌人是素称精锐的板垣师团；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敌人长驱直入，没有遇过什么大挫折，骄纵异常。我们的战士，总想活捉敌人，对被围的敌人用中国话喊：“老乡缴枪吧！”敌人往往以枪弹回答我们，死不缴枪。战斗激烈之处，甚至伤兵与伤兵还打做一团，互相用口齿咬，用拳头打。有一个敌人伤兵，被我们一个营长救出，背他下来，可是在半途上，他居然把营长的耳朵也咬去了。

我军歼灭了夹沟马路上的敌人以后，就集中主力，进攻平型关前敌前线阵地——东跑池的高山，那里本来是山西军八个团的出击目标，大约有二三千敌人，占领着村庄，和村东北的高地，向平型关一带阵地进攻。当八路军在马路上与敌人激战的时候，山西军八个团始终没有露面；黄昏后，汽车路上战斗结束，我军主力转移到东跑池方面，才将敌人占领的一千九百米达的高地夺取，并把村庄里的敌人完全包围起来。但是应该出击的国民党军

八个团，终于背信，因此我军得不到适当配合，没有能够将这股敌人歼灭。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第二天（二十六日），东跑池的残敌，向西北方面突围。这股敌人，因为得到浑源方向敌人的增援，便停止了退却，进行收容整理。在东河南镇方面，也发现敌人的载重汽车三十多辆，骑兵六百人，企图增援东跑池的敌人。同时，敌人调来大批飞机，向我阵地整日轰炸。我军因为昨天打了一天，还没有吃饭，队伍又分散在马路南北，不便于继续战斗，就决定以一部向敌人增援方向游击，箝制敌人；一部进行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救护伤兵；主力转到山地。我军将这种情况及我们部署，派了专人通知平型关的友军。

我们派往灵邱方面的骑步兵，在二十五、二十六两天中，也和板垣的后续部队进行激战，迟滞了敌人的前进。

附近山沟里的老乡们，听到我们打了大胜仗的消息，都自动出来了。他们帮助搬胜利品，抬伤兵。几千个老乡，加上我军随营学校的全体，搬了两天胜利品，还没有搬完。据统计，在这次战役中：歼灭敌人三千多，毁汽车一百多辆，火车二百辆，缴到九二式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掷弹筒二十多个，战马五十三匹，日币三十万元，其余军用品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大衣，就足够我师每人一件。我们伤亡最重的是第九连，因为他们处在增援的敌人和在汽车路上被围的敌人中间，他们始终坚持着，完成了堵击的任务，不让增援敌人接近汽车，也不让汽车路上的敌人突围；该连一百五十名壮士，战斗结束时只剩了十八名，连长负伤，三个排长都壮烈殉国。全连干部，除一个副指导员和一个机枪班长以外，其余不是挂彩就是牺牲。首先冲到马路上去的第五连，在整天的激战中，也伤亡了三分之二，连

长曾贤生同志，说到做到，慷慨地为国捐躯。五连指导员负伤，两个排长阵亡，全连百名壮士，凯旋者也只三十多人而已。总计我军团长、团参谋长各一人负伤，营级干部五人负伤，指战员伤亡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战况的激烈。

这次国民党军队自己定的出击计划，自己却不遵守，八路军依约出击，打得这样激烈，他们却临阵脱逃，错过了全部歼灭板垣师团的大好时机，到底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已由最熟悉其中内幕的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续范亭先生在“三年不言之言”一文中详细讲出来了。现在摘录几段于后：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底，二战区阎司令长官在雁门关指挥作战，副长官杨爱源在平型关指挥作战。当时我为高级参谋，随阎长官在太和、岭口。平型关防线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高桂滋军在平型关左翼。八路军林彪部一一五师在右翼。晋绥军四个师，还有几个旅在正面。兵力总共有六七万人，总归杨爱源副长官指挥。当时我们知道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敌人板垣师团进攻平型关，高桂滋向敌人右侧连日进攻，高军伤亡近两千人。晋绥军的炮兵，未能发挥其集中火力的效能。八路军林彪部由灵邱南山突击敌人，敌人的后路已被八路军切断，战争非常激烈，将敌人的大部围困在十余里长的一个山沟里；敌人的接济断绝，进不得退不得，狼狈不堪已经两日两夜；我军如能集中全力进攻被困之敌，歼灭敌人可获全胜。据当时参谋处所知，林彪部突袭敌人，布置周密，士气高涨，当把敌人切断包围歼灭的时候，战士们总希望活捉敌人，还喊着内战时的口号：“老乡缴枪吧，不杀你。”而日寇战斗力顽强，当你过去夺取敌人枪支的时候，他还要打你一枪，死命的挣扎。因此虽然敌人死伤惨重，我们得到很大胜利，但我们伤亡也很大。在这同时，我们又接到杨副长官的报告，大

意是：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当时阎长官接到这个报告，非常生气，鼓起勇气，连夜驰往平型关。此时，只有我与执法官张培梅随同前往，到了杨副长官的指挥部（平型关西南通五台山大路的一个小山沟里），当我们进入指挥部时，阎长官刚刚坐定，满屋子的高级军官，都尚未发言，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的报告了一点多钟，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要紧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能把力量用尽了。”他讲完了这一段话，阎长官未置可否，我们那位最可怕的执法官张培梅先生坐在炕头，也只是微笑不语。我看当时的情况，好像阎长官满肚子的勇气，被郭宗汾的这一席话，说得冰消云散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副长官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据说头一天军事会议决定郭宗汾所部增援某处、围击敌人；但到了出动的时候，他的部队并未开动。××军官到师部去看他时，他还在被窝里睡觉。并且说：“昨夜天气不好，所以未曾行动。”杨副长官对他也无办法，阎长官对他也实在不满，但听他保存实力的话，长官又觉得他颇为忠实，毫无责备。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了，就向阎长官说：“郭宗汾的这一席话，处处都表示对战争的动摇，长官应该严厉纠正他。”当时天已明了，阎长官正在“台上站着，听到我的话，踏了踏脚，唉了一声说：“我忘记碰他个钉子。”左右的人当时好笑。

“次日茹越口失守，繁峙告急，长官也就再不说增援平型关的话了。命令王军长靖国退守崞县，平型关各部分路退却。我们就随阎司令长官由五台山回到太原。这时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已经在太原成立，大家公推我为动委会主任委员。忻口的战

役将近开始，太原民气亦颇高涨，在追悼姜玉珍旅长的大会上，我把郭宗汾的逃避战争、贻误军机的事实向大会报告了。大会当时提出惩办郭宗汾的口号，并且在太原市上张贴标语，向阎司令长官请愿，要求惩办郭宗汾。这时只是由赵主席把请愿的人安慰了一场就算了，没有什么结果。以后阎长官恰对郭宗汾一天一天地更加信任了，计来现在已经七年了，郭宗汾还是二战区的参谋长！”（见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续范亭先生已把当时他所知道的平型关战斗经过和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的实情说得清清楚楚了。下面是续先生对这次战斗的估价：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冒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同上引文）

续先生的正确估价，同时也是一切正义人士的共同的客观估价。除此以外，这个战斗，还给了友军以收容整理的可能，因而得以准备忻口的会战。如果没有平型关的胜利，则忻口会战就很少可能了。

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它是空前的，然而却不是绝后的，更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和更多的胜利，还在后头呢。

或者有人提出问题：当时国民党在华北有七十五万大军都不能打胜仗，为什么在装备上数量上比国民党军队相差甚远的八路

军独能打赢仗呢？简单的答复是这样：国民党军队不能打赢仗，是因为：第一，他们的军队，本质上是压迫人民、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保卫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因此，在敌人进攻面前，便望风而逃，贪生怕死者大有人在。第二，他们采取片面的军事抗战，不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因而军队没有民众帮助，不断招致失败。第三，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因而处于被动的、招架的，也就是处处挨打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完全与此相反。第一，这个军队，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下，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民族的独立，它能压倒一切敌人，而不向任何敌人屈服。第二，这个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能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帮助；我军运动，敌人毫无所知，给敌人猝不及防的打击，其中原因之一就由于人民对我军行动保守秘密，协助我们封锁消息的结果。至于民众的热烈参战、救护伤员，就更不必说了。第三，这个军队还有一个决定性的优点，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完全正确。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了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关系，从而制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完整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力量的对比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这一切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预见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将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而

获得胜利，从而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这种情况，计划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人民战争，如何经过人民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一个战略时期，再达到人民抗日正规战的另一个战略时期，而争取抗日战争发展为人民胜利的结局。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上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预见和计划，已经全部成为现实。

二 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敌寇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

敌人在平型关第一次尝到了八路军的苦头之后，就变更了战役的部署，改从茹越口（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突破了晋北的防线，向忻口猛攻。十月初，开始了忻口之战。朱彭总副司令（八路军按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同志为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为副总司令）为着配合作战，便派了几支队伍深入敌人侧后去袭击敌人。

当忻口战争正紧张时，一二九师先头部队的七六九团，由二十四岁的青年团长陈锡联同志率领着，到达了代县南境的滹沱河东岸。他看到敌人的飞机从朝到晚飞向友军的阵地轰炸，极为猛烈；从飞机来去的情形判断，机场可能就在附近。陈锡联同志急想把敌情和地形弄清楚，但是这一带老百姓在最近国民党军过境时都跑光了，没有办法去调查。有一位晋绥军的团长，带着少数队伍刚从大同方面退下来，陈锡联同志就去拜访了他，想从他那里获得一点敌人的情况。但是对方却悲惨地申说：“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我们没有打就完了……”这大约就是这位团长所了解的“敌情。”后来又遇见他们的一位排长，这位排长却更坦

白：“抗战吗？只是把我们的小锅饭抗掉而已！”原来这些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以前，排长、司务长、上士都与连长一起，吃的小锅饭，如今抗战爆发，他们被敌人赶得像失群的羊，连大锅饭有时都吃不上，更不要说特殊化的小锅饭了。在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只是记着小锅饭问题，并充满失败情绪，要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点敌人的情况，自然是不可能了。事情只有靠自己。于是陈团长就带着三个营长，化装老百姓，亲自下山去。果然，一出沟口，就清楚地看到河对岸敌人的机场。凑巧得很，当他们在隐蔽处仔细观察敌人机场时，恰巧遇到一个老乡从河对岸过来，一问之下，原来他是附近村子的人，不久以前被敌人找去当苦力，每天给敌人抬汽油，因为受不住敌人虐待，所以一得到机会就逃出来了。据他说，机场里有二十四架飞机，其中九架是大家伙，敌人把它们分为三批，每天轮番起飞去轰炸。他还说，阳明堡街上住着敌人一个大司令，还有装甲车队等等。他对于机场里外的情形，说得如数家珍一样详细，这样一来，陈团长无意中不但得到了最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得到一个最理想的向导。老乡被带到团部来。他很愿意引导队伍去找敌人。但是在团部会议中，还有一番争执，因为三个营长都争着要由自己的一个营去担任袭击的任务。最后还是由团长决定，派第三营去，因为团长很清楚三营的质量——共产党员最多，且有丰富的夜战经验。同时派了一二两营担任牵制任务。三营营长赵宗德同志，素来是勇将之一，他在出发之前，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和党证都交给了支部书记，说：“阵亡了，不叫日本鬼子得去。”他的下级看到营长这种表示，没有不受感动而下定牺牲的决心的。上下一致，都准备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

十月十九夜，是雨后的黑夜，赵宗德同志领着队伍，由那个

老乡带路，经过最隐蔽的小道，渡过了河流，偷过了敌人的岗哨，一直到达机场上三列飞机的中间。他们还向前走，企图先消灭阳明堡的香月师团的部队，但是被敌人发觉了。他们就依靠着飞机与敌人开火。在梦中被惊醒的敌人守备队和睡在飞机上的驾驶员，在慌乱中，除了用自己的机枪向自己的飞机射击以外，不能有别的办法。战士们都隐蔽在飞机底下，向敌人扔手榴弹。有些战士还爬上飞机，想活捉飞机里面的敌人；但飞机很快就燃烧起来了，一刹那间，火焰冲天，二十四架飞机全着了火，机上的驾驶员，也全被火葬了。我们忠勇的赵宗德营长和十多个战士，也在这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中和熊熊的烈火中牺牲了。当敌人增援的装甲车队快接近机场时，队伍就由一位连长掌握着退出了战斗。

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的消息，经过无线电报告给八路军总部，由总部转告了友军。开始友军还不相信是真的，他们以为，用八路军那样坏的武器，去毁灭敌人飞机，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天飞机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再由太原派出侦察机，去侦察敌人机场以后，才证实了这个消息。确实，有许多事情，在国民党看来是不可能的，在八路军却是平常的事。阳明堡之战是一个例子。

冀西、察南和雁北战情

在夜袭阳明堡的前后，我一一五师的杨成武支队和骑兵支队，积极活动于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行唐之间，并深入到察哈尔和平汉线两侧，配合当地民众，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一连克复了冀西、察南的十几个县城。

一二〇师开到晋西北以后，就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并派了一个支队深入到大同附近，开辟雁北的游击战争。这

支队伍的遭遇怪有趣：那时雁北已被敌人占领，他们出发不久，就遇到了从前方垮下来的骑兵军。骑兵们诧异地说：我们骑马还跑不及，你们这点步兵，开上去顶什么事？骑兵军长何柱国，要见我们的支队长。两人见了面，就以下面的问答开始他们的谈话：

“你带了多少人上前线？”何军长问。

“带的人不多。主要依靠当地老百姓，发动民众打日本。”宋支队长答。

“你们准备开到哪里去？”

“有敌人的地方，就是我们活动的地方。”

“你们队伍怎样行动？”

“看情况而定。”

接着，何军长就发表了他的意见，说：“这个敌人不好对付，炮弹落在坦克上，毫无作用。若不是卫士得力，我自己都几乎送命了。大口径炮还不行，手榴弹更不顶事！”依照他的意见，我们这个支队此去只有凶多吉少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们这个支队却一连袭入井坪镇、平鲁城、岱岳镇，以至大同附近的口泉镇等地，并把沿途桥梁、铁路统统破坏，还缴到了敌人的坦克和汽车，声势大振；当地老百姓纷纷起来参加我军，宋支队由五百人很快扩大到三千多人。

当时一二〇师的主力，一直控制着雁门关以西的山地。曾于十月十八日伏击敌人汽车五百多辆于雁门关之南，并曾几次占领雁门关，完全切断了敌人的后方交通。

忻口原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土丘，形势远不如长城险要，但由于敌人的后方联络全被八路军切断，不但使正面友军能在忻口的小丘挡住敌人，而且使迟滞的敌人陷于危境，大有被包围歼灭的

可能。

驰援娘子关

狡猾的敌人，为了挽救晋北危局，便把平汉线全部兵力和津浦线一部兵力调来，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娘子关，声援忻口。我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奉到总部命令，立即驰援娘子关。当时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将军，由北同蒲路赶赴正太路指挥；经过太原时，要求一张完整的地图而不可得，交涉昔阳山地来安置伤兵，也不被允许。当我军还没有进抵阵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便随便将险要的雁过口丢掉了。我一二九师某团，于十月二十四日赶到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依托蒋阎战争时的旧工事备战。刘师长在马村接到报告时便说：不行，那工事不可靠。当夜果然受到敌人的夜袭。国民党军队前敌指挥某高级军官，得到这个消息，就居然在电话中对刘师长说：“游击战争不行啊！”刘师长当时也不用言语来争辩，决心用胜利来回答他。二十五日夜，刘师长就赶到七亘村，亲自指挥队伍。因收容少数失联络的队伍，他自己两次陷入重围，距离敌人只几十米远，他仍然镇静地指挥少数队伍箝制敌人，并坚持预定计划，要陈赓旅长率领主力迂回敌人的侧背。终于在二十六日，抓到敌二十师团的辎重部队，把它打得落花流水，缴获骡马三百余匹，炮弹无数；连在太原领不到的中国制的山西省和华北军用地图，也都从敌人手中得到了。这一仗，不但俘获很多，而且把守娘子旧关而陷于敌人包围的第三军曾万钟部一千余人也解救出来了。

我们在七亘村打胜仗，而国民党军却于同日（二十六日）放弃了娘子关。这时，那位陷于惊惶失措的国民党军前线指挥再打电话来时，刘师长就安慰他说：“游击战争还是行。我们已经打了胜仗，并准备继续打胜仗。”

这时，敌人除沿正太路西进外，敌二十师团沿正太路以南与正面部队平行前进。刘师长曾接到总部电话，知道一一五师主力已由五台南下，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将军也带着一部主力赶来。但在与他们会合以前，刘师长还决心在昔阳以东打一仗。他把三个团的兵力布置在黄崖底，于十一月二日拂晓，又把由东向西行进的敌人伏击上了。黄崖底是绝壁下的一条峡沟，我军集中了全部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给敌人以突然的短兵火力袭击，把崖底下的敌人打得乱叫乱嚷，敌伤亡七百人以上。后来在夺得的文件中，敌二十师团的随军记者称此役为“过天险的黄崖底”。

敌人虽连续两次挨打，还是继续西进，但是比以前小心多了。敌人把辎重夹在步兵中间，沿途搜索前进，天上还派飞机掩护。但是在正太路以南平行路线上，山脉都是南北向的，愈到西边愈高，山峦丛叠，沟渠极多，而且有疏疏落落的树林，便于隐蔽，是打埋伏的好地方。林彪师长带着一一五师主力在十月底赶到上下龙泉、沾尚一带的时候，敌人已经占领平定。为了阻止敌人前进，一一五师就打算在平定到榆次必经之路——广阳和松塔间——打一仗。他们派出一连人，全部穿上日本军装，在敌人的左侧后山上用望远镜侦察敌人行动；敌人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他们把日本大衣上的帽子往头上一戴，飞机上以为是自己人，便飞走了。

十一月四日，敌四千余由广阳向松塔西进，先头是两个骑兵连，跟着是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后面是本队，再后是成千的骡马，最后是两个步兵连，天上又有两架飞机，他们骄傲地前进。太阳稍为西斜时，敌人先头部队已到达松塔，但尾巴还在广阳这边慢慢拖着。我军一声信号炮响，各路伏兵齐出，把敌人切为数段，敌人全部的骡马辎重都在我伏击圈内。杀声响彻了山

岳，在刺刀和手榴弹下，敌人被打得人翻马仰，到处乱撞。战斗直至黑夜，杀伤敌人近千，缴骡马七百余匹，步枪三百多支，炮弹和军用品无数。这次活捉了三个鬼子，其中有一个是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渠同志（后来任师参谋长）亲自捉来的。这个鬼子躲在广阳村内一间房子里不敢出来，陈参谋长带着几个战士，用生硬的日本话喊：“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只听见里面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明白明白的！”但是大家还有点犹豫，不敢进去，陈参谋长首先闪进去，先把对着门口的上了刺刀的枪抓住，接着把粮食篓里的鬼子抱住。鬼子的汗，湿透了黄呢衣服，陈参谋长的衣服，也被他的汗搞湿了。活捉俘虏，在八路军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说，这也是第一次。这次还解放了一百多个东北民夫，他们见到我们，兴奋地说：“六年不见中国军队了；今天真是重见天日！”

敌人挨了打，还要凑上脑袋来，再挨一次。我们侦察到：敌二十师团的后续部队，还要经过广阳前进，于是一二九师又在广阳东面设了伏击圈，等候敌人来上圈套。在十一月九、十两天，在广阳土封村一带又等到了，于是又结结实实痛打了一顿，使他们不得不学乖了一点，改变道路，避开我军打击，转向上下龙泉去了。

这几次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阻滞了敌人前进，但太原竟在十一月八日失守，使忻口被围的敌人得以获救，实在可惜。可是也正因为我们打了胜仗，使同蒲路北段的友军，获得了安全撤退的可能。当时山西的老百姓说：“八路军会打仗，好是好，可惜太少，顾得东来顾不得西！”

是的，八路军太少了——老百姓正希望八路军多些，更多些。太原失守后，华北抗战有了新的变化，八路军也真的愈打愈

健，愈打愈多，并且打了许多新胜仗。这在后面就要谈到。

三 从后面拖住敌人

太原失守后的惨象

太原于十一月八日失陷。国民党军队蜂涌向西向南撤退，通向后方的大小道路，全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的混乱队伍；他们随便向人民征收粮食、骡马，要金银首饰与钞票。溃兵所过的地方，有时和敌人过境也很难区别。有些溃兵经过村庄时，甚至采取这样恶劣的办法：在村外先放几枪，把村里的男人都吓跑，然后进村把妇女强奸，把东西抢走。国民党的将领也惊慌失措，那位曾说“游击战争不行啊！”的将领，也在敌人迫近时赶快乘火车逃跑了。

在太原失守前，刘伯承师长在正太路以南指挥作战，本来计划派工兵连去炸毁正太路，阻敌前进；为了这事曾特地派了一位参谋去和那位将军联络，可是他考虑到自己还有利用铁路逃跑的必要，不答应我军去炸路。等到他仓皇逃走时，自己既无心炸路，也不通知八路军去炸，宁愿把完好的铁路落入敌手。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才得到炸路的权利，立刻把铁路炸坏。

败军之将的汤恩伯将军，那时奉蒋介石命令到榆次布置阵地，阻敌南下；但他到了榆社，因看到前方部队退下来，自己也就畏缩不敢前进了。那时刘伯承师长到了辽县（现左权县），与他通了电话。汤恩伯第一句话就惊慌地说：

“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左侧背威胁很大！”

“我们总司令部住在西河底，你左侧背没有敌情。”刘师长安

慰他。

“很感谢！我左侧背没有顾虑，但是右边怎样呢？”

“你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附近，都有我们的队伍。”

“你一师人摆得这样宽，吓死人啊！”

“是游击战争呀！”

幸喜这次谈话，大大地镇静了这位将军。在孤立无援中，汤恩伯热烈地要求和刘师长会一面。会见实行了。十一月八日，刘师长到榆社见了他。他一见面就说：“你们游击战争打得好，日本人吃不消！”正是这种“日本人吃不消”的游击战争，使他惊惶中镇静下来，并与刘师长一见如故。然而在患难中对八路军曾表示如此亲热与敬佩的汤恩伯，后来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时期，与其他顽固派一样成为“反共英雄”了。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的慌乱溃退，尤其是国民党军将领对日寇的恐惧与对敌情的漆黑一团，简直是吓人的。若是没有八路军在敌后有力地箝制敌人，那敌人无疑可以长驱直入，直下临汾，那时几十万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不知更陷于如何凄惨的地步了。

开展敌后游击战，创造抗日解放区

在太原失守前，我八路军在华北的活动，主要是配合友军；在太原失守后，我军就单独作战了。

那时国民党军已弃地而遁，国民党政府官员也弃职而逃，把千百万民众委弃在敌人铁蹄之下。敌人就大逞兽性，蹂躏地方，到处奸淫烧杀，并胁迫成立维持会，收编土匪散兵，鱼肉平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完全落入了无告之境，他们说：“军队退了，政府也走了，日本鬼子到处祸害老百姓，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唯

一的希望是：“八路军快来救救我们吧！”这时，只有八路军，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朱彭总副司令的指挥下，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等口号，留在敌后，为收复国土，保卫民众，领导民众反抗日本强盗而斗争。

太原失守后三天，十一月十一日，八路军总部就决定：一一五师除聂副师长仍留晋察冀坚持外，主力转移汾河流域与晋南，阻止敌人前进；一二〇师仍留太原附近，并担负开辟晋西北的任务；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解放区。

当一一五师南下，副师长聂荣臻将军奉命留守五台时，留下的兵力只有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共约两千。聂荣臻将军奉朱彭总副司令的命令，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他的指挥下，这两千人的队伍，在辽阔的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区，开始创造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解放区。

自然这是经过很多困难的。在太原失守后，这个边区是远处在敌人后方，无法得到外面的援助；除五台、盂县之外，所有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都跑光了，连比较巩固的阜平县的县长张某，也在朱怀冰部队南撤时，跟着队伍卷款潜逃了，因此，地方上找不到原有行政官吏，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这时正是严寒天气，战士还没有棉衣，赤着的脚只套着一双草鞋，部队的给养也没有固定的来源。大车、骡马、粮秣，都被国民党退却部队往南拖走了。我们部队往北开，运输就大感困难。在广阔的区域里，到处要和敌人作战，需要有更多的兵力与武器……要解决所有这些困难，除了发动民众、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共同克服困难外，不能有别的办法。

我们有利的条件是：人民对八路军有很高的信仰；他们看出

了，我们这些军队与那些纷纷南逃的军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

开始时，以八路军派出的工作团为基点，各地战地动员委员会（有的地方称救国会或自卫会）不久就普遍组织起来。在每个县、区、村，都掀起了动员的热潮。那时，在广阔的地区里，到处有的是要求抗日的人民，也到处有的是溃兵扔下的枪，人和枪结合起来，加以八路军的帮助和领导，立刻就成为保卫家乡的力量。在阜平，第一路抗日义勇军首先成立起来了。不到一个月，就由几个人的队伍变成几千人的队伍。在易县，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拿起了三支破盒子枪起义，不到一个月也成立了三千人的队伍。在其他各县，义勇军、游击队、自卫军也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老八路”就领着这些新部队和人民武装，到处打击敌人，把边远县份的伪维持会也打得稀烂。因为部队和民众武装开展极速，于是四面八方都喊出了“要干部”的呼声。哪里有八路军的干部，哪里就会有部队；哪里有部队，哪里就会要求有八路军的干部。然而哪里有这么多的干部呢？不得已，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甚而至于勤务员、炊事员、饲养员，都被“要”去当了队长或指导员。后来开办了“军政学校”，才逐渐解决了下级干部的恐慌。

随着抗战的需要，各地战地动员委员会，领导了民众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苛杂，优待抗属；另一方面又实行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我军到来以前，民众生活是极端困难的，如在阜平，那里的穷人连吃树叶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树是属于地主的。后来，地主和农民被请来一起谈判，共同决定：树枝仍归地主所有，穷苦农民有吃树叶的权利。从此，人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自然欢天喜地，而地

主害怕“共产”的心理也消除了。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中国历史上开了新纪元的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揭幕于阜平城，选举了边区行政委员会。抗日的新秩序就普遍建立起来了。

冀中方面，蒋军南撤时，吕正操将军眼看着河北人民的灾难，便提出“向敌人后方退却”的口号，率领所部两个营，由冀南回到冀中，遵从全体军人的意志，改名为“人民自卫军”。那时八路军总部已派人来冀中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地方党员也开始领导群众打游击。于是这三者便结合起来，成为冀中抗日的中心力量。那时地方上还很紊乱，日寇汉奸到处横行，糟蹋人民，无恶不作，更有骇人听闻的：往往一个村子有几十个女人被强奸的。安新县西某村，除了四十多个女人被强奸之外，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也被鬼子轮奸到不能走动，她的母亲悲愤地对儿子说：“儿呀！你一定要为妹妹复仇！”于是青年人都咬紧牙齿，怀着复仇的怒火，参加了游击队，连许多士绅，也看到我们这些新部队，完全和旧军队不同。我们的游击队很迅速地发展着，队伍扩大了几十倍，后来吕正操将军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包括多数的地方游击队在内），便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

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一方面不断袭击正太路，一方面摧毁在敌人威胁下新成立的伪军和伪维持会；于十一、十二月间，又先后组织挺进队、东进纵队，横越平汉路，开入冀鲁豫大平原。冀鲁豫平原的人民，在中共地方党领导下，曾有过抗日武装起义，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为首成立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并联合各界人士组织抗日同盟。我挺进队到达冀南后，就与他们一起抗日。

一二〇师在太原附近和晋西北，没有一天停止过作战，同时还掩护友军退却，帮助友军收容散兵，维持当时十分紊乱的社会秩序。

这时山西新军也在各处成立，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敌人对于留在他后方猛烈活动的八路军，开始感到很大的威胁：

“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宜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敌第一军参谋部第二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关于全般的敌情判断》一文）

正是因为敌人对于八路军的恐惧，所以在占领太原后，它不敢即刻向南推进，而以大量兵力回头向后方游击区进攻。

敌后解放区的最初反围攻

敌人于十一月下旬开始，以两万以上的兵力，配合着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向晋察冀边区进行第一次的八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刚刚诞生不久，就尝试这样一个严重的考验了。可是敌人八路围攻的结果如何呢？下面是一位国际友人一九三八年的报道：

“我很惊讶，”安特尔先生这样开始，“当日本军打下太原城以后，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分八路向他们举行大围剿，竟然没有得到丝毫成绩，反而是他们把日本军的三条运输干路毁坏了两条半（有一条是时断时续，没有完全破坏），使日本军的进攻感受了极大困难。

“在这些游击队接连不断的扰乱和袭击下，日本军一时就不敢往南推进，把很大数量的军队都停留下来，企图用以消灭那些游击队。但是，这却没有根本影响到那些游击队的发展，他们反而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的边界上建立起了和日本军长期作

战的根据地。现在这个根据地已经成了中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军包围之下和日本军继续战斗的最坚实的一个堡垒。

“的确，这根据地中的中国人民已经有非常坚强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经常的打击日本军。这种力量，当他们刚开始形成时，就已经表现出非常顽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现在是日益强大。”

安特尔先生对这种解放区斗争的奇迹表示了合理的“惊讶”之后，继续追述这次日军围攻的始末：

“当去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日本军向这个游击区举行八路围攻的时候，那些游击队和当地人民紧密地配合在一起，最英勇地把日本军围攻的计划粉碎了。

“日本军由怀来、涿鹿直趋蔚县，布置了第一路兵力；由天镇、阳高向蔚县，布置了第二路兵力；由应县向浑源、广灵，布置了第三路兵力；由保定、易县向紫荆关、涞源，布置了第四路兵力；由定县、新乐向曲阳、行唐，布置了第五路兵力；由石家庄、获鹿、井陘向灵寿，布置了第六路兵力；由平定、寿阳向盂县，布置了第七路兵力；由代县、忻县向繁峙、定襄，布置了第八路兵力。全部步骑炮兵达两万以上，配合有装甲汽车、坦克和飞机，企图一下摧毁这个游击区，但结果在那些游击队和民众密切联络，用夜袭、伏击各种方法英勇抗击之下，日本军伤亡达二千余人。游击队从日军手里缴获步枪四百余支，机关枪十余挺，坦克车一辆，无线电一座，汽车数辆，子弹几十箱和战马几十匹。几路日本军极狼狈地被击溃了，连尸首都没有赶得及搬走。而游击队方面的死伤仅仅不到六七百人。”（见《解放周刊》四十一期《晋察冀边区视察记》）

敌人不但对晋察冀的第一次进攻遇到失败，而且于十二月间

对晋东南的六路围攻，也被一二九师与当地民众粉碎了。

当时驻防太原之敌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看到正太路不断被破坏，他的后方不断被袭击，气得他下这样的训令：八路军这样可恶，与其支支节节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以期一劳永逸。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先派出一些便衣汉奸到寿阳西南的羊角崖诱我军深入，然后由和顺、昔阳、平定、寿阳等地共出动六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向我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分进合击。我陈赓旅从内线坚决抗击，陈锡联部则抄袭敌人侧背，内外夹击，终于把敌人击退；敌伤亡惨重。

在太原失守后，整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在晋察冀边、雁北、太原附近、晋东南等地，日夜进行作战，没有休息，没有整理，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苦战的代价是：拖住了急欲南下的敌人，使友军得到休息整理；在敌人后方建立了解放区，作为“向日本军作战的最坚实的堡垒”。

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友军经过了几个月休息整理之后，计划反攻太原。下面就要说到这次戏剧性的“反攻”。

四 由配合“反攻”太原到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我军配合“反攻”太原的作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蒋介石要“反攻”太原。当时中国军队在山西的阵势是这样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处在最前线；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在第二线（如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黎城，曾万钟部在襄垣）；中央军则在临汾及临汾以南，位置在第三线，采取“督队”的形势。在“反攻”的计划下，朱彭总副司令负责指挥东路军，即除指挥八路军外，还指挥友军李家钰、李默庵、曾万

钟、武士敏、朱怀冰等部。很明显，要反攻就得处在最前线的八路军首先动手，当时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以配合正面友军向太原的进攻。

不管友军对“反攻”诚意如何，八路军毫不迟疑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朱彭总副司令命令一二〇师担任切断同蒲路，一二九师担任切断正太路。

二月下旬，贺龙师长即亲率全师主力进到同蒲线北段，一连打了十几天，占领了平社、高村、原平等车站，把车站上的敌人全部歼灭，破坏了五六十里铁路和十九座桥梁，动员了数千群众把铁轨搬到西边山上。另外又派部队袭击太原飞机场，占领了太原附近的东山。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等曾亲到太原以北的大孟镇指挥，在那里遥望太原城，等候正面友军的出现。

一二九师也于二月二十二日动作起来了：开始袭击了娘子旧关，并设伏于井陘西南的长生口；敌两个中队由石家庄增援，我伏兵四起，将全部敌人歼灭，乘胜攻入井陘城。在夺获的武器中有太原造的迫击炮，巩县造的机关枪。

两条铁路已被切断，可是没有看见正面友军出动的影子。相反的，敌人却在这时突然派遣大军，一路由太原南下，一路由东阳光西进，钳击临汾。这时处在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不但“反攻”没有实行，反而退却在先了。除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进行了抗击外，寇兵所向无阻，临汾于二月底即告失陷。敌陷临汾后，继续南下，向黄河北岸扫荡，直达风陵渡，与潼关对岸相峙。

这时留在敌后与敌人周旋的，主要只有八路军了。

午城大战和白儿岭掩护战

敌人南下时，晋西方面，有我一一五师主力一部，本来因为

屡次激战，伤亡过大，照理应该休息整理，但因迫于形势，不能不立即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他们连续在兑九镇、田家铺战斗，给前进的敌人以威胁。敌陷临汾后除一路向南，另一路十一师团主力五千余又复西犯大宁，我军驰援大宁，于是激烈的战斗便展开了。从三月十四到十九，在午城、罗田、上下乌合、井沟、张庄一带，与敌十一师团主力进行大战。战斗特别激烈是在十八日，那天从早到晚，我军除与敌十一师团的激战外，在井沟张庄以北的山沟内，又将敌援军一〇八师团的一部（内有步兵六百，骑兵两百，炮兵一中队）加以围歼。敌依靠着四门大炮和两架飞机掩护进行顽抗，战斗快到决胜负时，我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党的书记和营连干部大部伤亡；这时共产党员的战士自动起来代替干部，继续指挥作战，终将敌人全部解决。

在五昼夜的血战中，击溃敌人四千余，毙敌千余，骡马八百，毁汽车七十九辆。尤其重要的是阻止了敌人霸占黄河各渡口及西渡黄河的企图。

那时第二战区司令部和阎锡山、卫立煌两将军，都早已退过黄河，留下在晋西的是八路军，少数晋绥军和当地老百姓。一一五师在午城胜利之后，我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又连获胜利。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率领一旅人重行过河，首先经过大宁晋绥军防地，然后向一一五师防地蒲、隰、汾三县东进，不料在大宁时即被奸细报告，敌人就派出步兵和飞机拦阻，卫立煌将军在进退两难中，派人要我军掩护，我军立即派出部队在卫将军东进的路上等候，但是一直等到黄昏，还不见友军通过，原来卫将军已转向北移。第二天，石楼敌人忽然出击，将卫将军的部队全部冲散，卫将军得到我五团二营的掩护，终于脱了

险，再一次返回河西，经延安到大后方去了。在这次战斗中，我曾以五团二营十一连一个连的兵力，抵住敌人二千余人的进攻，不叫他们前进一步。激战是在白儿岭发生，所以叫做白儿岭掩护战。当时白儿岭整个阵地，都处在敌人的大炮飞机猛烈轰击下，工事几乎都轰平了。卫将军用望远镜看到这种壮烈的场面，就问我们的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啦！”……然而十一连又回来了，不但打退了敌人，而且还牵回来敌人好几匹洋马，背回一大驮大米、罐头。他们伤亡仅二十余名。这使卫立煌将军非常惊奇。他不得不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

晋西北光复七县城

三月间，敌乘我一二〇师主力在同蒲线作战，便以二十六师团万余人从大同出发，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县；南面敌占领军渡，炮轰宋家川。一二〇师听到这个消息，星夜赶回：用一部分兵力打南面军渡的敌人；主力在北面，将进占岢岚城的敌人包围，城周高地完全被我军占领，把枪炮瞄准城里的敌人猛放，并断绝敌人水源，使敌人几天吃不上饭。敌困守几天后，终于在夜间突围逃到三井镇；我军追到三井镇又把敌人围住，乘黑夜冲进镇里，和敌人巷战。在漆黑的夜里，两军混战了一晚上，消灭了不少敌人，并缴到大炮一门。我七一七团政委刘礼年同志在这次激战中壮烈牺牲。第二天我部队移到山上，准备黄昏后再攻。敌人于午后又拼命突围，到了五寨。我军又追到五寨，敌人又突围奔神池五寨间的虎北村。这时各路敌人都往这里集中。我军决心在这里狠狠地打击敌人，出动两个旅的兵力，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都亲临前线指挥。这时敌人已经疲劳不堪，在我军猛打猛冲下，终于被

击溃，残敌一股逃到神池，一股逃到宁武；我军又向敌尾追，一直追到大同朔县附近。七个县城完全光复。这一战，对于晋西北解放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军一面与敌辗转激战，一面还掩护何柱国的骑兵军向河西撤退。我警备六团担任掩护，在偏关以东打了两天，将敌阻住，使骑兵军全军人马安全过河。他们撤退时丢的大炮机关枪，经警备六团拾得，全部送还。

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更加激烈的战斗是在晋东南。

敌人由长治向临汾西进，一路上友军都没有抵抗。我们的总司令部驻在良马，朱彭总副司令只带着一个警卫连和司令部直属队，和敌人遭遇，就打起来了。足足打了一整天。后来总部把在正太路作战的一二九师调回晋中，三月十六日，一二九师一部袭击黎城，设伏神头，消灭由潞城向黎城前进之敌千余，敌人称这一仗为“典型游击战”。

当时，在晋东南的友军部队，对坚持敌后抗战还没有充分认识，有些人不免陷人彷徨中。朱彭总副司令于三月二十四日召集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彭副总司令关于坚持华北抗战问题曾作了详细的报告，其要点有三：（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其次，关于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有详细说明。这次会议，对于稳定友军的抗战情绪和对于不久以后粉碎敌人九路围攻，都起了很大作用。

会议开过后，徐向前副师长就亲自指挥在响堂铺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他将三个团埋伏在邯长公路响堂铺附近，等到由涉县西进的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我们的战士手脚非常

快，日本兵在汽车上还来不及把迫击炮机关枪架起来，就被爬上汽车的战士们捉住了。在我军密集手榴弹与刺刀的威力下，敌人不是被打死，就是作了俘虏。这次战斗，敌一〇八师团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和掩护部队全部被消灭；由黎城东阳关来援的敌人骑兵四百、和由涉县来援的敌步兵四百，也被我们的预伏部队打得稀烂。

敌人接连吃了败仗，对我们很感头痛，于是在四月间出动兵力三万，由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分九路向我分进合击，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消灭我军，打算可以分出部分兵力助攻徐州。可是敌人的打算错了。敌人一出动，八路军、决死队、武士敏部以及骑兵团王奇峰部配合着民众，在朱彭总副司令指挥下，立即和他周旋于太行山上。民众实行“空舍清野”，敌人来了，给养困难，又到处挨打。等他们疲劳万分时，就集中兵力消灭其一路。四月十六日，我军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打了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急击战斗。四月十五日夜，我军克复武乡后，敌二十五旅团一一二七联队（联队长柏崎）附骑兵辎重三千余人，向长乐村窜去；一二九师即以徐深吉部为右纵队，沿马汉脚疾进，以叶成焕部及韩先楚部为左纵队，沿圪家脑、田庄急进，以七六九团为后续纵队，沿大道进迫。十六日十时，与敌激战于马家庄长乐村地带：右翼向漳河对岸之敌侧击，左翼向峪口型村猛扑，截断其后段一千五百人，七六九团则接左翼由马村向许家脑之敌攻击，又将他截成几段；敌人马伤亡，辎重毁坏，都累积在道中。激战十四小时后，由辽县来援之敌酋苦米地旅团长，率一〇五联队（联队长工藤）附骑炮工辎重三千余人，

白蟠龙向我左翼反攻，妄想解长乐之围，于是全线战斗更为激烈；左翼部队与敌争夺要点，反复冲锋肉搏七八次，终将敌击退。敌人伤亡二千二百人以上，损失极大。

这里我们从夺获文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苦米地旅团长在“皇军”中可称得是一位惯战的猛将，是善用“拖刀计”的人；在攻长治尤其是会攻临汾中，他曾与敌二十师团（“朝鲜师团”）争胜，他先进了临汾城；他最得意的战法就是遍烧民房以示引退，旋即回兵猛扑，或撤兵让守城者退后于路中伏击：以是得了敌大本营赐的勋章。他亲笔写给女儿的信，说：“天皇因我先入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可是长乐战斗的失利，曾经使他受到处分。

九路围攻的粉碎，使敌更进一步认识到八路军的威力，相互告诫：“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晋东南人民的胜利信心更大为坚定，深信八路军真与华北人民共生死存亡，且确能保卫他们的家乡，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从这一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太原失守到徐州会战时期，八路军在华北猛烈袭击敌人，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大小战斗四百余次，毙敌二万余人，缴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百余挺，毁汽车五百余辆。

五 牵制敌兵三十万

敌人不敢撤

徐州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陷落。敌人重新组织兵力，向武汉进迫。

八路军为配合保卫武汉，便积极行动起来，在所有干线上炸车破路，伏击截击，牵制了极大部分的敌人。一九三八年敌人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在进攻武汉时曾暂时调走五个师团，还有十三个半师团，三十余万人。这些兵力正如陷在池沼中的泥脚，不敢移动。也正如朱总司令所说“敌人不敢撤，一撤就不得了。”

敌人为着对付八路军和镇压民众，在一九三八年一年中曾两易统帅，以寺内寿一代替香月清司，又以杉山元代替寺内寿一。但谁来也是一样。他们的三十万大军，只能局促于几个大城市和几条铁路线，在这些点和线以外，就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了。甚至就在这些点和线内，也有我军抗日活动。

在配合保卫武汉时期，我军的游击战争，更加蓬勃开展，敌人的交通线常被袭击而中断，敌人的城市常被收复或攻入。在光复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抗日民主的解放区；并依靠着这些解放区，来配合保卫武汉。

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新解放区的开辟

一一五师一部坐镇晋西，在配合保卫武汉时期，曾粉碎敌人六千兵力对吕梁山解放区的进攻，并曾屡次主动出击，在汾离公路上获得了三战三捷的战绩，毙敌一〇九师团一〇八旅团长山口少将以下一千二百人，焚汽车三十辆。有趣的故事也曾在这里发生：敌某联队长于一再挫败之余，曾向我驻防晋西的六团团长写了一封信，大略是说：“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一带决一雌雄……”（兑九峪是在平原上）。我们也回他一信：“阁下来隰县山间一较可耳……”敌终不敢一试。由于一一五师在晋西的活动，不但使敌人受到很大损失，而且也巩固了河防，使敌不敢渡河西犯。

自从五六月间，国民党三十五军因开入绥远失败，被迫撤退后，敌人曾大肆吹牛说：“中国军队不敢再来绥远了！”“谁敢来绥远，就把谁消灭！”我们针对着敌人的欺骗宣传，八月间，一二〇师奉总部命令派遣一支劲旅，偏偏北出绥远，向绥远北部蒙汉杂居的大青山挺进。自包头而东，一道青岗贯串着绥远全省，这便是大青山脉。翻过山去，是乌兰花。我军于九月三日占领陶林，十月占领乌兰花（百灵庙西）。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打了许多胜仗，但总还感到不满足，因为在那样广阔的原野上，村庄相隔百十里，敌人又有汽车和骑兵，有好几次敌人打败了仗，可是迅速逃脱了；我们的步兵追不上他们。为着战斗需要，这年十月，八路军一个骑兵排在大青山出现了。这是在一个胜仗之后，由群众捐来的马匹而成立的。接着成立了更多的骑兵部队。作战也缴获了不少马匹，民众也带着马匹来参加部队，马匹是一天天增加着。我们的步兵，也就逐渐变成了骑兵了。于是我们的铁骑兵，就在丘陵起伏、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纵横驰骋，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一二〇师另外又派了一个劲旅，深入雁北察南，配合着晋察冀的部队，积极打击敌人。

五月间，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率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主力各一部开入冀鲁豫大平原，威县一战，打跑了敌清水部队，一时纵横驰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消灭伪军六七万，光复了三十余县。我军不断向东发展，到抗战一周年纪念时，我们的活动，已到达渤海之滨了。

在配合保卫武汉期间，我一二九师曾几次发动了向平汉、津浦线的总破击，把这两条交通线切成了好几段，等他们修好又破坏，又打他们一顿。

在山东泰安一带，当韩复榘不战而退时，由中共地方党员领导着一群平津流亡的学生和当地农民，以三杆破枪起家而发动起来的山东纵队，到一九三八年秋已成立了九个支队，共达三万人。他们接连着收复十几个县城：在胶东方面，蓬莱、黄县、掖县成立了最初的解放区；于八月间攻入济南，又几次进出烟台，占领威海卫，破坏铁路百余里，在鲁北方面，我地方党帮助“抗战老人”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县，由一个营的武装发展到二十六个支队。

尤其使敌人震惊的，是我八路军向冀东的挺进。冀东是“七七”事变前就丧失了的国土，现在那里却突然出现了久为民众所期待的八路军。这支八路军是在中共中央和朱彭总副司令的命令下，由在雁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和在平北活动的邓华支队汇合而成，名为宋邓纵队，于一九三八年夏天跨过了平绥路，沿途克复了无数敌人据点和县城，向冀东开去。我军在前进路上到处得到民众热烈欢迎与帮助，在袭击平谷县城时，附近山脚下某村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也能自告奋勇，帮助我们找梯子、斧子、绳子做攻城工具，并坚决要求带路去攻城。攻入县城时，小孩就大喊：“捉汉奸！”我军进到蓟县附近某村时，准备袭击五里铺，一个老太婆说：“我也去！”她儿子被伪军捉去，生死不明，后来我们捉住一个巡官，她一定要上前用针刺他。我军进入“满洲国”境内，老百姓半夜开门见了中国部队，兴奋得像疯了似的说：“想不到这辈子还有今天！”

八路军开到冀东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几年来含垢忍辱，饮泪吞声的民众，始而兴奋，继而像炸弹似的爆炸了。他们在李运昌等同志的领导下，于七月间爆发了抗日的武装大起义，组织抗日联军，民众武装风起云涌，号称数十万。他们占领了几乎全部

县城，东至昌黎、卢龙、滦县，西至玉田、宝坻、蓟县，中心区是在迁安、遵化、丰润。在北面，起义群众曾袭击承德飞机场，放水冲毁了飞机八九架。唐山煤矿工人七千余人，响应冀东人民的起义，也在赵各庄首先发难，逮捕汉奸走狗，炸毁矿山油库，成立了义勇军三个队。我宋邓纵队开到了迁安和蓟县一带，就和起义武装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整理部队，统一行动，开始创造冀察热辽解放区。这时八路军和起义武装声势浩大，惊破敌胆；敌就掉转头来，进攻与镇压起义。敌人想肃清冀东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冀东人民一直是在八路军领导下英勇地打击着敌人。

屹立于北平侧翼的平西解放区，在一九三八年初，就为我军所开辟。平西的中心地区，名为野山坡，崇山峻岭，民风强悍，文化比较落后，该地居民，在民国十八年才知道有民国。可是我军开到此地后，经过了艰苦的群众工作，逐渐地把部落式的村区转变为进步的抗日模范区，而强悍的山民正好成为英勇顽强的抗日战士。我军自进占平西后，常常活动于平郊西山一带，有时弹雨横飞北平城楼，使敌伪一夕数惊。

晋察冀边区击退敌二十五路围攻

晋察冀边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其范围，最初只包括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间的北岳区，但战略上已很重要，因为地势居高临下，可以随时向四条干线出击。（后来该区又包括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在内，对敌人威胁就更大了。）

北岳区几次大出击，曾使敌人大为震动。例如，二月九日夜，部队领着民众分九路向平汉线全线出击：一夜间克复新乐、定县、望都三城；摧毁了新乐、清风店、望都、保定、满城一带的汉奸维持会，活捉大批汉奸和鬼子；大批民众破路，并割回电

线数万斤。“七·七”周年纪念时，我军又向平绥、平汉、正太大出击，血战数昼夜，炸毁北平城西的石景山发电厂，北平顿时成了黑暗世界，敌伪吓得城门紧闭。敌伪报纸也恐惧地哀叫：

“共产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彼等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属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京。……日军决心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十月十六日汉奸“正报”社评）

敌酋杉山元经过了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〇师团、一〇九师团、二六师团、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等三万余人，于九月二十日依四周铁路分二十五路向边区大举进攻。这时，我们的部队和民众都更有锻炼了。我军以游击战与运动战抗击敌人，敌人找不到我军固定阵地，常常于扑空之余，遭受痛击。九月二十九日，广灵西南张家湾一战，打死敌二十六师团联队长正亚大佐以下千人；同日于伯兰镇（五台东南）又歼敌独立第四旅团清水部队长以下六百余人。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张家湾伏击战，毙敌独立第二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山崎少佐、归森炮兵大尉以下三百六十余人。十一月三日，歼灭五台东犯之敌，毙一〇九师团一三五联队纳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缴大炮四门，活捉鬼子二十一名。于是我军大举反攻，十一月底，阜平一战，夺下县城；敌人的大围攻最后被粉碎了。我军与敌苦战近两个月，战斗一百几十次，敌死伤共达七千多，损兵折将，狼狈窜回。

配合保卫武汉的战绩

八路军为了配合保卫武汉，在几个月间，进行了约一千次战斗，打死敌人二万以上，缴获步马枪八千多，轻重机枪一百五十挺，毁汽车八百余辆。尤其重要的，是牵制了敌人三十万兵力，

继续巩固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并将华北的游击战争发展到了绥远、冀东和热南一带。

六 新四军开入大江南北

新四军的成立

当八路军在华北闹得轰轰烈烈时，新四军也开始改编和出动了。新四军在改编前，原是散布于湘、鄂、赣、豫、闽、粤、浙、皖等省十三个地区的游击队，这十三个地区就是：

- 一、浙南区：在福鼎、泰顺、平阳、瑞安、温州一带；
- 二、闽北区：在崇安、邵武、武夷山一带；
- 三、闽东区：在福安、南屏、政和、松溪、庆元一带；
- 四、赣东北区：在浙赣路北部、鄱阳湖以东、浮梁、婺源、都昌、乐平一带；
- 五、闽南区：在潮安东北、漳浦、平和、饶平、诏安、云霄一带；
- 六、闽西区：在上杭、永安、龙岩一带；
- 七、闽赣边区：在瑞金、长汀、武平、石城一带；
- 八、粤赣边区：在南雄、大庾、信丰、南康、安远一带；
- 九、湘南区：在上犹、崇义、汝城、郴州、宜章、乐昌一带；
- 十、湘赣边区：在茶陵、永新、莲花、分宜、安福一带；
- 十一、湘鄂赣边区：在武昌、长沙间以东地区，如浏阳、平江、修水、铜鼓、阳新、大冶等地；
- 十二、鄂豫皖边区：以金寨为中心，在大别山内；
- 十三、豫南桐柏山区：在桐柏山内，以竹沟为中心，包括确

山、信阳、南阳等地。

在抗战前，以上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常常要与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敌人作战，很艰苦地将阵地坚持下来。这些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新四军以后在华中敌后坚持抗战是很有用处的。

在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中间经过许多波折，终于共同决定，把这些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给这个部队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十一、十二月间，以上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派出了代表，具体筹备部队的改编。一九三八年一月，就在南昌成立新四军的军部，宣布正式改编，成立四个支队，共一万二千人。

新四军由成立到全部集中，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原来分散在八个省四十几个县的部队，在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资利用，而只能靠步行的条件下，要在短期间集中起来，已经不容易，何况在谈判期中，又吃过国民党军欺骗的亏，使得一部分指战员，对于集中不免发生怀疑。他们恐怕部队在没有打日本之前，就有被零星消灭的危险。还有部队家属，内战时本来就受尽压制与剥削，部队远离家乡以后，怕安全更无保障。但是，他们在中共领导下，有高度政治觉悟，虽有以上疑虑，终在中共的号召与说服下，愿意离开家乡，困难终于克服，在四个月的短期间，全部在皖南和江北集中了。假如不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为了团结抗战，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们退出这些地区的。

可是在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就采取欺诈的方法。

在改编时，国民党曾答应：对新四军原来活动的十三个地区，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当地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保证新四军家属

的安全；补充武器，补充新兵。但当新四军离开以后，国民党就全部违反了诺言，以武力去占领那些地区，许多新四军的家属被杀害了。如在湖南，连我们彭副总司令的兄弟也被杀害，就是典型的例子。

说到补充，也是食言。新四军的武器，是多年内战用旧了的武器，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长枪锯成了短枪，有的埋在地下许久才挖出来，还有的是刀矛之类的原始武器，国民党明知拿这些家伙去打现代化武装的日本法西斯，是困难的，但它却不履行诺言，不予补充。

这些困难，新四军怎样克服呢？

当时新四军的口号是：“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

新四军开入大江南北和处女战

新四军出发抗战，东进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江南，被指定在京沪间打游击，主力与军部都在这一路；另一条是江北，那里有一个强有力的第四支队。

当新四军东进时，正如八路军北上时相同，沿途遇见了许多国民党刚从京沪失败退下来的军队，他们的情绪很坏，对于日本是害怕的，他们看到新四军武装这样坏，认为新四军到敌后去必败无疑。有位国民党军队将领某君，见了我们第一支队长陈毅同志后，很不客气地说：“陈司令！你们军队有优良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很好的，如到东线去打仗，请听下文分解好了！”

这证明他们当时对新四军是看不起！

但是，新四军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新四军江南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进至南京、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溧水、高淳、芜湖一带地区，把这一带广大的农村很快就从敌伪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有名的苏南解放区。当新四

军初到这一带地区时，也正如八路军初到华北时所遭遇的相同，这一带所有交通要道与大城市都被敌人占领了，乡村则成为土匪伪组织的世界！国民党的军队、政权、党部，都向后溃退了。情形十分混乱。新四军开入敌后，穿的是黄色军衣，老百姓以为是日军下乡，以后知道是中国军队，才大喜。不过他们看到新四军的装备这样坏，对于这支队伍的战斗还表示怀疑。有一回，我们有一个支队司令部住在南京附近农村中一个地主士绅的家里，这房东很高兴，他们一年来没有见过中国的国旗和中国军队了，到处是土匪，使他们很恐慌。因此，见到新四军，招待很好，可是第二天一清早这房东却拿了便衣给我们的同志，并说：“你们要小心，打日本不是好玩的，你们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呢？还是穿上便衣，我可以保护你们。”

同时，敌人在上海南京大胜后，对中国军队十分轻视。敌人警戒很疏忽，有许多车站、小城市、大镇子都不放哨，行军侧翼也没有侦察，他以为中国百万大军失败后，中国军队不可能再到那里了。所以新四军最初战斗中都能胜利地袭击敌人。

新四军进入江南不久，于六月十八日，在镇江到句容的公路上的卫岗地方，开始了第一次战斗，截击由镇江南下的敌人军用汽车队，战斗结果，五辆汽车被击毁了四辆，并击毙日寇土井少佐和梅岗大尉以下数十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和大批日本钞票。这是江南新四军胜利的处女战。附近居民看到我军初到就打胜仗，均大感欣快，一时聚集来观看胜利品者有数百人。当时陈毅同志曾戏作七绝诗一首，诗云：

“抗日旌旗到江南，
终夜惊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接着，七月一日，又袭击了敌人的新丰车站（镇江丹阳间的车站）。这次战争是很有趣的：在新丰车站旁一所小学校内住有敌人一个中队（约一百八十人），小学外面是土墙，没有防御设备。新四军将敌人包围后，敌人还不知道。我们一个侦察班很隐蔽地接近学校门时，门是开的，并且没有哨兵。侦察班就大胆的进去了，看见日军的寝室里，还点着灯，但都睡得像猪一样。侦察员看见墙上挂了武器，就轻手轻脚地慢慢地将枪拿出来。我们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同志，看见桌上有一个闹钟，他去拿它，不料钟就铛铛地响起来，日本鬼子惊醒了。侦察员们就退到院子里，日本鬼子赤膊下来了十几个。有的开始打枪，一个日本军官说：“不要放枪，要捉活的！”可见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轻视。日本军官拿着长刀冲向前来，来砍我们两三个同志，我们将他包围了，但是一下子打不倒他。这时那个小同志做了一件好事，他很快跑上去抓住敌人的睾丸，将他拉倒。其他同志一手枪结果了他。这时日军从楼上打枪丢手榴弹，我们开始用火攻。镇江、丹阳的敌人来援，被我四面的伏兵打退。经过了四个钟头，这所小学被埋葬在熊熊的烈焰中，除了跑走三个以外，敌人全部被火葬了。这次战斗，我军也伤亡五六十名。

在一九三八年六、七、八三个月中，新四军江南部队，进行了三十余次战斗，给敌人很大打击，民众大大兴奋起来，自动起来帮助新四军。有一次，日寇强迫一个农民带路去打新四军，他藉口回家拿东西，将这事秘密地告诉了他的老婆。等他把敌人带到目的地时，新四军早已离开了。原来他的老婆请旁人飞跑去报告新四军，因此新四军早就知道。这不过是军民关系的一例。

敌人对新四军也改变了态度。他们不敢再大意了，开始加强

工事设备。这时驻南京近郊十五师团的一个联队，因为挨打最多，松野联队长就大发传单，说新四军不讲“道义”，不会打仗，只会偷偷摸摸，不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求与新四军定期决战。新四军也写了传单答复他，答应他的决战要求，并要求来打一个公平仗，双方以同样武器装备来打，请国际公正人士来做评判员。如果我们打输了，我们就退出南京区域，不再来麻烦他们。如果他们打败了，就请他们退出中国。

还有一件有趣的故事：一九三九年元旦，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请新四军陈司令吃饭及参加元旦阅兵。半年来我们捉了不少的俘虏，缴获了很多日本军用品（那时我们排长以上的干部都穿日本军衣），我们时常送给他一些胜利品，他很高兴。一九三八年底，他的部队破天荒地捉了一个日本兵，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要他的参谋带陈司令去看这个俘虏。同去的有许多国民党军官，于是就开始了第一、二、三、四的介绍，陈司令在最后。当介绍前面那些人时，那日本兵冷淡的没有任何表示。当介绍到陈司令的时候，翻译说：“这是新四军的陈司令。”俘虏立刻起身对陈司令一鞠躬。翻译问他为什么对陈司令特别尊敬，他说：“新四军会打仗。”事后据这些国民党军官解释：“这个俘虏很左！”因此名之为“左派俘虏”。但当时他们大家脸上是禁不住有点发热的。

从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新四军在江南的半年作战，给予敌人士兵以怎样强烈的印象！

至于新四军的江北部队，他们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就进到安徽巢县、无为地区，那时敌人正向合肥进攻，企图由巢湖东岸渡到西岸。他们在蒋家河口上和敌人打了第一仗，完全击溃了巢湖登陆敌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和一面日本军旗。接着，又在胜利的进

军中解放了淮南路两侧的地区和津浦路南段两侧的地区。

从此，新四军不论在江南、江北，都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敌人逐渐感到寝食难安，汉奸伪组织闻风丧胆。

七 武汉失守后的敌后形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武汉广州后，回顾后方，感到无限惶恐。在武汉失守前就被敌人看做灭亡中国的“绊脚石”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的头两年中，不但没有为日寇的数十万大军所消灭，反而真的把日寇的泥腿绊住了。敌人占领武汉后，不能不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事重心移向敌后，对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于是敌后变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正面大规模作战是骤然停止了。前线敌兵源源向华北敌后转移，华北敌人由十三个半师团增到二十二个师团，人数由三十万骤增至四十四万人，比抗战第一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比第二年春夏间最多的时候还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在华敌人全部兵力的一半以上，都压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身上了。

这时敌人学乖了：一方面“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另一方面，在过去两年又挨够了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好对付的，所以改唱“百年战争”，“掌握民心”，并要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从此，敌人就阴谋百出，花样翻新。

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人颁布了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九月，华北敌酋杉山元滚蛋，多田骏上台，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所谓“牛刀子战术”，是日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的意思，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来对付。

战局是空前的紧张，“扫荡”是越来越加紧了。抗战第二第三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〇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中一万人到二万人的大“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最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两年中，敌在华北修复的铁路有一八七〇公里，公路一五六〇〇公里，新建碉堡据点二七四九，一九四〇年的碉堡据点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敌人在华北兵力虽有四十余万，但由于据点增加，兵力分散，大感不敷应用。这时汪精卫已投敌，敌人就利用汪逆加强“以华制华”政策，大量有计划地培植伪军。到一九四〇年底，华北伪军已达十四万人。国民党军队这时就有投敌后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的三十五军游击支队丁其昌，东北挺进军白凤翔，先后率部（共约一万三千人）投敌，豫北的CC分子张岚峰，也率数连叛变，使伪军势力增大。

武汉失守，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就开始倒退；他们错认为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因此，他们的敌人似乎已不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八路军。他们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法西斯主义又在国民党统治人士中抬头。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了钻进共产党内部来破坏共产党），九月，又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

方案”（规定了可用军事进攻来对付共产党）。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奸军”甚至“匪军”，解放区被称为“伪边区”甚至“匪区”，其口吻几与日寇无异。抗战初期，他们把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用苦战光复了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这些先生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八路军和抗日人民手里来“收复失地”。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与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驱非嫡系部队为前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进迫。当时日寇正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正与日寇遥相呼应。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张荫梧、秦启荣、胡和道等，当他们托庇于我军时，皆曾相安无事；这时，他们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示下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解放区。这些无耻的家伙，还高唱所谓“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把他们的卖国的滔天罪行粉饰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

鹿钟麟于一九三八年秋，奉国民党当局命令，前来华北成立冀察战区，设立河北省府，当时八路军曾竭诚欢迎；亟望精诚团结，坚持敌后。不意随鹿氏而来者有一大批国民党反共特务，挟持鹿氏以省府名义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还由山东调石友三等军突入冀南；由中条山黄河边调朱怀冰、庞炳勋等挺进太行。他们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人员，活埋抗日军民家属，包围抗日县府，剥夺敌后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他们各自争委县长、区长，甚至一个县内同时有五个县长存在，弄得民怨沸腾，民情激愤；民众对于他们的奸淫掳掠，纷纷控诉到抗日民主政府，案如

山积：日寇汉奸，则在北平大开庆祝会。八路军一再忍让，彭副总司令曾亲往冀南访鹿钟麟，刘伯承师长曾一再分赴各方磋商，他向朱怀冰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再没有地方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这种苦口说服，反被目为示弱，张荫梧且宣传：“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因此，石、张、庞、朱辈进攻益急，人民受害愈甚。

这时我们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中，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解放区，誓与华北民众共休戚。在军事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进行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在这个时期内全华北都展开了反“扫荡”。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曾粉碎敌人六万大兵的围攻；在冀鲁豫，经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底，连续粉碎敌人四次大“扫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二九师陈赓旅在威县香城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伟绩，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其他地区，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战绩，将在下面来讲。

尽管八路军有这样大的战绩，尽管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磨擦一再忍让，但国民党在“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阴谋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军正式向我开火，并且居然向我总司令部驻地进攻。当时情势危急，迫不得已，予以还击。进攻者挑衅者朱怀冰，来势汹汹，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于是他勾结日寇的事实暴露，激起其部下士兵的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身为军长，居然逃向日军驻地邯郸，经道清路平汉路坐了敌人的火车回国民党统治区，以后仍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官，逍遥法外。

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

抗战与投降之争，这在以后看得更明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军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克服了反共高潮和投降危机，否则华北早已为国民党所断送，不可能有敌后战场，也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武汉失守后，总的形势就是如此。下面分别来说冀中、晋察冀、山东、华中以至华南许多出奇制胜的战绩和一九四〇年震动全国、震动世界的百团大战。

八 冀中平原反“扫荡”

一二〇师开入冀中

冀中是处在津浦、平汉、北宁与沧石四条干线之间的大平原，人烟稠密，物产丰富。这个解放区自从在吕正操将军领导下开辟以来，对平津敌人威胁特别大，因此“扫荡”与反“扫荡”也就特别频繁。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敌人可以发挥技术兵种的威力，我们则以劣势装备对抗强敌，战斗的残酷是可以想象了。

一九三八年冬，敌寇曾连续对冀中进行了两次“扫荡”，都被吕正操将军所部击退。为着坚持那里的严重局面，一二〇师奉总部命令，由贺师长亲自率领所部进入冀中，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晋西北出发，冒着十二月的风雪，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冀中开进。每次过铁路，贺师长总是亲自断后，在黑夜里巨人似的横跨在铁轨上，镇静地指挥大队人马，秩序井然地通过。

二月初，部队到达了冀中，久经山地作战的战士们，当那“豁然开朗”的大平原出现在面前时，都扬着手欢呼起来了。大家

纷纷谈着：“我从当红军到陕西，到山西，走过多少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大平地！”“中国真有好地方，这样的平原，也是属于中国的呀！”说说笑笑，非常高兴。

第一战

一到冀中，就打开了。

二月二日，敌人开始对冀中第三次战役进攻。早晨，河间敌人向附近村子强拉了百多辆大车，狡猾地向老乡撒慌说：“明天出城打游击。”但一吃过早饭，四五百敌人就出发了，刚出城走到三里庄，老百姓就骑上自行车，抄着近路飞也似的向我们来报告了。

上午九时，敌人沿大道到达营中堡、杜中堡，一开始就向曹家庄我军阵地炮轰。第一个炮弹落在村旁的地里，黄土向四面飞溅，没有打中一个人。但炮火越来越密了。战士们蛰伏着，每人心里都记着这两句话：“这是我们到平原上的第一仗呀！一定要打得漂亮，来回答老百姓！”

炮弹在阵地上造成灰尘的烟雾。炮声稍稀，敌人冲过来了。一个个黑点在地上移动，看得很清楚。当敌人接近我们前沿阵地时，另一阵爆炸声代替了炮声：我们的战士跳出战壕迎了上去，雨点似的手榴弹投过去了。

剩了少数敌人，向后逃去。

敌人起初不知道我们正规师的主力到了冀中，以为仍是游击队。这一下却要使他们明白明白。

炮火又密集了。我们只是不冲。平原打仗和山地不同，运动容易暴露目标，火力容易发扬。一二〇师在进入冀中以前，曾研究了平原作战的特点，印发教材，所以战士们打起仗来都有把握。敌人的炮弹不断飞来，打着屋角，打着田里的泥土，却打不

着道沟里面的战士。

双方相持了两个钟头，敌人的冲锋都失败了。我们追在敌人后面，也开始了短兵突击。敌人占领了曹家庄东面的坟地，我们绕到他背后（这时敌人正注意前面），一顿手榴弹，打得敌人慌张地向杜中堡退却。料不到杜中堡已被我们的抄袭部队占领，敌人受了猛烈的火力杀伤，只得折向中堡店。我军缴获极多。

下午三时，敌人从任邱分三路前来增援，又被我们预伏部队打回去了。

傍晚，困守中堡店的敌人在墙上挖枪眼，预备死守。中堡店和解中堡是接连的村子，相去不到半里，解中堡为我占领，我们部队从后面悄悄摸向中堡店，把手榴弹往墙里掷。手榴弹炸得鬼子吱吱叫。近半夜，残敌向河间逃了。我军立即追去，直将敌人追到河间城，冲进西门北门，占领了一部分街道。到了三日上午，战斗结束，我们自动撤退。

这一仗，敌人伤亡二百余，损失了八九十大车的军用品。老百姓看到我们打了胜仗，蒸鸡蛋糕来慰劳；良村有个老百姓，正举行婚礼，听了好消息，兴奋得衣服都不换，穿戴着长衫礼帽来帮我军抬伤兵。

继续战斗

二月四日，我作战部队在大曹村休息，师部在朱湾里。

住在师部的国民党联络参谋，知道我军打了胜仗，说是“代表蒋委员长”来大曹村对部队“嘉奖”，但他一到，该地就发生了敌情，联络参谋不辞而逃。这时，敌人已分从沙河桥、河间、献县各个据点，调集兵力一千名以上，在小刘庄集结。九点钟，大雪已经停止，激烈的战斗就展开在大曹村的东面。随着炮弹的爆裂，一团团的白烟升起了。

“毒气，毒气！”

“坚决不动摇！注意敌人冲过去！”

“用湿手巾蒙住嘴巴！”

但急切里找不到水，战士们就用雪裹在手巾里代替水。敌人屡次猛扑，二次三次都被打退。我军中毒战士不少。这次是因为敌人上次遭了打击，用毒气来报复了（以后敌人并曾几次施用毒气进攻）。

下午，我们实行局部反突击。敌人退到第二线，我们占领了坟地，与敌人相隔仅一百米远左右，相持到夜里，我军用白刃冲击，打垮敌人，缴了八十辆大车。残敌三三五五，一面抵抗一面逃窜，由小刘村、曲堤逃回城里。深夜二时结束战斗。

看见我们打了胜仗，冀中民众开心极了。慰劳品像潮水般涌进来。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提着小篮子亲自送来，她不知道我军番号，只说：“慰劳那些穿皮大袄的。”

战士们明白了：平原打仗并不困难，毒瓦斯也并不可怕。平原路多，村子大，有的地方一里半里就有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二百家，敌人不容易知道哪村子有我军，他们的机枪、大炮，就不易找目标，步枪子弹多半打得太高，从头顶上飞过去。虽然路多，但我军天天收集情报，知道敌人可能从那里来。每到一村，必先修筑一些防御工事，把哨兵放在屋顶上。最主要的，平原游击战争，必须依靠民众，我军进入“群众的海洋”，如鱼入大海，接连得了许多胜利。

齐会战斗——平原的歼灭战

师部住在大珠村，正在开大会，敌情突告紧张，住在齐会的第三营，就与敌人打响了。我第三营是有名的“铁军”。敌人是二十七师团渡佳行联队二千余人，附飞机大炮，寻找我主力作战。

这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早晨。

我贺师长就调集主力七个团，与三纵队一部，与敌展开激战。

敌人把齐会紧紧包围了。三营固守村的西南角。敌人冲进了村子，在四面放火。街道宽阔，又是瓦房，所以大火还不能延烧到西南角，但四五百户的齐会，竟被敌人烧去了大半！敌人见急攻不下，又大发兽性，放起毒气！三营对抗毒气的办法，只有湿手巾和简陋的口罩而已。然而“铁军”的战士决不屈服！他们将各家的庭院都打通了，把长板和梯子架在屋顶之间，使各个屋顶都能交通。守军就在屋顶上抵抗。在最严重最剧烈的关头，共产党的支部开了三次活动分子会，每个党员以自己的坚定的意志和模范的行动，稳定了危急的局面。

十一点钟，我增援部队跑步到了齐会附近，立刻就将敌人包围，并与村里守军取得火力联系。外面的我军能看见村内守军在房顶上的活动，也能看见敌军在砖瓦窑附近的炮兵阵地的活动。

双方相持到下午。

四时半左右，太阳将落。火光和硝烟迷漫了整个天空。这时，村里守军还不能和外面部队建立交通。“同志们！”王营长说，“我们要打破敌人的火网，把村南那座桥夺下来！哪一个班去呀？”被称为猛虎班的第六班，在班长的率领下，就去担任这一任务。

他们在重机枪掩护下，匍匐前进，敌人不敢露头，当敌人发现我班已接近桥头，慌乱地扭动枪机时，手榴弹已扔上去了。敌人把机枪拉出工事，猛虎们便乘势冲上去，占领了桥头。他们不但夺取与固定了桥头，并由班长率领，摸上去打毁了西南角上的机枪阵地。九连弟兄也冲出了村子，占领了这个阵地。

远处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王营长取下了望远镜，擦了擦汗，高兴地立即下令：“同志们！五团的援助部队打进来了，南面敌人正向坟地撤退呢。准备追击包围敌人！”苦战一天的村里战士们，被烟薰得像铁匠一样，听到营长的命令，即刻奋勇百倍。在黄昏时，用猛烈的内外夹击，将敌人冲垮了。

五团夺取了敌炮兵阵地。砖瓦窑做了敌人临时火葬场，布满了腥臭。村里的战士冲出了，满身尘土，衣服揉皱，头上肩上全是烟屑，面孔上是汗珠，枪管热得烫手。

深夜，残敌从南留路、张曹村逃走。第二天，逃走的敌人，又被我主力堵截，折回找子营，在找子营又被我军包围了。

晚上，老百姓领着我军去摸找子营。摸近鬼子住处，听见里面咕咕呱呱讲话，一顿手榴弹扔进去，炸得鬼子哭嚷着乱窜，冲散了又集合，集合了又冲散；夜三点钟，敌终被击溃。第三天，二十五日，残敌又被围在南留路与张曹间的坟地，在坟地里被困了一天。敌人东逃西窜，到处被围，吃喝不上，二千人伤亡大半。傍晚，刮起大风沙，对面不见人。我们上好刺刀，冲进坟地，却扑了空，鬼子乘风沙溜走了。见坟地中挖了一个井，挖了一丈深还不见水，可见敌人的狼狈。

我们立刻追去，在路上，听老乡说，三个鬼子整整喝了一桶水。一路上敌人又被截击，逃回城去已剩不多。这样结束了三天三夜的平原歼灭战。

这一仗，光打死敌人就有七百多，打伤的更多，俘敌七名。缴获无数。在坟地里，曾掘出一个坑，见下面是敌尸，就不掘了。之后，据说敌人在下面藏了大炮，后来又偷偷取回，很是可惜。这一仗，贺师长因在前线指挥，中了敌人的毒瓦斯。三营营长，也在追击敌人时负伤。

齐会之战以后，接着还打了许多激烈的战斗，直到今天，冀中老百姓还留传着这些英勇事迹，称赞龙师长为“活龙”，因为他所率领的队伍打起仗来，恰如牛龙活虎一般。

在更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从一九三八年冬天起，连续经过几次战役“扫荡”后，冀中所有大城市和一部分市镇，都暂时被敌人占去了。敌人建立起无数据点，并加紧建筑公路网和封锁线，不断组织对我军的合击。

当敌后斗争进入如此艰苦的阶段时，华北有名的反共分子张荫梧就活动起来。他在抗战前是河北省行政督察员兼民军总指挥，日寇一到河北，他就逃跑了。八路军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根据地，他就回来向八路军“收复失地”。一到冀中，他就大贴布告，解散爱国团体，禁用晋察冀边币。敌人汉奸，就在他所贴的布告旁边，大贴标语：“欢迎张荫梧反正！”敌人第一次“扫荡”冀中时，他配合敌人，调巨大兵力向我后方博野、蠡县袭击，结果，又由他的手将两县不经战斗“和平地”奉送给敌人。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正当河间、任邱、肃宁地域战事紧张时，张荫梧又率领五千余人，开入八路军后方，屠杀我八路军将士四百余人，造成有名的“深县事件”。当时张荫梧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这样说：

“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

原来反动分子的“军政”工作，是在这样的时期展开的！

他指使华北著名汉奸柴恩波投敌，并为他辩护，在他给蒋的另一电文中说：

“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 ……”

张荫梧就是这种“曲线救国论”的著名代表，其配合日寇屠杀抗战军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敌人并曾放水淹没冀中，企图困死冀中军民。一九三九年夏，冀中的永定河、子牙河、漳沱河、大清河涨水，日寇就决堤造成空前大水灾，使冀中成为汪洋一片，从七月到十月，接连三月水都不退，被灾区域达三十余县，秋收全部被毁，无家可归者二百余万人。敌人是想用这种毒辣手段，打击冀中军民，然而冀中八路军始终坚持阵地，誓与老百姓同甘苦，共存亡，以艰苦卓绝，再接再厉的精神，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反共分子张荫梧，因其倒行逆施，受尽民众唾弃，不能立足，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又复逃跑。在大水灾期间，我军控制了冀中的船只，控制了渡河，与敌展开“水上游击战”，将敌人据点逼退。同时部队还节粮救灾，帮助民众渡过粮荒。

我们又发动了“交通斗争”，用人力改变了地形，从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起，普遍挖起道沟。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可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在行军中随时投入战斗。沟内每隔一里，挖一个弧形的或圆形的沟（好像火车站的铁轨似的），将土堆积中间，使敌人无法顺沟的纵深进行射击，而我们的人马特别是大车互相碰头时，又可在此让路。有了道沟，军队可以在道沟里隐蔽运动，人民也可在道沟里畅行无阻，独敌人汽车装甲车遭到意外困难，不能在沟里走，而在田里行驶，又时遇道沟横阻其前，必须临时修理道路、或在沟上铺上几层厚板，始能勉强通过。汽车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里到十二里，有的地方且根本不能走。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特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作战。

九 模范的歼灭战在晋察冀

陈庄歼灭战

晋察冀边区自从粉碎了敌人二十五路围攻后，边区的周围是从未停止过战斗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军在上下细腰涧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九月，敌又向我腹地陈庄突进，于是一个模范的歼灭战展开了。

敌人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特别在战术上经过多时研究，由第八混成旅团长水原率领一路精兵一千五百余人和强拉来的民夫二百余人，首先以陈庄为目标，向边区开始了“秋季大讨伐”的序幕。

在敌人出动之前，军区就已侦知敌人的调动，判断敌人有进攻陈庄的企图。而且凑巧得很，那时贺龙师长正由平原回到山地不久，于是就立刻决定，除原有陈庄部队外，又调动主力兵团之另一部赶来参加战斗。该部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还击溃了拦阻的敌人，终于到达了指定地点。八路军这样迅速的调动，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敌人由灵寿城出发，天黑时进占慈峪后，续向北潭庄进攻，经我某部迎击，就停止前进。二十六日拂晓，敌人继续前进，经我某兵团抗击后，又退回慈峪。二十七日拂晓前，敌人除留一部守慈峪外，主力一千余人，改变了原来的路线，把山炮和粗笨辎重退回灵寿，轻装地沿鲁柏山的山麓，经湾子里于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袭占陈庄。在敌人看来，这次进攻陈庄是采用了新战术，开始是佯动，继之以假撤退，在撤退

中以轻装的步骑兵避开我正面主力，绕小道奇袭陈庄。敌人得意洋洋。敌某军官在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满意地写着，“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

那天正是旧历的中秋节，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喜庆“胜利”兼过佳节的时候，陈庄周围却密密地响彻了我军的枪声。

猛烈的攻击，使敌人夜不得休息。次日白天也是如此。既受包围攻击，给养又没法来，老百姓又找不到，使敌人完全堕入聋盲饥饿状态。

如我们指挥员所预料的：二十八日早晨，敌人被迫不得不退出陈庄。在退却前，又使用了它的惯技——放火烧光！但是，聋盲的敌人往哪里跑呢？敌人东碰、西碰，都遇上了机关枪和手榴弹，于是，只得沿火力较稀落的慈河东窜，企图由山路逃脱。这却正好走进我们设好的套子里！

当敌人走上还不到十五里路，先头部队刚到达破门口时，就遭我军迎头痛击。一部由北向南打它，一部由南向北打它，另一部在后面跟踪追击。我军反复冲锋，激战至下午一时，所有较有利的地形，都被我军占领。被围困在鲁柏山下两个村庄——马沟里与破门口——的敌人，仍顽强抵抗。那时由灵寿方面增来援敌四五百，会合守慈峪之敌，企图将被包围的鬼子救出。但这个企图，由于我预伏部队的截击，始终无法实现。

黄昏后，我军就向被围困守村庄的敌人总攻，几次冲进村里，与敌肉搏，惨烈异常。敌人被截为数段，死伤狼藉；第二天天色微明时，两个村庄全被我军占领了。我军原定计划是要在头一天晚上将敌全部歼灭，但因我军一部刚从冀中开来，他们在大水中行军，手榴弹受潮湿，十之八九打不响，所以只歼灭了一部敌人，使另一部敌人得多延长一天一夜的残命。

二十九日拂晓，被围的敌人分四路向以南高地突围，用尽气力爬上了破门口西南的鲁柏山上。敌人以为上了山，居高临下，就可保全残命逃回灵寿。但是这终究又成为幻想。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队伍，敌人已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敌被围的山头是鲁柏山的主峰，不过一里多长，北面是绝壁，南面是很陡的石坡。敌人由西面上山，想由东面逃走。但是前后都被我们交叉火力封锁着。这群进退不得的野兽，走头无路地在山顶上孤注一掷。

下午二时，我炮兵（这些炮主要是敌人“送”给我们的）运动到附近山上，向鲁柏山的敌人轰击，跟着就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杀声震野的白刃战。东西两面的山头都被我军冲了六七次，终因为白天没有掩护，不能巩固已得阵地，解决战斗要延续到夜晚了。

困守在山头的敌人，临死前还紧急求援。在被缴获的电报上，我军看到敌人的惶急：

“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阁下身边忧虑，希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及增派讨伐队。”

飞机和援敌确亦应电而来，但还是无济于事。两次从灵寿增援的敌人千余，都在半途遭我猛烈截击，载着十多辆汽车的死伤的鬼子退回去了。下午，敌机三架两次飞来，还掷下包裹六大包，有三包落在我军阵地上，解开看，都是弹药和饼干。敌机抛完东西，无能为力地向石家庄方面飞回去。太阳已经落山，死守的敌人更懊丧了。

入晚，我军举行全线总攻击。

山头的信号枪一闪，跟着是炮弹、机关枪和手榴弹合成的狂暴的音乐。凄厉的军号声和“冲呀！”“杀呀！”的呐喊声，震撼了山

岳。整个山头都已被占了，残余的几十个敌人，从南面的陡坡上滚下去，企图向万寺崖逃命。但也没有一个活成。千余敌人，其中包括“天才的指挥者”水原旅团长，及他的部下田中大队长、川崎中队长、北村中队长等，都全部变成异乡的冤鬼了。

六天五夜的战斗，所得战果如下：毙伤敌人（连敌增援部队在内）二千人，被围的敌人全部装备，也成了敌人给我们的“礼物”。我军伤亡也达五百八十四人，内有共产党员三百八十七人，占三分之二，清理战场后，已是九月三十日的早晨，旭日东升的时候。

阿部中将之死

陈庄歼灭战以后，还不到一个月工夫，敌人又以两万余大军，分十二路向边区举行“冬季扫荡”（这是第四次大“扫荡”）。但是这一回敌人吃亏更大。头一个仗——涞源战斗，敌人就损失了一个由北面进攻边区的总指挥阿部中将和他指挥下的第二混成旅团。这个胜利，震动了全国，因为杀死敌人中将，不仅在华北是第一次，即在全中国也是破天荒的创例。

阿部是继前次进攻边区时，被我军打死的常冈少将之后，来统率第二混成旅团的。该旅在“皇军”中号称精旅，而阿部又是特别挑选的能够运用“新战术”的“俊才”，他以中将资格拜受旅团长大命（敌人旅团长一般都是少将，中将是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命的），来担任北面进攻边区的总指挥，可见敌人把对边区的进攻看得如何严重！

涞源大战开始于十一月三日，敌以一个联队，由涞源分三路经插箭岭、白石口浩浩荡荡的南犯走马驿与银坊。其犯走马驿一路，刚到插箭岭，便被我军聂荣臻将军所部拦腰一击，打退回去。其经白石口犯银坊一股，是敌十加过村部队，计步兵一大

队，机、炮各一中队，为此次行动中的主力。我军早有戒备，特派遣少数部队先与周旋，节节诱致过村部队向南前进。等到他过了白石口，进入到三岔口的山地险要地区时，两旁高山突然斜插过来我军的两股主力，把过村部队夹在山沟里，打得敌人人翻马仰。

过村自知失机，企图掉头往回跑，但是后路已被截断，于是拚命南窜，勉强进到三岔口。这时，我杨成武支队一部，由东、西、北三面环攻，将敌包围在三岔口、上下台、雁宿崖一带，以三面的交错火力向敌人紧射，足足打了一天一晚，好像堵猪似的。敌人也在山沟里翻滚了一天一晚，几次集结力量，想冲破一个缺口，突围而出，但是我军愈战愈猛，炮火愈来愈烈，结果，过村大队，连过村大佐与步、机、炮中队长在内，全体七百余名，终于仰覆在一堆死去，以山沟做冢了。

这是涞源大战的第一幕。

守候在涞源城内等候捷讯的旅团长阿部中将，入晚才知道他部下过村被围，一急气塞，四日早上天空才一发白，便亲率所部南开驰援，后续又有涞源南下的敌人三百，到晚上，先后会合于三岔口、雁宿崖。但是，可惜他赶到的时候，过村部队已完全死绝，只有抚尸痛哭一场而已！

第二天，阿部便执行了所谓大胆的独立行动，以一部三百人南进到张家庄，在那里又碰上了我们的伏兵，展开战斗，而原来消灭过村部队的健儿们，这时忽又在敌人背后出现。阿部中将已经陷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六日拂晓，阿部下定决心，统率所部千六百人沿大道齐头并进，南向银坊进发，再由银坊沿大道折回东北，企图经司各庄、黄土岭、上庄子，翻越王回岭而归涞源，可是我军并不愿意就此罢休，就以一部紧衔着阿部的尾

巴跟踪追击，另以有力兵团翻过山间小路，在敌人前面抵达司各庄、黄土岭，在两地向行进中的敌人猛袭。

敌人的先头部队，首先连续受到严重打击。阿部不敢恋战，指挥所部不顾死活地往北冲，全体陆续地到达上庄子附近。我军左翼部队，也立即转移到上庄子附近，右翼又从大道东侧，赶来主力军一支，而我们的追击部队，也同时赶到。于是就在上庄子附近，把敌人团团围住，激战一昼夜，敌人不断向南向北狼冲豕突，都不成功。包围圈一层紧一层，十一月七日，阿部规秀中将，就和他的部下五百余人，死在上庄子附近。

八日晨，已经失掉了主帅的阿部残败军，回转头来用全力向黄土岭猛攻，企图突围。同时涞源新增敌五百，附汽车十五辆，经三岔口急急忙忙赶来增援，终算死命地把被围残敌拖回一部。

这样就结束了第二幕。

敌酋多田骏，知道了阿部的死耗，十分懊恼，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道：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又击退了敌十二路进攻

涞源大战之后，敌人对边区的十二路进攻仍拚死进行，约于二十三日，先后窜到阜平境内，向阜平城合击。并以飞机十多架，协同动作。我军以机动姿态抗击敌人，在阜平附近曾展开了最残酷的血战，前后打了几天几夜，敌机盲目地滥施轰炸，发挥兽性，附近民房到处着火，烟柱冲天。我大军在大雪纷飞中露营在银白山野，朔风凛冽，刺骨裂肤，但士气非常旺盛。我军前后和敌人血战四十三天，到十二月中旬，将敌全线击溃，毙敌四千以上，而且从敌人手中获得了大批装备来补充和加强自己。

一〇 梁山泊古战场的袭击突围与歼灭

第一个献礼

为着坚持山东抗战，一一五师一部，于一九三八年冬奉总部令由晋西出发，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到达山东西部。在我军没有到这里以前，山东西部没有正规军，只有抗敌自卫团，力量不大。敌人、汉奸、土匪到处抢掠，老百姓遍遭蹂躏。山东人民听到说八路军主力快要到来的消息，许多群众团体和开明士绅就组织了代表团，步行几天，跋涉几百里来欢迎我们。从民众代表的声诉中，知道鲁西郟城西北的樊坝，是敌伪的重要据点。为着回答群众的热望，为民除害，我军就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一进入山东，就如猛虎般向樊坝扑去。

樊坝的伪军，乱打人乱抢东西，糟蹋老百姓妇女，素为民众所痛恨。三月四日黑夜，我军像疾风般摸进外围的大堤，活捉了伪军的哨兵。俘虏立刻变成向导，他沿交通沟将我们带到围子里面去。樊坝的后围子，驻有伪军一个连，这个连还没来得及打枪，就被一阵手榴弹解决了。前围子是伪军刘玉胜部的团部，深沟高垒，不易接近。我军将围子密密围住，痛打到天明。伪军还不投降，惹得我军火起，到上午八点钟，就开始不客气的强攻。在迫击炮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我们的健儿们大显身手，开始爬墙，打得守军没处可躲。九点钟左右，解决了战斗，当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及他的部下三百多。

山东哥儿们这一下可都开了眼界，亲眼见到八路军的神威！

此后，山东老乡们不但亲眼见了八路军的英勇，还亲眼见了八路军的机智。

八路军打下了樊坝，依群众要求留下一个支队后，主力就继续往东走。过运河时，以骑兵连向汶上县警戒前进。骑兵连集中了全连洋马，战士都穿上了日本大衣，伪装“皇军”进到离汶上城五里的草桥。草桥为伪军据点。由侦察员化装汉奸引路，伪军哨兵见了他们，慌忙敬礼。骑兵连长对他讲了一阵洋话，侦察员（就是引路的“汉奸”）就翻译道：“联队长来阅兵的！”伪大队长也立刻出迎，并集合队伍，等候“太君”检阅。我们等伪军集合好了，就突然将他们包围缴械。直到现在，那里的老百姓还流传着八路军草桥“阅兵”的故事。

陆房突围

我军进入山东后的第二仗是对潘庄汉奸总机关的攻略。我们将其一举覆灭。从此，鲁西周围的伪军在我军的打击与争取下，大部动摇和瓦解。这一形势的发展，给敌人很大的威胁。四月下旬，敌人动员了泰安、兖州、济南、东阿等十七县的守备兵力共六千余，坦克一百辆，大炮百来门，在敌山东最高指挥官尾高次郎亲自率领下，分兵七路，浩浩荡荡向泰肥山区的陆房包围拢来。

那七路呢？由泰安至肥城向南为一路；由东向至安驾庄向西为第二路；聊城与平阴之敌会齐向东南为第三路；聊城敌经东阿直扑东南为第四路；汶上向东北之敌为第五路；宁阳向西北之敌为第六路；由张夏而下西南为第七路。这七路形成一个纵横不过二十里的合击圈，就像一个铁箍似的。所有山口、隘路，都配备了炮兵与机动部队，准备“一网打尽”。

陆房的地形和一个铜盆差不多，周围有着孤秃而起伏的山岭，中间是十几里方圆的平原，其中大小庄子不到二十个。敌人的总攻，开始在五月十一日的清晨，被敌包围在该处的，有师部

和团部等直属部队。情势是严重的。

周围的老百姓，都替我们着急。他们眼见几十门大炮向肥猪山上发威，山上满是黑烟，可是没有一点儿动静。于是乎一队“皇军”出现在山脚下，弯着腰，持着枪，大步向山上爬，开始了第一次的冲锋。鬼子快爬上半山腰，八路军还没有打。

突然，肥猪山上飞起无数的黑烟团。手榴弹和重机枪的巨吼，响震山谷。鬼子带着惨叫滚下山来。第二次，第三次，以至黄昏前最后的总攻，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团长、政委、主任，都亲自在火线上指挥，鼓动战士，这就大大地巩固了阵地。

黑夜到来时，敌人不敢动了。他们怀着恐怖的心，守候着各山口，企图明天天亮再进攻。第二天，敌人在炮火的侦察掩护下，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一步步进了陆房，兜了一个圈子，不见我军一个影子。他们惶惑地叫道：“八路军天上飞去了！”

原来在黑夜，我军已经布置了许多路，乘暗夜四出突围了。在他们突围前，首长做了一番简单的鼓励工作，并将部队分成为许多路，各路有人负责，并有熟悉的向导，从敌人的间隙中转移出去了。这在敌人看来，似乎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要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八路军有优良的素质与民众的拥护，不可能的事也变成可能了。

敌人甚至带了捆俘虏用的绳子，但现在却只能用来捆“皇军”的尸体载回去了。他们伤亡了一千三百，一名大佐联队长，还有五十多个少佐以下的军官，并毁炮三门，消耗炮弹无数。

梁山歼灭战

在陆房战斗后不久，八月间，又在古时梁山泊附近地区，打了一个歼灭战。

八月二日上午，据侦察报告，汶上出来的鬼子，早上由靳口

出动，出击方向是前集。我们二连早已被派到大道上的高粱地里去迎接，但是直到中午，还不见动静；埋伏在梁山脚下一个树林里的第十连战士，早等得有些不耐烦起来了。

快到下午，好容易“客人”才驾临。我们的战士，看见鬼子们像游行示威似的，一队一队很整齐地排着走。汉奸、鬼子骑兵、步兵，及一门步兵炮、两门用二十四骡子拖的八二野炮，都顺着大道，神气十足地进了前集。

埋伏在树林里、庄子里及庄子后面的十连战士们，小心地运动着。布置好了。突然，从树林里、街口、坟后面，飞来一阵弹雨。三方面飞蝗般的弹雨，把鬼子的队形打得七零八散，骑兵和步兵互相乱撞乱踩乱吼乱嚷，闹得一团糟。

二连从鬼子背后赶来。他们生气了！因为鬼子本应该先由他们打，但不料没走他们的埋伏的小路，却走了大道，害得二连捞不到先打。于是气冲冲的二连战士们，赶上来就是一顿狠揍。

敌人手足无措。首先是炮兵开了几炮，以后才响起零星的机枪和步枪声。炮轰了半个钟头，敌人满以为八路军全吓跑了，因为半个钟头内没有还一枪。六百多鬼子死了四十多，于是收拾收拾，要来报复，沿着梁山西南的山坡搜索起来。刚走到山的西南突出部时，八路军的子弹又找到他们，一顿好揍，“皇军”只得忍气吞声退到独山庄。

夜十二时，鱼王庄我军又出动了，一路直奔独山的东南，一路直奔西南的乱石岗子。信号枪的白光穿过独山的高空时，却是东北角先发生枪声，接着就猛虎般地冲了出来，扑向独山庄。庄外一个鬼子分队先被消灭，接着两处巷口被突破。二百多鬼子困守两处房子。双方展开市街战。这时鱼王庄赶来的勇士们，前仆后继，屡次奋勇攀登独山，一次二次，再接再厉。最后，分成三

个梯队，一个担任钳制，一个担任掩护，一个主攻，终于冲上了最高点，敌人纷纷垮了，被赶下了山头。另一路我军，这时占领了乱石岗子，打走了树林里的敌人，并冲进了庄子。

敌人这时困守在一段小巷子里，挨着三方面的汇集的枪弹。巷子越打越短了，鬼子看看吃不住了，就拚命突围；二十几挺机枪和十几个掷弹筒，指着一点打，接着敌人用全力挣了出来，满以为可以脱身了，却立刻又被我们围住。

独山脚下的小平地上，战斗展开了。

鬼子的步兵，分成十几个小集团，绝望地向我们冲来。我们闪烁的刺刀迎了上去，杀声大震。冲锋与反冲锋，现在进行到第六次了。更多的鬼子做了刀下鬼，战斗之惨烈，简直杀得敌人鬼哭神嚎。我们的师长屹立在山岗上，目睹战士们的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充满了战斗决心和信心。

“打，打到底！”他咬紧牙想。“为了鲁西局面的开展，这次一定要得到胜利才罢休！”

他就挥着臂膊，向战士们呼喊：

“同志们！用第七次反冲锋打垮敌人！把敌人的炮夺过来！”

命令一下，战士们精神百倍，一个反冲锋，果然冲垮了敌人。残余的鬼子钻进了独山山坡的几所房子和几个窑洞里，把所有的火器组成密密的火网，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一个英勇的战士，发现敌人的主要火力点是在一个破了的小炮楼上。他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冲过高粱地，朝着炮楼的窗户连掷四个手榴弹过去。震得整个炮楼都颤动的爆炸声响了，窗户中飞出灰尘来。响声过后，三挺机枪和两个掷弹筒都哑了。

主要火力点被消灭了。

几个精选的勇士，爬到跟前去挖窑洞的根基，虽然牺牲了四

五个，终于挖成了三个洞。我们的机枪叫开了，朝洞里打。洞里发出骇人的洋马的嘶叫和鬼子的惨呼。两个汉奸吓得支不住，从窑洞里跑了出来。经我们争取，他就帮我们向敌兵喊话，喊了一阵，两个日兵自动出来举起枪投诚。

东方发亮时，鬼子放出了极为猛烈的火力，接着就是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窜了出来，拚命向南跑。从山顶上山坡上又飞来弹雨，鬼子又倒下了不少。我们一个特等射手，瞄着一个长着胡子的鬼子军官打了一枪，军官应声而倒，指挥刀掷出一丈多远。剩下二十多个鬼子，枪也不要了，有的只穿了衬衣，有的皮鞋也脱掉了，四散逃命。我们的骑兵连就分头去追。鬼子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捉住。

枪声停息了。歼灭战胜利结束。

各方的军民都来看我们打了胜仗的场面，看各种各样的战利品。老乡们还送来两个活捉的俘虏。当我部带着两门野炮及无数胜利品凯旋而回时，李连长在一个凹地里，见了那个死了的胡子军官，左胸上有官徽：“三二师团长田大队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

这次战斗的特点，就是我军在数量上与敌人相等，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终于能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是抗战史上少有的。

战斗胜利后，梁山周围和东平湖畔，有三千多个老乡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也是在夹攻中奋斗

哪里有八路军从敌人手里收复失地，哪里也有顽固派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当山东纵队刚刚把山东局面打开，沈鸿烈就来闹磨擦了。一九三八年秋，沈鸿烈到鲁北，就奉命与鹿钟麟建立反

共的“冀鲁联防”，从此山东风波横生，环境日艰。

山东人民和八路军，长期过着受夹击的生活。其中曲折、隐痛、艰难、忍辱，实难一一描述。

沈鸿烈不只反对共产党八路军，也反对一切抗日的先进人士。他在鲁西北挟其地位，对范筑先将军的坚持抗战，就用各种手段来阻挠，最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聊城之役，驱使范老人孤军守城，断其后援，使这位民族英雄，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的牺牲品，于聊城壮烈殉职。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是山东摩擦最频繁的时候。这时山东反共军流行着三个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另外还传布三种对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一九三九年四月，秦启荣将这些办法很认真地实行起来，他惨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三百余人，内有政治主任、营长及连排长以上干部七十多人，造成了博山太和惨案。同年八月，乘四支队出击时，秦启荣亲率所部向该支队雪野后方袭击，使军民遭受严重损失。

一九四〇年，山东国民党反共军完全停止了抗日行动，专门对付抗战人民和八路军。这一年八路军因此所受损失超过对敌人反“扫荡”的损失。但是八路军在山东人民的拥护下，一九四〇年底已比一九三九年扩大了两倍，群众组织达三百万。尽管夹击形势未变，山东的面貌却焕然一新了。

一一 大江南北游击战的发展

处在“梅花桩”里

江南新四军作战地区，是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上最发展

的地方，物产富庶，人口稠密，真是所谓“锦绣山河”。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敌人会特别重视，那是不消说的。

可是新四军的主力，却要在南京城下住下，这就使敌人不但写传单来骂，而且要调大兵来打了。

在新四军开进江南以前，敌人在南京、芜湖、镇江一带，只有两三个联队的兵力；从新四军来了以后，敌人兵力增到三个师团，到武汉失守后又增加了两个师团。从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敌人就开始了“扫荡”，八月一次，十月一次，十二月又一次，同时开始运用“梅花桩”式的堡垒政策。所谓“梅花桩”，就是敌人利用平原的河流湖沼错综的水网地带，在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要道大修工事和据点，这种工事和据点，多得像梅花瓣一样。新四军就是处在这样星罗棋布的据点中间，和优势的敌人作战。

战局虽然这样严重，但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解放区新四军部队，仍然打了许多漂亮仗，有名的如官陡门战斗，东湾战斗，延陵战斗等。

官陡门是芜湖近郊敌人飞机场附近一个据点，地形非常险要，里面驻有伪军夏明才部二百余人，周围据点则有千余日军。新四军一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夜间，从七十里外冲进到这个复杂的水网地带，突然奔袭该据点，用半小时的时间，把伪军全部解决，俘六十名，缴获全部枪械。因我军动作神速，附近日军来不及增援，我军就安全返回宿营地。

东湾是京杭公路（南京到杭州的公路）和溧武公路（溧水到武进的公路）交叉点上敌人重要据点。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新四军一部奇袭该据点，把据点内全部日本军消灭，并打垮敌人三次汽车增援。

东湾战斗后，继续打溧武路北丹阳的延陵据点。这个据点驻

有敌人一个中队。我们的部队夜袭该据点，整整激战一夜，天亮解决战斗：活捉鬼子两名，缴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两个。

这几次战斗，都是我们袭击敌人的战斗，且都是胜利的歼灭战。所有这些战斗，都是采取主动进攻，在进攻中，是以秘密、神速、勇敢、坚决、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而取得胜利。在“梅花桩”里坚持战斗是异常艰苦的，我们的军队每夜经常要换几次宿营地。一九三九年新年，我们在江宁云台山下一个小庄子里住了三天，没有移动，就引起了敌人的袭击，来了一个五路围攻。在突围中，我军营长邱立生、副营长黄营春两同志和以下六十多个指战员阵亡，可是敌人也没有占到便宜，死伤的与我军相等。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我军受敌袭击就只这一次。

这是汪精卫上台以前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从这以后直到一九四〇年，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仅在华中投敌者就有十万人。一九三九年五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就率领了五万大军投敌。这时新四军的作战负担更重了，一面要对付日本人，一面又要对付汪精卫的伪军。汪精卫把内战时期对付红军的办法传授给日本人。敌人对新四军常常采取“联合扫荡”的办法，即以一個联队配合一万多伪军向我进攻。战斗的规模更大了。当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时，我军只有向敌占区进攻，互相渗透着，使新四军游击区扩大。

向上海近郊挺进

一九三九年春夏间，新四军组织了东进纵队，由叶飞同志率领，冲过了京沪路，经过黄土滩和休士官两个战斗，胜利地进入江阴、无锡、常熟、太仓、苏州和上海近郊，并建立起以苏常太为中心的解放区。从此新四军威振上海，甚至上海租界内的中外

人士，也时时可以清晰地听到新四军袭击日寇的枪声，他们的心常为这些枪声所鼓舞。如一九三九年六月，新四军曾袭击上海近郊的虹桥飞机场，这是由观音堂出发的东进纵队一部，约四五百人；袭击结果，毁敌机四架。一九四〇年五月，又连袭上海附近安亭、葛隆两车站。安亭为上海出来的第四站，驻伪军一营，日军一个班，我袭入车站后，敌人逃跑，伪军全部被我解决，俘虏百余人，缴枪八十余支，车站及据点被彻底破坏。第二天，又攻克葛隆车站，解决伪军一个连，破坏四个碉堡，俘四十余人。……这些胜利消息传出后，大大振奋了上海的民心。上海三百万同胞，在苦闷中看见了光明，特别是那些先进工人、爱国青年、文化人，过去是投效无门，现在也找到了出路。他们经过近郊游击队一批一批地到抗日民主解放区里去。还有许多工人，直接组织了武装大队，如煤业卡车工人，就组织了煤业大队，参加新四军抗战。在工厂中的工人，也常常以暗语谈论新四军，他们称新四军为“四太爷”。有一个工人和工头吵架，工人就说：“老子不在你这里吃饭，老子到四太爷地方去吃饭！”由此可见一般人对新四军的向往。

江北游击战的发展

江南部队，除一部挺进上海近郊外，一部渡江解放扬中地区（江中大岛），又在江北登陆，在泰兴、六合、仪征一带发展游击战争。

江北部队（四、五支队）也在一九三九年春起，先后由周骏鸣、罗炳辉等同志率领，越过淮南路，在巢县——合肥公路的西山驿打了一次胜仗，击退敌人步兵八百余、骑兵二百余的进攻，消灭了二百多敌人。这是这一带人民第一次看见中国军队打胜仗，并且亲眼看见敌人得了应得的惩罚，被打得头破血流，马上

驮着尸体和伤兵，狼狈败退的情景。这给他们很大的兴奋。

淮南路与津浦路间这个地区，自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日寇、汉奸、土匪任意横行，作恶多端；会门互相勾心斗角，各怀猜忌；大道上行人裹足，老百姓呼诉无门。新四军来到以后，消灭了地方土匪与伪军，击退了日本鬼子，才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提高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一九三九年底，江北部队又越过津浦线，在来安、嘉山一带打击敌人，破坏交通。到一九四〇年，又深入天长、江都，从消灭秦栏（天长—江都公路上）伪警察开始，继而伏击敌人汽车，终至将沿路伪组织全部扫光。一九四〇年七月，由罗炳辉同志亲自指挥，火烧来安城，打了个大胜仗。

徐州外圍的游击战

另一支由人民中生长起来的武装，是徐州失守后出现的。当徐州陷落后不久，彭雪枫同志就从确山竹沟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带领了各地投来的抗日青年三百七十三人，组织一支东进游击支队，通过平汉线，深入敌后；在河南西华与地方武装之一部以及睢、杞、太（康）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相汇合（该支队是豫东吴芝圃所领导的）；汇合后就东渡黄河，进入豫东，在淮太公路上打第一次仗，虽然不是大仗，但却是五月开封失守后，豫东人民所见的第一次胜仗。胜利的消息立即传遍了豫东各县。

一九三九年春，我军向徐州挺进，到达永城、亳州、涡阳北部这一带，连战皆捷，便在这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九年夏天，彭雪枫同志率部向淮上进军，直向蚌埠、凤台、怀远、蒙北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在宿蒙公路上打了出名的板桥战斗，打下了敌机一架。

正在这时，张爱萍同志率一个团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之泗

县、五河、灵璧、睢宁一带，开展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八月间，永城县长鲁雨亭率永城抗日武装千余人参加我军，继而萧县抗战纵队也在我党同志率领下来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冬，胡晓初部又率部千余人东进参加我军。这时，这支游击队就正式改名为新四军的第六支队，在永、涡、蒙、萧、宿、夏、亳、怀、凤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解放区。

因为这个地区，对于徐州的敌人威胁太大，敌人从一九四〇年开始，便用大兵力来“扫荡”，其中著名的有“四一战斗”与“六一战斗”。在“四一战斗”中，我击退敌汽车四十余辆，敌伪二千余人的进攻；我一总队队长鲁雨亭同志英勇殉国。在“六一战斗”时，我军正在新兴集集中了大批队伍进行检阅，敌人分三路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但是，其中两路被我们中途痛击，窜回原防；第三路经一天的苦战，到达新兴集时，我军已全部转移了。敌人到达新兴集后，不到半小时，又被我军回击，狼狈而逃。战斗后，顽固分子造谣说，新四军已被打垮，彭雪枫带了百余人突围，往西南逃走，生死不明云云。这时，彭支队长正在新兴集以西一里的大黄庄住下，听到这个“惊人”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我军驻亳办事处说：“我正在新兴集以西一里住下，指挥作战。附带说一句：我康健如恒，并且战斗胜利了。”

武汉外围的游击战

在武汉失守时，武汉外围各县也为敌人所占领，于是在武汉外围的共产党员陶铸、杨学诚等同志，就拿起武器打游击，最初只有八条破枪，后来队伍才逐渐扩大。那时五战区曾划定平汉路与汉水间十三个县的游击区域为活动范围，并明令承认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但当游击战争发动起来，工作有了初步成绩时，抗敌工作委员会被取消了，那些过去当敌人进攻时望风而逃

的人，又要回来“收复失地”了。不过，这些先生们到一九三九年春敌人第一次进攻襄阳樊城时，又复逃走，而且有摇身一变而为“皇协军”司令与维持会长的。仍然留在那里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各界抗日先进人士。

与鄂中游击战争发动的同时，李先念同志也在豫南信阳一带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向鄂中挺进。后来就与鄂中游击队汇合，编成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这个纵队，在北起信阳、西至汉水、东接安徽、南至洞庭湖边的广大区域里，依靠着桐柏山、大洪山、大悟山和长江、汉水，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向武汉采取了包围形势。

从一九三九年夏天到冬天，他们连续消灭了与击溃了鄂中伪军李汉鹏、马筱甫、熊克、杨青山、刘梅溪、刘亚卿、李友堂等部不下数千人。十月十三日，敌伪步骑五六百分数路向我京山的大山头部队进攻；我以一个团的兵力拒敌于新街，激战从早上五时到晚上十时，终将敌人击溃，毙伤敌伪百余，缴重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这是敌寇对鄂中进攻的第一次惨败。鄂中人民至今尤以兴奋的心情来传颂“新街之战”的胜利。

不久，日寇又集中各据点兵力一千五百以上，附炮四门，飞机一架，五路围攻我驻京山马家冲的指挥机关；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战斗部队合拢来不够二百人，但经过一天抵抗后，予日寇以重大杀伤，到夜间我安全突围。经过上述这些战斗后，鄂豫挺进纵队和鄂豫皖解放区，就以蓬勃的气象向前发展着。

江南江北指挥部的成立

为着便于指挥大江南北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于一九三九年以陈毅同志为首成立了苏南指挥部，以张云逸同志为首成立了江北指挥部。至此，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已打出了一个新的局

面，初步稳定了这个广大地区的战场，解放了数千万流离失所的人民。新四军正与八路军同样，在民族敌人步步深入我国土，国民党大量军队溃退或投降，地方政权瓦解，敌伪奸匪到处滋扰的情形下，不怕艰难困苦，浴血牺牲，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局面。这对于国家民族，无论如何说得上有功无过吧？

磨擦真相

在这期间，国民党方面，前后约有五十通嘉奖电文给新四军，称赞新四军的活动。但在这称赞背后，却隐藏了许多争执。争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新四军从十三个地区出发时，国民党允许以民主方式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特别是土地问题，不侵犯新四军的家属，新四军可以设置留守处等。但当新四军出动后，国民党即违背诺言，以武力向这些地区进攻，杀害留守处人员及家属，造成我军全体指战员的愤怒。这是第一个引起争执的原因。

二、新四军在敌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这时国民党军队也要开入，我新四军最初并不拒绝他，因为打日本的力量愈多愈好，但新四军在敌后解放区，不但予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而且予民众武装自己反抗侵略者的自由。我们已建立起了抗日民主的秩序。我们告诉国民党应尊重这些秩序，国民党最初答应了；但进来以后，却违反诺言，肆意干涉抗日民主的社会秩序，剥夺民众组织自己武装自己的自由，说这也不合法、那也不合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旧的封建的社会秩序，其结果是摧残抗战力量，压制民众抗战积极性。这是争执的第二个原因。

三、为着避免继续冲突，新四军曾提议划出一部分地区给他们驻防，免得在一起吵架；国民党同意这个提议，但划定地区后，那些地区的老百姓原来参加了新四军的士兵们的家属不可能

搬走，国民党就进行登记新四军士兵们的家属，要挟家属勒令子弟逃跑回家，否则，以“通匪论罪”。新四军原来想划定地区来解决纠纷，可是这样却使纠纷更多了。这是争执的第三个原因。

四、新四军在敌后对于抗日的地方武装，不问其属何党派，一律给以帮助，与他们并肩作战。可是国民党军队却强迫新四军的朋友不得接受新四军的帮助，不得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否则，就实行缴械。这又引起了争执。

五、藉口军纪军令，对于游击队的服装、礼节、公文程式，肆意挑剔，并且违反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下达死板的命令，想把新四军钉死在狭小地区内，以期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新四军对于违反抗战利益的军纪军令，当然有不同意见，于是又引起争执。

六、国民党投降部队，成为伪军以后，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起而抵抗，并讨伐叛军，而国民党当局竟说这种抵抗与讨伐是不应该的；他们不但自己不加讨伐，而且还阻止别人讨伐。当然这又引起了争执。

这些争执，是新四军开入敌后，特别是汪精卫投敌成立傀儡政府后，国民党军队与我们的主要争执。以后反共的逆流高涨，严重事件层见迭出。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发生了平江惨案，我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被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派特务连包围屠杀。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同志和职员二人当场被杀害，至半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同志，通讯处秘书吴渊同志，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同志和新四军家属六人，活埋于黄金洞内。全国正义人士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惨案的抗议之声未息，又于十一月十一日在河南确山竹沟发生更大惨案。确山县县长许工超，纠合数县的常备队以及第一战区豫南游击

司令戴民权部共一千八百人，进攻竹沟的新四军留守处，并将留守处医院中的伤、病、残废人员及抗属二百余人惨杀！一九四〇年四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指挥一个师及一个独立旅，包围我驻在津浦路东半塔镇的部队（一个司令部和二个教导队，仅六百余人），包围了两个礼拜，直到新四军援军赶到，国民党军队才撤回。当时新四军如加追击，不难将该部聚歼于淮河岸边，但新四军仅以自卫为原则，没有加以追击，并期言归于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韩德勤又令李长江、张星炳十四个团围攻我驻江都、泰县交界的郭村的部队（管文蔚部二千余人），前后共历九天，终被击退。同时，苏南的第四十师，由冷欣领导向我苏南部队进攻，我军司令陈毅为避免内战，率部忍痛退出苏南，渡江北去，并出面调停郭村冲突。等陈部到达郭村附近，国民党大军已败退，但我军虽可加报复而不报复，不但不予追击，还请苏省士绅及当地公正人士韩国钧、李明阳诸先生出面斡旋，要求将苏南、苏北、皖东的磨擦事件和平解决，勿再诉诸武力。可是韩德勤一贯拒绝这种要求，坚持其武力解决政策。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韩德勤又以大军进攻在泰兴城东地区的新四军，被击退。九月四日，又进攻营溪、姜堰的新四军，又不逞退去。最后，韩德勤恼羞成怒，竟于十月四日集中最大兵力，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有二十六六个团，一万五千人），进攻新四军驻泰兴县黄桥的部队。这是有名的黄桥事变。我驻黄桥地区的仅七千人，与顽军激战三日，顽军直迫黄桥城下。黄桥民众万余人，一夜之间，就帮助新四军把防御工事赶修起来，我军展开自卫苦战，终于把韩军击退。李守维仓皇中落水身故，残部逃回兴化。新四军仅以达到自卫目的为止，仍然未曾大举追击。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的迫害，还是有加无已，一直发

展到皖南事变。到了皖南事变时，民族前途千钧一发，世界有识人士，都替中国的前途担忧。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以后的情形，留在后面再说。

一二 广东东江与琼崖的游击战

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虽然是敌后战场组织最好与最强大的军队，但不是唯一的。在华南的东江和海南岛，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独立支持着艰难的局面，在华南的敌后方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敌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东沿海本来有了民众无数血汗而构筑的国防工事；国民党军队驻防时，常与海外走私，形成了走私路线，敌人就利用奸商指引，通过走私路线登陆，国防工事等于根本无用了。

登陆敌人，当天占领淡水，三天占领惠州。该地守军在敌人未到以前，就望风而逃，敌寇便得以长驱直入，毫不费力地仅七天工夫就占领了广州。当时，广九路的石龙到深圳一段和虎门炮台，还没有被占领。这里还有国民党莫希德师的一个旅，张瑞贵师的一个旅，加上虎门警备团，约有万人。而驻淡水的敌人，仅三百人而已。一万大军却不敢去进攻。

然而广东人民却不是这样的“孱头”。他们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传统，内战时期，东江一带又有游击战争的传统。在日寇进攻的面前，他们英勇地起来保卫自己。只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万余国民党军队不敢去进攻的淡水城，我们的叶同志带了五个人，居然在白天进入淡水，打死三个汉奸，并且得了枪。东莞的壮丁常备队；缺乏训练，武器不足，但是在中共东莞

县委领导下，自动据守茶山，居然守了一个多月！

这时，以“侨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参加者有香港的工人，有南洋华侨，有当地农民及学生，也有过去散布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员。领导者是曾生同志。曾生同志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广东学生领袖，后在香港作工，为香港海员工会的组织部长。

这支队伍，最初名为“海员游击大队”，后又改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他们开始时只一百多人，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就在惠阳、淡水一带参加了战斗。第一次战斗，我们以仅有的八支枪，在一座铁桥附近伏击敌人，毙敌三人。这次破天荒的小胜，大大鼓励了民心。一个月后，敌人回师“扫荡”，将国民党一万人的部队，摧枯拉朽，一扫而光。独有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分散隐蔽，英勇坚持，“扫荡”过后岿然独存者，只有我们这支小游击队而已。这真是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了。

然而正是他们，当形势好转时，又来找磨擦，要取消我们的番号，宣布我们“不合法”，甚至连过去我们向他们所借的破枪八支，也非要回去不可！一九三八年底，在敌人“扫荡”中，虎门要塞失守，里面便满堆着枪枝炮弹，国民党军队却弃如敝屣，逃命要紧！虎门对面的民众，眼看着这些武器就要落入敌手，便洒水过去，把十几挺轻重机枪背了出来，武装了自己，把炮弹统统丢到海里。这真是一个明显的对照！

民众武装日益发展，我们的游击队，在民众武装配合下，不断向敌人袭击。一九三八年底曾威胁惠阳敌人，使之退出惠阳，一九三九年春又收复了淡水，以后又占领坪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抗日情绪与胜利信心。以后，我们的队伍日益扩大，民众武装也发展了四五千，我们自己有小型的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手榴

弹。在我们控制下的，有淡水、坪山、至大鹏湾的地区。这地区有人民二十万，由人民选举了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建立了解放区。我们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并恢复了国民教育，计有中学两所，小学五六十所。

当敌人进攻时，弃地而走的国民党军，在敌人面前虽然怯弱，但在我们面前却似乎很“勇武”的样子。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我们挤走了敌人，局面较开展，他们就回来了，大刀阔斧地干起磨擦来：首先就是将民选的临时政委会主席撤职，取消我军番号，要以“集中训练”为名来阴谋消灭我们。当时惠阳县长刘秉刚说：“惠阳的共产党满天飞了，五十条麻绳也捆不尽！”原来这些反共派所关心的，只是用麻绳一串一串地捆抗日人民，而不是抗日。

当然抗日人民不会同意他们的办法。于是他们又提出，解除我军武装，合并到工作团去，并说可以承认工作团的“合法”，这种妙法当然也为民众所唾弃。于是反共派就拿出最后手段，派一个旅前来“武力解决”。

这时适值侨胞代表黄伯才先生（是新加坡的资本家），率领南洋华侨总会的代表团，来检阅侨胞自己的子弟兵，看见国民党反共派来势汹汹，自动出来仗义执言，说：“我们华侨连救国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你们这样做法，实在使二百万华侨寒心！”

反共军香翰屏部喻英奇旅，正在向我军加以压力的时候，敌人又发动了“扫荡”，将这个旅打垮了三分之二。我们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起来自动配合他们，敌人把国民党军打得乱七八糟，得胜而回的路上，突遭我伏击，毙敌六十余名，活捉一名。这是广东抗战史中第一次俘虏敌人。我军乘胜追击，收复龙冈。反共军由于我们实际行动的影响及他自己失利的教训，就对我们换了一

副面孔，又发给我们八十颗手榴弹，以为打胜仗的奖励，并且给与我军“广东第三游击区独立大队”的名义。可是不久，他们又布下阴谋，要调我军到兴宁整训，当我军开入兴宁时，就爆发了坪山惨案，我军一部被包围缴械，损失了几百人枪，番号也被取消了。

后来，该部自动挺进广九路两侧敌后，与宝安、东莞等地共产党东莞县委王作尧同志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联合起来了，这便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

东江游击纵队，除上述战斗外，在一九三九年尚有夜袭沙头角，围困葵涌、峡口，白昼进袭大良城战斗等。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由副大队长率领一个班，袭沙头角小山上敌碉堡，我们一个班长冲至碉堡门口，一个炸弹掷进去，炸死敌二，重伤敌七，共九人。第二天敌人不敢再住碉堡就撤走了。我们的班长，成了有名的战斗英雄，载上了口碑。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我们围困葵涌据点。该地驻敌八百，把国民党打得无处可逃，我们上去，连续袭击了三天三夜，敌人惶恐不堪，结果逃出葵涌。当时我们游击队，不过仅四百人而已，挤走了二倍于我的敌人，当地民众，莫不称颂我军“神出鬼没”。

至于峡口战斗，更创造了以一当十的奇迹。我军一小队人，掩护峡口群众转移；峡口是个大村子，群众一下转移不尽；我军一小队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激烈抗击至四个钟头之久，毙伤敌四十余人，我们一小队同志也全部壮烈殉国，生还者仅一十余岁的小战士。当我军这一个小队接到掩护他们转移的群众要求后，虽然与敌人众寡悬殊，但斗志极旺，人人下定牺牲的决心，其中许多党员，都叫回去报告情况的小战士，将自己决心转告支部。最后竟全部完成了志愿，当地民众披麻戴孝，举行公葬，挥泪送

险。这恐怕可算是军民血肉相关的最动人的表现了。

广东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一九三九年后，也有我游击队活动，开始仅二十八人，七根破枪，没有一根是好的，到了后来，发展成了二千多人。五月间，曾白天袭进大良城，当街打死敌人上尉，剥了军衣，夺了军刀回来。

以上只是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例。由此也可见我军英勇之一斑。然而国民党对于我们，是尽其限制、破坏、压迫之能事。他们开始按兵不动，一万大兵对三百敌人不敢进攻，以后是什么取消番号呀，集中整训呀，包围歼灭呀，花样繁多，阴谋百出，使得我们这支华南唯一的抗战力量经常处在敌顽夹击的艰苦环境中。

在华南敌后战场上，除了东江游击纵队外，还在海南岛出现了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由该地红军游击队发展而成的，它在海南岛的东北部西北部不断围困与打击敌人，在这个岛上，大部分广大富庶的土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十六个县城，敌人只占了六县，我们则有十县。

海南岛的游击战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抗战爆发前，内战时代留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接到了党中央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文件，就派人去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要求合作抗日，可是一直未得答复。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开诚布公进行谈判的意思。他们的目光只看到一己的私利。抗战爆发前，他们既被迫抗日，缺乏准备；抗战爆发后，他们更无意守护海南岛，一九三八年初就把原驻海南岛仅有的一师兵力撤走了，只有二个保安团留在那里。海南岛人民感到敌人威胁日亟，遂自动要求武装，在民众压力下，总算谈判成功，以冯白驹同志为领导，成立了“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

立队”。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敌在海南岛登陆，先侵占琼山、海口、丰盈，再进攻儋县，并在三亚湾登陆。当地地方守军纷纷溃散，国民党官吏闻风而走，海南岛秩序非常混乱。这个时候，各地民众都要求我军去驻扎、去保护，要求我们领导进行抗战。我们的队伍，就扩充成了六个中队。

这个时候，我们不断以游击战袭击敌人。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军在琼山东南伏击敌汽车一辆，将其击毁，缴获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六支，消灭敌军小队长以下十余名。六月我军袭击琼山西永兴市（海口通临高公路上）敌据点，把驻守敌军大部消灭，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同月，琼山我军在西长村桥也取得了胜利，歼敌多名。十月底，我军在澄迈南围困了敌寇设防较强的那大据点，经过一星期的围攻，敌仓皇退走。十一月我军围攻文昌西石桥学校驻守的敌军，第二天敌被迫败走。同月，我军又收复文昌以南文岭敌据点。

在我军不断打击下，敌伪发动了报复进攻。一九三九年九月敌军一千多人，发动了四路进攻，合击琼山地区我军；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给了敌寇一个内外配合的夹击，把敌人打退；接着敌寇发动过大小数十次的进攻，都未得逞。后来，敌加强了驻守海南岛兵力，不断发动对我军的进攻，我军的活动更是艰苦。

我军英勇战绩，感动与振奋了孤岛人心。各学校学生纷纷要求参加军队及救亡工作，各地民间武装力量纷纷要求我们领导抗日，连远处南洋各地的琼崖华侨及香港的琼崖同胞，在南洋各地未失陷前，也组织了救乡服务团回海南岛工作。新加坡、泰国的华侨和香港同胞也募捐经费及药品，捐赠我军。香港同胞送来毛毯、卫生衣，新加坡侨胞曾组织“援助琼崖抗日游击队”的运动，

每人每日认捐经费若干，共捐了一万余元叻币。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琼崖专员吴道南到了海南岛，海南岛的反动逆流就上升了。到任后不到两个月，他就开始在各地抓捕共产党员及抗日进步人士，制造磨擦：把我们派去的代表杀了，并五度向我进攻，每次都被我严正地阻止了。可是，每当敌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但是琼崖的游击战争，我们不但坚持下来，而且更加发展与扩大。到后来反共派已经完全丢弃了琼崖人民，在当地保卫人民，抵抗日寇的，就只有我们的游击队——琼崖人民的子弟兵了！

一三 震动全国的百团大战

同一小时开始动作

一九四〇年，正是国际法西斯最猖獗的年头。希特勒用闪击战打垮了欧洲许多国家，气焰高涨。当时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空气笼罩国民党统治区。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在英日成立妥协后已被封锁。日本强盗也正在阴谋进攻西安、昆明、重庆，企图压迫中国投降，并打击英美在远东的势力，以便进一步与希特勒相呼应。……可是在东条好梦正酣的时候，在华北忽然霹雳一声，五千里长的敌后全线迸出了战斗的火花，东条挨了出乎意料的当头一击！

打击开始于八月二十日晚八时。

在同一小时内，八路军出动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人的兵力，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向全华北主要的交通线开始了战役的总破击。计划是在一个月以前就拟好了的。在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华北各个军区在战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将近一个

月内完成了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炸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制，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秣的贮存……一切都有计划地进行完毕，于是百团大战在敌人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

当天夜间，敌人似乎还在做梦，枪声和爆炸声响了。敌人无数据点，同时发出了求援的急电。但是求援之处如此之多，交通线又到处被切断，到底要从那里调兵，向那里增援，简直弄得敌人的指挥官手足无措了。

第一阶段的总破击战

从八月二十日晚八时大战爆发时起，到九月十日止，是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作战的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击战。进攻目标包括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平绥路、平古路、白晋路、沧石路、德石路、代蔚路等线之敌计五个师团九个独立旅团，约二十万人。打击重点为正太路。

(一) 聂部队（晋察冀军区，包括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在聂司令员指挥下，调集四十六个团兵力，以十五个团分三个纵队破坏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路，另以二十五个团兵力分头向北宁路、津浦路（德州以北）、沧石路、平古路、平大公路北段、平汉路（正定以北）实行破击。

娘子关天险，是敌人在正太路上的重要据点。在大战爆发的当夜，经一场血战后，就被我军克复了。娘子关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失守的，被敌盘踞了足足三年。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关西的大庙里。关的南角大山上，敌人依据了险峻的山岩，在我们旧有的国防工事上，又加了四个大堡垒，另外，在村子里还驻了一部分伪军。在当夜我军先以机敏动作解决了村内伪军后，续向据险顽

抗的敌人强攻，在陡峭的山岩上，我健儿冒敌炮火，前仆后继，经三小时的激战，终把敌人全部肃清。黎明时候，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重新飘扬在娘子关头。许久生活在黑暗中的同胞，见了祖国的健儿和飘扬的国旗，激动得流泪了。

同一晚上，并陘煤矿被炸毁。该矿除供给华北敌人需要外，由于煤质优良，大部运回敌国。国民党军南撤时，并没有加以炸毁，敌人占领后，保护得十分周密。四周是丈多高的围墙，墙上有电网（电力二千二百瓦），电网外有铁丝网与外壕。电网里，老矿筑了十五个堡垒，新矿也有四个。在离矿市八里的北面山上（贾庄村东），还修了三个碉堡，作为外卫。

出击的那天晚上，优良的工人做向导，队伍从一座高山下来，看见矿市灯光灿烂，电灯像星一样多；火车在吼叫，大烟囱正冒着浓厚的黑烟。

半夜里，战士们静肃地越过外壕，破坏了电网，掷出了第一个手榴弹。于是大炮吼起来了，机关枪也叫了。队伍架起梯子，向围墙里爬去。

战斗就这样展开了。敌人用山西造的大炸弹炸我们，也无法遏止我军。激战两小时，攻进了新矿，完全占领了新矿的敌人工事。残敌退进一座孤立厂房顽抗。我军包围了残敌，同时就在工人们奋勇的帮助下，炸毁了新矿的十四盘机器、十个锅炉、三座风车、二个大水池、两个烟筒、一个绞车房、一所电机房、一所火车站、五座铁桥以及矿上所有建筑。矿内的积煤，则以厂内汽油灌上焚烧，大火周余未息。在火攻之后，又引山洪，由新厂灌到旧厂，使未被炸毁的旧厂也难开工。据被俘的日本机师说，即此一矿，敌人就损失一万万日元以上。即使有现在的机器，也得在半年以后才能复工。

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三天之内，晋察冀部队就破坏了正太东段（阳泉至石家庄间）的铁道；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陘、地都、乏驴岭、南北峪、苇泽关、移穰、贾元、东王舍、关头村、头泉等车站和据点；毙敌独立第四、第八混成旅团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其后又连续打击盂县境内敌人，攻克北会里、东会里、河底镇、上社、中社、下社、兴道、西烟、杨兴等据点。所有公路也都被我破坏。

（二）刘邓部队（一二九师及晋东南新军，冀南部队等）：刘师长邓政委指挥四十个团，总部炮兵团、特务团和决死一、三纵队五个团参加战斗。以主力十五个团和炮兵团进攻由平定至榆次的正太路；以八个团兵力对付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另以九个团兵力分头破坏德石路、平大路南段及邯济线。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平遥至壶关段之白晋路，则由一二九师七个团及决死队五个团分头担任，另以两个团对临汾屯留公路破坏。

我军势如潮涌地扑向正太路时，敌人睡梦正酣，连续的雷鸣般的爆炸声，震动了二百里的地面。沿路所有守备据点及其部队都被毁灭，所有的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物都被彻底削平了。

虎踞在阳泉大门前的狮脑山（离城八里），控制着整个的正太路的咽喉，关系作战全局。我们的炮火就由这个山头向阳泉猛烈发射。阳泉是敌片山旅团司令部所在地。它急疯了，便在二十一日上午，开始凶猛的反攻，恶战在这里进行到二十九日。敌人动员了全部兵力，并武装了全部日侨，前后百余架飞机轮番轰炸，炮火的轰鸣和七昼夜的雷电急雨交织着。我军屹守在受着炮火洗礼的山岭上，进行英勇的反击。

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阳泉以西上湖据点进行着。堡垒里是

少数敌军，极多伪军。我们把堡垒包围起来。在周围山顶上，有伪军的家属们，喊叫着教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放下武器；伪军们听见自己亲人的召唤，很多人都拖枪跑出来了。剩下的敌人集在最后的碉堡里，企图做困兽之斗。我炮手在离敌人几十米远处，两个炮弹就把敌人的工事打塌，我军迅速地占领了这个据点。

正太路毁灭了。

外围的敌人，在战斗一开始，就被我军监视，既得不到援助，也得不到真实情报。四五天后，毁灭又临到他们的头上。

二十五日大白天，陈赓同志指挥的部队，向平定西南敌最坚强的外围据点冶西，进行了攻坚作战。一个连的突击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斩断了几层铁丝网，把外壕敌人全部消灭。守敌一百七十余人守住最后一个大碉堡，又施放了毒气；战士们用手榴弹炸散毒气，继以炮击，终于把敌人全部消灭。

我一二九师部队，在二十天内胜利地完成了正太路战役以后，便开始了从正太转移。这时敌人七八千人，分兵五路，向晋中区进攻，从背后来迂回我军。谁知我军早已转过身来，终于在九昼夜的作战中，粉碎其合击阴谋。

与正太路作战同时，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同志指挥之下，把冀南大小公路破坏得稀烂；尤其对石德路的破击，参加民众前后达三万余，把路基都一段一段挖掉。平汉路由石家庄到安阳段，受到东西夹击的破击，几座铁桥都被炸飞，安阳敌机三架也被焚毁。白晋路由子洪口迄长治段的铁轨都被搬走，铁桥都只剩一副残骸。

二十余天中，单在正太路沿线，就有片山旅团的德江、原田两大队全部被歼灭；条藤、铃木大队及三十六师团之永野支队等，也被歼过半。

(三) 贺关部队 (一二〇师和决死二、四纵队): 贺师长关政委指挥一二〇师及决死队共二十二个团破击同蒲线 (大同至阳曲段) 及汾离公路全线, 置重点于阳曲南北, 阻敌向正太路增援。

八月二十一日, 一二〇师三八五旅克复由静乐通到忻县公路上的敌人重要据点康家会。我军在夜间以强袭突破敌人的几层铁丝网, 先占领敌人的大碉堡, 把残敌压迫到小碉堡里, 然后爬到碉堡的顶上, 把手榴弹掷进去, 把鬼子全部歼灭。占领了这个据点后, 我军便继续展开对同蒲路的破袭。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斗, 延续二十余天, 到九月十日, 我军完全完成了预定计划。

第二阶段中的攻坚战斗

从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上旬, 为大战的第二阶段。我军为继续扩大第一阶段的战果, 战斗重心就侧重在歼灭敌人, 消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解放区的据点。其中大的战斗如太行的榆辽之役, 晋察冀的涞灵之役, 冀中的任邱之役, 冀南的破袭石德路和邯济路, 晋西北之对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的破袭等。

这里只叙述榆辽之役, 就可以概见其余。榆辽路是敌人割裂太行腹地的据点公路, 经营有年, 构筑坚固, 屯积粮秣够半年之用。但在我攻坚作战下, 一路上的小据点为我军一扫而光, 榆辽路被彻底摧毁。

二十三日晚, 我陈赓部就攻进榆社城, 把四百多敌人逼到东关第九中学的乌龟壳内。敌人早已把这一带的地形改变了: 四周是削壁; 削壁上 is 围绕着几层铁丝网的堡垒群, 工事构筑相当近代化。我们的英勇战士, 在极有组织的火网掩护下, 架起了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云梯, 并用水湿的棉被突然塞住敌人的枪火, 登上了四丈多高的母堡。炮兵火力, 把敌人集结的文庙阵地, 炸得

烟尘弥漫。工兵们乘夜间实行坑道作业，把大量的炸药，埋在堡垒的地基下。二十五日下午，开始第三次总攻击。敌人的主要堡垒都炸飞了。我突击队突然出现在敌人的操场上面，强迫敌人进行白刃战。除了个别的漏网以外，藤田中队、连中队长在内，统统都死在自己造成的坟墓中了。数千民众在一夜中还没有把枪炮子弹搬光。

管头的攻击是和打榆社同时举行的。敌人是片山旅团的山本中队。我军断绝了他们的水道，晚间登上了陡削的山，接近了敌人。经过三昼夜的恶战，山本中队长只能带领几个败兵，从尸体枕藉的巢穴中乘黑夜溜走了。

石匣是二十五日开始攻击，当夜攻克。敌人大发兽性施放毒气，我军在运动中的一个营全都中毒。陈锡联旅长亲自率领了其余部队，冒着毒气用几百个手榴弹歼灭了敌全部守军。

榆辽路的碉堡线就是这样肃清的，并消灭了敌池边大队的三个中队。

第三阶段的反“扫荡”战

一个半月接连不断的破击和歼灭，使华北敌陷于大混乱的局面。伪军纷纷动摇，沦陷区民众人心振奋，伪政权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敌恼羞成怒，乃急调大兵，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报复“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构成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这阶段从十月六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历时凡二月。首先由太行山区开始，次及平西、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大青山等地。在此阶段中，我军又打了几次歼灭战，如关家垴歼灭战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太行山到处燃起了反“扫荡”的烽火，彭副司令亲自指挥，以乘胜之师演成了有名的关家垴歼灭战。

十月三十日，由水腰窰左会的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在我军截击、尾击下已显露了疲惫的象征，当日继续被迫到关家埡、柳树埡（武乡以东）一带。我以第五、第六、第十旅及决死队各一部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我炮兵准确地摧毁了敌前沿阵地，我突击部队迅速涌到敌人跟前，往返冲杀达五小时，把关家埡附近的高地占领了几处。第二天，在敌机轮番轰炸下，我军又开始猛攻，往返肉搏四次，终于将周围有工事的高地完全占领，把冈崎大队歼灭殆尽。少数残敌，为由辽县武乡出援的敌人二千五百人拚命拖出。援敌又付了重大的代价。关家埡的山上，还遗留下二百八十具尸体和三大堆尸灰。

结果

我军从八月二十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连续作战，整整有三个半月。在这三个多月的过程中，我参战兵团是时刻处在紧张的战斗中，又因山地贫瘠，交通阻塞，有些部队一二十天没有吃过饱饭，没有睡过一夜好觉。但全军战斗热情仍然高涨，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在整个大战过程中，除配合部队战果不计外，总计我军进行了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敌军二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敌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余人；消灭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处；缴获了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里，桥梁、车站、隧道等二百六十余处；解放煤矿工人一万余，铁路工人二千余，被强拉去修路的同胞六百余人。而最重要的战果，则是打破了“囚笼政策”，并牵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拖住了它进攻大后方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而我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者及捐躯沙场者，亦有

二万二千余人。

这样一个在中国抗战史上空前大规模的战役进攻，使全国军民莫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后方许多报纸都做了庆祝的社论，后方民众纷纷来信表示钦敬与慰问。可是，这样一个大仗，在作战中却没有得到友军的配合，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充。卫立煌将军虽曾令其晋南中条山部队配合，但为蒋介石下令停止了。那时国民党军队完全停止抗日，都在忙于闹磨擦。日寇东条陆相在一九四一年对敌贵族、众议两院作一九四〇年一年的军事总结报告时，就有这样的话：

“昭和十五年度，敌军（指国民党军——编者）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事实上，八路军是把敌人的绝大部分兵力负担在自己身上，而国民党却腾出手来反对我们。这是中国抗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鲜明对照。

第三章 艰苦奋斗，坚持 解放区的抗日战争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

一、极端困难时期的敌后形势

从百团大战到抗战五周年（特别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是敌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百团大战后，敌人震惊于敌后军民的伟大力量之余，便大声疾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继任为冈村宁次。他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提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口号，企图把华北变成日本法西斯反英美的后方基地。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日寇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我解放区）。对各区施以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进行大编乡，肃清内部“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物资，用一切办法巩固其占领，强化其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以此在我解放区人民中制造严重的物质困难与失败情绪。在战

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与“扫荡”，三者又密切相配合，总的目的是要摧毁我解放区，消灭我军，以便“确掌华北”。

在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中，敌人仅对我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千人以上的达一七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三三、九〇〇人，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来愈凶，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三个月的。在“扫荡”中，兽兵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庄，都变成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囚笼政策”仍继续强化，公路碉堡大增。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奴役民众之苦，是骇人听闻的。所有这些堡垒、路沟，都是拆老百姓房屋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园，强迫老百姓劳役而筑成的。被拉去的老百姓，稍有怠慢，即用皮鞭抽打，或用酷刑致死（如有放在石灰水中浸死者）。

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各省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但他们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在反共中与敌人订立“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语），更有暗中与敌谈判投降条件，信使往还于平津、太原、新乡等地，大摇大摆，毫不以为耻；而对八路军新四军与抗日人民，则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反对；更对新四军进行了滔天罪行的“皖南事变”，爆发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乘机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太岳解放区。庞炳勋则侵我太行。一九四二年

李仙洲率部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国民党军队“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迫相辅而行的方针，在“和平”谈判不成时，就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既专心反共，对敌作战毫无准备，以至不到三天就丢掉平陆、垣曲等六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第三十师师长公秉藩，和第三、第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各一部，均行投降，共计约二万二千人。此外，这一时期，华北国民党军投敌者逐渐增加，较大的几批有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新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部三千人投敌，该军四师的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率部三个团投敌，暂编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 CC 分子齐子修率部八千投敌，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部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晋军骑一师长赵瑞、骑二师的团长杨诚，都率一部投敌。至于较小的降将，更不可胜计。其中也有不少地方武装（保安队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浅。这时正是国民党高唱“军令军纪”的时候，但对投敌叛变的将领，却无一纸讨伐令，甚至并无一字贬谪。所谓“军令军纪”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国民党军队“反共第一”之下，困难是增加了。

敌人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毒辣的进攻办法，我们也曾吃了一些亏。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华北解放区面积曾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平原地区（如冀中冀南）处于敌我力量错综复杂，非常严重的局面。但是，在严重的考验中，我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找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

这些办法，可分为三方面。

(一) 在解放区

我们首先加强解放区建设，其主要工作：

第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实施。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敌后各解放区都先后成立了参议会（县议会和村代表会早就有了），它与国民党一党包办指派圈定的国民参议会会有本质的区别，它是真正的民意机关，是人民由直接、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的人民代表组织，它有权选举政府，创制法律。而共产党则坚决限制自己的党员在民意机关与政府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这种真正民主制度的实施，保证了各阶层人士真正的团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更认真教育了共产党员如何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这个演说，起了很大作用，敌人曾认为这是一个顶厉害的演说。

其次，彻底执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由于这个政策的认真执行，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改善，因而抗日积极性也就提高，另一方面保证地主收到地租，因而也增加抗日的团结。这个政策的实行，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事实证明，自一九四二年后，这一政策的认真实行，成为使解放区严重局面重趋好转的分水岭。

第三，又实施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党外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提出的，中共中央热忱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并推行于敌后解放区。抗战初期发展起来的庞大机构，都加精简，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物质困难，另一方面又能更加轻快敏捷地与敌人搏斗。精简的结果，后方机关缩小了，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

使我们的战争机构与战争情况相适合，使我们仍然极有力量对敌斗争。

第四，是大量培植了地方武装和民兵。民兵（与自卫队不同）是人民武装的骨干，它的特点是既不脱离生产，又能担任对敌作战的任务。在各个军区，我们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差不多较前发展了一倍。在反“扫荡”时，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主力分散与民兵相结合，日夜与敌人扭打，用地雷、手榴弹与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又实行空舍清野，使敌人抢不到东西，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有力部队，则转进到敌后之敌后，主动地造成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集结主力，坚决消灭一股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在这时期中，好多次大“扫荡”都是被这种战法粉碎了的。

第五，为着打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我们开展了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在战斗间隙中进行的，主要是发展农业，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生活必需品的自给。举一个旅为例：新四军罗师的一个旅，在一九四二年春的二十天生产突击中，共开垦了三万二千四百一十亩荒地，种菜一百四十三亩，还植树二万三千余株。五月中旬五天内完成了锄草、插秧、种谷的计划。在十月一日至二十日，全部秋收完成，共收谷三万二千六百二十石四斗八升、稻草二十四万九千多斤、包谷二万零一百斤、芝麻四石。这样就部分地达到了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响应了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号召，开辟了号称“陕北江南”的南泥湾，赤手空拳地建立了革命家务；在一九四二年，南泥湾的屯田部队，已能做到全部自给，不向边区政府领

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不论前方后方，八路军新四军不但自己生产，还经常帮助民众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打击敌人抢粮阴谋，掩护并帮助人民抢种抢收。有些地区，部队还节约救灾，如太行区的救灾运动，上自总司令，下至每个战士，都节约了伙食，作为救济灾胞之用；彭副总司令连他自己的稿费也全部捐了出来。老百姓到处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此外，我们还实行了统一领导、拥政爱民、整顿三风（思想教育）等政策，使我们的队伍步伐更整齐，保证了我们的胜利。

（二）在游击区

针对着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展开了反蚕食斗争。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充分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在面对敌人点线的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也是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配合，乘敌立足未稳时，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嘴。如果敌人深入内地扎下了据点，我们就实行对敌围困直到把敌人撵走，或集结主力拔除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在敌人点线后面，我们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发动敌占区人民抗敌，推翻伪组织，使敌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在平原上，堡垒林立，活动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挖坑道至敌人堡垒下，以炸药炸毁它）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来保卫村庄。

（三）在敌占区

为着粉碎敌人的清乡，争取群众不至伪化，维系人心，瓦解敌伪，我们又创造了武装工作队。

这种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工作者。他们越

过敌人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深入到敌人的格子网内，进行活动。他们在敌占区里，分合自如，行踪不定，敌人找他们不到，老百姓却常常会见他们。他们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主要是为了保卫人民利益而奋斗，反对汉奸特务及日本侵略者。

武工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如经常包围敌人碉堡，向敌伪喊话，上夜课，或利用机会由日本解放联盟盟员用电话向日军通话；占领敌人的会场，揭破敌人欺骗宣传，将我军及盟国胜利消息散布到沦陷区的老百姓中间去；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政治工作。同时，它还进行军事斗争：如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和死心塌地鱼肉民众的汉奸，必要时将他们就地解决或俘虏过来，使这些坏蛋不敢随便下乡敲诈勒索；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散伪合作社，使敌人失去统制、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抓丁抢粮，截击抢粮敌伪，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由于我武工队进出敌后之敌后，逐渐解放了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破产，“治安区”永远不安，使敌人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如敌人在一九四二年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所得不过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三、二六九人，反正的有九、四八四人，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

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了。

我们采取了以上种种办法，这些办法又互相联系，互相结合，于是粉碎了敌人“扫荡”、“蚕食”、“清乡”的毒计，使其摧毁与缩小我解放区的计划失败。由于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我们终于在极端困难中站稳了脚，赢得了胜利，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下面，我们把新四军如何从危境中走上新阶段，华北几处反“扫荡”的极为残酷的情形，新四军反“扫荡”反“清乡”的情形，华南游击队活动的情形，分别谈一谈。

二 皖南事变与新四军发展的新阶段

皖南事变真相

汪精卫投敌后，国内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弥漫全国。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曾企图消灭新四军苏北主力未遂，于是布置更大的阴谋。他们完全抹煞新四军坚持长江以南游击战争的战绩，完全抹煞当地民众和新四军血肉相关的关系，以急如星火的命令，命新四军限期北移。

中共中央，曾洞察这种反共投降的暗流的高涨，一方面发动百团大战，以伟大的胜利来粉碎投降派的“理论”，坚定全国人民抗战信心；另一方面又主动向国民党提出调整国共关系的和平方案。经中共方面的让步，双方成立协议，遂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国民党对这一协议表示满意。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于十二月初就亲向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面商北移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过苏南渡江，移往江北。叶军长回部，先令新四

军皖南部队的辎重、行李、后勤人员计千余人，首批经指定路线北移，沿途无阻，抵达苏南。叶军长随即率军部教导团及三支队，一行计九千余人，循首批北移的路线，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由皖南泾县的云岭起程，次日到茂林地区。

一到茂林，就遭遇国民党七个师的大军的伏击。在丛山四绕、断崖绝壁的狭窄地区，变起仓猝，我军初无防备，仓促被迫自卫。一月六、七、八三天，曾将国民党军队打退，但到了十日以后，由于没有粮食，全军四天未沾水米，已呈险状。叶军长致书对方的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他与叶军长曾是保定军官学校幼年同学），责其背信弃义，望以抗战为重，不宜自相残杀；如能允许新四军继续通过，则叶军长本人愿亲往上官总部协议，以解决纠纷。上官得信后，就回信同意，欢迎前往面商。叶军长就慨然前往，同行者有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政治部秘书，一部官佐和少数卫队。不料十三日到上官处时，上官一面背约将叶军长及其随从扣留，一面令大军猛攻，遂于一月十四日夜，完全歼灭了被围的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及许多重要干部也惨遭毒手。在那样环境下突围的仅千余人而已。

从这次反共军的部队看，有的先期远从宣城调来，有的从苏南溧阳、溧水、高淳调来，有的从浙江金华、开化之线调来；其路程有远至八百里的，要从各处集中非有一个月布置时间不可。事实证明，发命令的人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命令新四军北移之时，同时也就是上述参战部队开进之时。到十二月，叶军长赴顾祝同处接洽的时候，对方诱歼新四军的罪恶计划已全部告成了。所以，当新四军开动的次日，就全部被围。当两军相持之际，上官云相又阴谋诱捕叶军长。反动派阴谋家们，对这次诱歼抗战部队的计划，是蓄意已久，并且从上至下，布置极其周密的。他们

先放新四军的辎重行李通过，以便诱致军部及主力通过，而将他们一网打尽。反动派对日本人打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布置周密的仗！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同志，由于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致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步，使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遭受覆灭的损失，项英同志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新四军皖南部队被歼以后，主持这次“大计”的蒋介石，就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于二十八日在重庆纪念周上宣布新四军事件，吹起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以期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事实上，违反军纪的正是下令围歼新四军的人，而不是执行北移命令的新四军！蒋介石并宣称，要组织法庭审判叶军长，然而这种“风波亭”式的所谓审判，终于没有敢于举行。很显然的，真正的审判如果要举行，被审判者将是无耻狠毒的国民党阴谋家们，叶军长将变成审判官，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批真正罪犯的罪状。

除叶军长外，还有很多被俘将士，有的瘐死狱中，有的被关在人间地狱的集中营里渡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据从集中营逃脱出来的同志目睹：年老的团参谋王槐生同志，作战负伤，国民党竟唆使医生割断血管，血尽而死；青年的科长陈惠同志，弹中头部，国民党五二师师长不但不予医治，反而亲自撕大伤口，使他狂呼而死。女同志周琳，遭受禽兽不如的国民党军官十余人强奸后，一个营长又逼她作太太，否则以活埋相威胁。她拒绝了这种无耻狂妄的要求。后来她虽被救亡团体设法救出，但因受摧残过重，竟惨死于江西上饶中心医院。这不过是国民党虐杀和污辱新

四军将士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余被酷刑毒打和长期磨难致死或致成残废者，还不计其数。

这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纪军令”的具体表现之一。呜呼“军纪”！呜呼“军令”！

事变的結果

皖南事变后，除反动派自身得意洋洋以外，首先称快者当然是日寇和汉奸。同盟社曾大为激赏，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同时，敌人竟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为口号，大举向新四军地区“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命令汤恩伯率大军二十余万，东进夹击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处境是多么危险！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事变爆发后就发表谈话，向当局及全国人民呼吁，仍然希望反共派的觉悟，希望采取比较公允的善后办法。但反共派充耳不闻，继续倒行逆施。为着应付巨变，中共中央便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重新组织军部，领导全军。新的军部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成立于苏北。

这时，新四军虽在事变中被歼近万，还有九万人分布在大江南北和武汉、南京、上海、徐州、开封、蚌埠、安庆的外围；他们在新的军部领导下，改编为七个正规师，仍然坚持坚决抗战。他们在皖南事变时，虽义愤填膺，愤激莫名，但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大局着想，以最大忍耐挽救危局，未采取任何报复和扩大大事态的部署。新四军就是以这种方针和态度克服了严重的反共投降危机。以下是代理军长陈毅同志对克服当时危机的经验谈：

“如果问：新四军今天从皖变以来的危急中摆脱，有什么宝贵经验？那我们正面的回答：最大的一点，就是于最紧急的关

头，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的团结精神回答对方分裂投降行为，绝不因别人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同时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则大义所在，自难忍让，绝不偷安苟且，同流合污，因此对一切破坏抗战的行为，均采取坚决而严肃的斗争手段。我们实际的经验指出：必要的自卫斗争，是达到坚持抗战，达到巩固团结的不可欠缺的措施；过度容忍让步，只能助长投降势力的发展，必至使抗战失败。同时我们又绝不过分苛求，宁委曲以求全，隐恶而扬善，责己也重，责人也轻。这是我们皖变中的经验，并以贡献于全国抗战的军民。我们此种临危不乱的团结精神，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流血的代价，但最终克服了反共投降的危险，保证了抗战大业的仍然继续。”（陈毅：《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

正因为新四军有正确的方针，又有广大人民的拥护，所以皖变后不但没有被消灭，没有被削弱，而且更加坚强了，走上了发展的新阶段。这不能不是大大地出乎国内反动派及敌寇汉奸的意料之外的。

走上了发展的新阶段

如果说，新四军过去还仅做到模范的游击兵团的程度，那末，在皖南事变以后，却迅速地走上了正规化大兵团的阶段了。

当时各师的阵容和活动地区如下：

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支队和管（文蔚）叶（飞）纵队改编而成，师长粟裕同志，该部活动于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

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第四、第五支队和当地的游击部队改编而成，师长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副师长罗炳辉同志升任），该部活动于安徽东部和江苏一部的淮南解放区。

第三师，由八路军南下五纵队，张、韦支队，彭、宋支队改编而成，师长黄克诚同志，该部活动于江苏北部的苏北解放区。

第四师，由在豫东发展起来人民武装——新四军的一个支队改编而成，师长彭雪枫同志，该部原活动于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区，皖南事变后，为着避免与国民党李仙洲、王仲廉部的磨擦，曾一度退入了津浦路以东和运河以西的地区，建立起了淮北解放区。

第五师，由鄂豫边的人民武装，新四军鄂豫边挺进纵队改编而成，师长为李先念同志，该部活动于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及中部、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的鄂赣湘皖解放区。

第六师，由苏南指挥部、新二支队、江南抗日人民自卫军改编而成，师长谭震林同志，该部活动于江苏南部和安徽一部的苏南解放区。

第七师，以皖南突围部队为骨干，加上江北游击纵队和江南渡江部队各一部改编而成，师长张鼎丞同志（后由谭希霖同志担任），该部活动于皖中解放区。

此外，在浙东沿海沦陷区，从一九四一年起，即有我们的游击支队，一九四二年六月浙赣战役后，我军收复了浙东广大地区，成立了江浙抗日游击联合指挥部，以何克希同志为指挥，建立起了浙东解放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发展之速，只举第七师为例就可以说明。第七师，主要是由事变中突围而出的少数部队和干部为骨干而编成的。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有两支部队：一支由傅秋涛同志率领，经过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了国民党冷欣部队的严密封锁，经东岸、宁口、孙家埠，而到达苏南与该地新四军汇合后再行渡江北上；另一支则由黄火星同志带领，经过同样艰难困苦，

突破了南陵、繁昌等地的重重封锁，北渡长江而与无为区的我军汇合。这两支突围部队，共约千人，个个都可称为钢筋铁骨的勇士，编成七师后，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正规师。

第七师一开始成立，即处在敌顽两面夹击中：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由西向东压迫，企图将我军压到淮南路东去；日寇又利用大量伪军、特别是刘子青部，经常向我“扫荡”，企图消灭它。经过一年的奋斗，他们就以无为、巢县为中心，向四面活动：向东直到含山、和县、江浦一带，向北越过巢湖直到合肥，向西直到桐城，开辟了桐东地区，向南越过长江，直到繁昌、铜陵、贵池一带。一九四三年敌以万余人的大兵力来“扫荡”，也被我军击退，更加巩固了解放区。

七师原是经过惊涛骇浪，基础薄弱的部队，但在战斗中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至于原来就有雄厚基础的其他各师，就不必说了。

华中新四军八个解放区，不但在军事建设上走上了新的阶段，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也走上了新的阶段。

皖南事变后，各区成立了参议会，在民主自由空气中，各阶层人士济济一堂，共参国是。年青者如康有为的曾孙女一辈，年长者如曾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老先生一辈，都乐于携起手来，为人民服务。其中还有多年不问政治的长者，如安徽省涡阳县的田丰先生，泗县陈荫南先生。两老都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见国事日非，豺狼当道，国民党日益腐败，乃回家潜居多年；直到新四军解放了当地，二位老人才出而参政。

在经济建设上，除了进行普遍的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运动及奖励生产，发展农、工、商业外，又积极为民兴利。特别对水利建设成绩卓著。如苏北大海堤，国民党当政十余年，在和平环境

下，屡欲兴建并藉此敛钱而未筑成的，现在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在战时敌后环境下，倡议兴修，结果在极短时间（由五月到七月）内，全工告竣。该堤将成，尚余数里缺口时，适风雨大作，海浪直扑堤边，一般老百姓大起恐荒，怕要功亏一篑。这时阜宁县长宋乃德同志，亲率干部，会同民夫在风雨中连夜抢筑，终于将堤合拢。堤成，海啸大起，水位超过一九三八年大水灾时（那次水灾曾冲毁良田数十万亩，有数万人民和数十万牲畜葬身鱼腹），堤内民众观此情景，都额手相庆，并相率呼该堤为“宋公堤”。

所谓“宋公”的德政，不过是解放区民主政府无数建设之一而已。其他兴堤筑坝，兴修水利的事情很多，不再枚举。

在皖南事变后，大后方的情形是民主日蹙，言路日窄，文化人不能立脚，纷纷来到解放区。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如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名记者范长江等都因愤于国民党的无理压迫，而到达新四军地区。苏北的解放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文化新村”，虽在敌后的条件下，还尽力造成适于研究与著述的环境。有名的江淮大学、南通学院、医科大学，相继创办。这些大学的教授，有许多是国内知名的学者，原在暨南、交通、复旦、大夏等大学任教，他们率领学生一齐来到解放区。江淮大学的校长韦恂先生，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广东教育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职，是国内极有声望的教育家。他们初抵解放区时，就感到无限兴奋。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当他第一次在解放区重睹祖国国旗时，不但兴奋得流泪，而且使他不能再安稳地骑在马上，弄得几乎坠马。

到解放区后，他们每人都运用自己的笔杆和枪杆结合起来，为民族为人民服务，愉快而辛勤地工作着。

根据一九四一年夏天的统计，华中解放区有日报二十七种，周刊、月刊和半月刊四十余种，部队报纸四十余种，油印小报二百余种，中小学计有四千二百余所，学生二十余万人。

特别应该说明的：所有这些建设，不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而是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下进行，有些是在敌人的一面“扫荡”下进行，有些是在两面夹击下进行的。

三 给冈村宁次的迎头痛击

晋察冀打碎敌人的“铁壁”

敌人于“百团大战”中遭惨败，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继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他是屠杀朝鲜民众和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

他到华北的下马威，是立刻集中了十万以上的大兵，首先指向我晋察冀北岳区来一次空前的大“扫荡”。冈村组织这次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意即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他集中的敌军为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二、第一一〇等师团的精锐，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等六个混成旅团，其他还有一部分伪军。在战术上，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点鳞式包围阵”，并使用伞兵和毒气。

在“扫荡”之前，敌人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并对军区的易县、满城、五台、盂县、平定、井陘、平山、行唐等地区，不断进行小“扫荡”。又在军区周围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挖掘封锁沟。……我军区当局根据此种情况判断，认为敌人有对军

区进行大“扫荡”的可能，就立即开始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军区的部队，不等敌人来攻，就主动地全面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封锁沟。

八月十三日，敌人在军区周围布置完毕，十五日开始动作，其“扫荡”计划，预备在四个月内完成。

敌人分十三路出动，沿途封锁交通，企图将我主力合围于长城的两侧而歼灭之。我军指挥部估计到在当时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经过半个月时间，到达我中心区时，我主力已适时地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我们的后方机关早已疏散隐蔽，而无数游击队民兵困扰与阻击敌人，使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而外，什么也得不到。

敌人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九月初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转戈回击。九日我军袭击军城地区搜剿的敌人，毙敌二百余，十二日我军夜袭王快，又杀伤敌伪二百余……这样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九月下旬，各路敌人，屡次失利，渐形困顿混乱。这时我军就集中了相当兵力，于二十六日收复阜平。这一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大败而逃，我军乘胜予以猛追。

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出色的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我军如汹涌的浪潮一般，迎面向敌人打去。在广大的地区里，克复了许多名城，占领了三四百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干线，不时为我切断。敌军损兵折将，伪军纷纷反正。这样就缩短了敌人对北岳区的“扫荡”时间，帮助北岳军民迅速打退敌人。

敌人在我军的夹击中，其主力在九月中旬撤退，残敌二万仍

留在军区内部企图挣扎。我军除以一部留在内线，继续消灭敌人外，主力又跟踪追击到外线，向敌人各主要据点袭击、断敌归路。这时内线敌人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就在十月中旬全部退走，沿途到处遇到埋伏，损失很大。

冈村宁次这个“百万大战”就这样完结了。所谓“铁壁”，也被打碎了。我军区部队与敌作战八百多次，打死和俘虏敌伪军八千多名，破路八百多里，还击毁了敌人火车三列。冈村只得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而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解嘲。

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场面。有名的狼牙山五勇士，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敌以二千五百余人围攻狼牙山，想消灭我军区的一团。当敌人到达时，该团以一个班扼守险要，掩护主力转移。敌人先以数千发炮弹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该班至此尚有五人。他们打完了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就将枪摔破并且同声叫出：“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于是大家跳下崖去。三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勇士挂在半崖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他们不仅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而且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黄烟洞保卫战

黄烟洞保卫战，也是一九四一年八路军英勇的奇迹之一。冈村宁次企图以优势兵力，来收拾我军后方的一个修械所，又遭遇到我军惊人的英勇的抗击而被打得头破血流。

黄烟洞处于辽县、黎城两县交界处，该处有我军的一个修械所，可以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这个所设在险要的山隘，有防御工事，总部特务团一部担任警卫。敌人于十一月十日，突然以三

十六师团主力五千余人的庞大兵力，配合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部，分数路以包围形势向黄烟洞围攻。我守军连该所员工合计不满一千，在敌人大炮猛轰下，在毒气弥漫下，虽经敌密集队形的猛冲，仍屹立不动，一直与敌人血战八昼夜，才奉命转移。敌人死伤千余，消耗弹药无算，才得踏进黄烟洞，但因到处埋有地雷，使敌寸步难行。加以我外围部队节节迫击，使敌坐卧不安，不到三天就仓皇逃走。半路又遇伏击，弄得死伤枕藉，狼狈不堪。这样以少数兵力抗击绝对优势的敌人，坚持八昼夜的顽强精神，实在是惊人的！

在这次保卫战中，全体指战员都发挥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其中有十二个共产党员，扼守一个断崖，在冰天雪地中和数百敌人血战三昼夜，敌人死伤二百多。第一天，曾打退了敌人十二次冲锋。直到最后一天，形势万分紧急了，敌人占领了断崖后面的阵地，把他们团团围住，以密集炮火轰击；这时他们已伤亡过半，只剩了四五个人，每个人都已中弹，但还是坚持下去。其中一个战士，是唯一凯旋的英雄，直到敌人完全占领背后阵地，才奉命退出战斗。

传奇似的英勇事迹，也出现在水腰山的战斗中。在那里，一个班的战士，和敌人苦战九天，才奉令回部队，其中三个勇士——排长王振喜、战士韩立合、李如坤——还坚持战斗一昼夜，杀敌七十余人，最后陷入重围，敌人打来两颗燃烧弹，不幸在熊熊烈火中殉国。我们的一个机枪射手，敌人以三门钢炮对付他，炮火一响，他便抱着机枪隐蔽起来；少数敌人冲上来，他用步枪打；大队敌人冲上来，他端起机枪扫射。敌人三次冲锋中，六十多个死在这个机枪射手的枪下。后来他负伤仍不离阵地，又和敌人坚持数小时，才背了一个负伤的同志退了回来。

由于黄烟洞数百健儿充分发扬了八路军的坚毅顽强，不但创造了光辉的保卫战，而且在敌我伤亡对比上——敌死伤千余，我仅百余，——也造成了抗战以来的新纪录。

为着掩盖冈村的惨败，敌人只得假造公报。据东京广播所公布：我军伤亡数目（二千余），比我在该处守军多二倍，并称：“完全占领第十八集团军在晋冀豫的中心根据地……”可是晋冀豫根据地，八路军始终坚持着并发展着，一直到最后胜利。由此可见敌人造谣之无耻与无聊了。

四 平原上展开“扫荡”与反“扫荡”血战

一九四二年是敌后形势更趋严重的一年。

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着要把华北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就不惜用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对华北的镇压，并加紧人力物力财力的搜刮。

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日寇又大举向我华北各解放区“扫荡”，“扫荡”的方法，也较一九四一年为残酷。假如在一九四一年“无人区”和“并村”的办法还没有认真实行的话，那末在一九四二年就认真实行起来了。假如一九四一年的“扫荡”主要的在于交通要道及其两侧地区的话，那末一九四二年就普遍到穷乡僻壤，进行反复地“清剿”了。假如过去敌人使用毒气还限于在战斗中的话，那末，一九四二年后，敌人却进而对民众放毒，并散布鼠疫病菌了。假如过去敌人提出的“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总力战”等还在开始采取的话，那末，一九四二年以后便更加彻底地执行了。总之，日寇凡能想得到可以摧毁、破坏、缩小我根据地和毁灭我军民的办法，它都尽量地采用了。

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对华北的七十五次“扫荡”中，尤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为最残酷。

日寇一向对冀中就称为八路军的衣粮库，在太平洋战争后，更对冀中垂涎，想攫为囊中物。差不多经过了一年的侦察情报，准备战役“大清剿”。在大清河以北以及保定、饶阳一带，普遍建立点线沟堡，逐步蚕食。四月间，敌人就集中三个师团及两个旅团的兵力，从五月一日开始进行“全面扫荡”，以两个月为期；在八千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布一千五百个据点；一万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使用七百余辆巡逻汽车。敌酋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故意留空隙作为钓饵，企图用“张网捕鱼”的毒计，一鼓歼灭我主力。

我军对敌人的毒计怎样对付呢？

我冀中部队，在吕正操将军领导下，对敌情有正确的估计，所以当敌人合击时，及早就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实行突然袭击，使敌人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整个全面的“扫荡”时，我主力即向战略的外围大转移，一部留当地坚持，分散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依靠民兵，创造了“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火力急袭战术，曾使深入深泽的敌人，在十几天内，被歼千余，不敢出扰。

敌人这次“扫荡”中的残暴行为，简直是骇人听闻的。老百姓被杀戮、伤害或被抓走的，达五万余人之多，使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这种惨状，只会增加我解放区人民的民族仇恨。敌人虽用极残酷手段，威迫老弱妇孺吐露我军秘密，民众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普遍的群众爆炸运动和地道游

击战，更使敌人随时感到死亡的威胁。

在两个多月空前激烈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我军在极端险恶环境下，仍然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战绩。如五月十三日，我们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八里的小吕；敌人加道大队长带领五百骑步兵，保护正定伪道尹和所属八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这一带“确保区”来视察，就落入我们的埋伏网里；伪道尹当场送命，加道大队长负伤，骑兵中队长和一百八十多敌兵及六十多匹洋马，也被打死在麦地里。在四十五分钟内战争结束，我军无一伤亡。又如六月四日，还是我们这些连队，在无极西北的里贵子，坚决打击了敌人的围攻。敌人约有兵力五百余，附野炮一门，钢炮一门，迫击炮一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掷弹筒八个，从四面围住村庄；从上午十一时打起，敌人在大炮掩护下，逐渐缩小包围圈，并从村的东口冲进八次，从东北口冲了十来次，都被打退。敌人恼羞成怒，便在东南、南、西三处施放毒气，我军因有防毒准备，毒气失去效用。敌见此计不逞，又陆续增援，于天黑时有二百多人冲进村西南边沿，并且上了房顶。我们的战士坚守每一个屋顶，接着敌用火攻，大火冲天，我军坚守村南北街的阵地，敌人不敢再进。到午夜十一时，我军即突围撤出，敌人还不知道，仍继续向南北街乱放枪炮，一直到天明才停。在整天十二小时的战斗中，打死敌人小队长两名，敌共死伤二百多。

六月九日宋庄之战，我军两个连击破敌人二千五百人的进攻，打死敌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我军伤亡仅七十三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坚持了十四个钟头，最后胜利突围而出。

下面就是这次模范战斗的经过：

队伍开到宋庄

六月八日午夜十二时，我们这两个连，在七级村外沉黑的广场上吃了早饭，不久便出发了。经过几里地的行军，队伍转移到深泽东北十五里的宋庄。这时天刚明，是六月九日了。

打仗，随时随地都会到来，我们的战斗准备是经常的。每个人都带了几个手榴弹，密密地挂满着一腰围。到了宿营地，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工事。我们的口号是：“谁多挖一锄头，谁就少挨一炸弹皮！”因此，不管如何疲劳，人们总是首先马上挖工事。在宋庄周围，从村外到村里，一共做了四道工事。

宋庄是一座有四百多户人家的中等村落，分为南北两部，两者相距约三十米远。我们两个连住在北部，还有两小队的民兵游击队也住在一起。村的南部，住有我们的一个临时组成的混合连——实际上只是半个连的兵力，六十八个人。

队伍从七级的转移，是因为有许多显著的征象，说明敌人将向七级一带合击。因此，我们主动的跳出他的圈套进至靠近敌方的地区，从侧后打击敌人。到达宋庄后，周围的情况已经异常紧张，四处密密层层敌据点，都控制着相当大的兵力，而且已有出动的模样。估计我们难于平静的度过这个白天，免不了会有战斗，而且战斗一打开，就必须坚持到天黑。因此队伍进村不久，即动员老百姓出村。只有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个中年瞎子自己定要留在村里。此外，还有八头黑色的山羊，用铁链锁在羊栏里。

完成了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的部队便休息了，可是那有时间来休息呵，战斗就在面前等候着。

坂本旅团长之死

几天以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曾打了一个激烈的战斗，结果敌人吃了不小的亏，死伤约计四百人，还打死他一个晋藤联队

长。就任不久的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他对白庄战斗的惨败感到很大的伤心。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将军，因此，虽然在六月九日早上，他在西固罗开了一个忙碌的会，却打定主意还要亲自去白庄一行，追究那次战斗致败的地理上的原因。

九点左右，坂本旅团长带着一个由三个日本人所组成的参观团，由宋庄北面的冶庄头出发了。从冶庄头去白庄，须得经过宋庄的东边。敌人没有知道在自己的鼻梁上就隐藏着八路军，在他们心里，这里也是属于所谓“碉堡区”的。

旅团长出巡，仪仗是十分烜赫，前面是三十几个手执军刀威武的骑兵，后面是两个中队约三百多人的步兵卫戍队。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呢，当他们一出冶庄头的时候，担任警戒的战士，就已经作过“北面发生敌情”的报告。因之每个指战员枪弹都已上膛，取着瞄准待放的姿态了。

九点一刻，坂本旅团长的大驾，到了宋庄东北离我们阵地前沿约三十米远的地方。我们发觉了这是“皇军”的高级官员，便在指挥员的命令下，一致开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马上同时集中火力，瞄准自己的目标射击。掷弹筒打得特别准，一颗炸弹落在坂本旅团长跟前，便把他的脑壳炸碎了。他的骑兵随从和参观团的武士们，也在我们强烈的火力下消灭了。

这边的枪声一响，走到村北的三百名卫队，立时就分两路从东、北两面猛扑我们的阵地。这是一支不同凡响的精悍的卫队呵，他们的钢盔、制服全是新的，武器装备也全是新的，战斗精神也颇顽强。他们以班为单位，端着轻机枪举行集团冲锋，可是一冲近我们第一道阵地跟前，就被手榴弹打垮了。这些武士道们，一班完了，一班又上来。在末了，这群旅团长优秀的卫队，

至多只剩下五十余人。一支笔不能同时写几方面的事情，当我们的战士跟卫队群举行激烈战斗的时候，附近各据点的敌人已陆续增援上来。宋庄东、西、北三面都有枪炮声，都有敌人的冲锋和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

战斗已经如此凶猛的展开，东南面的深泽、高庙、大执要一线也有敌人的重兵封锁，一打就走是完全不可能呵。我们坚强的指挥员，一切都了然于胸，决心是敏捷而坚定的，部署是沉着而周密的。我们决定在第一、二两道工事周旋八小时，第三道工事坚持到天黑。这就是说，不管敌人的兵力将达到如何强大的程度，我们这两个连，是必须顽强地紧韧地进行一整天的村落战。但我们是进行游击战争，对于村庄的坚持，只是为了把它作为战斗上的凭依，以便于达到一个这样的战略目的——即是在消灭敌人中来保存自己。因此我们的指挥艺术和战术动作，是主动而机灵的。

两种射击

起先，我们依据着村外菜园上墙边的第一道工事，杀伤猛扑而来的敌人。敌人几次的冲锋都压下去了。

敌人冲锋，是“呀！呀！”的狂号，我们的战士默不做声的予以迎击。我们的机关枪和步枪，一点也不乱打，敌人一进入我火力圈内，便猛投手榴弹，大大发挥了近战火器的威力。子弹是宝贵的，我们的口号是：“谁能节省子弹，谁就能坚持到胜利！”战士们都奉守着这个信条，不瞄准便不射击。

在东边，我们一连七班长李清斋同志，这个特等射手，他在土墙下用跪射的姿势接连地打了七枪；由北往南运动着的敌人，不多不少的被他放倒了七个。可是他兴奋得忘记了敌人正用狂蜂一样的枪弹对付他，他立起来招呼邻近的同志说：“瞧，我要再来

一个！”头部暴露，不幸，法西斯的枪弹夺去了他勇敢的生命。

在村西庙台上，发现敌人安起一架电台，同时有三挺轻机枪在那边扫射。二连副连长，选择了敌方的一挺机枪射手和弹药手正在接运子弹的时候，打了一枪，一下把两个敌人都打翻了。这架机关枪也就停止了叫嚣。

二连机枪射手，用一梭子子弹，打死了二十七个敌人。后来为了节省子弹他让机关枪休息着，却拿起步枪跟敌人战斗。他两枪打倒了四个敌人，第三枪打空了他就不再放，握起了自己的手榴弹。

敌人的冲锋是继续着的。在一门三八野炮和两挺九二式重机枪的掩护下，一群敌人，每十个端着一架轻机枪向着我们村的东口冲锋。冲锋的武士道们，离我们已经不很远了，我们的手榴弹正准备着拉火，可是敌人掩护冲锋的炮弹直飞过来，却落在冲锋者的人群中，炸了。接着又是一炮，两炮，全落在这一带。三个炮弹替我们省下了一些手榴弹。敌人躺倒了三十几个，剩下的不得已回去算帐去了。

敌人把机关枪、步枪扔在死尸的旁边，离菜园墙外也不过丈多远，可是我们不能出去拿，因为敌人的火力很强烈；但敌人也不敢过来取，因为我们的手榴弹也是怪厉害的。我们的一个通讯员，用一根长竿伸出去，机关枪倒没有捞到，把两支三八式钩过来了。

最险恶的两小时

战斗继续进行。我们的部队坚守宋庄村，不仅打垮了坂本的卫队以及附近各小据点出来的敌人，而且打了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远近各大据点增援来的敌人。总计敌人参加宋庄一战的兵力，不下二千五百人。他们用了各种口径的大炮

五、六门，掷弹筒三、四十个和众多的轻重机枪及瓦斯筒，炮烟飞绕着村庄。

十二点的时候，宋庄南面我们那个混合连也跟敌人打上了。这六十八个指战员，差不多打完了仅有的一点子弹，苦战了三小时；在下午三点，他们突围出来了。这以后，战斗是围绕着村庄北部进行，情势是很严重的。

三点至五点，是敌人最疯狂的两小时，它的突击兵力最大，火力最猛，冲锋最凶。也就是这个时候，敌人举行总攻；我们第一、二两道工事，差不多全被炮火毁平；个个独当一面的战士，这时按照计划完全退到了第三道防线，在村边房角工事里；战斗已经坚持了八小时以上了。

总支书记来回的走着，他向战士喊：“谁能沉着应战，谁就能坚持到底！”“谁能去危险地方，谁就能得到安全！”

这些鼓动口号都起了实际的作用。

民兵同志们防堵着西南角，敌人不断朝这个地方射击。战斗的场面是如此凶猛，民兵们直嚷着要三八大盖。于是二连五班班长跑过去，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们，并说道“我跟你们在一起打！”而民兵也都沉着不慌了。

二连四班的战士们，差不多伤亡了大半，可是班长仍然单独坚守了一个房角与三方面的敌人作战。打了两个钟头，他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的一个战士，卧倒在街上一座厕所旁边射击着，突然一颗炮弹飞过来把厕所完全打翻；他从土堆里爬起来，依然坚持自己的岗位。

这都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呵。

后来，村西南角被敌冲进，有十五个敌人带着一架轻机枪上了房；二连副连长急了，领着一个民兵通讯员，悄悄跑进这个院

里；他们每人手里握住两个手榴弹，同时往房上掷去，把那爬上房的敌人全打掉了。但敌人继续上房，决心要站住个最初的立脚据点，而我们也加上两个民兵前来继续投弹。敌人连上三次，我们连打三次。四个人打了四十几个手榴弹，敌人在房顶上伤亡便有四十多名。

有一个新战士，在西南的另一处朝房顶上打手榴弹，打死了两个敌人，自己也受了伤。

战斗更加紧张剧烈，而天是快黑了。我们又适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再坚持半点钟，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再熬过半点钟我们完全胜利！”

在一连二连的接合部，村的东南角上，敌人拚死连续四次冲锋都没冲上，碎身和重伤的动物摆了满地。我们眼见敌人一个小队长完全失去了再冲的勇气和信心，他的迟疑不前，被他的上级指挥官在阵前枪决了。

天黑以前，敌人举行的冲锋不下三十次，可是冲进街打出街，冲进村打出村。我们的战士，在指挥员机动灵妙的指挥下，发挥了充分的火力，粉碎敌人一切攻击的计划。敌人曾一度施放喷嚏性的毒气，但我们事前有备，没有遭受丝毫损害。敌人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我们的天下

夏天的黑夜，迟迟降临，近九点时，夜幕终于完全拉下来了。这时候，敌人的伤亡已经过半，一天恶战，到现在面对着可怖的尸场的暗夜，不得不停止了进攻。但是疲倦极了的残余敌人，仍然封锁包围着村庄。它在零散的枪声中杂以浓密的鞭炮，藉以迷惑我们，同时并在村外道沟旁边点起来了一堆堆大柴火，这样来防止我们不意的突击。

敌人还企图能够把我们围住，等待他期望的新的援兵到来，为他们的旅团长和横躺竖卧的死鬼们找什么补偿，可是现在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

一连二排向东北角突进，走到道沟旁边，敌人还没发觉：因为他们守在火光后面，反而看不清前方；而且精疲力尽的战士们，一大部分已经在死尸旁边沉沉的睡觉了。我们的战士从死尸身上踏过，也从睡了的敌人身上踏过。“嗯……嗯……”敌人在地上发出梦呓似的叫唤。我们一个战士好奇地去摸一个躺着的敌人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却被敌人咬了一口。当敌人的哨兵开枪后，我们便投了几颗手榴弹，扔在敌人躺着的地方。接着我们便跟敌人拚起凶恶的刺刀，有的战士把刺刀都刺弯了，就用枪托去打；另一个战士，曾使枪托打裂了一个敌人的脑壳。

一连一个战士，在突围当中用刺刀杀死敌人的机枪射手，夺了一挺歪把子出来。还有一个战士却在敌人睡着的地方背出一架机关枪。

昏迷的敌人被我们一冲便慌乱了。有一个突然惊醒的敌人，竟跟着我们突围的部队跑；后来我们发觉了这顶钢盔，吓得他又猛力往回逃，结果被我们打死了。

我们的部队，就这样突了出来。有的是静悄悄的突出，有的是拚刺刀冲出来的。在突围当中，我们有十四个同志受伤，九个同志阵亡。

可是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全部突围走了。这也难怪，他怎会相信跟自己打了整天的对手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呢！他以为我们是一支庞大的兵团呵，因之区区两连人突围出去，他并不以为是我们作战部队的全部。他们仍旧围住村庄，不断用零散的枪声，唬着他们心理上的村中的八路军，使得空村的深夜继续不能

安静。

据说第二天，天一明敌人就举行冲锋了，他们冲进村没有发现半个人影，觉得十分奇怪。后来一股敌人冲至圈羊的院外，武士们的叫嚣，把吊住了的羊群惊得乱跳，铁链铛铛作响，敌人在朦胧中以为遇见了八路军的伏兵，便劈劈拍拍；村外的机枪大炮也轰鸣起来。这时候，保定的敌人八百余，已经开到增援，可是现在他们只能把八只山羊歼灭，我们八路军是早已游在平原的大海里去了。

副连长的插曲

二连副连长带着一个机枪射手向南方突围。突出以后，他不知怎么忽然想起在那儿还有一架轻机枪没有带出。“咱们返回村找枪去吧？”“行！”

于是，两条黑影，低低的弯着腰背，飘忽的行走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地带。黑夜盖住了整个战场，零落的枪声和沟边的火从，反而使人感觉着更加荒凉与寂寞。

幽暗朦胧中，他们摸到了村子，可是摸遍了也没有找到什么枪，其实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已分散带走了。可是他总觉得丢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他一定要心满意足地走了才好。整天的恶战，是使他的神经过于紧张和兴奋了。应该补说一下的，这个副连长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性情却有点直爽。五天前的李贵子战斗，他曾被敌人的炮弹埋了一次，耳神经全震坏了。当他和记者见面的时候，他的耳朵还有点聋，要大声说话他才听得见。

没有找到枪，两个人又摸索着出村。在几乎到处都是横三竖四、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战地里，副连长在暗中边摸边走，把几具死尸身上的手榴弹和子弹都解下来，挂满了自己一腰。他还摸出

一些可吃的东西，那全是浸透了血，湿淋淋的。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吃过一次饭，他们打一天半夜的仗，一直没有吃东西。在摸出敌人的哨线以后，他拿出染了血的食品让机枪射手一同来吃，机枪射手不想吃，他便自个儿吃了。

在黑沉沉的道沟里走了一阵，副连长还感觉不满足。“同志，咱们再去让敌人消耗一下吧？”“行！”机枪射手赞成他这个新的主意。

两个人重又回来，摸到敌人跟前一连放了十几个手榴弹，口里大声嚷着：“村里的同志们坚决的守呀！”我们十七团、十八团都增援上来了！”

于是，敌人的机关枪、掷弹筒一股劲儿向他们这个方向打过来，乱嘈嘈地打个不停。

“痛快得很！”两个人从心底里笑着，便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最后，他们走了三十几里地，天快明时，在大定村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尾声

一切惊天动地的战斗，到这里，已经宣告结束了。

现在，我们应该列出几个数目字来表示双方的消耗。

敌人被打死的，计有坂本旅团长一员，以下官兵六百余名；被打伤的，有官兵三百余名；伪军被打死和被打伤的，有官兵二百余名。合计敌方伤亡约一千二百余名。

我们方面呢？阵亡三十二名，负伤四十一名，共计七十三名，其中有连级干部四员。消耗子弹约计九百余发，手榴弹二千一百三十余颗。

不久敌人开了坂本旅团长的追悼会，也被迫宣布：宋庄一战他自己伤亡了九百六十名，而我们被歼三千。这当然很难得的，

因为他说出了接近真实的自己的伤亡数字。但我们在宋庄却只有两连人，既然造谣是三千，就更证明敌人受创的惨重。它愈掩饰，就愈显出啼笑皆非的苦相。宋庄战斗，确是激烈无比，而我们的军队给敌人在人力、技术、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异常巨大。坂本旅团长，新任冀渤特区的“扫荡”司令官，是抱着多么大的“剿灭”冀中的雄心呵！而现在却自己葬身于宋庄之野，作了悲惨的“沉默的英雄”了！“皇军”对冀中“剿灭作战”的“赫赫战果”，难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关于敌人的故事，还有几点值得一说：

饶阳出来的敌人三百多，回去的只残余九十几个。马垒出来的敌人有一百多，回去的却只有二十八名——其中有一个中队长幸得生还，可是他太悲哀了，自己用手枪打死了自己；有七个兵士也在向东方膜拜之后，一起上吊死了。几个残余的敌人回去没处出气，互相埋怨，竟然自打起来，打了一个多钟头。

传说参加宋庄作战的敌主力，曾有一部分从南洋战场调回来不久，他们叹气地说：在南洋作战也没打过这样苦的仗，一个村庄的争夺，皇军牺牲了这么多人，真不值得！

最后，我要说一个关于我们方面的故事。

留在村庄里的那个中年瞎子，在部队突围的时候，由我们一个侦察员把他领出去了。他眼睛看不见，耳朵却听得见仗是打得那样的激烈。八路军打仗，老百姓的高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瞎子出村，自己的脚曾踩过敌人的尸首，我们的侦察员告诉他整天作战的状况，他的瞎了的眼睛，曾欢喜得流出眼泪。第二天，拖到了东内堡，他遇见人就说八路军打仗的情形，人们围着他，跟他的感情一起共鸣。他激动着说：“我要做八路军的宣传员，我是他们救出来的。”至于留在村子里的另一对男女，却因不

听我们的劝告，在白天跑了过去，被敌人的刺刀挑死了。

瞎子有四十多岁，他是一个算命先生，他成天在各村流转，到处播扬宋庄战斗雄壮伟烈的事迹。

(节录周游：《冀中宋庄之战》，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解放日报》)

五 骑兵在艰苦战斗中

在大青山，虽和其他解放区同样，要经常进行反“扫荡”与反“清巢”的斗争，但是这里却有特别的敌我斗争形势。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敌人的据点却不稀，甚至相隔二十里就有一个据点。这里地形是开阔的，飞机到处可落，汽车到处可通，骑兵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军时刻处在备战状态中。在反“扫荡”中，我们的骑兵队日夜不息地行军战斗，曾有这样一个营，他们半年之内没有脱衣服睡过；曾有这样一个政委，他领着少数部队打游击，一连十二天没有下过马。骑士们的经常口号是：“马不离鞍，人不离枪！”他们的机动范围比步兵大得多了，经常转很大圈子，夜行百余里，今天他们在这个县，明天又在另一个县。

由于人口太稀，有时他们住不上房子，就在山头露营，虽有大雨大雪，仍须连续行军作战，其艰苦非一般人所能意料。但不管任何困难，大青山骑兵支队却一天天壮大起来，使敌人更感到难于应付。骑士们非常熟悉地形道路（这在沙漠地区是特别重要的），行军不用向导。当大雪蔽野时，当地民众还要迷失道路，但我们的骑士却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不曾走错过。支队副政委张达志同志，曾经几次骑马从乌兰花到晋西北的偏关，用不着一个向导。

下面，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大“扫荡”的最艰苦的日子里，骑兵支队与敌人战斗的记载：

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骑兵们以全力抗拒着敌人的进攻。

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境遇呵。这些天来，疲劳无情地催打着人们。风雨的侵蚀，更使每一个人的脸上像失去什么似地突然瘦削下来。满腮胡髭茸茸长起，显得又黑又粗。人和马都陷在饥渴中。人们强撑起沉重的眼皮；马粗鲁地打着喘，不时从人们手握着的缰绳中探下头去，寻觅着青草吃。这些天来，整个的骑兵们是在枪声的漩涡里打着转，在暴风雨中打着转。很多人，连着几个整夜没有合一下眼，在马走得稍慢的时候，沉重的头便打起盹来，身子在马背上坐不稳了。

七天来，敌人以大量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向着这一支蒙古草原上的八路军骑兵们进攻。反复的、不断的、战斗的情况变化得很快，第一次的枪声刚刚停歇，枪筒上的热度还没有退完，第二次的战斗便又来临了。敌人向着他们射击，而且要“最后歼灭”。

草原上七月的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山坡上的桦树林和着风声呼呼响起。树根下边，满缀露水的野草，已经变成了骑兵们柔软的床铺；人们躺下来，马匹就在周围，睁起明亮的大眼，咀嚼着野草，像守护者似的，偶而把嘴探到主人的身上。那些睡熟的人们，一只手缠着马缰，一只手紧紧的抱着枪。

繁星将要落下去的时候，人们醒来了。黎明的尖风，刺骨地吹来。指战员抬起略带睡意眼睛，望着快要大亮的天光，就迅速的动作着，于是带领着机枪班或者步枪班，爬上山峰，占领了高地；游击小组被派向四处山头出动去了。战斗的爆发，也许就在这一分钟以内。

包围着骑兵们的敌人一天一天在计算，地图上的线条那样明

显的指画着，各个“扫荡”的部队都已进入了指定的地点。在七月初，敌人就已经把三万兵力，趁着晴朗的天气，用汽车和火车，装运到这个山岳地区里来，沿着几个方向，布置了三条严密的封锁线；敌人企图摆下这样大的一个捕捉网来与“区区”八路军骑兵做胜负的赌注。敌士兵被命令着，带着畏惧的眼光向云雾中的山头前进，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上面将会遇着神勇的八路军骑兵。敌人把帐棚都扎在高山顶上，他们不敢在村子里住，他们吃过八路军骑兵的苦头。现在他们却又在赶筑着工事。枪声接着便在空间震荡了。

草原上恬静的七月，就陷在骚动与混乱中。葱绿的田野里走来了敌人的马匹，不顾一切地在啮嚼着结着颗粒的粮食，一大片一大片庄稼被糟蹋了。村民们从这一个村庄奔向另一个村庄。敌兵架起机关枪挨门挨户地搜索着，穿着便衣的特务，大声地问着，“八路的有？”然后“白洋的有？”就翻箱倒篋的劫掠起来。

几天的恶战，敌人并没有一点得手的地方。骑兵们虽然处在包围网中，然而他们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虽然敌人用飞机、用炮兵、用骑兵到处搜索着，这都像一群饿狼到处扑空，只有更凄惨的大声狂嚎了。

“我们不能毁灭在敌人的手里！”骑兵们有这样坚强的信心，而且准备了缜密的突围计划。骑兵们向那茫茫的平原前进了。河流在远天边像一条蜿蜒的银线，那城里工厂的大烟囱冒着烟，骑兵们杂沓的蹄声突然拥向铁路线来，惊扰了这个城市附近的一切。

“怎么，怎么弄得八路军跑出山口来了！？”

铁路上的敌警备队气愤愤地叫骂着，

“有鸟用！八路军被包围出山来了！”

于是，警备队在铁路线上的敌石黑部队不得不急急出动了。然而，在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停留在铁路边村庄里的骑兵们向山上移动了。靠近山边居住的人们用惊奇然而充满兴奋的眼光看着这支队伍不慌不忙的移动着。人们猜测地互相询问着。整个山地与平原，被这一支骑兵谜一样的行动迷惑着。日本的侦探和汉奸，都报不出来关于这支骑兵的一点真实情况或任何行动。

沿铁路电话铃频繁的响着，无线电到各个据点去探询，敌人陷于惶惶不安中，有谁知道这一支神兵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杀到自己的头上来呢！雨又下起来了，潜伏在密林中的骑兵们依然丝毫不动；雨从树叶滴滴流下，从人们的头发上流到脸上，流到身上。

在黄昏开始，一个连续十四个钟头的夜行军，把敌人迷惑得不知所措了。骑兵们走上了非常陡峭的山路，夜间敌人的探照灯露出闪闪的白光来，这却给骑兵们以指路的目标。骑兵们于是继续在完成着突围的任务。这在敌人是难以想象的，就在两山敌人警戒的中间，骑兵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去了。大雨淋漓，人马都在打着滑跌，但是他们终于踩开一条新的路，爬上了悬崖。一个轻机枪班长，一手拉着马，一手挟着沉重的日本式机枪，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便轻快打一个口哨，马上就翻转身来，把机枪架着对准敌人的方向，然后伏在机枪的身旁。

阴云从天上飘过，黎明前的黑暗较夜间更为浓厚。就在这黑黢黢中，全部人马终于集合在这个荒无人烟高耸云霄的大山上了。这里可以俯视着山下的铁路，可以看见冒烟飞驰的火车。在天大亮的时候，哨兵们发现了就在山的边缘上，有敌人的骑兵和步兵搜索的踪迹。但是，它们只绕转在山脚下，终于没有敢上山顶来呵。

白茫茫的晨雾笼罩着所有的一切，连人们的呼吸都感到有点困难了。骑兵们就趁着浓雾，人马被掩蔽着，像一条瀑布似的从山顶上飞冲下来，又不翼而飞了。

敌人对这样的骑兵团，只有瞪起眼睛，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因为“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确是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支令人不得不十分惊奇的骑兵。显然，敌人的估计和揣测是落空了，失败到没有任何一点收获。

从蒙古的草原到古老的卡城边，敌人不止一次，十次的以三路、四路、五路的猛扑，企图合围这支八路军的骑兵，但对于它所要完成的“捕捉消灭”，没有一点效果。

在十几天的苦战中，骑兵们巧妙的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在敌人的“合围”中仅仅损失了几匹马。

在十几天的苦战中，骑兵们的表现依然是这样惊人：

骑兵们曾以一个连的兵力与敌人十二辆载有大炮的汽车相周旋，爬在山顶上的老乡看得眼都花了，不知是骑兵和汽车开玩笑，还是汽车太蠢笨了：只看见骑兵上山了，汽车却到了村边，当汽车又开足马力冲上山去的时候，山坡上却只留下杂乱的马蹄印，造成了装备低劣的骑兵与摩托化的载有炮兵的汽车捉迷藏的奇迹。

骑兵们曾来回往返七次，驰骋在平绥线上，把敌人安排得很整齐的警备网穿凿得七孔八洞，使得敌人不得不在铁路旁，再纵横交错的又挖了三尺深五尺宽的封锁沟，在山坡上布置了火力交叉点。但是驻守的敌兵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我们的尖兵曾一股风扑到敌人的火力点前，吓得六个敌人用毛毡把头脸都紧紧蒙起来。骑兵们拿到机关枪后又一股风过去了。

骑兵们几十个曾在热闹集市前的木栅门外通过，在居民面前

留下了鲜明的影子。

骑兵们英勇的故事，遍传在蒙古草原的大风沙中。在敌人的眼睛里，这支铁骑一天比一天更坚强起来，成为敌人底可怕的损伤者。老乡们却暗暗欢喜在心头。他们已经看出了属于敌人的是失败，而属于我们的都是像朝霞一般灿烂的胜利。草原上的八路军骑兵们，用他们的机敏勇敢，用他们一人一支枪，顽强地坚持了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他们迎接着每一次苦战的来临，他们不是被消灭在敌人的手里，而是把敌人干干净净的在国土上消灭掉。

六 新四军的反“扫荡”反“清乡” 反“蚕食”及其他

日寇对付八路军的办法；也施之于新四军，“扫荡”、“蚕食”、“清乡”，也样样具备，不过在这里也有它的特点。

皖南事变发生时，日寇曾兴高采烈，但后来看到国民党到底不能把新四军消灭，新四军反而更加发展，失望之余，就自己动手来进攻新四军了。

进攻首先开始于苏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日，敌人集中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各一部，独立十二旅团全部，约万余人，另外加上伪军李长江（原为韩德勤部下，后来投敌）、杨仲华两部，约一万五千人，共计兵力二万五千人，企图一举消灭我新四军军部和我苏北主力。敌人分四路合击盐城，后来又分两路北犯阜宁。我指挥机关和主力一开始就及时跳出合击圈，于外线抄袭敌人背后，形成反包围形势。苏中我军也配合大举向各城镇攻击，使占领盐城阜宁之敌仓皇向南撤退；这时苏北主力就分九路猛追敌人，收复阜宁、益林、东沟、永兴、建阳、

高作等地。前后苦战三十四昼夜，经过一百三十五次以上的战斗，伪军反正一千，毙伤敌伪五千，缴步枪二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挺，炮二门。我伤亡九百四十人。

苏北第一次大的反“扫荡”就此结束。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敌使用平林师团约二万人和伪军三万，又向我苏北解放区闯进，大肆进攻，结果又被击退。

从一九四一年以后，日寇对整个新四军各解放区，进攻日益频繁，各地区平均每半月就有一次，多的有一星期一次。新四军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力量，是没有可能担负这样繁重的战斗任务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一九四一年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处境虽然艰苦，但解放区各阶层的人民，都紧紧地团结在新四军的周围，始终与我军同甘苦、共患难。盐城士绅宋泽夫先生的事迹，就是一个动人的例子。在反“扫荡”中，他适家居，他们那里有一个旧的区长，想给敌人“维持”；宋先生责之以大义，说得他满面含羞而去。宋先生便自动代理区长的职务，呈报县政府，坚持该区的对敌斗争，并向敌占区征收救国公粮。敌人搜捕很急，他就乘小船到处游动，一夜数易停泊处。县府知道了这种情形，恐遭不测，一再劝他暂避。他坚不肯去，并举出新四军的青年女同志，披星戴月出生入死坚持对敌斗争为例，曾说：“青年小姑娘尚且不顾任何危险，与敌周旋，我已年老，有何畏惧？岂能贪生怕死，不如一个小姑娘！”

不幸宋先生终为敌所乘，被敌捕去。他被捕后坚贞如铁，曾绝食数日，不吃“鬼饭”。县府得悉后，就派人乔装探视，并送去食物，他知道这是民主政府所送，才开始进食。在被囚过程中，

敌伪虽历次威迫利诱，劝他出任要职，他始终坚定不移，保持了民族气节。

又如韩国钧老先生，在反“扫荡”中，也始终很坚决。一九四一年冬，敌人占领了东台、海安以后，韩老先生就迁居乡间，鬼子请他出来“维持”，他严辞拒绝。鬼子把他的住处围困起来，他表示宁死不屈。后来鬼子监视他，他始终坚如铁石，毫不动摇，最后病逝于隐邸。

由此两例，可以看到解放区各阶层人士如何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日寇对华中解放区的“清乡”，是特别严重的，汉奸汪精卫也曾卖了很大气力。他在南京粉墨登场后，就亲自出马，组织了一个“清乡委员会”，他自己当主席，把国民党向红军进行第五次围攻的办法都搬了出来，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则在南京专门组织了一个“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以便向我新四军进行“清乡”。

“清乡”的办法是集中力量搞我们一个地区，先以强大兵力占领，编造几百里长的竹篱木栅，使“清乡区”与其他区隔离；然后挨村挨户搜查、登记、听口音，用种种办法想把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清查出来。每天早晨要将全村老百姓集合点名，发良民证，特别是汪记国民党特务人员配合敌人担任这种工作。假使老百姓有反对的，就将全村屠杀，并采用人质办法，将一村的长者捉起来，如发现该村有新四军人员就将他杀掉。此外，还进行特务活动和欺骗宣传，分化民众之间及军民之间的关系。

这种“清乡”的办法，最初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也曾吃过一些亏。如一九四一年七、八、九三个月，无锡、江阴、苏州地区全被敌人占领，我军暂时退出，政权与群众组织受到摧残，汪逆曾

大吹大擂，吹嘘这是他的功劳。我们研究了失败的经验以后，就决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如敌人集中力量对我一个地区“清乡”时，我所有各区就进行全面出击，捣毁其后方，使之顾此失彼。第二个办法就是将主力转移出来，向敌人后方或侧翼进攻，打下它的大据点或重要城镇，也使敌人顾此失彼。此外，我们往往动员五万十万群众，在一个晚上将敌人的封锁竹篱烧毁或拔掉，使其封锁无效。如敌人对苏中分区，经过三个月经营竹篱，正狂吠“封锁成功”，突然于一个晚上，由南坎镇到天生港二百余里的封锁线上火光烛天，篱笆顿成灰烬。在三个月反“清乡”中，群众共烧去敌人的竹子三百余万根；敌人由江南运来的大竹子烧光了，改用小竹子，最后以芦柴代替，但这时连鸡也封锁不住了。我军并编成精悍的游击小组，散布在每个村庄，打击清乡人员及小股敌人，使这些人常常是来而不返。

在反“清乡”斗争中，也发展了民兵。华中各根据地民兵六十余万，这些民兵对付敌人也是极有办法的。他们可以配合主力作战，也可以单独行动。他们经常在据点附近监视敌人的行动。假如有日本哨兵或一两个日本人出来，他们就用麻布袋一套，或用绳子一套，背着就走。因为日本人见女人一定要追的，于是民兵往往乔装女人，穿着花绿绿的衣服从敌人据点附近经过，引东洋色鬼上圈套，往往能捉到活鬼子。

群众不断创造了各种新的斗争方法，因此敌伪伤亡损失更大了。伪军尤其害怕，有的伪军向新四军悔过，愿替新四军做事。民兵活动结果，使伪军动摇，使敌人孤立。我军集中力量打下几个据点，其余据点的敌人只有狼狈而逃，这样就恢复了一些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江阴地区，一九四一年秋退出后，一九四二年九月又被恢复。

至于“蚕食”，正如在华北一样，敌人依据其原有据点，逐渐向我推进。我们就加强边缘村的防御，挖地道，用泥涂房使敌人不易纵火，有时实行全村撤退。同时，在敌人的前进路上，民兵不断实行袭击，到处埋设地雷，使敌人“蚕食”一村，得花一个月时间，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敌人“蚕食”了我们的地区，又往往被我主力逐出。

苏北淮海区（陇海路以南，淮阴以北地区）曾一度被敌人“蚕食”，当地民众就起来做反“蚕食”斗争。民众竟将砖房拆了，将砖埋在地下，使敌人没有砖修碉堡。不得已敌人只得用土修碉堡，不料群众仍不甘心，集合了上万人将河改道，洪水将土碉堡完全冲垮了。此外，民众又想出办法，将狗杀掉，一方面可以使游击队晚间移动方便，另一方面将死狗丢在碉堡周围，在夏天腐烂起来，臭气冲天，使敌人不得不撤退。这叫“死狗战术”，这个战术弄得敌人哭笑不得。

另一个对敌斗争的办法，是所谓“筑坝运动”。苏北、苏中、苏南的沿海地区，有水网地带，河流交错，河深而不宽，水面离堤面往往只一尺高。敌军装甲汽艇，可以耀武扬威地游来游去，且能展望很远。我们没有重武器打它，开始是感到没法对付，后来在冬天水浅时，几十万群众起来筑坝，这坝如遇水涨时，被水淹没一二尺，能行驶木船，不能走汽艇，使敌优势武器归于无用。敌人开始曾用步兵掩护，前来挖坝，但边挖边驶行汽艇，一天只能走几里路，使敌人毫无办法。

沿海的渔民、商人，都有小划子，各村间的交通都靠船只。我们到来以后，民众就自动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强盗。所有船只，都编为大队、中队、小队，只要命令一下，随时可以行动。华中沿海从连云港起至上海止，情形差不多都如此。这一带是沙

岸，敌人大汽船不能行驶，所以近海都是我们所控制，只有远海还是在日本海上侵略者的魔手下。

近海区过去是中国的海盗窝。海盗有木船，他们不仅能下海，而且能在随海浪颠簸的船上射击很准。他们也常常登陆抢掠。这些海盗从清朝以来没有被人征服过。新四军到了以后，最初他们也同样与新四军对抗，但是新四军却对他们采取争取的态度。我们知道他们为盗是为生活所迫，他们是旧的剥削制度下的牺牲者，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爱海、爱自由、爱枪的人，主要还是教育他们去抗日。首先我们在沿海渔民中建立工作，在渔民的帮助下，我们派队伍到海上练习打仗，并将他们打败。既加之以威，又动之以义，这些纵横海上几十年的队伍，就自愿与我们一起抗日，成了新四军的水兵了。

我们依靠主力与民兵，控制了苏北苏中几百里长的海岸线，在我们手里的港口有七八处，而日寇能够利用的港口，仅三处而已。

七 香港失陷后的华南游击队

东江游击队的发展，在香港失陷以前，曾有曲折与风波：一方面，他们更向前发展，力量及于中山、新会、南海一带，包括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袭击，企图消灭他们。到一九四一年，曾生部与王作尧部会合，正式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

对于这支新生的力量，敌人曾发动了无数次进攻，一九四一年敌寇曾以二千余兵力配合伪军不断的轮番进攻，都被我军及民众打退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驻在广州的敌军配合一部分登陆部队，由陆路进攻香港。这时东江游击纵队就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我军除了在铁路上伏击敌军、破坏敌人运输外，更挺进九龙，给敌人后方以有力袭击。那时香港一带盛传中国游击队攻入深圳，就是指的这个部队。

港岛沦陷，东江游击纵队更出死人生的抢救沦陷区的国际友人及同胞、侨商等。许多政府人员，文化界人士及侨商，通过大鹏湾等地封锁线，经过东江游击纵队的保护，安全地到达内地。事后，许多国际友人及同胞们都写信去感谢他们的救护，并愿意以实际的援助行动来报答他们。

然而，也有很可痛心的事实：被游击队营救出来的某些军官，到后来又变成了“反共英雄”，以怨报德，进攻起游击队来。

下面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份美亚杂志上《东江游击队与盟国在太平洋战略》一文中的一段话。当时由于美国同日本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中，因此美国记者在这里报道中，还多少反映出一些关于华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中说：

“……随着总的政治上的反动，香翰屏将军也开始摧毁东江游击队，因为东江游击队被认为在组织与教育人民当中太积极了。一九四〇年中央军部队被派去进攻他们，而游击队为了避免公开的冲突退到沿海的海丰那里去。游击队发现与香翰屏谈判无结果后，于八月又回到广州区，继续进行抗日的活动。香翰屏将军曾派了很多讨伐队去打他们，但本地居民甚至当全部村庄因援助游击队的罪名而遭焚毁时，他们仍坚决地支持这些游击队。……”

“在一九四一年，当香港沦陷时，游击队立刻派人到‘新区’

去将难民、军火与供应品运出香港。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他们已营救出几千人，为有中央政府驻香港的代表陈策将军，广东军区中国军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国民党重要官员，英国军官，香港大学的教职员，很多中国的政治工作人员与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士。”

“经过游击区逃出来的一切外国人士，对于他们所看见的一切有着极深刻的印象，到重庆去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去促使中央政府承认这些游击队的。但当局完全忽视游击队伟大的贡献，广东的军事指挥部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又特地派了两师人作为更大的新的讨伐队去消灭这些游击军团。在这一战役中，游击队遭受严重伤亡，他们的很多根据地均被毁平了，但由于人民竭力的支持，这游击军团熬过了进攻并继续对日作战。最近获得的消息说：这游击军团由于有很多人从香港逃来从军，现在已有一万多人，而其游击队员在‘新界’与九龙一带作战，并能随便出入于香港城。”

自香港失陷后，海南岛的形势尤为重要，它位置在南海之中，为通往越南、马来、荷属婆罗洲及菲律宾之要道。一九三九年二月敌侵占海南岛后，即积极加以开发，作为南侵的“跳板”，作为进攻南洋的“兵站基地”，可是这一切的计划，都在我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及广大人民的打击下挫折了。

我军在广大民众支持下，坚持了三年的孤岛上的游击战争。至一九四一年，部队已发展到数千人，成立琼崖独立游击纵队，并且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以后，我军更积极攻击敌军，海南岛上敌我的战斗更激烈了。

第四章 恢复和扩大解放区， 发动局部反攻和争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

一 敌后新形势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是我军渡过严重困难后，再次扩大、发展和发动局部反攻的时期。一九四三年，日寇对中国的政策没有变化，还是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日寇在华兵力百分之六十以上，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始终压在八路军新四军身上。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也有调动，抽走了一些兵力，但其防务很快又为新的兵力所接替；直到一九四五年夏，我八路军新四军还拖住了敌人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六，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日寇对我党我军的进攻，仍是有加无已，“扫荡”也更带毁灭性与长期性。“扫荡”的次数也极为频繁，一九四三年，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五十次；一九四四年有一百六十余次。一九四三年三月，敌人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的新发展。同时在华北敌占区又发动所谓“新国民运动”，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

在华北战场上的残余的国民党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失败中得到经验，放弃“反共第一”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采取了

丧心病狂的与敌人联合反共的政策，企图“变奸伪区”（指解放区）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以收借刀杀人之效。这句口号的前一半国民党很努力在干，可是后一半却没有做，不但没有把“敌区变为自卫区”，而且连原有的“自卫区”也大块地奉送给敌人了。

敌人并不满意于国民党军这种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而要求他们“明朗化”，即是说，要求公开投降，做汪精卫第二。于是施行了军事压力，有所谓“山东战役”和“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在醉心反共下，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的民族意识几乎已消泯殆尽，在敌人的压力下就更加纷纷大批投敌。如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二十七军预八师师长陈孝强、山东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处参谋长宁春霖、第二纵队夏继礼、第三纵队侯如鏞、第九纵队李旭东、胶东四纵队王尚志、绥西伊盟游击军张励生等，都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率部投入敌人怀抱。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投降敌人的，前后有十五万人。他们手拿外国援助的武器，不用以对敌，而用以对付本国抗日人民，对付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了。现在华北有四十五万伪军，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伪军，我八路军还可以多牵制敌人八个到十个师团。这就是国民党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国民党当局还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结果由于我们有力地揭露了和斥责了这种倒行逆施的阴谋罪行，所以没有能够像过去历次反共高潮一样地爆发公开内战。

我们处境虽然这样困难，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下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胜利的基础。我们前一

时期中在解放区实施的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方法，到一九四三年以来就更加见效了。解放区各阶层的团结更加强了，减租减息的工作做得更好，生产更有成绩，群众更普遍地发动起来，民兵更加扩大，武工队深入沦陷区的活动更有经验更有成绩……正因为这样，所以两年来，我们在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中，在主动出击与讨逆战斗中，都得到了极大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我八路军与敌人作战二万四千八百余次，毙伤敌伪军十三万六千余人，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等主力，俘伪军五万一千余人，日军四百二十余人；伪军反正的有六千五百余人，日军自动投诚的有九十余人。我军攻克据点七百四十余处。在环境极端困难的冀中平原，于秋冬之间，粉碎了敌人四十余次的“清剿”，毙俘敌伪三千五百余人，攻克据点碉堡三百余处。在环境同样困难的冀东，在一年之中，打退敌人十四次“扫荡”，伤毙敌伪七千以上。新四军在一年中与敌作战五千三百余次，毙伤俘敌伪六万六千余人，攻克据点二百余处；伪军反正的九千三百余人。

我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在一九四三年，力量不断生长；敌人更感害怕，将华北华中的“扫荡”“清乡”办法，用之于华南。在这一年中敌人曾以一万人的兵力“扫荡”东莞，十余路寇军合击宝安沿海地区，五千人围攻中山等等，都一一被我击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东江游击纵队又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曾生、王作尧为纵队正副司令。

以上是一九四三年的战绩。一九四四年的胜利，比上一年更大了。现在将华北、华中、华南战场的情形分别谈一谈。

在华北战场上，首先谈到山东区罗荣桓部。在鲁中于一九四

四年三至四月发动第三次讨伐吴逆化文战役，歼伪军十三个团、七千余人，恢复国土一万二千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八月中旬的沂水战役，又收复沂水，光复国土三千五百平方里，解放了村庄三百五十处，巩固了鲁中山区。在滨海区，七月下旬的讨伐李逆永平之役，光复国土万余平方里；十一月，莒临公路上又收复了莒县，光复国土七千平方里，解放同胞三十万，并有伪军三十个中队反正（详情见后）。在渤海区，七月到九月的秋季攻势中，收复利津、乐陵、临邑、南皮等县，歼敌伪一万二千余名，光复国土四万五千五百平方里，解放同胞达四百多万。是役王道率部二千余人高举义旗反正。胶东区八至九月攻势中，收复荣城、文登，光复国土二万余平方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余万。荣城文登的伪军七个中队，及威海卫刘公岛伪海军七百余反正。在鲁南区，夏秋攻势中，歼灭敌伪一万七千人，收复国土二万平方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余万。

其次，谈到晋察冀区聂荣臻部，一连串的攻势，使该区形势大大改观。一月攻入芦龙，二月攻入宁河、昌黎，三月攻入赵县、晋县，四月攻入博野，五月攻入任邱、安新，六月攻入定襄、涞源、河间、获鹿、灵邱、徐水，七月攻入大城、易县、蔚县，八月攻入雄县、沧县，九月攻入深泽、饶阳，十月攻入献县、平谷、安平。此外，有些大城市，曾两度被我们攻入的，如石家庄、保定、高阳、肃宁、武强等城。晋察冀军区，共拔据点一千五百个，恢复了五千余村庄。冀中平原，在百团大战以后，敌人“蚕食”很厉害，形势更为紧张，战斗更为艰苦，但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以后，由于攻势胜利的结果，又恢复了百团大战以前的旧局面。至于冀西山地的北岳区，不但巩固了我们的根据地，而且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将敌人封锁我们的第一线碉堡，完全摧

毁，将敌人挤向后退。冀热辽三省的边界，我们也已经巩固了平西、平北、冀东等根据地，并且向前推进，已经将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到伪满境内。在冀东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屡次攻入县城，大大发展，可见我们力量的壮大。

再次，谈到晋冀鲁豫边区刘伯承部：在太行与太岳区（包括晋东南及冀西），三月收复榆社，四月收复林县、沁水；攻入的县城更多，如二月攻入武乡、太谷，五月攻入陵川、左权（即辽县），七月攻入阳城，八月攻入和顺，十一月攻入元氏。六月到九月，他们在豫北黄河北岸，连续发动三次攻势，克据点三十六处，光复国土九千余平方里，解放同胞十万五千余人，使济源、垣曲地区完全为我控制。在我军威力发展和政治影响下面，有十股伪军反正，共约一千三百余人。自河南战役国民党弃地溃逃以后，豫西沦陷区人民惨遭蹂躏；我八路军乃组织豫西支队，由晋南渡过黄河，积极打击敌寇，建立豫西解放区。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至年底的短短时间中，共作战一百三十余次，活动地区五万余平方华里，解放村庄四千六百七十六个，人口一百一十三万，建立县政府十六个。我军势力已东至平汉路西侧，西达澠池洛宁地区，南至宝丰、嵩县，大大威胁了平汉与陇海两铁路与郑州、洛阳的敌伪。我军与民众约法五章，深得当地民众热烈拥护与协助。

刘师所部在平原区（冀鲁豫）的活动，二月攻入沙河、朝城，五月收复内黄、邱县；五月下旬攻克清丰县城时，俘获正在开会中的伪冀南道的道尹薛兴甫及伪县长、保安队长、警察所长、商会会长等十三人，并俘虏敌伪军千余人，给了敌伪一个不意的大打击。七月间，收复莘县，八月间，更在汶上至鄄城二百余里的战线上，展开对刘逆本功所部的攻势，克据点三十七处，

解放村庄六百余处，同胞三百余万。九月收复濮阳、寿张，十一月莘县得而复失，但又被我攻克。十二月攻入尧山。据不完全统计，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部一九四四年共克据点碉堡千余，收复县城七，光复国土二十余万平方里，解放人口五百余万。到一九四五年，该区已控制了十一个县城，使鲁西南鲁西连成一片。

最后，晋绥区吕正操部，战绩也很大：四月攻入方山，五月攻入静乐，六月攻入离石，十月攻入宁武。九月中旬，该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攻入汾河西岸的要点汾阳城，焚毁敌人的飞机场、电灯公司、火柴公司及车站，将离石到岚县公路截成数段。一年以来共收复敌伪据点九十五个，解放村庄三千一百零八，解放同胞三十七万，光复国土九万七千余平方里。这些惊人的胜利，使晋西北形势大为改观。

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三月初在苏北车桥战役中获得极大胜利（下面将详细说到），七月中连续出击，攻克了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石庄、新生港、张横港及长江中的永安洲；一年来毙伤俘敌伪一万五千，克据点一百三十五处，破坏碉堡五百四十八座。第三师黄克诚部：二月攻入涟水，五月间在盐阜区发动攻势，攻克连云港南面的重要港口陈家港，开辟了灌河沿岸地区的工作；六月挥军南下，向射阳河以南进军，消灭伪海防军一个纵队；十月又攻入合德公司等据点，十一月攻入阜宁，粉碎了敌人对苏北区的分割。经过这些胜利后，苏北一、三两师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并向四周有所发展。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从三月起在淮北区发动三个半月军事政治联合攻势，击灭伪军郝鹏举的主力，克据点八十余处，解放人民八十余万，使洪泽湖北岸完全为我控制。夏天，彭雪枫师长奉命率部西进，牵制河南正面战场之敌，收复大块国土。九月敌伪大举“扫荡”我萧县地

区，彭师长奋勇杀敌，身先士卒，不幸在此反“扫荡”战中殉国。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彭师长的血不是白流的，皖豫大块国土又复为我所有了。新四军黄师彭旅，十二月间又复挺进皖北，即在彭师长殉国的萧县地区消灭伪军两个大队，并击溃敌伪两次增援，坚持与扩大了那里的阵地。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从四月豫湘桂战役以来，虽仍然处在敌顽的夹击中，但为了解救被国民党遗弃的豫湘人民，便分兵北上与南下：在豫南光复了信（阳）西、确（山）西、遂平、汝南等县，在湘鄂边解放了嘉鱼、岳阳、华容、公安等地，共解放国土五万平方里，解放同胞一百五十万人。现在的豫鄂湘赣皖边区，已成为一个面积三十万平方里、人口九百二十万的大解放区了。活动于江苏南部的王必成部，八月到十月两度发动苏浙边对敌攻势，攻入长兴、溧阳、溧水，予伪一方面军任逆援道以严重打击，光复国土三千平方里，使分散的游击区变为大块根据地。活动于安徽大江两岸，从两侧威胁南京一带的新四军第七师谭希霖部，一年来解放国土一万八千平方里、同胞六十万，克据点三十九处，使皖中解放区的边沿由江北向东，伸至南京附近的江浦、浦口，沿江向南、通达芜湖、当涂，向西伸至安徽曲江，控制长江江防七百里，包围着安庆、芜湖等城市。此外，浙东、淮南等区新四军，虽在反共军进攻与牵制下，也不断主动出击，得到胜利。

在华南战场上，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一年来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香港九龙间，组织了海上游击队，游弋于广州湾、大鹏湾、大亚湾，截击敌人海上交通，并以有力部队，横越粤汉路溯北江而上，挺进至清远一带，向西发展至高要、鹤山、新会一带；在解放了的广九路以西东莞宝安地区，成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全部地区建立了

抗日民主政权。广九路东增城博罗等县，大部地区为我控制，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并部分建立民主政权。在西江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新会、鹤山、肇庆等县，民主政府也已初步建立。在一年中，粉碎敌人二十余次“扫荡”，毙伤敌二千六百余人，攻克据点二十三处、碉堡四十六座、破坏铁路五段、公路二百一十里。四月间，我军还袭击了香港，救出了印度士兵十七名。五月间，我军又在香港附近营救五位美飞机师脱险。据不完全统计，沦陷港岛的国际友人，经我护送脱险者，已有六十余人。至于琼崖的解放区，一九四四年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在海南岛东北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万宁、琼东、临高、澄迈等八个县中建立了县、区、乡的民主政权，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改为抗日民主公署。在我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民众有一百五十多万。

一九四五年春华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拥有三百万人民，数万的人民武装，一万五千余的正规部队。这支人民的军队，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着，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唯一力量。

一九四五年春季和夏季，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有了更大的开展。晋察冀区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从雁北察南打到平北冀东，从冀中平原打到渤海之滨；日寇被挤到各铁路沿线的较大城市中去，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其他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同一时期中纷纷发动了猛烈的反攻。截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止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作战三万多战，歼灭敌伪军三十三万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十四万六千多枝，机枪二千五百多挺，炮五百四十多门；攻克县城五十座，解放国土八万七千平方里，解放人民一千三百八十八万人。

由于这些胜利，我们大量消耗与牵制了敌人，缩小了敌占

区，扩大了解放区，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以上就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反攻以前敌后的一般情况。在这两年多的时期中，有无数英勇的斗争场面，不是简单的篇幅所能谈尽，下边只举一些较大的战役战斗及围困敌人的情形等，作为典型而加以介绍。

二 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 与日寇“观战团”的毁灭

晋察冀北岳区三个月反“扫荡”

一九四三年敌人对我各解放区的“扫荡”，比一九四二年更加频繁。每一个解放区，一年至少遭受三次战役的“扫荡”，最多有十几次的。

晋察冀北岳区一个地区，这一年就遭受了十二次“扫荡”，最大的一次由九月十六日开始，直到十二月十五日结束，历时足足三个月，敌人使用了兵力四万余人，并动员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实行其所谓“毁灭扫荡”。但不管是什么“扫荡”，我们已有充分粉碎它的办法和力量。

我军区在战役的各阶段，对敌人的阴谋，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打击。当战役开始的第一阶段，敌人以分进合击的姿态，进据我中心区各要点，大量分散兵力，实行有重点的反复“清剿”、搜索与破坏；我军则集中适当力量，打击分散的敌人，逼使他不得不集结力量以对我。这样，就粉碎了他的分散“清剿”的计划。第二阶段敌人以溥沱河沿岸产稻地区为目标，以重兵盘踞，企图抢光我们的稻子；我军则在河流两岸不断地打它，以大量兵力配合民兵夺回稻子，并掩护群众抢收，变稻场为战场，使敌人想吃大米

也吃不成。在第三阶段中，敌人以奔袭合击我机关为主；但是我们经过精兵简政以后，庞大的后方机关已不复存在，使敌人也捞不到什么便宜。特别是我军方面能够使各种斗争方式配合，使主力与民兵结合，使内线与外线结合，使反“扫荡”与政治攻势结合，军事斗争与其他斗争相结合——依靠着这些斗争的结合，就保护了反“扫荡”的胜利。

在这一战役的全部过程中，我主力部队与广大民兵，始终密切配合，一致投入猛烈的连绵不断的战斗中。这三个月中，部队作战二〇九三次，民兵作战二一九二次。民兵与主力的配合很好，这里只从无数的战例中举出一个来：九月十四日行唐以北苇园与联庄两处敌人企图合击我刘家庄的部队，我芦家庄等七个村的游击小组在行唐二区民兵大队部的指挥下，担任打击从苇园来犯的敌人。他们在二十余里的山头上，以土枪、手榴弹和地雷相配合，与五百多敌人打了一天，从清晨打到黄昏，阻敌前进，以至敌人在这一天只走了十二里路，不能按时到达合击点。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我主力部队，迅速击溃了从联庄来犯的三百多敌人，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在这次反“扫荡”中，无论在主力部队或在民兵中都锻炼出了无数的杰出英雄。民兵中的爆炸英雄李勇及他所领导的游击小组，尤为驰名。他们在三个月中爆炸地雷六十九个，共毙伤敌伪三百六十四名，毁敌汽车五辆，还配合主力保卫了自己的家乡。民兵的地雷，确实使敌人胆寒，在这三个月中，敌人共踩响了四千四百多个地雷，这个数目已够惊人，何况地雷特别喜欢光顾骑洋马的指挥官，更使敌人叫喊：“没有法子！”

在军区腹地战斗激烈的时候，外线我军深入敌后之敌后，在敌占区与游击区积极活跃，一连攻入保定、望都、浑源等城市，

攻克与摧毁敌堡垒二百余座，炸毁火车十二列，坦克三辆，汽车五百四十余辆，铁桥十三座，平毁封锁沟一百余里，封锁墙十六里。同时，与反“扫荡”密切配合着，还有政治攻势的开展。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到处活动，我们的大布告张贴到保定城里，敌人司令部门前以及各地伪政府的门前，还在敌占区与游击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引起了伪军伪组织的人员普遍动摇。又和反“扫荡”的胜利同时，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秋收、秋耕、征收公粮和救灾的工作，这是一个以军事为主的极其复杂而严重的斗争，也终于获得了胜利。

大“扫荡”终于被打退了。四万多敌人出发，生还的仅三万多，而且还丢下了无数的装备。我们虽又一次被烧、被杀、被抢，但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并没有被“征服”，即使是那些不幸落入敌人虎口的同胞，无论老弱妇孺，在敌人残酷的毒刑面前，没有一个表示屈服的！

“观战团”的毁灭

日寇在一九四三年的另一个惨败，是对太岳区的“扫荡”。

在这一年中，敌人对太岳区组织了六次的“扫荡”，由十月一日到十一月十九日的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动用兵力二万余人。这次“扫荡”，又是敌酋冈村宁次亲自出马，布置和指挥作战。他的目的，不但要毁灭我根据地，并企图在这次“扫荡”中取得经验，指导各地日寇对我作战。冈村宁次采取了所谓“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这种“新战法”的重心，在于杀尽我根据地一切人畜，毁灭一切资财。敌人将二万余兵力集中在具有相当纵深的一线上，自北向南推进，然后又自南向北推进，反覆“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冈村对这种战法，自诩为得意之作，特地从各处调集少尉以

上军官、参谋一百八十余人，内有旅团长一人，外加汪逆伪军代表二人，来太岳实地观战。十月二十三日早晨，这批军官坐着十几辆装甲车和汽车，正在首途出发参观时，突遭我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一部伏击于临屯公路的韩略村（离敌军团指挥部三十里的一个村庄），除了三个漏网以外，全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敌人将配合“扫荡”用的六架飞机全部调来，滥行轰炸，并将“清剿”安泽以北之敌一千五百人，“清剿”浮山之敌六百人，“清剿”塔儿山之敌六百人，连夜调来韩略附近，企图来一个报复合击。但他们所见的，只是敌人自己的被炸毁的汽车和狼藉的尸体而已！

“观战团”被毁灭后，我太岳区英勇军民继续与敌搏斗，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终于将全部敌人击退。

冈村遭惨败后，无法挽回面子，竟将六十九师团长撤职，将过错推在他身上，以便自己卸脱责任。

三 山东反“扫荡”又创造奇迹

击退五十次以上的“扫荡”

山东八路军在一九四三年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统计一年之内，敌人在山东全境举行的“扫荡”在五十次以上，特别严重的一次，是在秋冬之间。从十一月初起，敌寇倾其在山东全部兵力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独立第五、第六旅团等部及山东大部伪军，发动对我山东军区从西到东、从南向北的大规模轮番“扫荡”。但是，敌人三个月大“扫荡”的计划，被我主力与民兵在二十一天的奋战中粉碎了。

山东军民的这一次反“扫荡”，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更有准备，有计划和更主动；军民的团结，战士的英勇，战术的机巧，

也有极优良的表现，所以能获得极其辉煌的战果：杀伤及俘获的官兵，占山东敌伪总数二十分之一；克复城市村镇，占敌伪据点总数二十五分之一。在这些战果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鲁南部队在反“扫荡”正紧张之际，深入敌占区的心脏，歼灭了著名汉奸刘桂堂。

刘桂堂，就是全国闻名的惯匪刘黑七，从民国初年就杀人越货，横行华北三十年，据估计，被他及他的喽啰们所杀害的人民有二十万，强奸妇女达三千。他镇压与残杀抗日人民的刑法有骇人听闻的花样，如“点天灯”，即将受刑者的乳部挖空浇油点灯；“放天花”，即将受刑者下身埋入土中，血压上升至头部，再用刀剑砍开或马蹄踏破，使血花飞溅；“响铃面”，即将妇女裸体，系二铃于乳上，迫之赶面，使铃作响。对于幼孩，甚至用石磨碾碎。所以华北人民，莫不恨之入骨，而日寇则视之如异宝，把他看为镇压抗日人民的最好爪牙。日寇一再补充他的武器，助他建立据点，并委以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之职。当他被我军围歼时，日寇曾数次派兵增援，但都被我军击退。我八路军击毙刘桂堂的消息传出后，全华北各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特别是目睹我军神勇战绩的鲁南民众，都说八路军简直是“天兵神将”。

在二十一天的反“扫荡”中，英勇事迹不胜枚举。例如鲁南区攻克石文塔、白塔埠之战；滨海区攻克赣榆及沿海十余大据点之战；清河区深入敌后攻克塘坞等十余据点之战，战斗中歼伪军十余中队，突入胶济路的溜河车站，并击落敌机三架；胶东区直迫福山、平度、牟平之战；鲁南区进攻战，一连攻克二十余据点，不仅恢复北沂蒙全部根据地，并且扩大了根据地，而其中尤以南北岱崮的保卫战，在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页。

南北岱崮保卫战

南北岱崮是山东省沂蒙山区里的两个崮顶，在敌人十二军山田参谋长和三十二师团石井师团长亲手指挥下，用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进攻了半月，炸弹炮弹花费了四十万磅以上，还狠毒的使用了白热的烧夷弹和两种以上的瓦斯弹，而它的抗击者和坚持者——八路军的指战员，只有九十三个人。

十一月十三日，敌人占领了芦崮，上午十一时过十分，对岱崮开始带有试探性的进攻，四百多敌人傲然地整队前进，从四障一直扑向光崖来；等他们走近距光崖百多米的预定火网区以后，在三、四丈高的屋顶上的守卫者发出响亮的射击口令，排枪像烈火般的喷进敌人的行列，敌人来不及还枪便溃逃下山。敌人一个机枪组逃到西北方向的小山去，想实行火力“掩护”，但机枪腿刚刚着地，小山头猛烈的震撼了一下，一颗重磅的地雷爆发了，机枪和他的三个枪手一齐随着黑烟被抛到老远的山边。

崮顶特等射手不断准确地射击着拉尸体的敌人，敌人无能地放起烟幕，退入沟底。

于是五架轰炸机在崮顶盘旋了。沉重的马达在山谷回响，炸弹狂暴的向崮顶倾下来，全崮被浓臭的烟味和厚重的尘土笼罩，战士们躲进防空洞，从枪眼里透过烟雾监视着崮的边缘。

敌人进攻在下午四时半结束，轰炸机不响了，敌抬着十几具尸体退回范家峪。接连四天的进攻和轰炸，敌人的收获只有死亡、溃退和弹药的消耗。我们的战士们白天不断地在战斗的空隙里修补着盖沟，夜间下山掩护着挑水，他们尽量不用崮上保存着的水。作战停止时，战士们都悠闲的回忆一下飞机低飞时的形状，议论着机身的号数和颜色；当轰炸机和大炮在崮上崮下轰鸣

着的时候，他们无所忧虑的坐在工事里，数着炸弹和炮弹的数目，有的甚至有趣的说：“炸一炸地松了，明年好开荒。”他们虽然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他们无形中建立了一个自觉的纪律，不论自身感到或遭到任何艰苦、危难，只有忍耐，没有叫苦。

十七日，敌人再也不敢轻视他的对手了。黎明，敌人占领了范干峪、郭家庄以及岱崮周围所有的大村庄，成千的鬼子，五六百伪军，夹杂着骑兵、炮队，团团包围了南北两崮。在山凹里，他们布置了整齐的阵地，安设了炮位，地上铺上联络空军的大旗，然后在空军配合下，开始整日的火力轰击。崮上的工事部分地被毁了，伤亡也逐渐发生了，然而，守卫的战士们丝毫不气馁，他们在炮火里一面修复着工事，一面沉着地还击崖跟的敌人。

从这一天起，敌人开始对岱崮昼夜围困，然而显然地，敌人面对了这样据险顽抗的对手，对自己的胜利抱极大的怀疑。他们白天全靠飞机的轮番轰炸和大炮的轰击，晚上只有蹲在崮下，迎着寒风叹息。我们只须一个班的兵力，就能下崮在距敌人阵地五六十米的地方掩护挑水。有一夜，我们甚至留了极少一部分兵力守崮，其余的完全下崮活动，一直袭击到敌人纵深的东莞村。

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面前，敌人又一次显露出他的无能。于是新的阴谋出现了，接连好几天都有被抓去的老人、女人、小孩，被强迫上来送信、喊话。有一次战士们亲眼看到山下的敌兵用枝条抽打一个老人胸背之后，三个端着刺刀的敌人一直逼他到山腰。战士们恼怒的瞄准了那三个敌人，放了一个排枪，敌人像兔子似的窜下山，老人沿着一条小沟脱身溜掉了。

敌人白天把崮团团紧围，夜间有所用意的闪开很小一条路，

不放哨，也不打枪。起初几天，他们在下面用不伦不类的中国话喊：“你们下来投降，投降优待的。”后来他们喊：“你们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走的。”最后他们凶恶的叫着：“八路的坏坏的，叫你走你不走，捉住剥皮。……”战士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响亮而愤怒地高喊：“要打打个痛快，有种的步兵冲锋吧！”敌人沉默，炮弹又恼羞成怒地在岗上疯狂爆裂……。

这几日，我们的外围部队，一直没有断过对岗上的援助和配合。他们三次袭击了范干峪、郭家庄，两次打了大张庄一带的伪四师在窝沟区的中队。民兵更配合主力对敌人围攻岱岗的运输队，打了一次埋伏。我军的一个团的政委亲率所属，几次冲过敌人的重重围困，往山上送水、送肉，带来军分区首长对英雄们的慰问信。大岗区逃出的难胞以及近地区的群众，天天登高远望，祝福着守岗英雄们的安全。有几个老大娘甚至每晚对岗焚香。

这一切给了守岗英雄们以无限的勇敢和快慰，他们有信心像军分区首长的慰问信上说的：“坚持七天到十天就是胜利。”他们更紧张的修补着工事，更准确的射击敌人。

终于更紧迫的日子到来了。

二十三日，敌三十二师团的参谋长羞恼地从朱低坐汽车赶到岱岗前线。他把进攻的部队完全撤换成三十二师团的精锐，飞机增加到八架，炮队换了最老练的炮手，并且调来了一门八匹骡子驮的重炮，只炮弹在土门屯集了四十二辆汽车。他命令昼夜轰击，昼夜进攻，飞机每天至少要炸三次，炮队要用排炮集中轰击岱岗的南门，步兵要以近迫作业，步步接近岗顶。于是壮烈的攻防战开始了。

从二十四日开始，南北岱岗陷入狂暴的钢铁的爆烈和厚重的烟火之中，敌人的重炮连续的轰击，流霰弹的碎片满山凄厉地呼

啸，烧夷弹在崗的每个角落里燃烧；八架飞机整日地轮番轰炸，炸弹的磅数由每架飞机载六个至八个，增加到每架只载两个；丢的技术由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命中目标，到二分之一以上命中目标。三丈多高、周围八、九米粗的峨圪被拦腰炸碎，有着二丈三、四宽的工事外壁被炸成两人多深的大坑，交通壕开始炸平了，掩体被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开始震裂了，个别防空洞的门口塌陷了；战士们在充满烟硝尘土的防空洞里被震得抛离地面，帽子掉到地上，个别身体虚弱的被震得口鼻流血，然而他们的意志还是钢铁一般的镇定。成为轰炸和排击主要目标的南崗南门，二排副是共产党员，他带领着他的第六班，一直坚守着。他们的口号是：“门是我们的，至死没有退缩，没有逃避。”

当炮弹正在门的周围疯狂冒着钢铁的火烟穿过的时候，一个战士绕进门上的碉堡监视敌人，一颗炮弹打去了碉堡的一半，火烟薰坏了他的眼睛，随着倾塌的石块滚进壕沟；另一个战士立刻钻进轰毁的碉堡接替他的位置。又一颗炮弹，碉堡又轰去了一角，这个战士头破血流地倒下来，于是第三个又英勇的站上去。八架轰炸机在门的上空轰鸣了不到一分钟，八颗重磅的炸弹连续地倾下来，黑烟遮天蔽日的升起了。碎石和弹片满天飞舞，碾砢大的石块从光崖崩裂，工事完全翻腾起来。

飞机还没飞走，二排副带着三个还能行动的战士从废墟里钻过来，冒着炮火，监视山下的敌人。一个战士受重伤，别人问他的时候，他狠狠地指着被摧毁的工事说：“不要问，监视敌人重要，我牺牲事小，敌人爬上来事大。”另一个战士被木材把腰压坏了，可是他刚刚喘息了一下，立刻举起几十斤重的大石头赶着修工事；被制止了以后，他从碎石里拖出被砸坏的步枪，装上刺刀，带着突击组一拐一拐地去巡逻。有着三丈多高的悬崖的南门

虽然被炸成一个六十度的斜坡，但有着二排副和第六班的三个战士，敌人一直没法冲上来。

岗的形势一天天的紧迫了，与外围的联系完全断绝了，即便两岗之间也不能通信。水缸在洞里逐渐破碎殆尽，锅作完了饭，要立刻埋进土里，不然就会被炸弹震得粉碎。工事的缺口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扩大，伤员亦较前增加了，从前每人每天可以休息七八小时，现在连吃饭也换不下班了；从前每人每天可以喝两茶缸水，后来减为一茶缸，现在减为半茶缸也难以保持几天了。在如此恶劣的情势下，敌人更残酷的手段出现了，他们不断地从飞机上投下大批的毒烟罐，炮弹里大量的用着瓦斯。黄烟扑到洞口来，每个人的嗓子里像塞上了棉球，流着眼泪，打着喷嚏，吐着黄水，甚至晕眩过去；幸亏事前还准备了些蒜瓣肥皂，战士们每人把手巾浸湿涂上肥皂放在茶缸里，一发现毒气，立刻用手巾把口鼻掩起；毒气过了，再把茶缸子揣进裤腰里，恐天气冷结冻。

不管情势如何，这一切只有增加战士对敌人更深的仇恨以及牺牲的决心。支部发出最响亮的号召：“每一个党员不仅要在任何情势下掌握自己，而且要分工掌握一定的群众。”于是在昼夜炮火饥寒的交迫下，英雄们板着铁青的面孔，在废墟里与敌人坚持每一分钟的斗争。他们为了发挥更大的杀伤力，不使手榴弹从光崖下去的半空就爆炸，把一堆堆的手榴弹所有的拉火线拴在一条极长的绳子上，等手榴弹滚入进攻到光崖底下的敌人堆里时再拉线。他们甚至更巧妙的把重磅的地雷也用这样方法滚进敌人堆里去爆炸。他们不断瞄准着射击所有进攻的敌人。一排副曾在十九枪中接连打死七个，打伤两个敌人（其中有一个机枪手，两个小队指挥者），把一个三十余人的集团进攻，用一条枪打退子。二排副也曾在十枪中打死四个鬼子，其中有两个指挥官。他们不仅

打击着敌人的陆军，也连续地打击着敌人的空军。一架黑色的轰炸机是战士们最恨的，它每次轰炸来得最早，走得最晚，飞得最低，丢得也最准，于是战士有计划的组织了对它的打击。在一次轰炸开始，黑色飞机被战士打了一次排枪后，炸弹还没来得及丢就冒着黑烟溜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它。

敌人的进攻，一小时比一小时加强，敌步兵在距光崖六七十里以内挖了工事；轰击也一次比一次地疯狂，岗顶差不多被炸得每一块土地都变了样。

情况万分紧迫了。二十七日夜，守固的英雄们召开了紧急的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坚决突围，保持实力，理由：第一、坚守半月，已完成预定任务；第二、外援及水源断绝，弹药人员逐渐消耗；第三、面对优势的敌军时，不宜绝对死守某一阵地，坚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胜利。

于是分别在每个阵地里进行了动员，坚持到黄昏以后，开始突围。内部余粮扬下，光崖仅有的水缸连同锅碗水罐……全部捣碎，破枪破刺刀巧妙地装成地雷的拉火线，牺牲者深厚的掩埋；然后干部及党员分别掌握一定的群众，帮助所有的伤员，规定了突围的方向，集合的地点。

十二点过十分，敌人前半夜的大进攻结束了。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战士们紧束了行装，留三个人在其他方向打手榴弹迷惑敌人，其余的，斜背了枪，沿着一条大皮绳，一个个的从崖顶上滑下来，然后在黑暗里屏着呼吸，扶着伤员，一直摸下山来。四面是架着大炮机枪的一千六百敌人，当中是三四丈悬崖的岗顶，只要被发觉，随时都有被困困的可能。他们屏息前进，从火圈的空隙里钻出，从炮兵阵地旁边爬过，接着又穿过几道敌人的步兵宿营线，最后越过成堆的丢着敌尸的山坡，冲出了敌人四五里路所

有的包围。

南北岱崮光辉的保卫战结束了，英雄们得到了崇高的荣誉。敌人半月进攻的代价，除了百余伤员及无数的消耗，只有一座空空的破毁无余的残崮，那上面的断垣残墟，永远辉耀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光荣和中华民族的光荣。

（冠西：《光辉的南北岱崮保卫战》，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四 围困、挤走敌人

两年来，我八路军新四军不但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大“扫荡”，而且还克复了敌人大量的据点、碉堡、县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共克复据点九百四十五处、碉堡九千九百六十座。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入县城四十七县，克据点碉堡五千余。到底八路军新四军用什么方法克复这么多的据点呢？

方法有各种各样，有效而且已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是：依靠民兵与武工队的配合顽强地将敌人围困于据点之内，然后以奇袭或里应外合把据点攻下。下面就是把敌人围困住，最后把据点收复的一个例子：

敌人在岔口安下据点

在“蚕食”晋西北八分区时，敌人的据点，由平原伸进山地。一九四二年十月，敌人在八分区的腹地扎下了两个钉子——岔口和芝兰。这是在山地的两个据点。

敌人加强了军事活动，经常小股出发，出来骚扰。一九四三

年一月十九到二月七日，活动最频繁，平均每两天半就要出来扰乱一次。整个山地根据地，几乎被敌人“蚕食”了一半。在敌人威胁下，好多村子都“维持”了。敌人在岔口设“维持会”，划分了四个联合村，成立了村公所、自卫团；敌人经过这些伪组织经常要粮，要款，要夫，要情报。

民众陷入了水深火热中去了！该地是地瘠民贫的山地，但敌人的无餍的贪欲是惊人的。富农负担达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粮草夫役还不算。贫农自然更难过活。有的村长甚至将妻妹也供应了敌人。他们陷入苦闷，并秘密希望着：“八路军快来吧，快来把敌人打走吧！”但是他们不但这样希望着，而且也要自己起来干。怎么干法呢？他们自己缺乏武器，要想打硬仗打破据点是困难的。但敌人必得赶走，否则，老百姓的牛马生活将没个尽头。……干！但是怎么干法呢？

这时，分区的领导者就出来给老百姓出主意了：围困，坚决的围困！老百姓立即热烈地响应。围困的结果，敌人果然夹着尾巴跑掉了。

围困的第一着

围困岔口有好条件：地形好，周围都是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有工作基础，各村都有抗日积极分子，有秘密的共产党支部；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只有敌军一中队，伪军一小队）；民众对敌人仇恨很深，极思驱逐。

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始布置围困。

首先，是给敌人以军事打击。敌人过去一个小队长带了十来个兵，就敢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到岔口以西几十里的地方。我们的两个正规连，在中西川和四道川出现了；东西葫芦川也出现了一个正规连；加上了游击队，就是一个不小的力量。我们抓到

小股敌人，给他一顿狠揍，老百姓信心提高了，纷纷传开了：“八路军来了！起来跟敌人干吧！”

交西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首先走在人民的前头。他们随支队下去活动，阻止敌人不许活动到双家寨、申家社、游家坪来。

要领导反“维持”斗争，首先就要做宣传和调查。干部在前面活动，队伍在后面掩护，恢复了一些交通线，使我们有了耳目，于是第二步就是加强锄奸。

部队打了几次仗，打下敌人抢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在中西川和东西葫芦川捉了十多个坏人，都是本地人被收买的。据说敌人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一条特务线，共四十多人，这一下就搞掉了他四分之一以上。开了群众大会，自新的特务报告了罪恶活动，群众的警惕性大大提高了，谣言大大减少了，汉奸特务们都把头缩进去，不敢公开活动了。摧毁了窑儿上、申家社、游家坪的秘密“维持”，恢复了我们的村政权。这是布置围困的第二步。

过旧历年的时候（阳历二月七日），部队在石沙庄布置妥当，迎接“皇军”过大年；“皇军”出来抢掠，吃了大败仗，伤亡四十多，小队长也被打死了。中队长和小队长是同乡同学，哭了一整天，士兵情绪低落。敌大队长率队出来寻找我主力，寻了三天，没见个影子。

老百姓都乐开了，纷纷慰劳，说：“队伍过年还打仗，人家也是好人家子弟，还不是为大家！”青年们情绪更高，他们说：“毛主席把枪给我们，我们要反攻岔口！”

与敌人不合作——移民

石沙庄战斗以前，岔口附近的张仙村很贫苦的农民，已经苦于敌人压榨，觉得“维持”不了，要搬家。石沙庄战斗后，民众纷纷提出要迁入根据地去，摆脱敌人的黑暗统治。我们的政府就出

来帮助民众这种对敌人的“不合作运动”——移民。当时北自东坡底，西自石沙庄、蚕丝塔以下，共计二百九十户，根据地内有很多荒地可耕种，住处也可调剂。困难问题容易解决。

中西川于二月二十一日开始酝酿搬家，开始有人还舍不得坛坛罐罐，有的怕搬的时候敌人追击，但后来都被说服了，全体都同意了。民兵布置了警戒，群众就着手准备，二十三日总动员搬了起来，各组由组长带领，每村派一干部负责，六支队也出动两个连掩护。老百姓扶老携幼，高高兴兴上路了。四道川的群众酝酿得晚一些，及听见中西川全搬了，也马上动起手来搬。因为不搬将来对敌人负担更重，更难过活了。

就这样，掀起了群众性的搬家运动。这是对敌人的一种很彻底的抵抗。“我们全搬走了，看你还找谁敲诈剥削！”老百姓心里骄傲地想。

敌人慌了！他发动了谣言攻势，说老百姓移到那里，就往那里扎据点。他又纵容平川的白面鬼到处挖粮，被我们抓了不少。威胁无效，敌人又无耻地引诱，说三月一日或十五日要撤走。然而过了一日，没有撤；过了十五，又不撤，谣言自动揭穿了。敌人又说，回去后不要款不要粮了，但是这次更没有人相信。鬼子不要粮款，除非狗不吃屎，太阳从西方出！

敌人曾要制造根据地周周的“无人区”，但是现在他自己据点周围成了真的“无人区”了。敌人异常恐慌，密探不敢出来，给养夫役找不到，完全陷入饥饿聋盲状态。敌人为报复计，抓了岔口、会立几十个人，并说“维持会”是八路的，要杀“维持会”，三月五日夜间，岔口维持会全部逃出，敌人更加孤立。

至于搬出的老百姓，他们生活得很好，第一天在离岔口四十多里休息，区公所就派人招待，以后分别安置，又发了救济粮，

民众就在民主自由的解放区安家了。以后又分给了荒地。有的老百姓，还回去搬了窖藏的粮食出来，准备就在这里久住。移民们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反维持协会”，由群众中素有威望的和开明的绅士领导，更好地照顾移民的生活及教育。

这样，就出现了反“维持”斗争史上的奇迹。

奇袭岔口

岔口这个据点建筑得相当坚固，敌人欺我们没有重武器，以为是“天险可守”；但在三月十日夜间，我们以逃跑出来的维持会的人员为响导，竟袭入了岔口。一部分住营房的敌人还在睡觉，毫无抵抗；于是我们消灭了他们一大半，并活捉鬼子一名，伪军小队全部，缴步枪数十，重机枪一挺，救出了被敌人抓去的几十个老百姓。当我们胜利撤走的时候，民兵正在夜袭北山碉堡，恰好配合上了。碉堡内敌人只打炮，不敢出来增援。从营房里面出发的二十多个敌人，在山上听见下面打起来了，也不敢回来援助。

我们抓到的伪军，释放回去，回家的就在家乡宣传，回伪军的就在伪军中宣传，影响很大。伪军都愿意上山打仗，被俘虏后能释放回家。敌人更恐慌，不敢离开碉堡。

战斗后，文水的笠原大队部立即来检查，带了二三百人，并到中西川一带转了一趟，以图示威报复，毫无结果。此后敌人全部住在碉堡上，再不敢出来，老百姓也不支差不送情报了。敌人也不信任民夫，每天往碉堡上送水时，在碉堡外敌人就接去了，不叫进碉堡。我们的侦察员民兵经常在岔口附近活动，专打挑水的；挑水的也会意；一打就跑，使敌人吃水都困难。

总之，敌人不敢出来，我们又不断去袭击它，造成敌人心理上经常恐怖。

打击敌人交通线，逼退了敌人

岔口战斗后，我以一部主力继续围困外，又以一部主力移往东社一带敌交通线上活动。我们天天去埋伏，并打上了几次。敌人为了对付我们，改变了运输办法，时间忽早忽晚，运输队伍拉得很长，使我们不易打上。但是，这样也同样地增加了他们自己运输的困难。

敌人为报复计，四月四日突然包围东沟，捉走三十多个青年活动分子，并拉走三头牛、一头驴。我们很快进行慰问，并由六支队派了一个连，再度袭入岔口，打开地牢，救出被捕群众数十人；连上次被捕没有救出的，这次也一起救出来了。

此后，我们主力一部更伸向边山一带活动，威胁太汾公路及文汾边山一带，进行了大营盘等胜利战斗。这样真把敌人搞苦了，出又不敢出来，交通线又不安全，给养困难，晚上常受袭扰。

岔口敌人完全被围住了。

七月二十一日，岔口、芝兰敌人同时撤退。撤退时未敢走会立的交通线，夜里翻山去芝兰，从那里去青冶。

敌人“蚕食”山地的计划破产了！围困敌人得到胜利了！晋西北八分区用上述的方法，在不到半年之内，连续挤掉了敌人突入解放区内的四个大据点（即除岔口、芝兰外，还有草张头和榆林山），使该分区所依靠为根据地的山地，扩大了二分之一的面积，形成了一较完整与巩固的后方。在没有挤走敌人以前，八分区的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在挤走敌人之后，形势就完全改观了。

这些胜利告诉了我们：敌人的“金城汤池”、“坚甲利兵”，也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五 车桥大歼灭战

两年来，我们对敌人的据点，除用顽强围困的方法来克复外，在必要时，我们则集中主力一部以消灭之。一九四四年春天以来，捷报频传，战果说之不尽，车桥歼灭战就是其中之一例。

车桥镇是距淮安东南二十余公里的一个大镇，过去是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敌人向苏中区“扫荡”，在三天之内首先把韩德勤的部队打垮，然后“扫荡”新四军。当时韩德勤本人在我新四军黄师的自动掩护下，始得逃生。在保护他过运河时，还送给他给养，使他残余的后方机关和太太小姐们都不受损失。车桥却从此沦陷于敌手，成为敌人一年来苦心经营的一个坚固设防的据点。四周筑着两丈多高的城墙，墙外挖了一丈五尺宽的深沟，墙上修了四个三四丈高的大碉堡，在镇内又建筑了大小五十三个碉堡。伪淮安保安纵队六百余人，是车桥的常驻军，另外还驻扎一队日本人。敌伪时常骄傲地说：“新四军若是能够打下车桥，我们情愿撤出苏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是车桥敌人大难临头的日子。我们的队伍在午夜出发。在苏中说来，这样庞大的队伍的结集行军还是空前的。

当我军接近敌人据点，掩护爬城的火力已布置好，一百多架爬城云梯已架在一丈五尺宽的外壕时，敌人还在据点里呼呼地安睡。

我们的机枪首先打响，突击部队像狂流一般冲过了一丈五尺的深壕，攀登两丈高的围墙，以迅雷的动作，于三十分钟内，一千多个健儿，冲到市街去了。

在慌乱中向我们射击的敌人，很快地被打垮，拚命钻进碉堡内部进行顽抗。一幕争夺街市碉堡的激烈战斗从此展开。战斗直到拂晓，一半以上的碉堡和街市被占领了；但一个可以封锁我们进路的筑在围墙上大碉堡，还在威胁我们。

突击部队受到新任务后，迅速接近这个大碉堡。在弹雨横飞中，战士们喊出：“和平军弟兄，缴枪不杀你们！”

但是对方没有反应。

这时候，我们的“陈傻子”大显威风了。他平常口讷，举止笨拙，别人都叫他“傻子”，一直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陈福田。他全身浸在水里，只露出一个头，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往碉堡里打。后面的同志只是把手榴弹往他手里送。

天亮了，大风刮得漫天灰尘，敌人的机关枪仍是无目的地叫着。

“停一下，”陈傻子突然对旁边同志说，没有等回答，他就飞奔地往房子那里跑。

他从房子那里带了梯子，腰里带了新的手榴弹，冲向碉堡去了。把梯子架好，立刻撩起袖子爬上去，塞进第一个手榴弹，爆炸了。他向碉堡里面喊话，没有回音，就塞进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碉堡着火了。敌人一个个从门窗里钻出来，缴了枪。陈傻子被烟薰黑的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兴奋的笑。

同志们跑过去，把陈傻子举起来，高兴欢叫，大家嚷着以后再不能叫他“傻子”了，要改称“飞将军”才对。

中午，车桥镇内五十三个所谓“铜墙铁壁”的碉堡，都用了“飞将军”的法子，被我们打下来了。六百余人的伪淮安保安纵队全军覆灭，毙副团长、营长以下二百多名，被俘了三百多。

午后，我军向已陷入我包围中的日军攻击。日军一个小队，在拚死的抵抗中被迫缩进最后一个碉堡，利用疯狂的火力作临死的困兽之斗。

我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同志，冒着炮火进行喊话，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同志，进到距敌人碉堡二十米处喊话，敌人仍不觉悟；他就拿起武器，向法西斯武士们开火，毙敌二人。不幸他自己这时也头部中弹，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敌人的固执激怒了我们的战士们。密集的火力，密集的手榴弹，向敌人倾泻。轰然一声，碉堡倒塌了一角。

午后的时候，碉堡里的炮火沉寂了；三十多个鬼子全部消灭了；车桥攻击战就此结束。

当我军攻击车桥时，我主力另一部在车桥以西的周庄、受河、芦家滩之线摆开，迎击敌人的增援。

芦家滩的工事构筑，始于三月五日拂晓。韩庄的前面，有一道迷惑敌人的假工事；河流以南的高岗山，也设了防线。阵地附近，有开阔的地形及坟庄、土埂、公路侧坡等地物；估计敌人可能利用，便在这些地方都埋了地雷。

五日，天一亮，大风沙很厉害，尘沙漫天，刮得简直睁不开眼。就在这样的大风沙中，战士们辛勤地一镐一锹，挖着工事。

果然，五日下午四时，由淮安、淮阴、泗阳、涟水各县先后出动敌人八百余人，内步兵四个中队，炮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中队。这是六十五师团五十二旅的六十大队，由三泽大佐率领出来增援。

太阳已经偏西，战士们还在吃中饭，韩庄西面发现了敌情。许多部汽车，载着敌人三泽大队，也许是因为大风沙看不见远

路，爬得很慢。

汽车在离假工事五十米处停止了，敌人迅速跳下车，展开了重机枪掷弹筒的火力，向工事猛射。打了半晌，敌发觉受骗，再上汽车，第二批增援车桥的三辆汽车的鬼子和一队步行的伪警察也到了。

隔河工事里，不知谁打了一枪。开火是早了一点，因为敌人还比较远。

敌人又慌忙下车，各自携带武器，恰好就找到坟庄、土埂、侧坡等地方去找掩蔽。地雷接二连三狂吼起来，鬼子炸得东倒西歪。还活着的想另找地形，又碰上了地雷。一个扛轻机枪的鬼子，被炸得“飞”了起来，落到河里。慌乱的鬼子，迅速窜进附近的民房。三泽大队长，在高地上用望远镜眺望我们的阵地，指挥大炮重机枪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只是一枪不响。敌人开始向我们冲锋了。当他们“哇啦哇啦”嚷着，冲到我们阵地前面几十米远时，我们的射手们发了神威，敌人像砍草似的倒下。剩下几个零星地逃回去了。

在一阵炮击以后，敌人再发动第二次冲锋，第二次又被打垮。

阵地面前，尸体七零八落地躺着。

我们射击很准确。很多战士，三四颗子弹就打倒两三个敌人。机关枪用点放。我们的口号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大家准备抗击敌人第三次的冲来……

这时候，我们的突击部队出动了，迅速向西北前进。两路迂回到敌人的来路，两路向敌人左侧面插过来。其中又分一路转到阵地前面，挡住敌人的头。

敌人放弃了第三次冲锋，准备应付我们的突击。这时暮色苍

茫，太阳已经下去，周庄据点已看不清楚。当我们的突击部队发现了前面的敌人时，重机枪立即猛烈开火，战士们就冲了上去。敌人抵抗不住，准备退回韩庄，可是已经晚了，我各路部队已经在东、西、北三方面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由周庄出来的第三批敌增援车桥的部队，有两部装甲汽车，两连伪军，开出不到半里，就被我们警戒部队打回周庄。这时，车桥的敌人也已大部解决；韩庄附近被围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

指挥部的命令：九点钟向被围的敌人开始总攻击。

还不到九点钟，凄厉的冲锋号声划破长空，激战开始了。我们部队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向敌人压过去，手榴弹成排地爆炸；敌人在各方面从烟火中反扑，都被手榴弹打垮下去。

黑夜看不清楚。直到冲到敌人面前，才看见敌人，立刻投入肉搏。一个战士冲到鬼子那里，突然跳出两个鬼子向他刺来，他的衣服被戳穿了两个孔；他猛力用枪托打倒了一个，其他一个就吓跑了。机枪班长起了火，把机枪交给弹药手，自己抓了三个手榴弹冲上去；到离敌人很近时，才猝然扔出手榴弹，决心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结果炸死了几个鬼子，他自己不但没有伤，还缴了两支枪。突然一个鬼子，向弹药手猛刺过来，刺中了扁担上；他抽出手榴弹当铁锤，向鬼子头上猛锤下去，鬼子倒了；他夺了枪，刺死了鬼子。

战斗非常激烈。

一个鬼子打枪打不响，掷了枪，拿起刀子乱舞。我们的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决心捉活的，跳了上去。鬼子跳进河，我们四个人也跟下了河，一个握住了他的刀，一个捉住手，另外两个把他拖上岸了。我们的连指导员抱住了一个鬼子，鬼子刺刀刺破了他

的手，他咬紧牙关不放松，鬼子急得乱蹦乱跳；另一个同志跳上来，便帮着把这个鬼子活捉了。

敌人已溃不成军，向东北突围未成，又向西南溃下去。另一部敌人爬过水荡，很多淹死在水里。少数残敌，由东北角逃了出去。

我另外两部主力赶来，迂回到溃兵的前头去，在三王庄、大北庄一带；又把残敌包围了。

敌人躲在一所房子里，四次想冲出去，四次退了回去。房子燃烧起来了，敌人全部都做了我们火攻下的牺牲者。

七零八散的个残兵，一枪不放，只是跛着脚跑，害得我们也得四面追，到处捉。

拂晓以前，敌人~~的~~大炮沉默了，战斗宣告结束。到处是火光，到处是硝烟，到处是敌尸。八百敌人全部消灭，捉到二十多个俘虏，其中有三个重伤的，有三泽大队长在内。

六日，吃早饭的时候，老百姓前来报告：前庄子田里还躲着几个被打散的鬼子。战士们把饭碗一放：“去！捉活的去！”田野里枪声喊声响成一片，鬼子像被追的野兔，没头地乱窜。一刻钟以后，又活捉了十来个，一个也没跑掉。

这时，敌人由宿迁出来的第四批增援车桥的部队，有十八辆汽车，一看光景不好，不等我们动手打，他自己乖乖的向后转，溜回了周庄据点去了。

总计这次的战果，从三月四日午夜起到六日拂晓止，总共毙俘敌伪一千三百人以上。车桥攻击战中，越过几道工事，冲进城内只需三十分钟；消灭守敌六百，克碉堡五十余。五日芦家滩伏击，围歼敌三泽大队长所部八百。另一部更击退与阻止了敌人的增援。前后俘日军山本一三炮兵中尉以下四十八人，俘伪军连长

以下三百余人。在抗战史上，这次战斗是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这一光辉的歼灭战，使宝应、淮安以东纵横百余里的一百万人民，欢腾鼓舞，得庆重睹天日。胜利之大，至今犹脍炙人口，甚至连这次被俘的许多日本兵，也对新四军战斗力称赞不止。一等兵水野正一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石田光夫伍长说：“我现在清清楚楚知道了：日本军不管战斗意志也好，思想方面也好，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毛病。”

六 里应外合收复莒县

一九四四年，我军不但克复了许多据点，而且也收复了许多县城。在山东区，半年之内，一连收复了八个县城；而打得最漂亮的一次，要算收复莒县。

莒县是山东一百零八个旧县中的第一个大县，南北平均长达三百余里，宽达一百二十余里，拥有三千六百余村镇，九十万以上的居民；土地肥美，物资丰饶，在历史上称为莒州。而且它是山东我军的鲁中、鲁南、滨海三大根据地的接合部，形势很重要。因此，这一大县的光复，不但解放了原在敌寇统治下的七千平方里的土地，七百多村庄和三十余万同胞，而且还使我们的鲁中、滨海两个战略区，在二百余里的边境上打成一片，使沿海平原和沂蒙山区，成为一个互相依托的战斗整体。

敌寇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国民党反动派莒县县长许树声手中不费一弹占领莒城以后，五年多来，在全县周围修筑了大小十六个据点，碉堡不计其数，并修通了台潍公路（潍县至台儿庄）及莒日公路（莒县至日照），筑起了兵营、飞机场、弹药库。至

于莒县的工事，更是敌人别出心裁，研究了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修成的。

假如在滨海区夏季攻势中，我军已经遇到了李逆永平的“国防工事”式的防御体制（这是敌第五混成旅团工程队亲自协助构筑的）的话，那末，在莒城之战中，我们遇到的是比李逆永平更进一步的工事。它是综合了李逆永平的工事及沂城（不久前为我收复）之役的两套经验，处处针对我军的武器火力、进攻方法，而进行改造与增强的防御体制。因此，莒城之战中我军面临的是：城墙小圩内圩三道工事，各个炮楼直射侧射的炮火，高俯全城的“中心碉堡”，八尺宽的深壕，以及轻炮火所不能摧毁的坚固墙壁等。

但是敌寇所有这些处心积虑修成的防守工事，自认为“固若金汤”的莒县城，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我军的进攻。

敌人把莒县做为进攻鲁中、滨海两区的战略支点，特别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害怕美军登陆，敌人更依据莒城自西北钳击滨海区，因此在增强工事以外，还积极培养一批新的伪军与伪组织，大大加强其统治机构。然而这也没有能够阻止我军。

我滨海军区决心收复这个县城。

进攻开始于十一月十四日。我滨海军区主力部队，自十四日晚七时开始，沿莒临公路长达一百四十里的战线发起进攻。我攻城部队以每小时十五里的速度，分四路前进。七时五十分城内传来两声巨响，我攻城部队跑步直扑城垣，工兵迅速架桥设梯，突击队飞越丈余宽的外壕，奋勇登城。我军首先占领了敌人的城防工事，并继续扩大突破口，后续部队鱼贯入城。伪军莫正民部乘机反正，在碉楼顶上插上白旗。

我军攻进城里的部队，立即和反正的部队配合，由他们带领

着迅速占领了各要道，逐步逼近敌中队司令部。敌曾两次反攻，都被击溃，到夜十一时半，我军已完全将敌人压缩在城里小围子内，重重包围起来。

进攻城中心敌军司令部的战斗开始了。

我们的一个战斗英雄，接近城中心的西南炮楼，在进攻开始后一刻钟，就听见三次猛烈的爆炸声，炮楼崩裂了；张团九连从缺口蜂涌冲进，迅速在围墙内扩展战果。这时，八连也从挖开的墙洞里冲进去，并占领了敌人的曹长室、仓库及事务室，直逼敌人最后凭藉的工事。我军贺团，吴团，一同从东南、东北各方面攻进小围子，通过开阔地带，将敌寇铁丝网和鹿柴炸毁一段。莒中独立营又从西北攻进小围子，以迅速的动作冲上西北角大炮楼。到后半夜一时半，我们的攻城各部已统统打进小围子。

在十五日拂晓以前，我们就将城圩内敌人仓库里的粮食运出，把敌人工事摧毁，又把敌人水井破坏。十五日下午三时，敌机一架在城上空盘旋侦察，十六日午前，来了四架敌机，投弹十三枚，但我军民毫无伤亡。

在黄昏时，我军集中各连炮火，猛击敌人工事，在炮火间隙中，可隐约听见敌人的哭叫声。敌人并在碉堡里焚毁尸体，臭气熏人。

城市工作委员会，在占领莒城的第一天，就建立起来，从事恢复城市秩序，设法救济难民；万余民兵被动员起来日夜拆城，城墙全被拆平，使敌人即使再来时，也将无所凭藉。

在炮声隆隆中，莒县民众活跃起来，为前方服务。在转送伤兵的路上，各兵站设置精致的慰劳棚；伤兵路过时，马上就有小学生或妇救会员送水送饭，亲切安慰，使不少负伤同志感动流泪。在通往前线的大道上，驴子、车子、担子等，运着大批慰劳

品，络绎不绝。在火线上，持枪的战士在街上来往巡逻；城门口的战士，在开放缴自敌人的留声机；太阳地里，有人在写日记，读书报。枪声在继续着，城市在燃烧，而战斗快接近结束了。

莒城外围，已经收复了十多个据点，并将据点工事摧毁。莒诸（莒县至诸城）公路上，收复了招贤、管帅，诸城的敌人吓得发抖；诸日（诸城到日照）公路上的石桥、桃林、山东头三个据点敌人，看见情形不妙，赶快狼狈地逃进诸城城里。这时莒县全境都告光复。

十六日过午，诸城敌伪六百余（内敌军二百余）经枳沟（莒县东北百四十里）南进，企图增援，进到崖头、店子一带，就遇我军北路梯队，给以迎头痛击。敌人被我压缩在一个沟边，激战终夜，敌伤亡甚重，不能救莒城，慌忙先自救，还是以走为上策。次日拂晓，敌人施放了毒气，才向东窜走，遗下尸体十余具，不少的文件和很多的军用品。

这次莒城之役，不仅光复了县城，而且光复了全县境内所有大小据点；不仅打烂了敌寇的军事机构，而且彻底地摧毁了敌寇政治、警察、特务、文化教育、经济财政等上上下下全套机构。这样对敌人彻头彻尾的打击，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在全国敌后战场也是罕见的。即使敌人恼羞成怒，来一个报复“扫荡”，拚命挽回面子，而遗留给他的将只是一座空城，所有统治机构已经完全不存在，连市民也疏散了。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从这一个胜利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重要的经验——对敌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里应外合收复城市问题。在这一点上，莒城战斗是个范例，给我军今后作战方法提供了一个方面。

从战役的过程来看，十四日一夜之间，我军在沿诸莒公路上

同时展开猛攻，一举光复县城及十六个敌伪据点，在如此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战果，其原因就在除了我军英勇以外，还有三千五百余伪军、伪警察、伪组织的全部反正。敌人苦心经营了五年的强固工事，除由敌人据守的四个炮楼以外，竟在一个黑夜中化为灰烬。这又说明了，敌人虽有工事，但没有人坚守，这是敌人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自然，光有这些条件是不够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长期的艰苦的敌伪军工作及城市工作。我们的敌工人员和武工队员，不避生死危险，深入敌寇心腹与统治中心，具体运用了“攻心为上”的方针，对敌伪进行日常持久的耐心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一点一滴辛苦经营，到了十一月十四日，果熟蒂落，到了收获的时候了。莫正民原为国民党六十九军独立旅旅长，在国民党“曲线救国”政策指示下投敌多年，充任驻莒城伪军的副大队长。他在事先即和我军约定，决定当晚在我军攻城时率部反正。

下面就是莫部配合我们攻城时反正的经过：

十一月十四日，莒城显得非常激动。有些居民，已经悄悄地在搬家。

伪保安大队部，这一天也显得特别忙碌，官兵们进进出出，脸色表现出紧张兴奋。一切反正的部署已经就绪，滨海军区陈司令的命令，限定当晚七时动作。午十二时，八路军接援部队布置就绪，堵住敌人一切增援的可能道路。一过十二时，莫正民就吩咐人去缠住县长和警察所长，并把他们带来。接着他又下计谋，捉日本教官。

他的四个勤务员接受了这个任务。

“报告大队长，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要捉活的。”

四个人四支匣子枪，直奔金野教官的住处。“报告教官！”他们一喊，在门口石台上逛来逛去的金野站住了。“什么意思的有？”他问。“什么意思的没有，”一个勤务员答。“那边什么干活的？”另一个问金野。等金野回转头时，即刻跳上去一个人将他抱住，第二个打落他的指挥刀。金野的两个中国勤务兵，提着枪从屋子里跑出来。“咱们都是中国人！”捉金野的人就喊。两个勤务兵很顺从地把手提式和两支匣枪交出来。金野被捆起了，并用手巾堵了嘴。

天一黑，十二中队三十多人，由中队长率领，散布在日军司令部门口。一会，在灰暗的灯光下，从司令部出来十多个鬼子，带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十二中队就与敌人开火，毙敌七八人，缴到了机枪。接着，炮弹在城中爆炸起来，鬼子并打出照明弹，用猛烈机枪火力向外扫射，把胡同口对面的短墙也打塌了。十二中队继续堵住敌人的门口。一点钟后，有人在喊十二中队长，中队长一问，知道是八路军的杨同志，并知道八路军已进城了。他就领着杨同志，告诉了地形敌情，就带着弟兄们，从南关出城。

莒城的夜在极端动荡中。伪保安大队的官兵和他们眷属，都一伙一伙地向南关走。伪县长丁晓峰日教官金野和沂水的敌顾问，也夹在人流中，被押出城去。这时城门洞里传来更紧张的脚步声，是雄赳赳的八路军向城内挺进。有反正的弟兄引着他们前进。大队反正部队便集合了四路纵队出城，前面的人挥着白旗。在出城的时候，顺手把日警务段分所长成田和翻译员一块捉来。万仙会头子于敬武——这个曾经杀了许多抗日军民的罪魁，也没有逃出法网。监狱的门打开了。重见天日的人们奔跑出来，有的脚镣手铐还在哗啦哗啦的响。他们是被俘不屈的同志及被逮捕的“不稳分子”，也有一些是被冤屈的老百姓。他们见到我们的战士，兴奋得不得了，亲热地拉着我们同志的手，正像久别重逢的

亲人。

在十四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十中队长护送荒井顾问和五百辆小车的花生米到招贤，带了四十多个士兵，分坐在两辆汽车上。到了招贤以后，他对荒井说：“我和顾问坐一个车，保护顾问。”“好的，好的。”荒井似乎领会了中队长的“忠心”，就答应了。汽车开到土沟，中队长叫车夫停止，装着解手下车，荒井也跟着下车，“中队长什么干活的？”荒井问。中队长回身就抢上一步，把荒井抱住，两个扭做一团，从汽车路上滚下沟里去。下车的士兵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队长就喊：“兄弟们，奉上级命令捉鬼子，我们要参加八路军了！”士兵们一拥而上，捉了荒井，又打死了二个鬼子兵。荒井被绑着，不肯走，被大家穿过两根扁担，抬死猪似地抬着走，大家集合队伍，开到牛家庄——预定的集合地点。

十五日晚，与我军攻入莒城同时，凌阳、店子集、牛家庄、埝头、菜园、杨家店子、孙仙、滩坪行、柳店子、阎家宜庄岭、苑庄、刘具村、河口等十三处据点的莫正民部，均举行反正，并将据点工事捣毁。公路上的招贤、管帅的莫部两个中队，也同时反正。计攻城中俘敌经济顾问多本、伪县政府顾问荒井、伪县保安大队教导官金野等十名。

莫部三千余人反正后，连同完整的机枪三十一挺，手炮二十五支，长短枪三千余支，开进祖国的自由土地——解放区中心地带。出城后的几天，群众同样也欢迎与慰劳了他们，他们被这种热情感动了，好多人在休息的时候私议：

“你说，为什么早先出来讨伐，见不到一个老百姓，民兵还到处打枪，现在却连大闺女小媳妇都来欢迎咱们呢？”

“早先咱们是当汉奸糟蹋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把咱们当鬼

子打。现在反正了，并且配合了八路军打鬼子，所以老百姓把咱们当抗日军看待。这就叫‘改邪归正’。”

一星期后，莫部全体官兵接受了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的番号。在改编大会上，继儿童团员讲话以后，莫旅长对大家表示：“我们现在已经落在儿童后面了！我们要努力学习，改头换面，迎头赶上去，做个新人。……”

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前壮大 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血战将近八年的结果，开辟和坚持了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战争的敌后三大战场，创立了十八个解放区。在华北，有六个解放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包括热河南部和沦陷十余年的辽宁一部），我们的力量已深入到东北了。在华中，有十个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在华南，有东江区、琼崖区两个区。若加上陕甘宁边区，则为十九个区。总面积为九十五万六千余平方公里，我军活动所到的地区为九十七万余平方公里（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丧失国土即全沦陷区面积为一百四十四万余平方公里）。尤其重要的，解放区是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所有全国最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青岛、徐州、郑州、洛阳、开封、武汉、安庆、南京、镇江、上海、杭州、广州等，均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军队包围之中；所有全国几千里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均在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军队控制和活动范围之内。

在解放区里，根据一九四五年三月的统计，已建立了二十四
个行署，一百零四个专员公署（内有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六百
七十八个县政府（内有陕甘宁边区的三十个）。在我抗日民主政
府区域内的人口有九千五百五十余万（占全国总人口五分之一
强）。

在将近八年的抗战中，我军力量是日益加强了。抗战开始
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到一九四五年春则
有六十万主力军，比出发时扩大了十三倍以上；新四军由出发时
只有三个支队，一万二千人，到一九四五年春发展到七个正规
师，近二十六万主力军，比出发时扩大了二十多倍；华南抗日游
击纵队，抗战开始时几乎是白手起家，到一九四五年春也发展到
两万余人的主力。我军在作战中，专门靠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
了自己，还武装了二百二十余万民兵，抗击着敌伪六分之五。

在作战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七年半
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
座、据点一万一千余个；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
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
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我军主要缴获：炮一千零二十八
门，机枪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支。我军伤亡总数也达
四十四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名。我们的牺牲，换来了十八个解放
区，解放了九千五百余万同胞。假如没有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抗
战，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昆明、成都，早就被日寇占领了。而缩
到峨嵋山上去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毫无反攻准备，反而千方百计来
反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滔天的罪行。

在将近八年中，我军虽然经常处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中，
但我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愈战愈强；我们打败了敌人的一切

进攻，也克服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在华北，敌人在七年中换了七个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华北时间最长，手段最毒辣，杀人也最多。但是，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面前，他是失败了的。当他于一九四一年上台时，我们是处在空前困难的时期，他来了以后，使用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搞我们，确曾增加了我们许多困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当他于一九四四年秋调走时（其职务为冈部直三郎所代替），我们又处在重新发展的时期了。我们的力量比他来时要大得多了。所以冈村在华北三年，并没有得到便宜，也没有升官。他只有到进攻豫湘桂的国民党战场时才升了官。不到半年，就做了驻华全部日军的总司令了。

在将近八年中，解放区军民不但创造了如上的战绩，而且还改造了旧中国的社会，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解放区里，没有土匪，也很少看到乞丐，我军初到华北时，要饭的成群结队，许多老百姓没有裤子穿。这种情形很快地改变了。贫苦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日益改善着。在华北解放区里，贫农上升为中农，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华中解放区生产更加丰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加普遍；原来非常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也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在日益加强着。解放区不但是中国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且已成为未来新中国的榜样。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与我们的情形却完全两样。国民党的军队对抗战袖手旁观，一九四四年被少数敌人一敲，即节节溃退，在不到一年即损失六七十万兵力，失掉了长沙、洛阳、福州、桂林四个省城及郑州、许昌、衡阳、宝庆、零陵、全州、梧州、柳州、南宁等一百四十六个城市，丢掉了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六千多万人民，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

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空军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和各省的广大资源。假使敌人再要进攻，国民党还要继续惨败，那是无疑的。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斗中壮大起来，成为中国举行对日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力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苏联红军迅速地攻入日寇的战略基地——中国的东北，歼灭了日军的精锐——关东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配合苏联的进军，在各个战场上发动了猛烈的大反攻。

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指使下，日伪军拒绝向中国人民投降。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反攻大军，仍继续进行着猛烈的战斗。林彪将军率领所部，沿北宁路挺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整个东北。聂荣臻将军率领所部，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解放了察哈尔，包围了平、津、保。贺龙将军率领所部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了绥远、山西的广大国土。刘伯承将军率领所部，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罗荣桓将军率领所部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攻，解放了山东一百零八县中的一百县。陈毅将军率领所部，向沪宁、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攻，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攻，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反攻大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在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两个月中，毙伤俘虏敌伪军共二十三万多人（其中俘虏及投降的敌伪军有二十二万余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

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

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正式签字，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了，长期侵略中国的凶恶而又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争取这一伟大胜利的最重要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在这一伟大的胜利的战斗中，共歼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这一伟大的胜利的战斗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它已经是一支拥有一百二十八万人的强大的部队了。

1945年3月

①说明：本篇原名《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延安出版。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重印时把书名改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在文字上和事实上作了个别的修正和补充。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

一 抗战前夜的形势

经过了三个多月血战之后，国际形势有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对日本有利，抑对中国有利？最近将来的前途又是怎样？我想，要清楚地了解对中国今天的抗战可能发生极大影响的这些问题，最好首先回顾一下抗战前夜的形势。

在日本强盗发动对中国冒险战争的前夜，亦即在中国大规模抗战的前夜，从日本强盗看来，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予他以有机可乘。因为：

第一，英日妥协的空气在那时正达到相当的浓厚。英国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劲敌，自从近两年来英国在远东采取较积极的政策（用金融财政支持中国南京政府，同时尽力加强新加坡和香港的防务）以后，日本感到了相当的不安。但是，在日本发动冒险战争的前夜，英国却又正在恢复他一贯的动摇故态。在欧洲，英国对西班牙问题始终采取消极的政策，这在客观上给予侵略者以不少的鼓励；在远东，英国又在日本的“日本华北，大不列颠华中华南”的诱惑中与日本进行着谈判，这在客观上当然也给予日

本以不少的帮忙。我们不管这一回由日方发动的英日谈判有无结果，但是英日谈判本身确是对日本有利的，因为英国既同意与日本谈判，就是表示英国对日本有妥协的倾向，就是表示英国愿意牺牲中国部分的利益以满足日本。这在日本军阀看来，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

第二，美国对世界问题的消极。美国对西班牙问题始终站在外面，不想卷入漩涡。这也是侵略者求之不得的！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从日本看来，美国的大海军政策还没有完成，美国在远东又没有巩固的海军根据地，因此，日本军阀显然不相信美国在目前有足够的力量来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近年来美国的资本家却有很大一部分依靠日本法西斯鼓动战争作为他们最好的市场，日本侵略者认定美国决不会轻易的把他们的最好的主顾丢掉。同时，自从斯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失败以来，美国有不少资产阶级居然主张退出远东，而让英国单独去碰日本的钉子，这当然也使日本军阀特别觉得高兴！

第三，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没有弄好。在远东，苏联是日本最有力的强敌，而且苏联是最能够而且最愿意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然而主要因为过去中国南京政府不愿意和苏联接近，使得苏联虽欲积极帮助中国也不可能。过去中苏关系没有改善，使日本军阀更加肆无忌惮。假使中国能像外蒙古那样，早早与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那么，日本军阀的胆子一定不会像目前那么大！

第四，日本与法西斯的德意已经缔结了同盟，而且这两个法西斯盟友正在西班牙、中欧和地中海各处捣乱，日本军阀认为这正可以牵制英国和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配合日本对中国的进攻的。

日本强盗就是在这样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下，发动了对中国的

冒险战争。

二 战争扩大后的形势

日本强盗对国际的估计，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认为，假使中国政府这一回仍然不发动抗战，假使中国内部仍然不能加紧团结，那么，在日本不费力的占据中国大块土地之后，各国的态度会软下来，国际形势会变成对日本实际的有利，那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中国终于实行抗战了，中国内部也日益加紧团结起来了，在中国抗战下的国际形势是不是仍然对日本有利呢？事实刚与日本军阀的估计相反，日本强盗自以为有利的国际形势，随着中国抗战的展开，已经一天天对日本变成不利了。

首先，动摇不定的英国，在华北战争爆发的初期，的确还不愿意得罪日本，的确还想站在调人的地位，劝告“双方”停战。但是，自从华北战争逐渐扩大，英国的劝告又得不到结果之后，艾登就不能不通知日本，暂时停止英日谈判。自从上海战争相继爆发，特别是自从日本宣布用武力封锁中国的海口，用飞机杀伤英国的驻华大使，用暴力搜查英国的商船以后，英国就不能不比较积极起来。在舆论上动员抨击日本，在外交上频频与美国接洽。在地中海会议中采取较坚决的态度，在国联会议上相当支持中国，这都是英国进步的表现。当然，目前英国的进步还是非常迟缓的，英国有少数资产阶级特别是少数的保守党分子显然还存有与日本妥协的幻想；但是，假使中国的抗战始终坚持下去，假使英国少数保守党分子对日妥协的企图再三遭受碰壁，那么英国的动摇政策并不是没有被麻痹的可能。

美国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对中国即表示同情。但是美国因为一方面要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另一方面又有 1931 年英国不愿意合作因而斯汀生的不承认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于是他这一回在英国要求合作对日的时候，就“以夫子之道还诸夫子”，拒绝英国的建议，坚持孤立的政策；同时又不愿提出任何方案，他深怕提出方案后得不到结果，会损害他的自大主义的尊严。特别给中国人民以不好印象的是美国有少数短视的资产阶级居然还愿意借款给日本，美国驻中国大使居然首先接受日本的威吓而退出南京；不过美国政府和一部分资产阶级这样的行为，在受到全美国及全世界人民猛力抨击之后，已有了相当改变，如今借款事情已听不到下文，美国大使在走出了南京之后，不到几天又跑回南京了。一直到最近，美国当局因为看到中国抗战的坚决，看到美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看到苏联外交的活跃，看到尼翁协定的成功，才开始由消极转向积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本月五日芝加哥大桥落成典礼中发表痛斥侵略国的演说，就是表示美国已有了采取较积极政策的准备。罗斯福氏不但指出侵略者的恐怖政策“已危及整个文明的基础”，而且还要求“各国务当出以积极行动，以保全和平”。当罗氏这一篇雄壮有力的演词发出后，立刻得到了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拥护，尤其表示愿意赞助罗氏主张的是英国、法国和苏联。因为英国在中国损失最大，而法苏则是拥护世界和平的支柱。他们看到有雄厚力量的美国既有了转向积极的表示，当然也就随之更加活跃起来。同时国联也因之而增加了勇气。国联的迅速通过咨委会第二报告书，正式承认日本为侵略国，并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都是在美国的声援下，在英法苏的推动中进行的。九国公约会议的前途如何，固是另一问题，但是九国公约会议的召集，正与英日谈判相反，它本身就是

对日本一种打击!

英美的转向积极固然值得我们欢迎，但是事实上在目前对中国帮忙最大的还是苏联与法国。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的舆论即积极攻击日本，同情中国；在上海战争爆发后，苏联又与中国迅速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缔结，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而把日本置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可以相信，今后只要中国南京政府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而绝没有中途变节的倾向，苏联愿意进一步积极帮助中国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法国在远东的关系虽然较少，但是法国今次对中国的帮助却很大。他不但在舆论上一致同情中国，而且在外交上也常常与苏联站在一起，给予中国抗战以不少的帮忙。这确是值得我们致以高度的敬意。

最出乎日本强盗意料之外的是德国的行动。德国这一回并不能给日本以意想中的帮助。因为日本把主力消耗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上而不拿去进攻苏联，是希特勒所不高兴的；同时，德国在中国保有相当大的利益，这种利益现在又受到他的盟友的威胁，这也使希特勒感到头痛。据说，日本要求德国供给军火，希特勒并没有答应，由此也可以看到侵略阵线中的矛盾了。

目前能够给日本以相当帮忙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波兰。墨索里尼在去年尚假仁假义地以一架大型飞机赠给蒋委员长，而现在却明目张胆地袒护日本。差不多在中苏不侵犯条约缔结的同时，意大利却与日本进行谈判“仿照德日协定先例”的意日协定。据可靠情报，日本有一部分轰炸南京和上海的飞机和机师都是由意大利供给。意大利为了配合日本的行动，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即加紧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大施侵略和捣乱的魔手；但是由于英法苏的加紧携手，由于尼翁协定的成功，使意大利的海盗行为受到严重的打击。为报复计，墨索里尼曾于九月二十四日亲自跑到慕

尼黑去和希特勒商量办法，但是这一回这两个法西斯巨头的会见，据说并没有多大结果。实在说来，像意大利那样一个可怜的国家虽欲尽量对日本帮忙，但他自身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叹！至于甘心做日本走狗的波兰，那就更加可怜了。他为了贪婪日本一点军火订单，居然愿意在日内瓦充作日本强盗的代言人，但结果除博得举世的痛恨外，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不管意大利波兰等不知自量的国家怎样愿意对日寇助桀为虐，但是，由于中国的坚持抗战，由于法苏的活跃和英美的转趋积极，日寇已经逐渐陷在四面楚歌之中了。

三 展望

瞻望国际形势的前途，目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英美能否合作，二是九国公约会议的动向。

英美能不能合作共同对日呢？

如大家所知，英美两国有世界规模的矛盾的存在，要这两个国家永久地密切地合作是很少可能的；但是，目前为了对付当前危及他们本身在远东利益的共同敌人，英美是有某种接近的可能。

自罗斯福发表谈话后，英美在事实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接近。但是英美的接近，将站在牺牲中国的立场去调解中日纠纷，抑站在制裁日本的立场来帮助中国，那主要的就不决定于英美，而决定于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假使中国不能坚持抗战，假使中国不坚决反对妥协，那么，英美即欲帮助中国制裁日本，也无须多此一举；反之，假使中国坚持抗战，绝不表示动摇，那么，英美即使想牺牲中国利益以进行调解，也没有可能。

我们应该认识，制裁日本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不是轻易的可以实现，因为英美帝国主义者向来是动摇不定的，向来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维持他们的利益的。但是英美等国共同制裁日本的可能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只要中国绝不动摇，只要中国能坚持抗战到底！

照目前的情形来说，英美是在想用压力来软化中国，使中国在某种条件之下与日本妥协，我们应当坚持拒绝英美的这种方针。

九国公约会议的前途如何，与英美能积极与否有密切关系。因为九国公约会议主要是由英美主持的。所以这个会议能否成功，主要决定于英美，正如地中海会议能否成功主要决定于英法一样。在地中海会议中，因为英法的积极和苏联的热心赞助，意大利虽没有参加，会议也终于得到成功。地中海会议的成功，已经证明集体制裁侵略的可能，已经造成今后同样性质会议的好榜样。现在，日本对九国公约会议，像意大利对地中海会议一样，已经宣布不愿意参加了（也许他还要讲价还价，到对他有利的场合，才答应参加）。但是日本即使不参加，只要英美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这个会议也可以得到成功的。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九国公约会议要比地中海会议困难得多。地中海会议只是预防“海盗”的会议，而九国公约会议则是对付一个正在进行抢劫的强盗的会议。在地中海会议中，没有一个侵略国家参加，反而容易顺利进行，在九国公约会议中，现在已报名加入的意大利必将袒护日本，会使这个会议受到许多妨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英美如想这个会议有所成功，须要有较多的努力；同时，为要加强这个会议的力量，聘请苏联参加是极有必要的，不要忘记尼翁协定的成功，苏联也尽了很大的

力量。

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侵略中国到底将采取怎样的办法呢？它的前途，当然也不外三个：一个是对双方调解，一个是空议一场而散，一个是对日制裁。所谓调解，就是劝日本少拿一点，劝中国多让一点。这种纵容侵略者的办法，不但绝无理由，而且对于中国的抗战是绝对不利的。我们坚决的反对这种牺牲中国的“调解”。所谓空议一场而散，即是毫无结果，而把问题延宕下去，这当然有利于侵略者的，我们要用血和肉争取对日本的制裁！

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英美一部分人士倾向采取“调解”的空气，非常浓厚。本月廿五日合众社由伦敦发出消息：英美解决远东局面的方法“将出以调解，而不采取惩处举动”。伦敦泰晤士报也非常圆滑的说：“和解提案目前纵不能为交战国所接受，然终有一日可为双方接洽的基础，至于采取经济压力作为停止战争工具一层，虽将演进，然未必有什么进展，希望参加比京会议的国家不要对日本作不能见诸实施的广泛攻击……”。英美在目前还发出这样的论调，可以说对和平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要正告英美人士：目前只有对侵略者实施制裁，采取强硬态度，才能使它放弃对中国的侵略，解除对英美的威胁；若舍此路而不由，只对侵略者进行“调解”，即使“调解”成功，将来的后患仍是无穷，而且这不但对于中国不利，对于英美也是不利的。那些顽固的少数英美人或者说，“英美若采取制裁，会使纠纷更大”，这完全是过虑之言。要知道日寇对中国作战仅三月，已经到了内外交窘，众叛亲离的境地，它现在单独对付中国已经对付不了，已经暴露出无数的弱点，还有什么能力去扩大纠纷呢？所以我劝英美人士不必对日寇怕得那么利害，只要大家能采取共同行动，一致对日制裁，一定可以停止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一定可以停止战争的蔓

延！如果英美仍维持今天的动摇态度，对侵略者放任，将是九国公约会议流产的预兆。

说到我们自己目前的任务，说来说去，最主要的就是坚持抗战。唯有坚持抗战，才能使国际形势对日本变成更加不利，也唯有坚持抗战，才能使英美更加积极起来，使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制裁的办法！

我们除了坚持抗战以外，是不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呢？当然不是的。为了推动国际形势对中国更有利的开展，在外交上起码要做下面的几件事：

第一，我们应该立刻对日寇宣布绝交，表示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我们应该迅速与我们最可靠的友人进一步订立军事互助协定，再以这种协定为基础，去联合其他一切同情中国的国家，去和他们订立反侵略的协定。

第三，我们不但要和英美法苏联合起来，我们不但要用种种方法使英美法苏站在一条阵线上，而且我们还要和一切弱小民族弱小国家联合，使他们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织成坚固的反对侵略者的密网。

第四，我们应该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对全世界表明我们坚决抗战、彻底反对侵略的主张，并要求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致起来援助中国，反对日本。

我们要这样做，才能促进全世界国家和人民对我们同情和帮忙，才能使国际形势对中国更加有利，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迅速的得到最后的胜利！

(原载 1937 年 11 月 6 日《解放周刊》)

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一 我们对敌人的面孔应该认识得更清楚些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六年来，中国从日寇得来的教训，本来已经够多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他本身及其行动的观察，常常“认识不足”，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就拿最近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这一严重事件来说吧，对于这一事件，就有许多离奇怪状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次日寇向华北以至向上海开火，完全是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的行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的国策（他们认为连日本金融资本家以至近卫内阁也不同意）：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的爆发，是出于“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预先有布置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证据是，在日军未发动进攻中国以前，东京金融市场并没有紊乱，等到日军在华发动以后，公债及各种产业股票才开始惨跌），甚至还有有些人认为日寇这次行动只是“示威”的性质，最少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把事件扩大”；等等。

不消说，这些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把日本的“少壮派军人”看得太神化，而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

近卫内阁的本来面目认识清楚。固然，在华北发动战争和指挥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但是，这些少壮派军人是谁派他们来的呢？他们的行动代表谁的利益呢？稍为留意一点时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驻屯军干部，大部分都是在“二·二六”事变后，或在去年华北驻屯军强化计划实施后由东京调来，现在华北屯驻军的首脑，被称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将则是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才由东京方面派来的；经过“肃军”后的东京当局，假如预先没有“放火”的计划，为什么要派这些“点火者”到最容易发火的华北来呢？尽管这些点火者在点火和扩大火焰的瞬间不一定要得到东京方面的同意，尽管他们在某些部分的问题上甚至会和他们的主人——金融资本家地主等——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忠实于他们主人的利益的！老实说，日本帝国主义老早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布置好了，驻华北的少壮派军人不过忠实地活泼地按着这计划做去罢了。若果有人认为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以至近卫内阁不同意华北驻屯军人这次在华北发动战争的行为，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谬误之谈。要知道东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等，希望无事平稳地继续五年来资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固是事实；但是到了除非用战争不能解救他们的危机和延长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同意发动战争的！只要看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东京各政党对“近卫政策”（其实就是军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在政党背后的金融资本家和大地主等的态度如何了。至于说，近卫内阁也不同意这次战争，那就更加荒谬！我们早已指出：近卫内阁的出现，主要的就是为了调和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请参看本刊十三期时评）。

第二和第三两种观察错误的根源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不过其

意义来得更加严重！由于没有看清楚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的一致性，由于没有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必然性，而只凭一些极表面的事实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乱下断语，那自然会在有意无意间中了敌人宣传的毒计了！但我们必须指出：敌人天天宣传这次中日“小冲突”(!) 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是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放出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要向其他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要动摇中国不坚定的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线的苟安的幻想！对于这些烟幕，中国的舆论界早就应该给以揭破；可惜中国的舆论界，当华北战事发生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华北的问题，当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又往往只注意到上海的问题，而对于敌人对中国进攻的整个计划，却不但很少有正确的把握，并且有些论调还陷于严重的错误！试问这次战事真的是出于“偶然”的吗？日本政府真的“不想把事件扩大”吗？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政府对言论界彻底的统制，关西几个师团到了除队时期而不下解散令等等，为的是什么呢？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下总动员令，在短时间内即动员近三十万大军（包含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师团）到中国来，又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事实，不能不强调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向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不但是有计划的行动；而且这种计划的严密性及其广大性是以往所没有的！不健忘的读者总应记得，当日本军阀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统治阶级间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当时的日本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军阀诋议：“日本吞下了满洲，等于吞下一颗炸弹。”（大意如此）；但是这一回情形却不同了。根据东京通讯：芦沟桥

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各报的专电，各杂志的言论，各政党负责人的发言……差不多是“句句一样，众口一词”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这次事件在事前事后，都有严密的布置，其严密性甚至连日本的“交易所”有可能在发动战事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当它执行对主人有利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时，不一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们的同意！），至于说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侵略计划的庞大性，我们可以断定，是“九·一八”以来所没有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了。

二 日本为什么要在目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完成了在田中奏摺里所明白记载的“征服满洲”的计划后，天天在准备着实现“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要选择在目前下决心执行这个计划，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原因所促成的。

首先，我们从日本经济方面观察：日本新的经济恐慌的征兆已经非常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不管日本的军需工业有怎样畸形的发展；但是由于军费无穷尽和无限制的膨胀，至使赤字公债无法消化，物价的高涨无法抑止；同时由于军需原料须从外国大量购入，致又引起对外贸易的空前入超；跟着国际收支的无法平衡，大量的黄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据日本官厅发表的统计：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间，物价总指数高涨了百分之三一（国内商品高涨了百分之十三，输入商品高涨了百分之五十六），几个月来物价高涨之势，还是有加无已；至于入超和黄金外流之数，尤为惊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达六万万四千万日元，截至目前为止送

往美国的现金共分四次，总额达二万万七千万元。照目前情形看来，日本经济的恶化，只有日益深刻，而丝毫没有“好转”的倾向，如此发展下去，新的恐慌的来临，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无论是怎样蹩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惯于向中国抢劫以“打开”危机局面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样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我们从日本内政方面观察：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内阶级与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这也是应有的文章了！据日本官方发表，本年一月到五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比去年全年七百次几增加一倍；农民斗争则仅一月至三月已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到日本国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农大众在全世界无比的残酷的警察制度压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至于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始终不易彻底缓和，虽则日本统治者在面对着各种危机之前，极力设法使军部和政党间的矛盾和缓下去，然而以实现“军资合作”为任务的林内阁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一百十七日的寿命），表示调和前途的不可乐观。近卫文磨的登台，虽则也以“缓和国内之彼此对立，以收举国一致之实”为己任；但是近卫登台以后，不但“军资合作”既得的成绩，无法维持（结城不愿再当财长），不但已成的许多对立，无法消解，就是在内阁之内，马场广田贺屋之间也未见融洽。光阴易逝，特别议会召集之期已经不远，可是“新党”的组织，毫无把握，这不能不使近卫内阁感到前途的暗淡！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缠结在一起的，日本统治者在这样的危机的威胁下，当然要发狂起来，拚命向中国狂噬了。

第三，我们从军事方面观察：侵略主义的日本为要补救军需

工业资源的缺乏，为要完成建立进攻苏联和对抗英美的有利的军事根据地，在获得了和相当巩固了满洲热河等“生命线”之后，进一步夺取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原是必走的路径和既定的方针。现在眼看着苏联的第三届五年计划行将开始，中国抵抗的实力显著地增加，同时世界和平势力和侵略势力最后搏斗的时期也日益迫近，在这样的种种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这位“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撑好汉”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日夜企图要实现的既定方针，加速地“断然”执行起来！

第四，我们从日本国际环境来观察：在这一方面，从日本统治者看来，目前执行它的“既定方针”是相当有利的。他们认为欧洲的国家正忙于应付他们的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硬干”，当然没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情，他们特别高兴英国“友谊的态度”。实在的，英国绅士这种态度对于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给予不少的鼓励。

苏联消息报早已指出：英日谈判是促进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上一期本刊的《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中，也已说明，英国在远东一贯的动播不定的老政策对于帮助日本进攻中国是有着莫大的作用。

此外，美国的爱玩“中立”政策，和日本军阀对苏联的厉行清党肃军错误的估计，都使日本军阀误认是有利的条件。

最后，最近中国内政的动向，对于日本的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假如中国内部的团结早已十分巩固，民主政治早已实现，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要踌躇一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国自西安事变后，和平统一虽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国防政府的建立，亲日势力的肃清，民主政治的实现，还相去很远，因此日

本帝国主义便乘着这些空隙，赶快向中国开炮了！

以上的几种因素当然是互有连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促进和影响下，便决定向中国找寻出路。

三 侵略中国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在六年前，日本军阀曾在国内危机非常深刻，国际环境却相当顺利的条件下，干过一回，结果可以说相当得手；现在，它又要干第二回了。这一回是不是也像前一回那样的顺利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也应该从几方面来观察。

第一，日本统治者以为进攻中国可以“打开”经济的危机，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错算。在战争还没有发动以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如此深刻，财政方面已经如此没有办法；在战争发动以后，日本每年将需要多少战费呢？据专家估计，起码要一百五十亿到两百亿元，这是罄日本全国国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战争除了引起财政的破产以外，将使对外贸易更加恶化，物价更加高涨，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据最近东京通讯：“华北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已经被搅得一塌糊涂，一般粮商更乘机操纵粮价，囤积居奇，致使粮食价格，猛涨不已”（申报）。将来战争愈持久，财政和经济的破产必然更加显著，所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将是日本这次企图以战争来打开经济危局的必然归趋！

第二，日本统治者企图以进攻中国来缓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结果也必然适得其反。因为由战争所引起的恶果，无疑大部分都要由日本的工农大众来负担。他们现在已经无法过日子，他们现在已经不能不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若果将来情势更加恶化下

去，谁也不能保证日本国内不发生“侵外必先安内”的问题。据最近消息：在日本首都，居然有人抛掷炸弹，居然有人到处贴标语，以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法西斯蒂团体，如青年党一类的东西在东京所举行的演说会，却根本没有群众去参加！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国民对于日本的法西斯蒂如何痛恨和对于由法西斯蒂所直接发动的战争又如何表示坚决的反对的一端了。

日本统治者间的矛盾，也不易由对华侵略得到缓和。我们曾经指出：到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断然行动”受了挫折的时候，必然又是日本统治者间的矛盾重新尖锐的时候（请参看本刊十三期时事短评），我们在这里应该附加一句：只要战争稍为持久下去，日本统治阶级的阵线必然就要紊乱起来。

第三，既然日本在战争中会使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得到日本统治者所预期的相反的结果，那么，日本所自夸的“优势”的军事也必然受了很大的限制。事实上，从七月七日战争开始到现在，日本的军事不见得比中国“优”得多少；中国北平、天津以至南口的失陷，主要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军事，不如说是由于政治。但是即使在中国政治上还有种种弱点的情形下，日本在军事上所获得的“胜利”，其代价也是相当高的。由八月十三日到廿八日，在短短的期间中，仅在上海的一隅，据长谷川向日本陆军省的报告，日本兵士受伤者达七千六百余人，死者五千八百余人；军舰被击伤和击沉的共十二艘；飞机被击伤和被击落的共八十架；坦克车被毁坏四辆，侨民死六百余人。这个数字当然是不确实的，根据各方电讯和实际情形估计：由七月七日到现在，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战争中的伤亡，最低限度也在五万人以上，即当日本常备兵的六分之一。我们说过：目前战争还正在开始，要是战争持久地延长下去，要是中国当局能在短期间内将政治上的弱点克服过来

(即改革政治机构，建立巩固的国防政府，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等)，那么，在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之后，日本军阀即使把日本全国六千万男女老幼都驱上战场，也绝没有胜利的把握。

第四，在国际方面，日本军阀自以为有利的估计，也将成为错算。自从日寇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除了法西斯的德意以外，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无不同情中国，痛恨日本。在远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更不耻日寇的所为。自战事爆发后，法国一向对中国表示深切的同情，美国在最近已表示不愿放弃远东的利益，连动摇的大英帝国，自从英大使许阁生被日机射伤后，也采取了较前坚决的态度。尤其重要的，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布，这一条约的公布，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立时提高，将使日寇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无怪东京政府听到这消息后，在手忙脚乱中，乱吠乱叫了。

最后，我们再回到本国方面来看。中国在今天以前，因为在政治上还有许多弱点不被克服，因为对敌人整个侵略中国的计划估计不足，因而有平津以至南口的失守；但是在今天以后，由于日寇进攻的加紧，由于日寇企图整个灭亡中国计划的完全暴露和由于种种事实的教训，中国人民和政府要在最短期间内起来把过去政治上的一切弱点完全克服，以重新加强抵抗的实力，以扫灭敌人已得的一切成果，是没有疑问的。到了那时，中国必能在军事上由不利转为有利。

总之，今天一切情形，在表面上虽和六年前“九·一八”当时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实质上却完全不同！日本帝国主义又要在这“第二次的九·一八”事变中收到像第一次九·一八事变同样的果实，不但没有可能，且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终生的误算，很可能

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种误算中，断送它的强盗的寿命！

(原载 1937 年 9 月 6 日《解放周刊》)

沦陷区的土地问题

土地被强占

“七·七”事变后，华北及滨海诸省，大部分继东四省之后成为沦陷区。现在沦陷区中的一部分最好的土地已经被日寇所强占，而且还继续的被强占着。

日寇强占殖民地人民的土地，是有着极丰富的经验的，在四十八年前，日寇占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的土地成为日寇主要掠夺对象之一。其掠夺步骤，首先是进行土地调查，接着就是直接没收或低价的强制收买。结果台湾人由大地主到自耕农的大量肥沃的土地便逐渐落入日寇地主资本家手中了。在三十二年前，日寇正式吞并朝鲜以后，它在台湾掠夺土地的经验照样地搬到朝鲜去运用，结果朝鲜人的土地便遭受到过去台湾人的土地同样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台湾和朝鲜掠夺土地的经验又在东四省运用起来。“七·七”事变后，日寇又吸收了过去在台湾、朝鲜和东四省掠夺土地的经验，拿到中国本部广大沦陷区中来运用，而且花样更多，手段更毒辣，掠夺范围更广泛了。

日寇在我沦陷区中，利用特务机关、保甲组织，或设立“土

地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周密的土地调查，强迫人民实行“土地陈报”和按户的土地登记。日寇只要有所需要，不问是属于地主或农民的土地，都一律实行强占。强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的武装霸占，有利用伪组织名义强行没收，也有用租赁、低价收买的名义（如价值数百元或数十元一亩田地仅给数元）以及其他方式，总之，它觉得怎样便利便怎样去胡作乱为。

日寇大量强占沦陷区人民的土地用途何在呢？

第一，在沦陷区中，日寇到处建筑公路网、封锁沟、飞机场、兵营、仓库等，都需要大量的土地。拿冀中来说，日寇计划在冀中一千七百余里铁路和六千七百余里公路的两侧，挖掘宽一丈二尺至二丈四尺的深沟二条至四条，沿公路线，每里建一兵房，三里建一小碉堡，十里建一据点。再拿晋冀察来说，由去春到现在敌据点由八百多增至一千四百六十，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封锁墙。这些稠密的据点、公路网、封锁沟等所需的土地，当然都是由强占而来的。第二，日寇为了加强沦陷区的统治和解决其国内和殖民地一部分困难（如饥饿现象），便积极的推行移民政策，把大批日本人，朝鲜及台湾人，特别是一些老弱残废送到中国沦陷区来。日寇外务省东亚局调查：中国事变前，在华日侨人数（包括朝鲜、台湾人）只有八万六千余人，“七·七”事变后，大量增加，到1940年3月，已增加到三十四万五千余人（见大阪每日新闻）。经过一年之后，到去年四月又增至五十六万人，比抗战前增加到六倍以上，其中以华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南又次之。为了满足这些移民的需要，日寇便随意强占中国地主和农民的田园与房屋。在江南，敌人把真茹、大场、吴淞、杨思桥、关行、龙华一带的农田，武力强占，分配给日韩的移民种植，把残有的房屋拆除或烧毁，建立

起日本的新村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政府籍口疏散人口，“避免英美飞机轰炸”，更积极地动员本国及朝、台人民特别是老弱妇孺到中国来。仅山东一省，移民已达十五万。他们来了，中国老百姓就被赶走或送出关外去。鲁南各地的许多富饶的村庄已划为移民区，当地的房屋和田园均被霸占。最近当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新的冒险计划又在酝酿之中，日寇因为要把华北变为它北进的“兵站基地”，要把华北更彻底的殖民地化，所以又计划将伪满全部敌侨移往华北，而将朝鲜敌侨移往伪满，且已有大批敌侨进关。如果这个计划当真实实现，则华北沦陷区人民的土地将要更大量的被掠夺。据估计，目前伪满日伪将近两百万人（朝鲜及台湾人在内），若按照日寇在伪满的移民计划，每户（约五人）授田十町步即一百六十亩，则二百万人所需的农田为六千四百万亩。我们在这里暂时替它打大的折扣，假定它至多能把一百万人运到关内来从事农业（因为我们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移民，大部分是武装移民，当它没有放弃进攻苏联的计划以前，要把这些移民全部移到国内来是不一定可能的，但把一百万甚至一百万以上的朝鲜人及少数台湾人移到关内来，则是可能的），那所需农田也要三千二百万亩，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个数约大于全华北水田面积的二倍，而约等于全华北旱田面积的八分之一。

第三，在沦陷区中，日寇为要有计划的增植棉花、粮食、鸦片烟和其他农产品，成立了许多“农业会社”、“实业公司”、“农事试验场”、“农场”等等，这些“会社”或“农场”所需的农田，当然也是由霸占或强迫收买而来的。如“中日实业公司”经过伪政权之手，没收了过去由段祺瑞等出资经营的军粮城茶堤两个大农场（其地三千五百町步，即五万六千华亩）；北平的伪装“中央农事试验场”，曾派员到各地调查，在德县和唐山等地“收买了”不少

的民田；伪“新民会”在南口设立的农场和各地的分场，河北、山东、山西各地的“农事试验场”，都是随意霸占（或变相的霸占）中国人民最好的耕地。除了这些最好的耕地被霸占之外，广大可耕而未垦的荒地，也是在它们计划强占之中。1940年日伪合资的“华北垦殖公司”成立后，便选定了冀省沿海一带，垦殖新田一万顷，冀东沿海地区已开荒七万顷；“中日实业公司”计划开发以下地区：冀东三十万町，津浦线路沿线沧州一带四万町，山东省黄河下游八十万町，其他山西、河南等省约一百万町，合计二百余万町，即三千四百余万华亩（以上均见《庸报》）。还有日本人是喜欢吃大米的，去年“华北交通公司”在敌军和兴亚院“援助”之下，指定了该公司管辖下的线路和沿线“爱护村”，选择最好的水田七百五十顷，专门替日寇种植日本大米，以供华北日人的粮食（见《庸报》）。这又是一种变相的土地掠夺。

日寇无限的和随意的掠夺土地的结果，加上疯狂残酷的烧杀、奸淫、掳掠、苛捐重税等等结果，使得沦陷区一部分农民和地主完全丧失了或不能不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今天沦陷区的耕地最好的一部分已逐渐落入敌伪手中，一部分变为荒田（仅河北省一带1940年春荒田增加到四十余万亩），仍留在中国地主和农民手中的土地也随时有被掠夺的可能。

于是，在沦陷区中，土地问题就成为更严重的问题。在抗战前，全国大部分最好的土地为中国地主阶级所独占，而现在沦陷区中一部分最好的土地已经为日寇所强占，而且还将继续被强占。问题的严重性也在这里，这不仅是农民的生死问题，而且是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一点早已为我党中央所预见，所以在抗战前就改变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政策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没有这种改变，要发动全国抗

战和战胜日寇都是不可能的。

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同受损害

在没有战胜日寇，完全驱逐日寇出中国以前，沦陷区中无论农民与地主的利益都是同受损害的，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在经济上受到极残酷的压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沦陷区中对我民族的毁灭政策、奴化政策等，无论对于农民与地主同样是难于忍受的。

沦陷区的农民大众所受的苦难固是最为深重，他们除了经常遭受屠杀、捕捉、抢掠以及种种凌辱压迫之外，他们的负担也空前的加重了。日寇在沦陷区中，不只要维持原有的高额的地租，而且还有所谓田亩捐以及无数的苛捐杂税（多至七八十种）都尽量压在农民的头上。当然，沦陷区的农民是不会服服帖帖地甘受敌人的压榨的。在很多地区特别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区中，日寇要征收租税是相当的困难，为要保证得到田赋，日寇就实行以“租划赋”的办法，在某些沦陷区的山村中普遍设立了租栈，由伪县公署组织“租赋协进会”，聘请地方士绅和地主参加，分别负责，开栈收租。假使佃农逾期不交租，敌伪即派武装下乡挨户征收，扣除了高额的田赋和地亩租之类以后，再把剩余的一部分退给地主。

这样看来，岂不是沦陷区中地主的利益可以获得相当“保障”吗？当然不是的。很多地主的土地、房屋、牲口、财物被劫掠了，地主的整个经济基础动摇了，即使一部分附敌的地主，也不能得到好处。固然，敌人为了笼络这部分地主，为了能使他们甘当工具，也常常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乱开一些空头支票。例如，

晋西北偏关沦陷时（现已收复），敌人对地主与租户的关系就作了如下的规定：“地主与租户每年租票仍照二十五年以前办法清理，不得籍端减少或扣除或退地不耕等情”。苛里被霸占时（现已收复），敌人也维持旧的剥削方式，即“对半分”（地主与佃农各得收成量之一半），“四六分”（地主得六成，佃户只得四成）和“三条腿”（佃户只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归地主）。这些办法，在其他沦陷区中，敌人也是采用的。但是旧的剥削关系的被维持，并不意味着地主的利益不受侵害。因为在旧剥削关系被维持的同时，田赋也空前的提高了。例如偏关的田赋，沦陷后比沦陷前，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到五十七。其次，地亩捐、契税、牲畜税、婚姻税、区费、警费、房捐、铺捐、旅行护照、身份证等的征收，是不分贫富的，而能够交得起这些捐税的，首先还是有钱的人呵！

地主利益被侵害的又一证明，就是地租虽然加重，地价却仍下降。在现代国家一般的情形下，地价与地租的涨落常是正比例的，因为地价不过是地租的资本化。然而在今天沦陷区中一般的情形却刚刚与此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沦陷区社会的极度不安，地权没有保障，田赋奇重，劳动力减少，荒田增多，在许多地区中竟造成了有地无人耕的现象。在靠近城郊比较好的土地，敌伪又常常要低价收买或直接没收，地价不能提高（虽然比之农村要高些）；而偏僻农村的地价当然更要暴跌了。如河北省定县敌占区的耕地，每亩竟跌至五元。这种地租高，地价低的情形如果发展下去，必然要造成极严重的后果，若果土地不是被集中于日伪手中，也将造成有地无人耕的普遍现象。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我势力所能达到的线附近，地价也有趋于上涨的，如晋察冀边区附近某三个“爱护村”，原来地价也是暴跌着，但由于我工作

的深入，巧妙的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确保了地权，使过去无人过问的土地从1940年到去年春以后，每亩已涨至五六百元（见《晋察冀日报》）。不过这种情形不能与一般沦陷区的情形相提并论。一般沦陷区农村的地价是低落的，地主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

农村生产力空前低下 农民与地主相率归来

在沦陷区中，与地价低落的趋向并行的，是农村生产力的异常低下。这是敌人各种残暴行为与各种苛杂盘剥的必然结果。土地被掠夺了，房屋被烧毁了，数百万壮丁被送出关外去了，大批好男儿当兵去了，无数牲口与农具被劫掠和毁坏了，地租加重了，生产情绪极度低下了，许多田地荒芜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当然是日益减少。甚至敌人最需要的棉花与粮食，尽管它用尽一切力量企图提高生产量，但直到现在也无法达到抗战前的水平。如河北省的棉花，根据1940年的数字，生产量较战前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见1940年6月28日《新华日报》）。去年华北棉花收获量为三百万担，比之战前的五百万担，也仅及五分之三（见1941年9月30日《庸报》）。今年华北的粮食缺乏五分之二，平津等地已开始大闹粮食恐慌（4月10日本报）因为敌人对粮食的大量掠夺以及强迫农民多种棉花，而牺牲了一部分粮食的生产，以后华北的粮食将要更成问题。虽然敌人在这里开设了一些农场或“农事试验场”，但这种少数殖民地性的农场在整个沦陷区农村经济中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并没有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目前整个沦陷区的景象仍然是一片漆黑。假如今天中国沦陷区所处的时与地，与当年台湾或朝鲜沦陷时所处的时与地相同，那么，我们沦陷区同胞们的前景是相当悲惨的。但是目前中南沦陷区的情形显然不是那样。从时间上说，全中国人民经过了五年搏斗的今天，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从空间上说，黑暗的沦陷区是与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处在犬牙交错之中。我们根据地的各种正确政策的执行，各种建设的实施以及各种胜利的获得，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与情绪。

农民在沦陷区生活不下去了，他们就大批的进到抗日民主的根据地来，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里来。最近，晋察冀边区周围的敌占区青年和农民逃到该区来的络绎不绝。四月间，六百多个被解往东北的“囚徒”，半途举行暴动胜利，有二百多个“暴动者”也成帮结队的逃到晋察冀边区来了。

以后抗日根据地不只是沦陷区劳苦大众的避难所，而且也是有钱人的避难所。当然，地主最初是比较犹豫的，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是常常缺乏了解的。但自从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地执行了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并经过深入的宣传以后，地主逃回根据地的事就日益普遍了。山西浑源某村三家地主全部搬到该县抗日政府辖区来；山东营南区逃亡地主三十五户已归来三十户，临近逃亡地主已全部归来，当然，一些死心塌地的地主汉奸，除了等着被消灭以外，是不愿意回来的；但大多数从实际经验中知道在敌人统治下没有出路的地主，也还有可能继续不断地回到我们抗日根据地来。

前面所说几个地区的农民与地主的纷纷逃到根据地，就已有材料看来，这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种收获证明着我党中央土地政策的正确，证明着那些根据地执行政策的正确，同时还证明

着敌人各种欺骗宣传与统治的失败。

两种土地政策的对抗

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不只在各抗日根据地里，而且在沦陷区的农民中，也有了深刻的影响；上述大批农民与地主相率逃归或撤到抗日根据地来，就是证明。正因为如此，敌人的眼睛红了，它为了对付我们的土地政策和这个政策已经在农民中发生的深远影响，它们想出一个“土地政策”，并利用特务人员在晋中一带到处组织“土地委员会”，宣传“没收抗日分子与在逃人民土地，交还归还农民土地”（6月7日本报）。敌人这种括弧内的土地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才有，“七·七”事变以来，它就有一种“土地政策”，那就是掠夺土地的“土地政策”，不过没有明白的宣布罢了。现在，一方面为了对付我们，一方面为了掩饰其强盗嘴脸，又把这一套搬出来使用。

敌人这种欺骗宣传，是会在农民中被粉碎的，因为它没有实现这种欺骗宣传的牢固基础。敌人固然可以藉口“没收抗日分子土地”，来更大量的掠夺沦陷区人民的土地；但是那些土地不见得都属于天生的“抗日分子”或“在逃人民”的；至于说到“交还”，那就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它能够把“移民区”、“农业会社”、飞机场、公路网、封锁沟等的土地“交还”吗？部分的做为小恩小惠的“交还”还是可能的，然而是无补于事的。敌人这种既不合事实，也不能完全兑现的“土地政策”，要与我们既合群众要求，也能完全兑现的土地政策对抗，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我们要知道敌人的各种宣传，在一部分落后的农民中也会发生过一些作用。

特别是在目前沦陷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敌人的欺骗宣传和加上一点小恩小惠可能发生一些暂时的部分的作用，这就需要对敌伪斗争工作的更加开展，来把敌人的各种欺骗与蒙蔽完全粉碎。

要粉碎敌人的“土地政策”，我们不只要向农民深入宣传我们的土地政策，而且还要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忠实地而又灵活机动地实行我们的土地政策，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不仅各抗日根据地里可以实行，而且在游击区、在敌占的点、线附近也可以机动灵活地运用。如前面讲过的三个“爱护村”，就是灵活地实行了我党土地政策的模范例子。在那三个四面被敌人强占和汽车路包围的村子里，虽然经常遭受敌人的蹂躏与破坏，但同时却实行着“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法令，基本上消灭了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调整了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巩固了地权，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这为什么会可能呢？主要依靠我们干部的艰苦工作，依靠他们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当地农民的密切联系，最后而且最主要的是依靠有组织的农民的力量。像这种光荣的模范，是值得其他地区去学习的。

各抗日根据地只有正确地执行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并深入敌区广泛宣传这一政策，把这种政策实施下的根据地里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实情与敌占区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实情对照起来，则敌人的欺骗宣传必将被粉碎。

(原载 1940 年 7 月 8 日延安《解放日报》)

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庆祝《毛泽东选集》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国人民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选集》包括了毛主席自一九二六年以来的重要著作，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辉煌记录，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同时又预示着毛泽东思想将要取得更大的新胜利。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希望做毛主席的学生，有阅读和研究能力的同志更希望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了，这就给希望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同志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我们应该感到万分高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政治舞台最初出现的时候，就表现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开始在湖南作马克思理论宣传，并参加了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站在正确方面，反对了当时“左”右倾的思想

观点，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当时中国革命中最突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意见；但由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因而招致了革命的失败。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那种严峻的日子里，有很多人都认为革命没有什么希望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退出了革命队伍；但毛主席不但举高了革命的旗帜，团结了自己的战友，而且在每个重要的关键时刻，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当一九二七年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开始以后，井冈山同志中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论文中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毛主席在前一篇论文中，对中国社会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并天才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这些论述已为中国革命实践所完全证明了。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对于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在实质上也就联系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三个根本问题，即土地革命问题、民众武装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

其后在许多篇论文中，毛主席关于建设根据地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农民土地政策、军事路线和建党问题，继续发挥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提出了一套完全适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因为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这许多问题，才克服了当时严重的困难，

使革命战争迅速扩大和发展，并粉碎了敌人几次的“围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以及对当时错误路线大争论的总结，同时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准备。这是一篇关于战略问题、政治策略问题与思想方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论文是在“九·一八”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写的。毛主席在这几篇文章中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特点，指出了党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的论述，成为全国人民新的革命行动指南，引导我们走向民族解放的大道。

选集第一卷最后一篇是《实践论》，这篇著名的哲学著作，是指导我们如何正确思想与行动的指针，在最近时期已有许多专文介绍过，是值得我们认真反复研究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整个历程。其后三卷，则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记录，他终于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选集》在今天出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有了这个选集，就能够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可以想见，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久经考验的科学真理，一经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将成为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

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来，经过各种政治学习运动，中国人民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毛泽东选

集》出版以后，人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将随着学习运动的开展而更加大大提高，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但是有了《毛泽东选集》还不等于我们已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武器，还需要我们认真的学习与在革命实践中锻炼。

我们华南解放已两年，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对于干部思想和工作的提高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实际工作任务繁重，理论学习习惯尚未养成，理论学习的空气还不够浓厚，我们希望《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于我们的学习将大大推进一步，我们应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计划地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要在干部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理论学习的空气。当前首先必须初步地进行党史学习和作好整党的准备工作，为我们更好地、更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相信，当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出版之时，党内外、国内外的同志们、朋友们，一定会以无比的热情和兴趣来阅读它、研究它、体会它、认识它，把它变成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把它变成我们思想和工作的武器，我们的事业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原载 1951 年 10 月 17 日《南方日报》）

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

目前“三反”运动已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华南的“三反”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也一定要获得全胜。我们还将在“三反”和“五反”胜利的基础上，为认真开展增产节约与思想建设运动的新高涨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此时出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一样，我们以高度热情来欢呼第二卷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包括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半期）四十篇重要著作。另外一篇在抗战前写的哲学著作也暂收入在里面。这些著作清楚的告诉我们：毛主席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使一个落后的国家战胜一个强大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正确运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及时纠正党内的偏向，打退国内反动派的进攻而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这些文献充分的显示着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开卷第一篇，论述了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关于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所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据毛主席所说的第一个方针、第一套办法，我们党向全国人民

指出了一条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在抗日战争中既然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我们怎样贯彻正确的路线呢？毛主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说，既要与国民党联合，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要与它进行必要的斗争。这个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关系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抗战胜利与失败的问题。但是，在抗战初期，在我们党内却发生了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投降主义，他们认为抗战只有依靠国民党的力量，他们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原则，反而强调“求同不求异”，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主席对这种投降主义，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很显然，如果不克服党内的投降主义，也就无法坚持抗战中的正确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一再强调地指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是有原则分歧的，并警告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毛主席告诉我们：为着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毛主席把这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是“把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由于毛主席掌握了这个中心一环，才能把抗战引向胜利。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致无法阻止蒋介石的叛变，挽救当时革命的形势，使革命遭受了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以陈绍禹、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使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抗日战争初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假如不能及时克服这种投降主义，那么，党的正确路线就不能坚持，人民的抗战力量就不能发展，蒋介石的投降阴谋就不可能阻止，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完全没有保障了。为着坚持党的正确路线，阐明党的正确政策，打击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阴谋破坏，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机会主义立场，毛主席曾辛勤地写了许多著作——从宣传鼓动提纲、后方布告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抗战又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由于个别战场的胜利和徐州的大溃退，“速胜论”与“亡国论”曾一度嚣张。毛主席在同年五月间发表了《论持久战》。毛主席在这个著作中，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变化，作了科学的分析；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整个战略问题，预见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才能获得胜利。毛主席这个著作，曾经振奋了全国人民，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灯塔，而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个科学预见的正确。抗日战争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是与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领导分不开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及会议结论中，

总结了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并对抗战初期党内发生的路线争论作了基本总结，严正地批判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又做了一次明确的解释。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的文件也极为重要。由于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投降主义，坚持了正确路线。这才使我党我军在敌后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人民的抗战力量日益壮大起来。

一九三九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准备向日寇投降。毛主席写了许多著作，来揭发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投降阴谋，并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共产党的任务。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著作中，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阐发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划分了中国革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与范畴，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对于动员中国人民积极起来参加解放斗争和建设新中国，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梦想及其投降阴谋，都起了极大作用。为了克服当时投降危机与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毛主席又写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在毛泽东同志不可战胜的理论和政策面前，蒋介石的阴谋一次又一次被粉碎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教育干部，毛主席还写了许多有名的文章，如《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这些文章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

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写成的，它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我们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集中为三个主要问题，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主席把它们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把这三个法宝传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我们战胜敌人最有力的武器。另外，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又写了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其目的也是为着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思想。主观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投降主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们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毛主席这个哲学著作，就是从思想方法上来彻底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投降主义。毛主席引用列宁的话指出：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抓住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根据他自己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伟大的天才，阐明了有关这个法则的各种哲学问题，教导我们从根本上了解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如何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由此可见这个著作的重要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出版，对于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极宝贵的文献。

抗日战争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的进攻也是可以击退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很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否能正确运用历史教训。虽然目前的情况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了，但抗日时期的经验却是值得吸取的。当前还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内还须要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虽然目前的统一战线

与抗战时期不同，在目前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已经没有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只有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仍然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他的积极性，有他一定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又有他消极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用共同纲领去改造他们，要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理合法地去经营业务。在统一战线中，假如我们忘记了与资产阶级既要联合又要有区别、有斗争；忘记了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一定纲领的基础之上；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忘记了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予以批判；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指导当前的斗争，“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保卫祖国与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因此，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同志都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正确运用历史经验，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加强无产阶级原则性的锻炼，只有这样，才能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完成当前斗争的任务。

(原载于1952年4月10日《南方日报》)

理论如何联系实际

——重读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体会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著名的基本著作之一。正像其他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同志一样，在一九四二年我党进行伟大的整风运动时，我对这个著作已读过多次了。但是，当今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我又重新阅读这个历史文献时，不但感到无限亲切，有无限教育意义，而且每重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新的鞭策和新的鼓舞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存在党内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即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也就是理论与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将两种互相对立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反复地、深刻而又通俗地加以说明以后，号召全党要将主观主义当作当前的大敌来打倒。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二〇页）

毛泽东同志还向全党提出三点号召：（一）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二）要有组织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三）改造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的教育方法，“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见同上书八二三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著作以及其他关于整风运动的著作中，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即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点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分歧），对错误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从而维护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整风运动以来，已经过十年了。这十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获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获得了伟大胜利的十年。随着革命事业的开展，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毛泽东同志不断教育与培养下，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政治理论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实际斗争经验也丰富得多了。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各种任务的繁重，我们党内多数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对于各种实际经验尚没有很好总结，没有把它们提高到理论的水平。因此，对于克服经验主义，不但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在某些同志中反而发展了。比方，我们有些同志，从农村转到城市，转到工矿企业中，而仍然盲目地搬用农村的工作方法，而且是搬用不妥当的工作方法，如单打一的或一揽子的领导方法，对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复杂性、科学性、社会性认识不足，不知道严密的科学分工与各种工作的互相配合，不会严格的科学管理等等，这就是经验主义的表现。当然也有一些同志，因为注意学习理论，学习科学知识，学习先进经验，深入研究情况，走群众路线，因而把企业

管理得很好，创造出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就总的情况来说，经验主义的倾向还是普遍而严重的。这些情况对于现在和今后由农村转到城市、转到工矿的大量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些同志，只有注意从理论水平和科学知识上提高，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成功地运用到当前的实践中来，才能完成当前国家的建设任务。此外，有些在机关里工作的同志，虽然工作是积极的，想把工作做好的；但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缺乏对情况深入了解，缺乏检查与总结工作，有些计划、指示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比方，以文教工作为例，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很大发展，这是我们祖国伟大成就之一；但缺点在于在发展中缺乏计划性，有些部门，如中学和小学有盲目发展和重量不重质的倾向，这是与某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在下级机关则普遍存在命令主义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从思想范畴来说，也是属于主观主义的。这些情况都说明：虽然我们全党的理论政治水平比十年前是提高得多了，但在干部中还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思想水平上还大大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在理论战线上也仍然大大落后于中国革命的实践。

自从我们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以来，我们的学习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干部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但这种学习高潮必须巩固，学习制度必须坚持，只有加强学习，联系实际，才能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在这里，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当然，今天的情况，与十年前是大不相同了。我们在学习上具备更有利的条件了。第一、我们有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静止地孤立地单纯地为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不容易重复了。相

反，今天的情况是没有认真读书，没有弄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满足于搬用局部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倒是较普遍地存在；但是这种倾向，经过不断纠正，已经逐渐克服了。第二、领导同志都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了经验去学习理论，用实际经验去领会理论，就会体会得更深刻；不过有些有经验的同志现在还没有做到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因而还没有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水平。第三、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一套可行的学习制度，这就是首长带头学习、领导学习；保证学习时间不受侵犯等制度，有了这些制度，对于坚持学习是有利的。然而由坚持制度走到自觉自动的学习，养成学习理论的习惯，在今天仍然是许多同志，特别是农村工作同志所需要大大努力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搞好我们的学习，用以克服经验主义与官僚主义。

目前，我们在学习上，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呢？

根据中南区情况，在一部分同志中关于学习态度问题，学习方法问题，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体会和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第一、我认为首先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才能进一步达到克服经验主义。有些同志有急于求成的思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不耐心精读文件，不认真自学，开起会来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二）对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艰苦性认识不足，缺乏长期打算，总想现买现卖，今天学了几小时就想要在明天全部用到工作上，或者想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全部学完一切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三）以为不经过深刻研究就能够很快很容易地发现规律性。这些想法，本身就是不合客观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把理论与

实际的关系比喻作“箭”与“的”的关系，那么，要想当个熟练的射手，也要经过苦练过程，如果要想掌握马列主义之箭，准确地射中中国革命之的，要想做一个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那就更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我们既要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学习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同时也要反对离开文件去“联系实际”，这实质上仍然是实际与理论脱离的经验主义倾向；而且后一种倾向是我们今天更要着重克服的。我们要克服经验主义，必须首先克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提倡认真学习理论，认真读书，毛泽东同志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端发生的东西。”（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四一页）那些犯有急性病的、不肯认真读书的同志还要记住马克思这几句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一卷法文译本之序与跋）

第二、要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还必须首先解决联系什么与如何联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四二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但是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我

们在进行学习时又从何联系起呢？有些同志乱联系一通，得不到结果，因而感到苦闷。这里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认识发展的规律；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运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而这个指导又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因为共产党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首先就应该与党的方针、政策相联系。只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政策，掌握政策，才能做好工作，然后才能谈得到理论性的创造。在这里，我试把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说一说。“理论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经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理论既是综合经验，就不是一种简单经验，而是根据许多经验提炼而成的科学道理，而且也不仅是一种结论、公式或科学法则，而是各种结论、公式和科学法则的系统化，是各种客观过程有系统的反映；政策则是以理论为根据，同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而规定的。我们既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当前党的方针、政策、计划相区别，同时又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科学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而法令是依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意即由我们规定的）。他又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与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计划又必须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页及第六页至第七页）。斯大林又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与经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经济法则来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见同上

书六五页) 斯大林这些论点对于我们了解科学法则与政策的关系, 对于我们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问题, 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我们根据斯大林的启示, 可以理解, 政策的正确与否, 要看它是否合乎客观法则的要求, 而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依靠对科学法则的了解, 依靠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还依靠实践的检验, 才能衡量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因此, 我们要深刻认识我们的政策, 不但要研究情况, 也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法则和有关原理。只研究政策, 不研究理论, 我们就不能了解政策的理论根据, 不能有远见, 也不能把我们自己提高一步。还是斯大林的话说得好: “因为, 理论, 而且只有理论, 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 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 使它能了解四周事变底内在联系, 因为, 理论, 而且只有理论, 才使实践不仅能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而且能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莫斯科版, 三六页) 但是, 反过来, 如果只研究理论, 对党的政策指示反而不重视, 不感兴趣, 则会脱离实际, 变成书呆子、教条主义者。我以为了解这一点, 对于一个革命同志, 特别是领导干部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首先联系什么和如何联系的问题, 也有了进一步解决的方向了。当然不是说, 除了政策就没有可以联系的,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 但政策问题对于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革命同志则是首要的。

第三、要把理论联系实际搞得好些, 我们还要找榜样, 找导师, 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典范。只有很好的研究它, 我们才可以逐渐体会毛泽东同志

是如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我们在学习中，克服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解决了首先联系什么与如何联系的问题，又找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典范，认定了学习的方向，我们还要在实际工作中来锻炼自己。我们在工作中不应该盲目地工作，而应该有意识地、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说明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不断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总结经验，这样就一定会逐渐把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些。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名著《实践论》中告诉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九五页）这就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努力方向。

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幸福的，责任是艰巨的，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调查研究，关心人民利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担负起新时代的任务，才能符合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以满腔热情来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祝我们人民的文化生活和我们的思想工作大大提高一步，前进一步。！

（1953年4月10日）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三十周年而作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名的科学著作是在1926年3月发表的，到现在刚好三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这篇著作，正是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当时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在党内外都还不够明确，都还有很大的争论。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

首先，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陈独秀曾说过：“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陈独秀把工人阶级看作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是“很幼稚”的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既然如此，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以

上引句，均见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毛泽东同志直接反对了这些谬论，他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①毛泽东同志观察中国革命问题，一开始就是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看，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看清楚了在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尖锐对立的形势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那么，中国民主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②根据什么来确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

①注①——⑦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人都不如他们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③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分析，是与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看法根本对立的，而且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在这篇著作中，明确地解决了革命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白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既然确认这个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那么，这个革命的性质问题，与革命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看，实质上已经解决了。

第二，它解决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既看不起工人，也看不起农民，他认为农民的特点是散漫、保守、落后，革命性不强；“左”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又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寻革命的力量。毛泽东同志与他们相反，他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要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有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即必须要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个原理，并且分析了中国的具体情况，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极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左翼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其中最主要的朋友是农民。他说：“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④毛泽东同志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半自耕农和贫农的经济地位，认为他们富有革命性或“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这样，这篇著作完全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革命同盟军的问题。

第三、它还解决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与地主阶级都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⑤也就是说，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谬论，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矛盾态度，并且预见到这个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潮时期将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⑥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估计，在以后的事变中都证明是正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既然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因此，我们就应该与他们联合，但又要提防他们扰乱我们的阵线，就必须与他们作斗争。这里可以看见，在这篇著作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已经明确地解决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最复杂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这篇早期的科学著作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在领导机关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又占了统治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不能为他们所接受，使革命遭受了失败；但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仍然不失为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三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在每个革命时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熟练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阶级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因而能够解决了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指出正确的方向，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因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革命阶段的斗争经验，完全掌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规律（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七三页至五七六页）。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当前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这是又一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范例。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中农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特别分析了占农村人口70%的中农这个阶层，根据中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两部分，而把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贫农在一起列为依靠的力量。这就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如何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有这些阶级分析的范例，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读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他有关文献之后，除作了以上的介绍外，还有什么体会呢？我觉得还有如下几点体会可以谈一谈：

第一、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离开了这个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这次重

读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并联系其他有关文献一起来阅读，更加感到阶级分析这个方法的重要。为什么有不少同志往往在革命的转变关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毛泽东同志却能指出正确的方向呢？原因之一，就由于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有些同志则不善于运用这个方法。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认真了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能认真了解应该依靠谁、应该联合谁、应当反对谁，这样就不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开头就说清楚了。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⑦而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就必须进行阶级分析。

第二。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既不能像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样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自己另讲一套；也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生搬硬套；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时，他首先是根据列宁的原理。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还必须孤立自由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把这个原理与中国

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孤立排斥，而是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又如对中农问题，如前所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也是运用了列宁的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的原理，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新局势，分析了中农的经济地位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应该把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同贫农一起列为依靠的力量，这样就解决了在合作化运动中应该依靠谁和联合谁的问题。这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范例。

第三、要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必须要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必须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有关“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丰富和可靠的材料。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教导说：“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〇九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是把进行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方法完全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教导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调查就谈不到正确的分析。调查必须是典型调查，必须用正确观点进行分析。调查的着眼点不同，分析的方法不同，同样一个问题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第四、要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还必须针对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左”右倾观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就是在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有力地批驳了“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坚持了正确的观点。“争论产生真理”，这是希腊的名言。正确结论往往是经过争论引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与各种错误理论斗争中生长、发展和取得胜利的。

最后，我认为，阶级分析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认识过程，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过程。因此，要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认识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进行了如此深刻的分析，三十年来，又通过无数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结果，对于这些阶级完全摸清摸透，不但熟知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而且也能科学地预见到他们的将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每遇革命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都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主流，用有根据有说服力的论点，驳斥各种错误观点，纠正各种错误偏向，使革命事业继续前进。

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阶级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学习他的领导方法，使得我们的事业进展得又快又多又好，而不是又慢又少又差。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很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原著，加强理论学习，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分析能力，提高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能力，除此不能有别的捷径。

(原载于1956年3月3日《长江日报》)

学习《实践论》，克服经验主义

一

在华南一年多的学习运动中，我们曾经发现两种偏向，这是我们经常要注意改正的，也是学习《实践论》时必须注意克服的。这两种偏向：一种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联系自己的思想，不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这种情况在新干部中较为普遍。例如前一个时期，广州的省市机关干部进行土地改革学习，开始时，有许多新同志读了不少关于土地改革的条文，但只是在条文中兜圈子，或只关心自己家里能分几亩地，而没有考虑如何拥护土地改革，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以致碰到实际问题就站不稳立场。后来总学委重新作了深入动员，号召学习土地改革八项纪律，指出土地改革学习首先必须解决立场问题，之后，这个学习就有了转变，许多机关，运用典型教育，展开讨论，结果就解决了一些思想、立场问题。这一次土地改革学习，前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后一个阶段才比较地联系实际。加里宁在《高级学校内怎样教授马列主义基础》（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指出了两种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方法：一种是创造的方法，另一种是抽象的方法。创造的方法也就是联系实际的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这是最能引人入胜的；抽象的方法就是光念条文，就是用指头指着：“从这儿念到那儿”，这种方法，无论在教育工作或在宣传工作中效果都是很差的。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理论政策，必须注意克服教条主义的偏向。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偏向，在某种意义上，在某些同志中，更要注意克服的偏向：这就是不耐心钻研文件，对学习理论缺乏决心与恒心，缺乏刻苦精神，幻想一步登天，开会不作准备，到会光带耳朵，连文件都没有弄通，就忙于“联系实际”，或凭一知半解来联系，结果，因为没有掌握理论武器，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弄到牛头不对马嘴，这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倾向。前面引用了加里宁的话，这些话当然值得我们记取，特别是当教员的人；但我们要了解，加里宁的话是对苏联高级党校的学生与教授说的；在我们这里，情况不一样，我们的同志，对马列主义书籍一般说是念的太少，所以我们必须提倡挤时间读马列主义的书，提倡刻苦用功，在读懂了文件之后，再用文件的精神来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得好。

二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那么，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发表《实践论》，为着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这篇文章，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是为了迎接历史新时期给我们党的任务，使我们党内有思想准备，提高干部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他当时抓住党内思想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来源，就是在认识上主观与客观不一致，也就是因为有主观主义。所以毛主席抓着这个最本质问题并光辉地加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干部的思想水平就不能提高，工作就会犯错误。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毛主席当时着重揭露的是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所以题为“实践论”。因为在我们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轻视中国革命自身的经验，并以错误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实践论》的发表，廓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流毒。1942年我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了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普遍提高了全党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与党的纪律性，相当地克服了曾经统治过我党而当时还残存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错误的作风。自整风运动以后，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已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而对于经验主义则还认识不足或克服不够，因此，目前反对经验主义，应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华南，由于过去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许多同志不但没有经过有系统的理论学习，而且也缺少老解放区多方面的经验，在解放后也没有认真的进行学习，所以对经验主义尤应注意克服。现在在座的同志们，多数是做过一些实际工作，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应该认识，这些经验多半是片断的，如何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则还没有解决。因此，今天提出着重克服经验主义是必要的。当然，毛主席《实践论》在目前重新发表，不但对于党内同志，而且对于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思想建设，对于帮助他们

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过我今天要谈的主要是如何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

三

怎样克服经验主义呢？

一、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经验主义及其危害性：有的同志认为经验主义比教条主义好些，这是不对的。经验主义者满足于局部经验，把局部经验认为普遍真理，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经验。经验主义者对待自己的经验，正如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有三个瞎子，一个摸着象耳朵的说象的形状像一把扇子，一个摸着象腿的说象是柱子的样子，一个摸着象的肚子的说象是一堵墙壁，如果三个瞎子开个会，把三方面的认识分析综合一下，也许可以了解象的全貌，可是他们却各执己见，都把自己局部的感性认识认为象的全貌，就变成笑话了。本来直接的实践经验是宝贵的，但如果用错误的态度来对待，就很危险。有些干部自以为有些工作经验就骄傲自满、盲目自负，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进行工作，这样是不能做好工作的。广东解放一年多来，因为执行了中央、中南和分局的正确政策，获得了很大成绩；但许多地区群众没有很好发动，原因虽多，这与经验主义的领导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同志容易满足于现状而缺乏远见，他们往往有单纯任务观点，而对于从思想上发动群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对旧的问题虽有些经验，但面对新的问题，则往往缺乏理解与办法。这些同志，因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缺乏理论的指导，就不能区别经验的好坏、合时与不合时，往往被旧的经验所束缚，固守成规，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如对抗美援朝运动，

开始时有些地方干部认识这个运动是“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大城市的事情，和我们农村工作关系不大。”他们觉得光搞中心任务已忙不了，还搞什么抗美援朝？他们不了解抗美援朝运动不只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且可以推动我们的各种工作，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地方，群众和干部的工作热情会大大提高，对其他任务不但不妨碍，反而会有帮助。经验主义者为局部狭小的经验所限制，看不到全面，不能有全面的观点，在做工作时，只有“单打一”的思想，而不善于既抓住工作中心同时又把各种工作结合起来，他们往往提起“结合”就头痛。这些干部，因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往往藉口工作忙，不重视研究政策文件，不重视学习理论。有的甚至说：“老子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样做了工作？”他们即使勉强进行学习，也不耐心钻研文件，开会不作准备，开起会来乱谈一阵，不求达到思想的统一，会议没有结论，甚至不作记录，开完会后各人只根据自己的了解去工作，这样就很容易发生偏差。还有的同志藉口说是“从实际出发”，把“实际”与党的政策对立起来，因此政策很难贯彻下去，在执行政策中，往往左右摇摆，如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开始有些干部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上级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他们就说，要放手，就要放心，不要再来纠偏！经验主义者因为缺乏理论的指导，就不能了解运动的规律，即使有一些经验，也不能总结出来。而他们做出来的“总结”，又往往是老一套的几条公式，每一次都说：“成绩是主要的，但还有缺点。”而不能按照具体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样下去，工作便很难提高。因此，经验主义者又很容易犯官僚主义的毛病，因为他们思想、政策理论水平低，又不用脑筋，不能很好的思考问题，结果只有靠老一套的方

法发号施令。毛主席指出经验主义者是庸俗的事务家，“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这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注意的。由此可见，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不好的，都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决不能以为经验主义比教条主义好一点。

二、要检查与解决阶级立场问题。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决不能够有超阶级的人，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生活，因而就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及有其对问题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思想方法。要克服经验主义，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要解决阶级立场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层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尾巴进党来。”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社会的产物，从小资产阶级生产的保守方面，就特别表现为教条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生产的分散方面，就特别表现为经验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因此，要克服经验主义，必须认识经验主义的阶级根源，要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在我们华南党的组织内，不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而且还有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这些同志有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经历过各种考验，但还有一些尚未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年来就暴露了不少立场不稳的现象。因此，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必须解决阶级立场问题。非无产阶

级出身的同志，只有放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毛主席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因为党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如果有主观主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有关，当然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才能掌握毛主席战斗的思想武器。无论在党内或党外，无论对自己或别人，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立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主要是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批评立场不稳的现象，要检查是否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群众中，还要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要检查是否站稳人民的立场，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批评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

三、要反对主观片面性，注意调查研究。有同志问，我们如何才能不犯错误呢？毛主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比方中国革命和抗美援朝为什么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呢？就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掌握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规律，能够知彼知己，所以百战百胜。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抗美援朝的胜利，又进一步证明它的正确性。相反，美帝国主义者则是根据侵略者的主观愿望出发，这种愿望是不合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对中朝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对自己的侵略力量过于夸大，所以不能不失败。中国革命以至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情是这样，小的问题也是这样。指导一个村子的工作，如不了解这个村子的情况，又不懂得群众运动的规律，也一定搞不好。有些新干部下乡，最初与群众接触，除了

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有多少田地？”三句话以外，就没有第四句话，这自然会碰钉子。我们如何才能由没有经验到掌握工作的规律性呢？毛主席用很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与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同环境给以详细的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与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与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没有不跌跤子的。”毛主席举这个例子以及其他例子，说明了认识运动的过程，也批评了那些主观主义者。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得出教训：我们如果要在工作中不跌跤子，就不要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而必须在实践中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而不是凭感情来决定政策。叶剑英同志也常说：“不怕事前毫无研究，只怕当事毫不研究”，又说：“听别人的话，要用两个耳朵来听，听了这面，还要听那一面，否则就容易片面。”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我们要做好一件小小的工作，都需要有调查研究，都不能只靠感想，或只听一面之词，就随便做结论；如果要进行一件大工作，就更需要有调查统计，而且需要有典型调查与全面统计相结合。

农村工作干部很怕填表格，有些干部对上级发下表格甚至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如果上级不照顾下级情况，对鸡蛋大小都要来个调查，固然是不对的；但上级要决定政策，没有必要的调查统计也是不行的。毛主席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论理来。”

四、要学习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如果光有调查而没有研究，只有感性认识而无理性认识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感性的材料，往往是零碎的、片面的，有些是假象，如果不好好地分析，就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例如一枝竹竿插入水中，一看就是曲的，实际上是因为空气和水的密度不同而发生折光作用，而不是真曲了的。又如光的速度，是不能只用感性把握的；有些星球距离地球要以多少光年来计算，这就不是只靠眼睛去看就能认识，而必须依靠仪器、计算并且经过研究推理，才能了解。仅有感性，没有理性，很多问题都不能认识。感性认识不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旧小说中往往用“一见钟情”或“一见倾心”来描写一双男女的幸遇；这只是满足于感性认识，具有极大危险性，因为“一见”彼此决难有深刻的了解。要了解一个人的本质，按照我们的观点，如果不经过较长的时间，从其历史、思想、工作等各方面加以考察，就办不到。所以“一见倾心”的遭遇，往往是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终结。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尚非分析研究不可，要了解一个社会问题，更不能只靠感性认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整整花了四十年，他从商品分析开始，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研究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正如他自己说的，不能藉助于显微镜和化学反应药，而必须靠抽象力。毛主席说：“商品这个东西，几百万人，天

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是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这样看，那样看，不像我们读联共党史那样马虎从事。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做了分析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论来。”（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由此可见对问题不能单看现象，单靠感性，而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了解一事物，在得到各种材料之后，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要对现象的各方面，各个特点，各个部分加以认识，经过思考然后加以综合，这样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反映出事物的规律性。毛主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毛主席在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中，都是使用了这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比方毛主席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对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农民问题作了明确的分析。这种较早期的著作就已经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其后许多重要著作，如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毛主席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在战争中这一切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对抗日战争作了科学的预见，指出这个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而获得胜利。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个科学预见的正确性。毛主席其他许多著名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都是运用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对于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学习科学分析的方法，要在工作中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要克服经验主义，最中心的环节就是要认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开展一个系统的理论学习运动，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许多重要著作，学习中央的政策和老区的经验。这个学习运动，在华南不能因为工作紧张，就认为可以例外，我们不能提倡“例外论”或“特殊论”，因为工作现在忙，将来可能还要更忙，我们不能因此永远不学习！其次要做好总结工作：实践中得出经验，经验必须经过总结，才能由感性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前面已说过，毛主席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就是十年国内战争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的思想准备。在这一著作中，毛主席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条件，分析了极端复杂的问题，说明了革命与革命战争由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毛主席这种总结工作经验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五、要学习正确的知行统一观。我们在实践中得到认识，有了认识，还要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总结以及我们的计划方案是否正确，也只有回到实践中，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经过总结的经验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完全正确，还可能因情况变化而不适用了，必须要在实践中继续考验，并继续发展。因此我们的办法就是要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并且要“做到老，学到老”。我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一步步提高。同时，我们做和学，都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做去学，而是与全体劳动

人民一齐做，一齐学。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践，是社会实践。我们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是靠正确地集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实践而来的，我们又靠这个理论和政策去指导工作。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把整个认识过程加以概括，也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的结语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我们要克服经验主义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必须要了解这样正确的知行统一观。我们了解了这样正确的知行关系，我们就不会把片断的经验认作绝对真理，更不会因做好一段工作就骄傲自满起来，我们应随着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而永远努力前进。

过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正确的解决过知行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关于知行问题的唯心论的学说，对于某些人可能是有影响的，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如明朝的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说，是怎样一回事呢？他是把知行混同起来，他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与辩证唯物论认为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相反，他的学说是唯心的。关于王阳明，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王阳明有一天和学生出外游玩，学生指岩石中的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这个学生知道深山中的花树的自开自落是独立于人们主观之外的，他提出问题，是正常的唯物论见解，但王阳明却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见王阳明：《传习录》下，黄省

曾录)①王阳明用唯心论的见解，把问题讲糊涂了。如果说：我不来看花时，花就不存在，只有当我来看花时，花才存在于我的心中；那么，岂不是可以说：当我睡着时，整个世界也不存在？当儿子还不知道认识自己的父母时，父母也就不存在？唯心论者的主张是完全违反常识的。中国过去没有一个人正确的解决了知行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正确的解决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实践论》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发展得更完全，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一个极伟大的贡献。以前我们学习《实践论》，主要反对了教条主义；现在我们学习《实践论》则应认真克服经验主义。

四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经验的同志容易犯教条主义，这些同志学习《实践论》还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并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而只有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的则易犯经验主义，这些同志则应着重克服经验主义。但这不是绝对的，工农干部也会犯教条主义，甚至容易做教条主义的俘虏；知识分子也会犯经验主义。而且同一个干部也会有时犯这种偏向，有时犯那种偏向。因此基本问题在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于用正确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于在实践中学习它运用它，把学与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

① 王阳明这段话是杜国庠同志替我在《王阳明全集》中找出来的，这里应感谢杜国庠同志对我的帮助。

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原载于 1951 年 7 月 4 日《南方日报》)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在他开始进行理论活动时，就写下了“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那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是指过去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师黑格尔等在内。过去的哲学家，虽然在理论上的某些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总的来说，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已，或者用唯心论，或者用旧唯物论等等。马克思第一次指出，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有了这个世界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蓬勃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革命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世界观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指导和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又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首先是列宁运用这个世界观组织和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世界观。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运用这个世界观组织和领导了中国革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世界观。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世界观，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所写的大量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四篇重要哲学著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哲学概括，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世界观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两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不仅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也为我们具体地指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首先要深入社会实践。任何人如果脱离了实践，就决不会有正确的认识。

同时，认识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任何人如果不懂得认识过程的这种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善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样也是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什么需要深入蹲点，调查研究；为什么需要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为什么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发展真理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论述，对于革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哲学著作中，着重地创造性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这一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也即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问题也是属于认识论范围内的，因为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也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和研究唯物辩证法，同样是为了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贡献，首先就在于他把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贯彻到底，强调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即事物一分为二的矛盾规律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根本的普遍的规律。同时，他又着重阐明了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善于区别对立统一规律在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特殊形态，对于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分析和解决矛盾的时候，要善于在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要善于通过矛盾的斗争，促进矛盾的转化。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人类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谁要否认并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谁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观察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学会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样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之，毛泽东同志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是非常全面、深刻的，这些论述充满了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根据这些论述，我们不仅可以同那种根本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或通过夸大矛盾的特殊性而否认矛盾的普遍性的经验主义划清界限；而且可以同那种把矛盾的普遍性看成是抽象的绝对，从而否认了矛盾的特殊性的教条主义划清界限。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对于革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同样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四篇哲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篇哲学著作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其他著作之中。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关于阶级和阶级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斗争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关于农民问题和人民战争的学说，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关于世界革命的学说，等等，事实上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和具体体现。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所有这些内容，构成了系统的、完整的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考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百战百胜的。我们只有用这个革命的世界观武装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少犯或不犯严重的错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现在，一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一切要革命的人，都把树立这个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在我国内，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早已形成风气，学习毛泽东同志革命世界观的巨大成果，正在不断显现出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革命的世界观是革命的科学，要真正把它学到手是需要很好努力的。今天，尽管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著作，并且在学习和运用中取得了很多成果，满怀信心地不断前进；可是也有一些人还不善于学习，特别不善于运用。在他们那里，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指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作者）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①

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承认，而在实际上又不能应用呢？当然有各种原因，看来，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不论什么人，要树立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能够把它应用到实际中去，应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用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去，不仅要经过艰苦的学习，而且要在实际斗争中经过长期的锻炼，要改造旧思想，要与旧的世界观决裂。不经过这种锻炼和改造，旧的思想、旧的世界观仍然会“牢固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就树立不起来。所以，口头上承认容易，实际上运用困难，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搞书本的人，埋头于读书、研究、教学，书本的原理懂得一些，但往往容易脱离实际，而书本一经与实际相脱节，就容易把活的哲学变成死的哲学。第三，做实际工作的人，读书的时间少，特别对于哲学，有人认为高不可攀，害怕去碰它；对于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不习惯于联系哲学原理作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就难以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哲学如果不能用来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也就不能为他们所熟悉和应用，也就不能做到学用结合了。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到手，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学到手，真正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再三思索“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一真理，不仅要熟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著，而且应抽出时间，走出书斋、研究室和课堂，参加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同劳动人民结合，同劳动人民一起学习，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各种经验，去向群众作通俗的理论讲解，去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这样，比起去钻那些名词、概念，搞烦琐哲学，写艰涩难懂的长篇大论的东西，无论对当前斗争的作用方面，或者在治学的真工夫方面，在个人思想改造方面，其意义与效果都要大得多了。最近时期，全国各地有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下乡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后，都深深感到：参加实际斗争，不仅对思想改造是不可少的，而且对提

高专业研究水平也是绝对必需的。有的同志还说：“下乡三个月，胜读十年书。”这种体会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则要挤出时间，认真读书，读马恩列斯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从里面找到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并且经常通过总结工作，反复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有关篇章，联系工作中的许多感受来理解理论原则，又运用理论于实际工作中，求得熟练实际联系理论、理论联系实际的路数，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既深入了理论，又提高了实际经验，就把哲学活生生地学到、也活生生地用上了。

应当看到，有些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能由于主观努力不够，但也可能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比如旧社会的学校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受过这种学校教育熏陶的人，往往只懂得一些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实际知识；同时，长期参与革命斗争的人，由于没有读书时间或不善于挤出时间读书，又往往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但又缺乏理论知识。要根本改变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倾向，除了要彻底改进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学风，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对于新的一代的教育。教书的同志要改善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启发学生关怀生动的现实斗争，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把新的一代培养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知识的富有创造性的革命接班人。当学生的也要改进学习方法，不要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死读书的书呆子；必须善于联系现实生活，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思考问题。只有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好学风才能在我们后一代巩固地树立起来。

无论搞理论工作的或是做实际工作的，不论是教师或是学生，学习哲学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首先要立志做一个革命

者，使哲学为生活实践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马克思是一个大学者、大科学家，在伦敦图书馆就钻研了四十年，写出了像《资本论》那样伟大的著作，他还精通许多科学知识，但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读书、著作、写《资本论》都是为着革命，而不是为着其他目的。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书本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有害。所以学习哲学与革命是分不开的。要革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树立辩证唯物论的革命的世界观，而只有树立起这个世界观，并经常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这个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革命的思想才能更巩固，才谈得到彻底革命化，在革命斗争中才能更有办法，才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我们要为革命而学，也要为革命而用。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我们的哲学武器。理论工作者要很好地去运用，搞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也都要很好地注意运用。例如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如果不懂得区别两类矛盾，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就会造成很坏的后果。又例如搞文艺创作的，如果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即使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认识生活的深度也会受到限制，因而就不能抓住反映时代前进中的主要的东西，进行艺术概括。过去一个时期，有些文艺界的同志们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以为人民内部矛盾难写，而且容易犯错误。这些同志所缺少的，首先就是革命的哲学思想。经过大学毛泽东著作以后，有不少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无论写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都写得比较好，不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有些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在哲学的运用上也是成功的。如果不学好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怎么能取得这种成功呢？

有人问，主张学活的哲学，用活的哲学，是不是古典的东西就不应钻研了？当然不是。恩格斯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把古典哲学继承过来的呢？他们不是厚古薄今，不是钻在旧纸堆中出不来。他们原来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们却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使它两脚着地。恩格斯还指出，“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哲学家都大”。^②他们既承认了费尔巴哈的功绩，又批判了他的唯物论的不彻底性，以及他的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上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但不是照搬，而是进行了一次哲学上的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哲学就是这样继承的，在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革命的导师们也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现在是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民族民主革命空前高涨的时代，是真正的狂风暴雨的时代，其规模和声势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样伟大革命的时代，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并运用这个哲学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运用这个哲学来破旧创新，写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哲学篇章，无疑是一切革命战士极为重要的任务。

写于 1964 年 2 月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53 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12 页。

提倡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形而上学，是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特点在于：它不懂得事物的相互联系，孤立地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静止地看问题；不懂得事物多方面的错综关系，片面地看问题。形而上学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现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在各地成为风气。这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显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世界观，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也需要一个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短时期内就可以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就可以完全免除形而上学给实际工作带来的危害。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事实上还是今后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际问题。很多事实表明，有些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而且也懂得

一些辩证法的道理，可是一到实际工作中就不一定管用了，他们的行动在很多场合下却仍然受形而上学的支配。毛主席曾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我们对待唯物辩证法，就要采取这种态度，不仅弄通它的道理，而且学会具体运用。只懂得一些道理，不会运用，实际上还是没有把这门学问真正地学到手。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应用唯物辩证法，随时随地辩证地思考问题，却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因为，从理论到实际，或者从实际到理论，都是认识过程中的质的飞跃。要很好地实现这种认识的飞跃，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人们的阶级立场、思想意识、理论修养、实际经验、思想作风、客观环境以及对思想改造所采取的态度等等，莫不对人们辩证地思考问题，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如果不下一番苦工夫，不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锻炼，那末随时都有可能不知不觉中走进形而上学的歧途，而不能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学产生的历史谈起。大家知道，在古代当人们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时候，一般都能粗略地看到事物的运动、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错综关系，所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分门别类地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尽管成果巨大，可是却也养成了人们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的习惯。而剥削阶级则利用了人们认识上的这种局限性，使之形成系统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可见，形而上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阶级的根源，也有认识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为了克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服和防止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我们首先就要有正确的立场，坚决摆脱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改进自己的认识方法，尽量克服个人在认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局限性。

对于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认识过程中，一般都具有较高的阶级警惕性，但是对于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性，却常常重视得不够。其实，认识的局限性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们观察问题总是免不了要受到自己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因此，能不能意识到这种局限性，并努力设法克服这种局限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革命者的思想状况，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辩证地思考问题。

举例来说，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他们绝大多数是想把工作做好的。他们由于平时接触面广，看得多、听得多，对于当前全国的大好形势，一般也都能有所认识。可是也有些人因为没有深入实际，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又可能了解不够，体会不深。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很容易使认识产生片面性。深入蹲点，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克服这种片面性的好办法。然而蹲点也有蹲点局限性。长期地蹲在一个点上，耳听眼见的都是这个点上的具体问题。如果这个点上的工作不怎么好，问题比较多，那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全面的大好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所以蹲在点上，也有可能使认识产生另一方面的片面性。所谓“走路时看不见蚂蚁，蹲下来到处都是蚂蚁”，正是针对这两种片面性所作的生动写照。

由此看来，不论在面上还是在点上，事实上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为了免除形而上学的危害，我们不仅应当像唯物辩证法教导的那样，观察问题注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决不使自己的认识

绝对化；而且应当坚持点面结合的方法，个别与一般结合的方法，力求对客观世界获得较为完整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因为局限于一点而产生种种片面性的弊病。

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很好地掌握它决不能满足于书本的知识，而必须到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因此，深入实际、蹲点调查、解剖麻雀，总是更有利于人们辩证思考问题的。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们也决不能认为，有了实际就可以不要理论。事情总是这样，当一个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常常容易抽象地看待理论，凭空地考虑问题；而一旦深入到实际中去，又容易被现象所蒙蔽，停留在表面打圈圈，忘掉理论的指导作用。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是指蹲在点上，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同时也是指在实际工作中，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现象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大量的现象材料，是人们辩证思考问题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事物的现象，不善于通过理论分析认识事物的本质，那又会离开辩证法，导致形而上学。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问题，必然是罗列材料，根本抓不住要领；处理问题，免不了小手小脚，专门在琐碎的事务工作中兜圈子。有人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烦琐哲学，实在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要害。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对烦琐哲学的问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所谓烦琐哲学，一般是指理论脱离实际，专门在概念上兜圈子，处处钻牛角尖，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讲话和写文章罗里罗苏，长篇大论，空话连篇，但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岂只是书斋里会产生烦琐哲学，实际工作离开了理论的指导，同样会产生烦琐哲学。试想，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抓材料，不抓观点，工作根本不能抓住要领，搞的实际是一大堆无效

劳动，这不是烦琐哲学又是什么呢？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应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实际工作者来说，尤其应当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现象，统率材料，以便从中把握本质，抓住要领，学会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这些，我自己也还没有学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把工作做得更好。

过去，全日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学中，也有不少烦琐哲学：课程很多，学时很长，而教学内容又很庞杂。经过教学改革，有的学校课程精减了，学时缩短了，教学内容也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这样一来，不仅突出了重点，使学生能够学到真正需要学的东西；而且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使他们可以参加实际锻炼。也就是说，反掉了形而上学、烦琐哲学，教学质量反而大大提高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有多么重要。当然，反对烦琐哲学，决不是提倡工作简单化。刚刚相反，要把握事物的本质，抓住问题的要领，必须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而决不是工作简单化或粗枝大叶所能办到的。

人的认识总是有继承性的，过去的认识往往可以成为将来认识的先导。我们所以非常重视学习理论、总结经验，原因就在于理论、经验这些过去认识的成果，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问题是必要的、有帮助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的认识、过去的经验。可是对于过去的认识如果缺乏正确态度，那么它又会反过来束缚住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辩证地思考问题。我们平常说的，带着框框看问题，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是对于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可是人们如果带上了框框，那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具体分析

事物，而是要求事物适应自己的框框。上级指示本来是对的，然而他却不去领会其精神实质，到处生搬硬套，强迫执行。外地经验本来是好的，可是他也不去考虑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人家怎么做，他也依样画葫芦。人对事的看法也是这样，人说这个同志很好，他就看不见人家的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做优点来表扬；人说这个同志有毛病，他又把人家看得一无是处，优点也是缺点。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可是有了框框这种先入为主的東西，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方法无形中就会被丢掉，形而上学方法就会暗中发生作用。

可见，对于理论、经验、上级指示、群众意见，必须采取正确态度，处处注意从实际出发，善于学习和运用。理论也罢，经验也罢，一切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都只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束缚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框框。我们应当提倡思想解放，学会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运用理论，学习经验，贯彻指示，分析问题，首先应当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为依据，实事求是，具体对待。把理论、经验等当作框框，作茧自缚，不仅会导致形而上学，而且还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

思想中的框框，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些人往往还可能夹杂着个人主义成分，这样成见就会更深。有了这种成见，既不能全面地看问题，也很难全面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有些人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只愿听正面意见，不愿听反面意见呢？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有个人成见，他们思想中有个框框，他处处要求别人的意见适应他的框框，对自己有利的、合乎自己框框的就听，否则就不听。所以为了打破框框，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坏作风，大力提倡民主的好作风。

提倡民主作风，遇事集思广益，这是实行正确领导，避免认识片面性的重要方法。任何个人即使没有个人主义，也会有自己的局限性，因而要想依靠个人的力量毫无遗漏地反映事物的全貌，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发扬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的意见，才能获得较为符合客观真理的完善的认识。然而群众的意见总是多种多样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也有关于那一方面的。这些意见不仅可能同自己的意见发生矛盾，而且它们本身往往也包含着矛盾。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对人们正确地认识问题大有好处的。毛主席就曾说过：“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①这就说明，思想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它不仅不妨碍人们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相反却正是人们正确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必要条件。

缺乏民主作风的人，往往也缺乏辩证观点。他们把人的认识看成铁板一块，非常害怕思想矛盾。他们脑子里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因而就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殊不知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结果，恰恰导致了思想僵化，使认识变成一潭死水，根本得不到发展。所以，要想养成良好的民主作风，首先要辩证地看问题，不害怕矛盾，不回避思想分歧，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敢于听，听得进，让别人把话讲完。当然，听取不同意见，不等于对这些意见统统采取盲从态度，承认矛盾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解决矛盾。所以要对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综合，在民主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4页。

基础上实现集中。领导一人说了算或听任大家随便说了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都是片面性的表现。

认识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揭示客观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客观真理去改造客观世界。我们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就是为了使人们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尽量防止和避免错误。可是谁也不能认为，学了唯物辩证法，就可以完全避免错误，反对形而上学，就是根本不准犯错误。由于客观事物的极端复杂以及人们认识所固有的种种局限性，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要想完全避免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新的没有经验的工作，更需要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完全避免表面性、片面性等认识上的错误，也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关键还在于对待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害怕错误，根本不准犯错误，这是不对的；对于错误听之任之，不愿坚决改正，这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努力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尽量防止和避免在认识过程中发生错误；而一旦发生了错误，则应该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正视错误，认真进行总结，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使错误变为正确。其实，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怕的不是发生错误，而是不善于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对人的认识本身，也要有辩证的观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是从这种辩证观点中引伸出来的必然结论。

人的认识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那就是揭示了客观真理。可是，即使对于正确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也不能把它看得过于绝对化。毛主席曾经说过：“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

理性。”^①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才能构成绝对真理。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在一定发展阶段所获得的正确认识绝对化，以为这就是最终地、彻底地、穷尽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也决不能把自己在一定发展阶段所完成的种种工作绝对化，以为这就是最终地、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切问题。如果采取这种绝对化的观点看待自己的认识和工作，那又会离开唯物辩证法，使原来正确的东西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错误。所以，辩证地看待自己的认识，不仅要求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要求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一步步深化和完善自己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开辟出一条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为了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时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端正阶级立场，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第二，提倡点面结合，切实防止认识的局限性；第三，凡事抓住要领，切实避免烦琐哲学；第四，注意具体分析，摆脱思想框框；第五，发扬民主作风，遇事与群众商量，但又决不偏听偏信；第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看问题。

目前，在全国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在进一步实现革命化。毫无疑问，在革命化的内容中，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革命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一步加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学习和实际锻炼。我们相信，随着广大干部和群众唯物辩证法思想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各项工作必然会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写于 1965 年 2 月

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①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五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著作的正确性，证明了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个重大的贡献。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要求用科学的阶级斗争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时代，因此，当他们用自己缔造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观察社会生活时，首先就论证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指出了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求得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看到了许多关于人民内部

①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五周年而作的。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页。

矛盾的论述，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谈到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劳动人民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城乡矛盾、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等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实践，还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领导俄国人民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尽管国内阶级斗争还很激烈，但是列宁已经考虑到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他在批评布哈林的时候，曾写下了这样的名言：“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灭，矛盾还会存在。”^①然而革命胜利后的繁重工作，使得列宁还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就与世长辞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和打败了法西斯的进攻。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也谈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如在《给契·同志的信》中，就指出不要把“结合外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同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混为一谈”。^②在《问题和答复》中，指出当时存在五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与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其余四个困难，都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困难，都可以用内部的力量来解决。可见，斯大林曾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注意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但是，正如《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建成后的长时期内，斯大林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因而，斯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的批评》，1920年。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大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很好地解决。

毛泽东同志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精华，并把它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于1957年写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长期以来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原则性和独创性相结合的典范。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迫使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①1927年党在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并在南方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后，就一直是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内部关系，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过严重的教训。1931年到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实行错误的路线：在党外，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敌人进行斗争，而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当作敌人加以反对；在党内，不是充分发扬民主，而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贯彻自己的错误主张，伤害坚持真理的同志，结果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直到1935年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才彻底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此后不久，党就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主张。对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了分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使他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党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见实践出理论，过去革命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全面论证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根据。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任务。1949年在我国大陆上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国内和国外还有阶级敌人，还存在敌我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虽然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但是，它们还不够完善，不够巩固，人民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又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对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总之，当时的现实生活迫切要求从理论上阐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阐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正是为了满足这一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是新历史时期的理论指南，是引导我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它不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重大问题，而且善于

在运用的过程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极其光辉的贡献。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的学说，为党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矛盾论》中所阐明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新的贡献。这个贡献，我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矛盾普遍性的学说；并把这一学说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去，从而解决了理论界长期存在的争论。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界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就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互相适应的方面而没有互相矛盾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旧社会矛盾的残余，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全体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完全一致，等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已根据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矛盾普遍存在的原理，进一步阐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学说，明确地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又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否认了一切”。^①这些话，把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已经讲得非常深刻和透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它，不正视它，工作必然会陷于被动地位；承认它，正视它，人们就可以主动地采取各种方法解决矛盾，使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日益巩固。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能不能将这个规律运用于一切方面，一切领域，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考验。毛泽东同志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原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并且具体地揭示了这些矛盾，这正表明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彻底性。这种理论上的彻底性，使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一切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区别，同一切“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相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犀利武器。

第二，毛泽东同志贯彻了矛盾特殊性的思想，指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肯定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一贯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他所著的《矛盾论》，其中大部分篇幅，就是用来论证这一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充分发挥了列宁提出的、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如何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具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矛盾之后，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些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情况，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①毛泽东同志特别着重地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要采取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所以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如果搞错了就要坚决地纠正过来。

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性所作的科学分析，对于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正确地地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确实掌握了矛盾的特殊性，然后才有可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无数事实表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根本不同于敌我矛盾，因此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时，我们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也应该具体分析，对政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3、444页。

学术、思想、工作等各个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千篇一律。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会犯错误，就因为他们不是把矛盾看成具体的，而是看成抽象的，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教条主义者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毛泽东同志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犀利武器。

第三，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方面互相联系的原理，进一步阐明了矛盾转化的学说，从而提醒我们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便创造条件使矛盾朝着有利的方面转化。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对立……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这一原理，对矛盾转化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矛盾转化的学说。毛泽东同志认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之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极端重要，首先，毛泽东同志揭示了不同矛盾的不同性质，但并不认为它们的性质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观察问题时，不致绝对化、凝固化。其次，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就主观方面讲，解决矛盾的方法，对于矛盾处理的得当不得当，就是一个重要条件。这就向我们表明了主观能动作用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我们在工作中能够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努力创造条件，以求把坏事变成好事，好事不要变成坏事。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理论上的贡献，当然不止这些，上面谈的，只是几个重要的方面，很可能有挂一漏万之处。

理论是服务于实践的，理论的贡献，最终要依靠实践来说明。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最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五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指导下，使我们澄清了许多混乱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逐步学会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从而大大巩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进一步调动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近几年来，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但是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仍然牢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毫不动摇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毛泽东同志著作理论威力的最生动的说明。

五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指导下，科学、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已经进一步繁荣起来。由于有了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科学、文艺界的自由讨论也逐步发展起来。所有这些也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五年来的实践，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的重要指针，凡是认真贯彻了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精神，工作就做得好，反之，工作就会遭受很大困难，受到很大损失。今后，为着做好工作，我们还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并且要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这一著作的精神。要做到这样，还有什么问题要注意呢？我认为，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每个阶级都要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剥削阶级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讲，但实际是这样做的；我们无产阶级公开宣称我们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并且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从旧社会来的，都不免带着许多旧思想、旧作风，我们要改造世界，首先就得很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自己武装起来。不然，如果用原来的旧思想去改造世界，就改造不好，就会在工作中犯错误。

改造世界观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什么关系呢？应该看到，学会区分两类社会矛盾，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矛盾是具体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有些矛盾是容易混淆的。有时弄错了，还不能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因此，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有唯物辩证的方法，而且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坚强的党性。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有些人是能够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改造思想，使主观能够符合或接近客观。但也有些人，常常是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知道接受教训的。比如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的联络部长吴志克，就是这样的人。吴志克是一位老干部，但由于相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把顽固派当作自己忠实的朋友，他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碰了钉子，但还不知道回头。直至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几乎连自己的脑袋也丢了，才算醒悟过来。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已为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所认识，我们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即使有错误也是比较容易纠正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善于学习，在学习中要认真联系实际，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才能深刻地体会毛泽东同志著作精神，才有可能很好地去掌握它、运用它。

所以，能不能很好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归根结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的改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方法的改造，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树立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二是思想意识的改造，主要是克服骄傲自满、个人主义，增强党性的锻炼。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要十分注意克服的。有些同志说：我已经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各种考验，难道我的世界观还有问题么？这个问题是自满不得的。哪怕是最老的同志，哪怕他也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只要骄傲自满起来，只要个人主义没有认真克服，就会忘记过去的教训，就会脱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会犯错误。这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记取这些教训。我们必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改造我们的世界观。

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反对独断专行。关于划分两类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正确处理国家政治生活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理。反过来，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即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又是我们必须贯彻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保证。前面提到，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同时，区分两类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样，在处理这种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同看法，会发生争论，这本身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处理这种矛盾，同样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监督，而不应该由少数人说了算。如果不发扬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就必然

要犯错误。

发扬民主的关键在于领导。领导同志要有真正的民主的作风，要认真培养民主的空气。这里，最重要的有三条：

(1) 要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是不怕人家讲缺点，讲不同意见；(2) 要切实保证“言者无罪”；(3) 要保障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要做到这三条，谈起来容易，要做得好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比如，要认真虚心倾听别人批评缺点、讲不同意见，就不是很容易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革命导师们，一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缺点、改正缺点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鲁迅先生在对敌人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也注意揭露人民自己的缺点。在《阿 Q 正传》中，鲁迅深刻地揭露了阿 Q 身上存在的许多缺点，而其中最突出的又是他怕人讲他的缺点。他对自己头皮上的几处癞疮疤讳莫如深，不但癞字，就连一切近乎“赖”的音都是不能提的，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都忌讳了。阿 Q 有自发的革命要求，但毕竟是一个觉悟不高的被压迫群众，身上存在很多缺点，又不愿意别人讲它，这是难怪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时代和阿 Q 的时代又大不相同了，我们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从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局部的、暂时的、次要的。我们有缺点错误，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只要认识它，并能及时改正，我们的事业就可以做得更好。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一切剥削阶级，对绝大多数人民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因为他们要维持剥削制度，手上没有真

理，只能采取压服的办法，专政的手段。大家知道，在《红楼梦》中，尽管贾宝玉是贾家的命根子，但因为他要背叛封建制度，不愿意接受封建的说教，他的父亲贾政说不服他，也只好使用棍子。贾宝玉尚且挨打，其他人的命运就可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虚伪性更大，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专政的手段，实际上更加厉害了。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相反，我们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则讲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完全可以采用说服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有人说，说不服怎么办？说不服，就要检查自己的方法是否对头，决不能采取粗暴态度，压服办法。

三、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说老实话，当老实人。我们党是一贯注意干部教育，要求每个同志都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的，但是人们的水平总是有高有低的。我们不能设想，在我们党内或人民内部，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完全一样，思想觉悟完全一样，也不能设想，混淆两类社会矛盾的现象一点不会发生。问题是只要大家能站稳立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说老实话，当老实人，就可以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过来。我们要坚持真理，就必须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是一定要胜利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这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同志，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但要学习他们的著作，而且要学习他们坚持真理的风格。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愈高，能坚持真理的人愈多，错误东西的市场就会愈少，歪风就不会抬头，即使抬头也不能占优势，这样，我们的事业就更能

顺利地发展。我们要记住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话：“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这一段话，是从我们党无数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要十分予以重视。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要争取更大的成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可以争取更大成就。当然，我们讲团结，决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决不能忽视解决矛盾。我们只要认真学会区别两类矛盾，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我们党内和人民内部就一定能团结得更好，就更有力量去对付真正的敌人，去克服任何困难，去夺取新的胜利。我们应该信心百倍地为人民内部的更加团结、为战胜帝国主义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

写于 1962 年 5 月

论共产主义道德

一、道德的社会作用

对任何一个社会，道德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对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旧的思想、旧的道德观点还有它一定影响，有时影响还很大；而新的思想、新的道德观点正在树立，还要很好发展和巩固。因此，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反对旧思想、旧道德，主要是反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树立、发展和巩固新思想、新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我们就会犯错误。

什么是道德？它在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先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道德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和政治、法律、哲学等一样，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上层建筑中，哲学是世界观，它对于各种社会观点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一定的道德不仅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于一定的阶级本质，而且受一定的世界观的支配。革

命的阶级，有革命的世界观，因而也就有革命的道德观；反动的阶级，有反动的世界观，因而也就有反动的道德观。

道德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在阶级社会中，评价人们行为的决定因素是阶级利益。在某一个阶级看来，对它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对它不利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的道德观也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对立，不可避免地使道德也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道德问题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抗争，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①

道德和法的社会作用，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根据一定阶级的利益，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某种约束。但是道德和法又不相同，法的行使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而道德却只依靠社会舆论、思想信念和习惯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剥削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坚决主张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法治以外，也有些人竭力宣扬对人民多使用道德感化。例如，我国古代儒家的代表孔子就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在孔子看来，君主应该依靠道德治理国家而不应该依靠刑罚治理国家，因为道德能使人民更听话、更守规矩，而刑罚却会使人民不顾一切地胡作非为。当时有个卫将军文子，不同意孔子的意见，主张道德与刑罚并用，孔子答复他说：“以礼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页。

② 《论语·为政第二》，《诸子集成》第1册，第22页。

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①看来，孔子由于害怕高压政策将会引起人民的反抗，而更倾向于用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中国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历来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尽一切力量在人民中宣传自己的道德观点，扩大这种道德观点的影响，儒家学说本身也由于它在这一点上对统治者作了突出的贡献，而被尊奉为剥削阶级社会的正统学说。

但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是极其虚伪的，它对劳动人民是一套，对剥削者自己则又是另一套；它表面上高唱“礼义廉耻”，实际上却对劳动人民极尽其剥削、压迫之能事，真正是“寡廉鲜耻”。为了巩固私有制，剥削者历来都把“不要偷窃”当作他们道德规范中的重要一条，然而他们自己对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却实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剥削阶级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纵欲、卖淫都说成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他们自己始终沉醉于荒淫无耻的生活，公开地或暗地里鼓励卖淫，实行形同卖淫的买卖式的婚姻。剥削阶级口口声声地把忠诚、坦率颂为人类美德，但充斥于剥削阶级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尔虞我诈。总之，剥削阶级的道德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条锁链，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服从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心安理得地成为人剥削人制度的牺牲品。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曾经对剥削阶级的道德作了最深刻的揭露。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

^① 《论语·为政第二》的注释。《诸子集成》第1册，第23页。

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

的确，剥削阶级的“吃人”道德，对于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巩固剥削阶级社会，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这一点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尽管如此，被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仍然不断地突破剥削阶级道德观的束缚，奋起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或者表现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被剥削阶级以自己的道德观对抗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或者在阶级矛盾尖锐时，直接表现为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行动。在我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不就是农民公开地对封建统治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道德观实行最有力的反抗？不就是农民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对封建道德给予最有力的否定？所以，阶级斗争的存在，各种相互对立的道德观的存在，使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设想，只能是一种空谈，实际上剥削阶级对于劳动人民总是少不了要使用法律制裁，依靠严刑酷吏，实行血腥镇压。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永远地结束了剥削阶级的“吃人”道德在人民中的统治地位。现在，在人民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②“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③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页。

③ 同上书，第262页。

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将远比剥削阶级道德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大得多。剥削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对立，各阶级有各阶级的道德观，而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又是非常虚伪的，因此，尽管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居于统治地位，但它的作用却不能没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剥削阶级自己就不愿受这种道德观的约束；其次，劳动人民也常常把这种道德观置于脑后，不受约束。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在这里虽然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工人和劳动人民已居于主人翁的地位，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体现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对全体劳动人民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共产主义道德势必成为被全体人民所公认的唯一道德观，成为被全体劳动人民所一致遵循的行为规范。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道德，它将把全体劳动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同心同德地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鼓励劳动人民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共产主义道德的影响下，我国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像李大钊、彭湃、恽代英、方志敏那样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出现过许许多多像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徐学惠那样为了捍卫祖国、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公共财富而顽强斗争的英雄儿女。至于那些日夜以自己辛勤的劳动，献身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平凡而伟大的模范人物，更是成千累万，数也数不尽。共产主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放射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光辉。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道德正在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走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会越来越大。要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具备这几

个条件：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二、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逐渐消灭，三、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大大提高。以道德代替法治，在剥削阶级社会只是一种欺人的空谈，在共产主义社会却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灭，法权也将退出历史舞台，而道德却将永远存在下去，并继续担负着调整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关系的使命。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①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及其影响已经完全消灭，那时，普及于全人类的，真正为全人类所自觉遵循的共产主义道德，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人类道德”。它在社会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是历史上道德所不可比拟的。所以，我们党和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十分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竭力提高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出必要的条件。

二、新道德与旧道德

目前，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社会中虽然已经居于统治地位，但是由于我国还有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分子和仍然存在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有小生产者和没有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所以旧道德在人民中仍有相当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新道德和旧道德究竟有什么区别？它们的根

^① 《反杜林论》，第96页。

本对立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的新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说的旧道德，指的就是剥削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和剥削阶级道德有根本的区别。共产主义道德奠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剥削阶级道德奠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共产主义道德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思想；剥削阶级道德则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为指导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反映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剥削阶级道德则反映剥削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并为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服务。这些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种道德的内容中，共产主义道德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而剥削阶级道德则以个人主义为其核心。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最本质的内容，它贯穿在共产主义道德的各个方面。集体主义表现在对国家的关系上和对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上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表现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是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在对阶级的关系上，是忠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有鲜明的是非观点，与阶级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表现在对组织的关系上，是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在对同志的关系上，是有原则的团结和高度的阶级友爱；表现在生活作风上，是艰苦朴素、大公无私和严格要求自己，等等。总之，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把共产主义道德推向人类道德的高峰，使它远远超越于一切旧道德之上，成为人类最进步、最高尚、最伟大的新道德。

关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毛泽东同志讲过很多。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①一事当前，首先要为集体打算。“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②。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③因此，我们不应当满足于一点成就，更不应当害怕任何困难，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④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学习白求恩，学习张思德，学习他们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⑤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因而成为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的榜样。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千百万共产党员是执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他们处处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真正做到“身居茅庐，心怀祖国，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全国人民也在努力向模范的共产党员看齐，把维护集体利益看成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这种高尚道德品质，已经在我国人民中广泛地树立起来。关于我国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崇高道德品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

①② 见《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9页。

③④ 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

⑤ 见《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4页。

员的修养》中曾经概括地写道：“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①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是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所作的最生动、最深刻的描绘。

与此相反，个人主义则是剥削阶级道德最本质的内容。列宁说过：“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

^①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41页。

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①我国封建阶级乐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个人主义道德观的体现。资产阶级则把个人主义道德推向了顶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几乎成了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在个人主义道德支配下，剥削阶级社会充斥着利己主义，贪婪欺诈，虚伪奸滑，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偷盗谋杀种种现象。剥削阶级的道德，不管它在历史上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把它和共产主义道德相比，总是最肮脏、最落后、最反动的道德。

从新道德和旧道德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种道德一个最进步、最高尚，一个最反动、最卑鄙，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并且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这两种道德是针锋相对的，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但是新道德和旧道德是不是也有什么联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新道德是舶来品，它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它和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旧道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没有任何联系。也有人认为，不同时代的或不同阶级的不同道德有其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原始公社的道德。所以古今或新旧道德之间，有共同之处，也有其一定的继承关系。这两种看法都涉及到新道德的来源问题和新道德与旧道德的继承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两种看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不能认为是全面的、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0—262页。

列宁主义。”^①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道德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是十月革命“送来”的，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我国便出现了工人阶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②我国工人阶级当然也不例外。在旧社会，我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因此他们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同时，工人阶级丧失了生产手段，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终年累月地在社会化的工业中生产劳动，这又使他们养成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团结互助、勤劳勇敢、热爱科学、追求进步、有组织有纪律等等特性。工人阶级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就是从他们这种阶级特性中产生的，就是他们这种阶级特性的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则赋予工人阶级道德以科学的内容，使工人阶级道德上升为共产主义道德。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时期登上了政治舞台，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就以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和各种各样的旧道德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五四”运动中，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人，就站在反对封建旧礼教的最前列，与此同时，他们还反对了胡适等所贩卖的帝国主义奴化道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种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② 《反杜林论》，第95页。

斗争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自觉、更有组织地进行着。共产主义道德与旧道德的斗争，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共产主义道德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共产主义道德则开始代替旧道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革命队伍中倡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处理军民关系的准则，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道德观一种初步的、通俗的概括。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共产主义道德观作了许多精辟的、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刘少奇同志，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著作中，则对共产主义道德观作了集中和系统的论述。所以，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出现于工人阶级诞生以后，并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在新道德和旧道德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说共产主义道德是舶来品，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是毫无根据的。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也有它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①共产主义道德，当然也是如此。但是应该怎样理解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呢？能不能笼统地说，古今或新旧道德之间，都有继承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

假如把共产主义道德出现以前，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道德都看成是旧道德，那么旧道德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除剥削阶级的道德以外，还有被剥削阶级的道德以及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劳动者的道德。从形式上看，不同的阶级常常使用相同的道德术语，但是这些相同的道德术语所包含的内容却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我们说的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当然不是指的道德术语的继承，因为道德术语，是表达道德的语言工具，各个阶级可以运用相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他们之间绝然不同的道德思想内容。所以，如果把道德的历史继承性仅仅看成道德术语的继承，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该说，道德的历史继承性主要指的是本质内容的继承。如果肯定了这一点，那就很难说新旧道德之间都存在着继承关系。譬如“忠”这个道德术语，几乎所有的阶级都使用它。中国封建统治者讲“忠君爱国”，国民党反动派讲“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忠”在剥削阶级那里，指的无非是忠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忠于剥削阶级的统治，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剥削阶级有时也在一般的意义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但这是虚伪的，是掩盖它要求人们忠于它狭隘的阶级利益的手段。所以对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忠”不仅在形式上相同，内容上也有共同之处，在他们那里，“忠”确实是有历史继承性的。但是剥削阶级道德中的“忠”，却是共产主义道德所不取的，从内容上讲，它和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主要是指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工人阶级，忠于真理，忠于革命，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绝不能忠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统治、剥削阶级的国家。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忠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忠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忠于剥削阶级的统治、剥削阶级的国家，

就不能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和剥削阶级道德，在本质内容上完全背道而驰，共产主义道德不可能从剥削阶级具有反动内容的“忠”里面吸取任何有益的东西，因而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和剥削阶级道德中的“忠”，就谈不上有什么本质内容上的继承关系，过去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也讲“忠”，如果抛开剥削阶级道德所给予的影响，那么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道德中的“忠”，往往包含这样的内容，即忠于劳动，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等等。这些积极的内容和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有共同之处，共产主义道德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吸取了这些积极的内容，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所以应该说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和过去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道德中的“忠”，在内容上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可见，就道德的本质内容讲，它的历史继承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剥削阶级道德和剥削阶级道德存在着继承关系，共产主义道德和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的道德存在着继承关系，笼统地说新旧道德都存在继承关系是不恰当的。

共产主义道德虽然和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的道德有着继承的关系，但是这种继承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拿过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过去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的道德观，虽然有许多精华，但也有不少糟粕。譬如，劳动人民的道德观中，有着爱国主义的内容，这是共产主义道德应该吸取的精华部分。但是刘少奇同志说过：“真正的爱国主义乃是对于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自己祖国、自己人民、自己语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之热爱，这种爱国主义，是和那种自私自私的、排外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及反映那种落后的家长制的、小农的狭隘闭关主义、孤立

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民族偏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①而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就往往和“反映那种落后的家长制的、小农的狭隘闭关主义、孤立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民族偏见”，夹杂在一起，这是劳动人民道德观中的糟粕。必须经过批判、改造，把这些糟粕剔除出去，不这样做，共产主义道德就不能很好地继承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就不能把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到更高的水平，使之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历史上崭新的道德观。

我们对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必须做具体的分析。我们应该看到，阶级社会不是单一的“全民社会”，那里存在着阶级对立，存在着各种不同道德观的对立。道德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东西，我们绝不能用超阶级的观点对待道德。同时还应该看到，各个阶级的道德观，通常总是通过各个阶级的伦理学家加以论述、阐发和广为宣传的。伦理学家所受到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在他们那里，道德思想往往也不是单一的。至于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具体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出的道德品质进行评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例如历史上有些有名人物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他们都是剥削阶级的官吏，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忽视了就不是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但他们在抗御外敌中却表现了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这怎样理解呢？能不能说这只是剥削阶级道德的表现，而一点不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呢？恐怕不能简单笼统地这样说。——所有这些，都给研究道德的继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我

①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第39页。

们在研究道德的继承问题时，也应该根据列宁的指示，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拟另写文章加以论述。我们上面所作的一般阐述，只不过要说明，共产主义道德和剥削阶级道德存在着本质内容上的根本对立，对于剥削阶级道德，我们绝不是要继承它，而是要批判它，肃清它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也只有这样，伟大的、崇高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才能在劳动人民中巩固地树立起来。

三、道德与才干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不仅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而且应该是多才多艺的人。因此，在我们研究道德问题时，必然联想到德与才的关系。我们认为，道德品质的修养和工作能力的锻炼，是有密切联系的。德才兼备，是党衡量和选拔干部的标准，也是每个革命战士的努力方向。

德和才是矛盾的统一，两者是互相促进的，但主导方面是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主张德和才的统一，重才轻德，或重德轻才，都是片面观点，都是我们从来所反对的。

我们党根据德才兼备这一观点，提出红与专相结合的道德，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培养干部问题上的新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怎样培养干部？只教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么？这是不行的。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是必要的，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但是，不具有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

红与专的道路，是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德才兼备的道路，而主导方面是政治品质，是道德。

共产主义的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它要求人们决定自己的行为时永远以集体利益为依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便是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这又是要依靠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的。因此，共产主义道德就离不开革命，离不开政治。我们讲道德品质，道德就是指政治品质，没有政治上动摇的人，同时又是道德高尚的人的；当然也没有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同时又是政治上坚强的人。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指出：“我不敢担保，那些把私人的恋爱故事同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妇女会在斗争中表现出可靠和坚忍不拔的品质，也不敢担保那些失魂落魄地追求任何妇女并让自己给每一个年轻女郎弄得神魂颠倒的男子。”^①列宁把政治和私生活联系起来，认为那些失魂落魄地追求女性和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在政治上就不敢担保他们有可靠的政治品质，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我们只有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才能掌握时代的革命精神，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头，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得起各种考验而毫不动摇；我们只有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才能把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与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我们也只有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学习中，在科学研究中，如马克思所说的，用攀高峰的精神，不畏艰苦，不怕险阻，不贪图走便宜的道路，才能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

在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与才相结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马克思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发

^① 蔡特金：《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他在其他许多研究部门中都有独立的发现。“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①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四十年的功夫，在社会科学上做出了如此伟大的贡献，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革命，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革命与科学、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与才紧密结合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同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然，德才兼备，红专结合，对于不同的人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任何人都不应有所例外。有些人只强调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不提倡学习政治，不强调道德品质的修养，这是不对的。例如有人说，我不想当政治家，我只想研究自然科学，又何必要我学习政治呢？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专心学习，只要对某门科学学到一些本领，就有了铁的饭碗，走遍天下也不愁吃不愁穿，又何必去管什么政治和道德修养呢？有些人甚至还提出了一种所谓“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说法，这种“三过”观点在本质上也就是轻政治、重业务、重生活享受。显然，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人没有灵魂，怎么能学得好？即使学好了，又怎么能很好地去用它为人民服务？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得好。他说：“……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

①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

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却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成为国家政治领导的积极参加者。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出息的负担。”^①斯大林的话，不能认为是过时的。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与才必须结合，在这种结合中，首先要注重政治。政治指导业务，无论各行各业，也无论何年何月都是需要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需要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内容将会日益丰富，某些内容也可能改变，但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共产主义道德的修养和工作能力的提高，难道不是愈来愈重要么？难道可以轻视的么？不，这是决不能轻视的。

四、道德与自由

以上我们对道德的社会作用，新道德和旧道德的对立，道德和才干的关系，都作了一些简要的分析，从这些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培养、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道德在当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也许有人会问：有了共产主义道德，是不是就会使人们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3页。

的行为受到束缚？我们打倒了旧道德，又提倡新道德，是不是让人们摆脱了旧束缚，又给人们加上了新束缚？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研究一下道德和自由的关系。

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告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及人和社会的关系中，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同志的批评。所以，人们在共产主义道德面前，是不能毫不负责任地没有任何顾忌地任意行动的，共产主义道德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道德是自由的对立物。但是共产主义道德不是任何人随意规定的，它是社会的产物，它本身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人们如果认识了共产主义道德所以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并能够自觉地按照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行动，在共产主义道德面前，就不会感到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道德与自由又是一致的。所以，道德和自由，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共产主义道德对不自觉的人，缺乏道德修养的人，不懂客观规律的人，确实是一种束缚，是一种限制他们自由行动的力量。但是这种束缚和限制是不是必要呢？完全必要。因为超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自由，是妨碍他人、妨碍社会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允许这种自由存在，人们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譬如，允许偷窃的自由，被偷窃的人就不自由；允许调戏妇女的自由，妇女就不自由；允许驾驶汽车在马路上有横冲直闯的自由，许多人就没有行走的自由甚至可能被压死。这种自由对人民不利，对国家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所以必须加以束缚，加以限制。

共产主义道德对自觉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懂得客观规律的人，就不是什么束缚，也不是什么限制。因为他们能够按照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行事。按照道德规范行事，是不是就没有了自由呢？当然不是。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以内，人们仍有充分的自由。譬如，共产主义道德不允许偷窃的自由，但人们仍有通过自己劳动获得正当收入的自由；不允许玩弄异性的自由，但人们仍有正当恋爱的自由；不允许驾驶汽车横冲直闯，但可以按照交通规则自由行驶。这种自由不但不妨碍他人、不妨碍社会，而且对他人、对社会有利。这种自由是合乎客观规律的真正的自由，因而永远不会受到束缚，受到限制。

恩格斯曾说过：“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于自然规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在这种认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所以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认识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所以人对于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则所确定的这一判断的内容，将带着同样大的必然性；而犹豫不决则是以无知为基础的，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可是这种犹豫不决，正是证明自己的不自由，证明他被自己所应当支配的对象所支配。”^①可见，对于那些由于不自觉而盲目行动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譬如，有些人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就动摇不定，这难道是自由的吗？当然不是，这恰恰表明他们“被自己所应当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而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们实际上是很不自由的。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有自觉性、能按照客观规律行动的人来说，他们却有真

^① 《反杜林论》，第117页。

正的自由。他们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坚贞不屈。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自觉自愿，毫不犹豫，因为他们早已为自己所应该采取的行动，作出了合乎规律的判断。在革命队伍中我们看到很多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他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了革命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永远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蓬勃向上。这难道是可以强迫做到的吗？不，这是高度的自觉，也是高度的自由。

共产主义道德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道德，是解放人类的道德。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正是为了使人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在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使自己从不懂得客观规律变为懂得客观规律，从缺乏道德修养变为有道德修养，从不自觉变为自觉。这样，在共产主义道德面前，也就会从不自由转化为自由。所以，道德和自由在对立中有着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自觉。当然，从不自觉到自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往往需要一个人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做到。道德修养的过程，也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努力过程。每个人都应该为提高自觉性，加强道德修养，付出最大的努力。看看孔子年老时回忆他一生学习和修养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这就是说，孔子在学习和修养的过程中，每经十年才前进一步，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经过毕生努力，办事才有点“自由”，而不致越出轨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自然

① 《论语·为政第二》。《诸子集成》第1册，第23页。

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要修养的是共产主义道德。这些，和孔子那时要学习和要修养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任务也要艰巨得多。但是，我们今天的条件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们的青年一代今天是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他们有党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受到优良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着党、团、少先队等革命组织的帮助和监督，再加上整个社会已经逐步形成的高尚道德风气的影响，因此，只要自己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努力修养，真正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决不需要像孔子所经历的那么长的时间的。目前，在我们国家中不断涌现出一批一批像雷锋那样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五、怎样树立共产主义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筑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新道德，在培养、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道德的过程中，必须非常重视宣传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实际锻炼。

首先，党和国家要十分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要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什么样的阶级，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观点。但这是不是说共产主义道德会自然而然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呢？是不是说自觉性会自然而然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呢？绝不是的。工人阶级固然有自己的优良品德，但把这种好的品德提高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决不是靠自发成长的。因为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犹如列宁指

出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自发运动中，而是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所以是人类最崇高的道德，不仅因为它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因为它有真正的科学性。共产主义道德是为人类科学发展的伟大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这种道德观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中自发地产生出来，而必须通过宣传教育，通过深入的思想工作，才能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确立起来。忽视了这一点，就会产生自发论的倾向。目前有些人把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的一些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现象，一律归结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在他们看来，好像生产大发展了，产品极大丰富了，这种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共产主义道德就会自然地在人民中树立起来，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都没有什么用处。这种看法就是自发论倾向的反映。当然，共产主义道德的树立，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但是把经济条件绝对化，从而否认了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否认了政治挂帅和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却是完全错误的。物质条件好了，人们的道德面貌是未必就能自发提高的。只强调物质条件，而忽视政治挂帅，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思想工作，放弃对自己和青年一代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了在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宣传教育，首先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有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目前在我们国家里，出现了许许多多道德品质非常高尚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成长，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强大威力。我们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入细致的、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才能使共产主义道德深深地刻划在人们心中，并逐步变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实际行动。

其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说服的方法帮助群众抛弃旧道德，树立新道德。道德的存在，是社会合乎规律的现象。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不受这种道德观的支配，就受那种道德观的支配，在人们的思想中不可能存在着道德的真空。因此，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本身就包含着批判和反对旧道德；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的过程，就是新旧道德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应该用什么斗争方法来解决这种思想矛盾呢？毛泽东同志说过：“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①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反对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斗争中，我们应该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的办法。目前有些人对社会上仍存在的一些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现象，抱着急躁态度，他们总想用惩办的方法来解决，好像惩办一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再出现了，共产主义道德就树立起来了。当然，有些严重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他们往往同时也违反了党纪国法，对这样一些人一定要给予应有的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处分也是为了教育。但是对于一般忽视或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却应该更多地通过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因为只靠处分，不进行说服教育，就不能提高人们的自觉，不能解决思想矛盾。应该看到，旧道德对人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0页。

的影响是深厚的，它常常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要肃清这种影响，决不是简单粗暴的方法所能收效的，必须在普遍深入的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群众懂得新道德的崇高意义和旧道德的丑恶本质，造成社会舆论，大家都来反对旧道德，都成为依照共产主义道德行事的人。这样，旧道德的影响就会逐渐被肃清，新道德就能逐渐在群众中树立起来。

第三，加强个人的学习和实际锻炼。树立共产主义道德，主要是依靠人们在高度觉悟基础上形成的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社会舆论只不过是一种监督的力量。真正树立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他们的信念是如此之深，责任感和义务感是如此之强，以至把维护自己的道德品质看作比保全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道德信念的体现。这种信念是怎样养成的呢？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对他本人来说则是依靠长期的学习和实际锻炼，特别是要依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注意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在我们看来，学习和实际锻炼是统一的，它们都是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工作能力的不可缺少的方法。刘少奇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

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①刘少奇同志还指出，旧社会的自我修养方法是理论脱离实际，剥削阶级说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所需要做的，“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②我们反对这种方法，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学习与实际锻炼相结合，提倡言行一致。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就要按共产主义道德行动。我们重视实际锻炼，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道德才能巩固地树立在言行一致的基础上。

我们在培养、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道德中，必须重视宣传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实际锻炼。这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革命干部要以身作则，要成为青年人的榜样，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一代，则尤其重要。青年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将肩负伟大的使命。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新生的一代，一方面，他们沾染的旧社会意识较少，富有敏感性，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另一方面，他们的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有时也易于接受不良的影响。所以必须在青年中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同时加强文化教育和体育锻炼，使他们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道德的熏陶下，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列宁曾经说过：“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③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重要指示。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重视政治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5页。

②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15页。

③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7页。

思想工作。解放后的十三年来，由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共产主义道德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已经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今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应该把这方面工作进一步地加强起来，使共产主义道德的花越开越鲜艳，果越结越丰硕。

写于 1962 年 9 月

革命的道德观

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所写的《论共产主义道德》一文中，曾经简略地谈了一下，本文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作一些探索。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道德，总的说来只有两种：一是剥削阶级的道德（其中包括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三个阶级的道德）；一是劳动人民的道德（包括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道德），而共产主义道德，则是劳动人民道德的最高发展。因此，探索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探索这两种道德的相互关系以及我们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下面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

研究道德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一定阶级的道德，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道德问题的根本观点。对我们来说，承认这个观点并不难，因为马克思主义的

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确。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到道德的继承问题时，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碰到的便是剥削阶级的道德究竟能否继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论共产主义道德》一文中，曾经给予否定的回答，我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就其本质内容来说，是不可以继承的，现在我还坚持这种看法。我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精华当然是不少的，但是，剥削阶级道德并不是精华，而是糟粕，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剔除的问题，而不是继承的问题。可是也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虽然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其中也有些精华部分可以批判地继承，如封建阶级的忠、孝、诚实、勤劳等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等等，现在不是都继承过来了吗？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一些根本分歧，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楚。

研究剥削阶级道德能否继承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只要牢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个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

主张剥削阶级道德可以继承的人认为，剥削阶级道德有两面性：有剥削、压迫人民的一面；也有可以批判继承的精华的一面。例如，勤劳、朴素等等道德品质，不仅在某些剥削者身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剥削阶级道德理论中也有所表现，这些就是剥削阶级道德的精华，我们不可以一笔抹杀。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我看是不对的。剥削阶级的道德确实有两面性，但是这两面性并不是一面好一面坏，一面是糟粕一面是精华；剥削阶级道德并不存在这样的两面性。我们说剥削阶级道德有两面性，主要是指这种道德有其真实本质的一面，也有其虚伪骗人的一面。例如，剥削阶级一贯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可是在他们的道德

说教中，却也宣扬所谓“不要偷窃”、“不要抢劫”等等。这是为什么呢？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捍卫剥削阶级的私有制，把剥削阶级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合法化，竭力防止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那里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我们难道能把“不要偷窃”、“不要抢劫”等看成是剥削阶级的美德吗？显然是不能的。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勤劳、朴素等等，情况也是如此。谁都知道剥削阶级是不从事劳动的，是奢侈无度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有时也宣扬勤劳、朴素呢？那是因为他们要劳动人民做牛做马，为他们创造物质财富；要劳动人民安于贫困，好让他们把劳动人民最后一滴水也榨取到手。剥削阶级如果真正主张勤劳、朴素，那么他们就应该放弃剥削，放弃他们的奢侈生活，显然剥削阶级从不准备这样做。但是剥削阶级有时又不能不宣扬勤劳、朴素，因为他们如果不宣扬这些，他们也就无从剥削，无从享受奢侈生活。因此剥削阶级道德必然会有两面性。他们要劳动人民做的，常常是他们自己所不愿做和不能做的，这一点正好表现了剥削阶级道德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本质，也表现了剥削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剥削阶级道德时指出：“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①这正是对剥削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极深刻的揭露。我们如果把剥削阶级道德中虚伪和骗人的东西，也当成剥削阶级道德的精华，那岂不是正好中了剥削阶级的诡计，美化了剥削阶级的道德面貌吗？所以这个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主张剥削阶级道德可以继承的人还认为，剥削阶级内部大都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人，但也有少数比较同情和接近人民的好

① 《论共产党的修养》，第15页。

人，他们在劳动人民的影响下可能形成某些“美德”。例如，岳飞的爱国主义，司马光的诚实等等，这些属于剥削阶级的“美德”，是可以批判继承的。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岳飞、司马光等历史人物，都是封建社会的官吏，他们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并且是忠心耿耿地为这个阶级服务的。当然，剥削阶级内部存在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反映某些劳动人民的要求，接受某些劳动人民的道德观点。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总是通过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线，与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从中外历史事实来考察，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历史上个别剥削阶级优秀人物具有某些优良品德是一回事，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道德思想是另一回事，这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绝不能把个别剥削阶级人物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形成的某些优良品德，简单地看成是整个剥削阶级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品质。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往往相互影响，对于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就以爱国主义来说，这种“美德”在个别剥削阶级人物身上，如岳飞、文天祥等人身上，尽管表现得比较强烈，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种“美德”往往是受到劳动人民思想影响的结果，何况他们的爱国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纠缠在一起，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也就是说，在这些个别别人的爱国思想中，还存在着封建思想。他们的爱国思想是相对的，他们的封建思想却是绝对的。比如岳飞在抗击外敌中，虽然屡打胜仗；但在紧要关头，最终还是要听由投降派的奸臣所控制的皇帝的话，班师回朝，放弃抗战事业。他在被杀头之前，还是表示要“精忠报国”，可是“精忠”是做到了，“报国”则没有结果，岳飞的悲剧性的结局，就是他的封建道德思想起绝对的支配作用

的必然结果。就整个剥削阶级的本质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他们有时也有一些“爱国”的表现，但那是爱他们的统治地位，爱他们的剥削阶级利益。在历史上，为了阶级利益，牺牲民族利益；为了苟且偷安，不惜丧权辱国，在剥削阶级那里都是多不胜数的。“宁赠异邦、不予家奴”，往往是他们道德观的本质表现，而真正的爱国主义却总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历史上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事业，最后的结局多是失败的，除了他们本身的思想行为还有不少弱点之外，当权的剥削阶级不但不支持他们，而且拆他们的台，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由此看来，我们今天肯定历史上个别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优秀人物的某些优良品德，并不等于继承剥削阶级的“美德”，因为剥削阶级并不存在这种美德。如果把爱国主义、诚实等等，也看成是剥削阶级的“美德”，这实际上也是美化剥削阶级的道德面貌，任意歪曲历史事实。这个观点也是我们绝不能同意的。

主张剥削阶级道德可以继承的人还认为，剥削阶级道德有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之分，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道德，腐朽、反动透顶，的确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可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道德，却有一些好东西，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因此是可以批判继承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强调在道德继承问题上要有历史观点，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道德，采取不同态度。评价历史上的问题，要有历史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认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当它处于上升时期，确实曾经提出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道德思想与道德规范。例如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和发展时期，封建阶级理论家就提出过类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道德思想。西方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也曾提出过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规范。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剥削阶级提出的这些道德思想与道德规范，也并不是超阶级的，而是同样有它的阶级内容与阶级目的的。就以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说，它也是就实现其封建阶级的政治理想所应持有的态度而言的，是为贯彻其所谓“仁义”的思想而服务的。这句话的道德含意，绝不能和孟子的整个道德思想相分割，而孟子的道德思想则是明显地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至于资产阶级提出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它的阶级本质更是早已为人们所揭示。所有这些东西，和无产阶级道德观并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对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尽管可以根据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给予肯定的评价，承认它的历史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继承这种道德。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剥削阶级提出的这些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即使在剥削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对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一种名不符实的东西，剥削阶级很少把它认真地付诸实际行动。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剥削阶级道德的欺骗性时，曾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个老秀才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①其实，岂但孔子及其门徒是如此，一切剥削阶级也都是如此，他们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常常相去甚远，有时还会背道而驰。试问，封建阶级究竟什么时候做到过“富贵不能淫”？资产阶级又什么时候真正地实现了所谓人道主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16页。

义？所以，从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来看，对于剥削阶级口头上讲的以及他们实际上做的，必须予以同等的重视。如果剥削阶级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他们自身并未付诸实行，而且也无法付诸实行，那么就很难把这些东西看成是剥削阶级道德的本质内容。同时，这些剥削阶级没有实行或无法实行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以后却被劳动人民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加以实行了，例如劳动人民为了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不是坚持封建阶级的什么“仁义”的主张），很多人都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说这就是继承了剥削阶级的道德。由此可见，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不仅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要进行阶级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它理论的方面，而且要看它实践的方面。如果抛弃了这种具体分析，把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思想就看成是我们可以继承的好东西，那同样会抹煞剥削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原则界限。这种观点也是我们绝不能同意的。

主张剥削阶级道德可以继承的人还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道德的内容也在改变，可是有些道德概念却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封建阶级讲忠、孝，我们也讲忠、孝；资产阶级讲民主、自由，我们也讲民主、自由，这岂不是说剥削阶级的道德也有其可以继承的一面么？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前几年在哲学史讨论中所谓“抽象继承法”的翻版。在《论共产主义道德》一文中，我们对这一问题已有所评述，这里就不打算多说了。我们认为，不同的阶级确实是常常使用相同的道德概念，但是这种道德概念的含意，在不同的阶级那里，却有着原则性的不同。例如，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忠”和封建阶级道德中的“忠”，含意根本不同；同样，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含意也完全不同。

因此，如果说不同的阶级使用相同的道德术语或概念就是继承，那么这种继承也只能是名词、术语的继承，学术资料的继承，而绝不是道德本质内容的继承。其实，这种继承在各个理论领域中都是存在的，例如哲学领域中的存在、经验等概念，就是为一切哲学派别所共同使用的；又如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商品、价值等概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始之前就存在的。事实上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和建设的文化遗产，都是要批判地继承的，对前人留下的学术资料，当然也是如此。但是，学术资料或语言形式的继承，不等于学术内容的继承。道德是有强烈阶级性的，抽掉道德概念中的社会阶级内容，空谈道德概念躯壳的继承；不着重研究新旧道德在阶级内容上的根本区别，而热衷于探寻它们在概念形式上的相同之处，这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由此可以证明剥削阶级道德也有其“精华”，也可以继承吗？所以，这种用“抽象继承法”解决道德的继承问题，只会抹杀道德的阶级内容，而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显然，这种做法也是我们决不能同意的。

阶级社会的道德，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他们之间道德思想的不可调和性。这里，阵线划得十分明白，他们之间毫无和平共处、取长补短的可能。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这是天经地义的，例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就继承了封建阶级的道德和帝国主义的道德，并把它们融为一体；可是剥削阶级继承被剥削阶级的道德或被剥削阶级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则是从未有过的，不可思议的。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如果混淆了这个界限，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对道德阶级性的否定，导致离开道德的阶级内容，承认所谓抽象的永恒的道德论。而这却是

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极为危险的倾向。

其实，关于剥削阶级道德究竟能不能继承，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许多先进人物就已接触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充分地受到了旧道德的教育，但同时旧道德的毒害也了解得最深。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当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有远见的、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统治我国人民几千年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推翻，为中国人民摔掉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孔子是代表封建思想的典型人物，是封建道德的化身，他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封为“圣人”。孔子的封建道德观点以后又被孔子的信徒所发展和渲染，使它成为更加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工具，同时它又反过来成为劳动人民沉重的思想枷锁。什么仁义礼智、孝悌忠恕等等道德说教；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等道德信条，这些东西不仅针对着封建阶级的老爷和少奶奶，更重要的是针对着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压迫。鲁迅先生称这些道德为吃人的道德，是很恰当的。五四时期，为了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我们的革命先辈已不再用伪装上帝临降的手段，也不再采取“替天行道”的旗号，而是用真正革命的办法，用直接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办法，提出“打倒孔家店”，使群众从几千年来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大胆行动，向封建制度冲击，这是很了不起的。有人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把孔子一棍子打死，未免有些简单化。我们说，我们的革命先辈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人还不大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们往往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封建道德的革命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是永远值得钦佩的。事实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论在五四时期以及在此之后，都起了积极的动员革命群众的作用，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所以，问题十分清楚，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是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的，是不能留恋的，也不能采取改良的办法，除掉一些，保留一些，而只能采取革命的办法，坚决打倒它，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新道德，代替剥削阶级的旧道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听听五四时期先进革命人物的话是很有益的。那时李大钊曾经这样写道：

“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三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①

李大钊痛恨旧道德，但对新道德却充满了希望，他主张“开新”，反对“复旧”。他还说过：

“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所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的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继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②

看吧！这就是五四时期革命先进人物的语言。现在有些人要

①②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载1919年《新潮》第2卷，第2期。

为孔子翻案，有些人要继承剥削阶级道德，回头看看革命先辈，能有什么感想呢？

归根到底，在道德问题上，我们应该继承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并把这种革命精神加以发扬光大，而不应该走回头路，这就是我们的意见。

二、到劳动人民的道德中去找精华

我们对剥削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应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样是不是在道德问题上提倡虚无主义，否认接受文化遗产的必要呢？不是的，我们反对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但是我们主张继承和发展劳动人民的道德。

有些伦理学家，总想从剥削阶级的道德中发现些好东西，而对劳动人民的道德却很少注意，很少研究，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当然，研究劳动人民的道德确实有客观上的困难，因为剥削阶级有自己的伦理学家，由他们著作的剥削阶级道德典籍极多，可是劳动人民历来受剥削阶级的压迫，缺乏文化，因而记载劳动人民道德思想的东西则较少。但是，只要我们把观点端正过来，从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当中，直接的、间接的，正面的、侧面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关的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

据我所知，在我国系统地论述劳动人民道德观点的典籍还没有发现，可是在古典文学创作中以及一些历史文献中，却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比较零碎，而且大多不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它却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劳动人民的道德面貌，研究我国劳动人民的道德传统。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子——《诗经》，其中有不少是劳动

人民的创作。这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场景，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状态、道德面貌。在《诗经》中，有一些篇章对劳动作了热情的歌颂，这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在几千年以前，就把热爱劳动看作一种美德。另一些篇章则对剥削者的贪婪、荒淫，进行了讽刺和斥责，这又反过来说明劳动人民从来是以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为耻的。例如在《魏风·伐檀》中有这样的诗句：“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大意是：你不种不收，那来的那么多粮食？你不狩不猎，院子里怎会挂上了野味？那些老爷们哟，没有菜就不下饭！）这岂不是很好地刻画了劳动人民对于不劳而获的深深厌恶吗？《诗经》还有些篇章，唱出了劳动人民在国家遭到侵略时同仇敌忾的心情。例如在《秦风·无衣》中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大意是：谁说没有军衣？你我同穿战袍。国家调兵打仗，我把武器修好。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哪！）这岂不是很好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么？《诗经》中对于爱情忠贞的歌颂，对于诚实忠厚的赞美，更是多不胜数。《相鼠》这一首很多人都熟悉的诗歌，还直接对人们的礼貌行止，提出了评价：“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不仅表现着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无礼无仪的憎恨，而且也很好地道出了他们对于优良道德品质的重视。

我国有不少具有鲜明人民性的古典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劳动人民的道德面貌，往往也得到深刻的反映。例如《水浒》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正义斗争。在这部小说中，对劳动人民的道德思想、道德风貌，有很多生动的

描绘。例如梁山泊英雄对起义事业的忠贞，对患难兄弟的义气；他们在公堂上的宁死不屈，在战场上的勇敢直前；他们对贪官污吏的刻骨仇恨，对人民群众的秋毫无犯等等，都被描写得有声有色，深深打动人心的。当然，梁山泊中的人物，出身不同，所受的教养也不同，因而在有些人的言行中，往往也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同统治阶级进行妥协的思想，但是毕竟还有许多人，例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他们的道德品质，应当说是有着相当鲜明的劳动人民的特色的。梁山泊英雄之所以为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所追念，也正因为他们的言行，在劳动人民那里得到了会心的共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对这部同情农民起义的小说，一向视若眼中钉，总是想尽方法对它进行歪曲，主要是歪曲梁山泊英雄的道德面貌。例如封建文人金圣叹，对《水浒》进行了大力的评点，他诬蔑梁山泊英雄是“杀人夺货之行”、“揭竿斩木之贼”。金圣叹甚至篡改小说的本文，例如把梁山泊英雄张横唱的一首《湖州歌》中的两句：“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改为“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使这位英雄的不畏权势、不惧官府的优良品质，完全颠倒过来，变为贪图私利、谋财害命的丑恶品质。总之，经过金圣叹的批点，梁山泊英雄的高尚品德就走了样，变成了卑鄙小人的丑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两种道德观的斗争有多么激烈，封建阶级害怕劳动人民的道德，即使在文学领域里他们也不放弃对这种道德的进攻。看来，封建阶级的文人十分懂得道德的社会作用，懂得对立阶级的道德不能和平共处、彼此继承，因此他们不仅从未想过要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而且竭力阻挠和反对劳动人民继承自己革命先辈的道德。从这里可以看到，研究并进而继承过去劳动人民的道德思想有多么重要，因为这种研究和继承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是

一场继承和反继承的斗争。剥削阶级歪曲劳动人民的道德面貌，反对我们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我们则必须粉碎剥削阶级的歪曲，恢复劳动人民的道德面貌，批判地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在这里，道德继承问题上的阶级对立，是再鲜明也没有了。

劳动人民的道德思想，在革命的暴风雨中，的确是表现得尤为明朗、清晰，这不仅可以从《水浒》这样的反映农民起义的文艺作品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直接记述农民起义的历史文献中看到。当然，这样的历史文献有许多早已为反动统治阶级销毁，但也有一些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例如近代史中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史料，目前还保存得较多，这是我们研究劳动人民道德思想极有力的依据。在太平天国所颁发的诏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歌、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等等文献中，虽然都是用宗教说教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关于劳动人民的道德思想，有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记述。例如在《原道救世歌》中，提出“须作正人”的号召，并且把“淫”、“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覡”、“为赌博”等看成是“不正”的行为，要求人们戒掉。在《幼学诗》中，则对父母、兄弟、夫妻、姐妹的家庭伦常关系，提出劳动人民自己的看法，它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三纲五常有着原则的区别。在《太平条规》中：还对部队的行军纪律作出了规定，如“不得毁坏民房、掳掠财物”、“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瞞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太平天国在思想建设中，对于用劳动人民的道德代替封建阶级的道德，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太平天国不仅有着明确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道德观点，而且对未来的道德境界也有一定的理想。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认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有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因此必须变“陵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到了那时，就能“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就能“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从而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①这种道德理想，当然并不是建筑在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空想）的性质，但是它却反映了劳动人民在道德问题上的思想高度，并在当时起着动员劳动人民奋发向上的积极作用。

从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中的点滴材料来看，过去我国劳动人民的道德思想，虽然历经统治阶级的反对、歪曲，但到如今也并非荡然无存，根本无法研究，相反，这方面材料还有不少，还可以进行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就可以进一步明确：过去的旧道德确实还有些精华，但是这种精华只能存在于劳动人民的道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剥削阶级的道德之中。因此，在道德问题上要说到继承，也只能是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而不能是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

当然，我们说应该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这种继承也必须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不仅有精华，而且也有糟粕。这些糟粕有的是由于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所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劳动人民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世界观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就以太平天国文献中所表现的劳动人民道德思想来说，它不仅有着一套宗教的神秘的外衣，而且有不少方面还受到封建阶级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显然，这些糟粕是劳动人民道德中消极的东西。对劳动人民道德的精华部分，由于今天与过去所处时代不同，世

① 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太平天国》第1卷。

界观不同，我们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必须对它进行分析、改造、提高和发展。

其实，关于批判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只是在理论上还没有迎头赶上，我们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目前在我国人民中开始形成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在批判地继承劳动人民道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

例如，目前在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中，勤劳、勇敢据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勤劳、勇敢的美德，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继承了这种美德，并且赋予它以新的革命和科学的内容，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过去劳动人民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条件下为生存而辛勤劳动，并不了解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创造世界的重大意义；现在劳动人民则是以主人翁的地位，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同样是劳动，但是劳动的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在旧社会是自发的，现在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懂得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同样是勇敢，但是勇敢的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我国人民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勤劳、勇敢，已比过去劳动人民道德中的勤劳、勇敢，水平更高得多，它已成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打败一切敌人的动力和基础。

所以问题很清楚，在实践中我们既然已经继承和发展了劳动人民的道德，在理论上当然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此，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就不是什么继承剥削阶级道德的问题，而是继承和发展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

遗产非常丰富，对这些文化遗产必须全面研究，既要研究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也要研究劳动人民遗留下来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同样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对剥削阶级道德的研究，因为研究敌对阶级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坏处，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反面教员，使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要重视对劳动人民的道德的研究，以便从其中吸取可以吸取的好东西。

三、新中国人民的伟大道德面貌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中国人民的道德面貌，也在迅速的改观。在研究道德问题时，我们也不能厚古薄今，只讲过去，不看现在。现在我国人民伟大的道德面貌，早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旧道德达到的最高峰。这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继承过去劳动人民优良道德品质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最具体的表现。

一般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道德面貌总是比旧社会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生产和不断提倡新道德和反对旧道德的充分的思想教育中，人民的高尚道德品质才能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反之，如果在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就可能引起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使许多人道德败坏。

我国人民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伟大的道德面貌，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以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在这条正

确路线的指引下，不但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人民的道德品质也得到迅速提高。

目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道德面貌，究竟主要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我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

一、彻底革命精神。在中国人民的道德思想中，不断奋发前进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具有首要地位。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斗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资产阶级吹嘘所谓“人道主义”，不过是骗人的东西。资产阶级维护人剥削人的制度，根本就不配谈人道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彻底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当作自己伟大使命的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才谈得上是真正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所以，彻底革命精神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别虚伪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真正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分界石。彻底革命精神作为新中国人民的高贵品德，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是中国人民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重要尺度。中国人民懂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持续不断地改造世界的伟大动力。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人们不但要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还要进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人类幸福、美好的未来，是和革命分不开的。所以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没有这种思想是不行的。为了培养这种高贵的革命品质，过去我们曾经同那种目光短浅的“革命到顶论”进行过斗争；现在我们仍在和一切背叛革命的思潮进行着斗争，中国人民不但高举革命的红旗，

而且脚踏实地地干革命。他们坚持革命原则，明辨大是大非，爱憎分明，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中国人民决心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坚持彻底革命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高贵道德品质的最大特征。

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民的道德思想中，集体主义也表现得极为突出。中国人民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集体主义的集中表现。只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出发，才可能产生真正的革命精神。反过来，要革命取得成功，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集体的力量。人民有了集体积极性，也就是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集体主义品德是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相对立的，当然也是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经济上是唯利是图，坚持少数人发财的剥削制度；政治上是争权夺利，实行少数金融寡头统治的资产阶级专政；在道德品质上则是自私自利，腐化堕落。中国人民鄙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提倡革命的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政治上是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行工农联盟，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道德品质上则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品德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互助友爱，团结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而最为突出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中国人民一向热爱祖国，并把建设祖国、捍卫祖国看成是他们至高无上的集体主义职责，为此他们辛勤劳动，英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同民族沙文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人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热爱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兄弟，因

此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自己神圣的义务。中国人民竭尽一切力量建设祖国、捍卫祖国，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援阶级兄弟，完成世界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的最高体现。

三、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也是中国人民相传已久的美德。劳动人民热爱劳动，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劳动在旧社会和在新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旧社会，不劳而获，劳而不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是被人视为下贱的。在新社会，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是富有创造性的豪迈事业，因此人人以劳动为荣，以不劳动为耻。现在，热爱劳动已经与热爱集体联系起来，这样，劳动不仅成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原动力，同时也成了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力量。最近，党和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干部参加劳动规定为一种经常的根本的制度，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规定为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这是伟大的创举。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大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思想修养、道德品质上，都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可以克服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改善干部和群众关系，可以促进青年一代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经济上，可以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减轻群众和国家的负担，提高干部领导生产的水平，帮助青年一代掌握劳动的技能；在道德品质上，则可以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干部参加劳动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新制度的积极影响下，我国人民热爱劳动的美德，必将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四、忠诚老实。中国人民把对党、对祖国、对自己的阶级兄弟的忠诚老实，看成是共产主义品德的重要方面。在旧社会，忠诚老实的人常常吃亏受骗，虚伪狡猾的人反而处处沾光得益。那时有人认为，忠诚老实不过是愚蠢无能的别名，应该说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新社会，情况完全不同了，忠诚老实总是受到尊重，弄虚作假不仅受到鄙视，而且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中国人民的忠诚老实的品德是和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相一致的。他们只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讲忠诚老实，而不是对反动阶级、对敌人、对叛徒讲忠诚老实。中国人民的忠诚老实的品德，同时也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联系的。具有这种态度，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工作，必然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主观，不浮夸，不靠说谎过日子。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至在论战中，也坚决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反对捏造、夸大和不讲理。忠诚老实，是人民和党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也是人民群众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正是由于有了忠诚老实这种高贵品德，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共同事业中才能彼此信赖，相互依靠，不论风里雨里，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五、好学谦虚。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好学的。在剥削阶级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可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刻苦学习。在古典书籍中有不少描绘劳动人民子弟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情景。目前劳动人民自己当了家，他们不仅继承了过去先辈的好学精神，而且大大加以发展，在学习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劳动人民既勤于学习，也善于学习，他们实际上已经打破了

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知识的垄断，开始向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军。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些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并且以此为指南，逐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现在，我国人民都把勤于学习看成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美德，把懒于学习看成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中国人民从来反对骄傲自满，不懂装懂，夸夸其谈和自命为“老子天下第一”。但是，中国人民也不自卑。革命的胜利，建设的胜利，已把过去长期存在的民族自卑感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雄心壮志，发愤图强。我们承认兄弟国家、兄弟民族的长处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们虚心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自愧形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过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总是教育我们要虚心，要以平等态度待人，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还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有这些，都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人民道德修养的重要准绳之一。

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埋头苦干、不怕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艰苦奋斗的美德，我们党把这种美德看成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艰苦奋斗，打败了强大的阶级敌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我们还要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中国是一个又穷又白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主要依靠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当然，我们决不忽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互助合作、相互支援的重大意义，但是我们认为，革命和建设最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自己的努力，外援再多

也是没有用的。有人嘲笑我们，说艰苦奋斗是一种“苦行僧式的共产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胡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起旧社会已有很大的改善，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改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因为革命没有止境，建设也没有止境。我国革命成功了，要支援其他国家人民革命；我国自己建设，也要帮助兄弟国家建设。我们永不会放弃艰苦奋斗的美德，去追求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生活，因为艰苦奋斗就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民将永远把艰苦奋斗看成是自己的高尚品德。

中国人民的伟大道德面貌，绝不止以上简述的几条。这里只不过是列举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用以说明中国人民在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中，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这里应该指出，在上述的几个方面，都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彻底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彻底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如果离开这种精神，那么，就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道德。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道德与过去所有剥削阶级的道德是完全对立的。我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在全国解放后，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道德品质，都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还要指出，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情况下，许多人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开展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同时还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解放军，学习好八连，学习雷锋等的运动。这些运动，对广大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对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效果。人民解放军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经得起考验的、具有高尚革命品质的英雄集体。雷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新人物。好八连的官兵们和雷锋的高尚道德品质，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的道德品质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雷锋说：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换句话说，他活着就是为了革命，为了集体。雷锋的话反映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通过好八连和雷锋等的事迹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教育，正是要全国人民都向他们看齐。现在，全国人民都热情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向往好八连、向往雷锋，热爱他们，学习他们，这就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国人民一定要把自己的伟大道德面貌，再提高一步。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观点对待道德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題。首先，要以革命的观点，否定剥削阶级的道德。因为剥削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是势不两立的，不否定剥削阶级道德，就不能建立共产主义道德。其次，要以革命的观点，批判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因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中包含有共产主义道德可以继承而且必须继承的精华，同时也包含有共产主义道德不必继承也绝不能继承的糟粕，只有扬弃了糟粕，才能吸取到精华。在对待精华部分，也要进行分析和改造。最后，要以革命的观点，在人民中培养和发展以彻底革命的集体

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因为只有坚持不懈地做好这一工作，中国人民伟大道德面貌，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总之，我们要有革命的道德观，要有彻底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以上无论从观点到引用材料都是不成熟的，写出来只是为了请同志们指教。

写于 1963 年 9 月

革命者的生死观

世界上有人怕死。有人不怕死。其实，怕死又有什么用呢？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对于作为自然的人来说，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毫无例外的。但是，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人的生和死除了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外，还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总是享受着远比劳动人民优越百倍的生活条件，并且为此而迫使劳动人民流汗、流血，为他们承担一切危及生命安全的风险。相反，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的压榨下，生活根本没有保障。他们由于营养不足，操劳过度，缺乏医疗设施，没有安全保护，通常总是未老先衰，不能寿终其年。何况有时他们还要被剥削阶级驱向战场充当炮灰，在为剥削阶级卖命的战争中遭受无谓的牺牲。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生与死对于不同的阶级来说，又是很不平等的。剥削阶级实际上掌握着人们生杀予夺的权力，广大劳动人民却是经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然而，尽管如此，在阶级社会中，历来又总是剥削阶级最为怕死。剥削阶级从来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一切都更加珍贵。

他们越是生活富足，恣意享乐，就越是不愿离开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得天独厚的花花世界。剥削阶级虽然视财若命，但是为了谋求所谓摄身养生之道，延年益寿之法，却从来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富。过去有些剥削阶级的权贵，甚至幻想着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这些人所以非常怕死，极其不愿意死，原因无非是想永生永世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千年万代地过着他们那腐朽寄生的生活。

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都是贪生怕死的。他们自己怕死，就以为劳动人民也怕死。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他们历来就采取这样两种手法，一方面，宣扬所谓活着就是目的，活着就是幸福，用这种活命哲学的说教，诱骗劳动人民忍辱求生，任凭他们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利用严刑酷吏，实行恐怖统治，以死来威胁和吓唬劳动人民，制止他们的反抗斗争。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现代反动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实际上都是为这两种职能服务的。帝国主义者往往推行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手拿橄榄枝，进行和平诱骗；一手拿箭，进行战争讹诈；就是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新发展。

可是，和剥削阶级的愿望相反，劳动人民从来就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早在两三千多年前，老子就告诫过当时的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的话，是有根据的。劳动人民虽然热爱生活，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们的被剥削、被压迫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只有逼上梁山，起来反抗。他们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渐摸索到这样一条真理：在剥削阶级残酷统治下，怕死是没有用处的。剥削阶级并不会因为你怕死，就让你好好活下去。相反，你越是怕死，就越是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死神倒是随时都会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拿出不怕死的精神进行反抗斗争，向制造死亡的剥削阶级夺回自己生存的权力。几千年来，面对着剥削阶级的血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他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用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不断地给剥削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自从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就有了更为正确的看法。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剥削阶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为了享受，并为了保持他们的糜烂生活和剥削制度而作垂死的挣扎。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同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进行斗争，革命地改造客观世界。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应该竭尽一切力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奋斗，就要把革命利益置于第一位，也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第一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对于生还是死，都抱着积极的、勇敢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从来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鄙弃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反对种种由于贪图个人享乐而不断耗费自己精力的堕落行为。他们把身体看成是革命的本钱，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也极其注意体格的锻炼，认真维护自己的健康。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的鲁迅先生，在谈到他的战斗生涯时曾经说过：“……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①鲁迅的话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说，他活着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同敌人进行战斗。王若飞同志当年被拘禁在反动派的狱中，受尽折磨，但仍以顽强的精神和恶劣的环境进行斗争。他说：“生活就是战斗。在这人间地狱里，我们要以加倍的勇气进行战斗。敌人要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必须征服恶劣的生活条件，必须和死亡作斗争！”^②王若习同志英勇不屈地度过了狱中的艰苦生活，出狱后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最近回国的在巴西历经反动政治迫害的九位同志，也像自己的革命先辈一样，在远离祖国的监牢中，表现了高贵的革命品德。他们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们曾向祖国人民表白：“只要斗争需要，我们可以把‘洋’监牢的牢底坐穿，视死如归；同时我们也要以斗争求生存，迎接胜利！”^③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进行思想和身体的锻炼，终于胜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些生动的事例，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对于人生的积极态度，他们全心全意地为革命而生活，为革命而斗争。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懂得，革命是敌对阶级之间进行的殊死斗争，要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得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有大无畏的不怕死的精神，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对于一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154页。

② 《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44页。

③ 《九颗红心向祖国》，见《人民日报》1965年5月21日第2版。

个革命者来说，个人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生命在内，都是属于革命事业的，都是应当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的。我们既然是为革命而生，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事实上我们现在美好的社会和我们的美好生活，正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用自己的死为我们争取来的；一旦我们为革命事业的需要而死，也必然能够换来更多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美好生活。这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生与死这一对矛盾，在服从革命需要的前提下就得到了统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论是在战场上、法庭中、监牢里或是在断头台下，从来都是表现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打开《革命烈士诗抄》，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豪言壮语。革命烈士们在就义前昂首阔步地唱道：“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①他们表白了自己的雄心大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②他们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③革命烈士的这些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革命者不怕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来看，无数坚强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就是在出生入死的残酷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革命人民或者由于认识一时不够正确，或者由于力量对比暂时处于劣势，有时也会遭到一些失败，但是最后总是要成功的。不管成功或失败，站在斗争前列的战士们，总不免有人要流血牺牲，总不免要死人。是不是怕牺牲、怕死，就不敢革命了呢？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了。真正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懂得生与死的自然规律，而且也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

①②③ 《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21、23、27页。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乐观的。在革命过程中，尽管也会有人动摇变节，有人因贪生怕死而背叛革命；但是个别或少数人无耻的背叛，决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革命人民总是不怕死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各国革命的历史，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不用多说，革命者的这种不怕死精神，对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的人来讲，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眼中，革命者的自我牺牲不过是一种盲目的行动，是一种完全不值得做的傻事。有些人甚至把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战士在对敌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说成是什么激于一时的“正义冲动”。这是不正确的。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向秀丽、刘文学、张高谦等等英雄儿女，他们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他们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们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革命需要，不怕赴汤蹈火；正是这种高尚的革命品质，决定了他们能够在紧要的关头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怎么能够把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说成是什么“正义冲动”呢？

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怕死的精神，完全是出于革命者的自觉，是革命者所具有的革命世界观的最高表现，革命道德品质的最高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怕死的哲学，也是革命哲学的最高表现，它和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是完全对立的。也正因为这样，怕死不怕死的问题，从来就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坚定的革命和不坚定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尺度。任何革命者只有具有不怕牺牲、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才能真正做到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在任何大风大

浪里，都不会惊慌失措，在任何艰苦复杂的条件下，都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断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不断发扬他们革命的不怕死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不甘心灭亡，妄图用战争来挽救自己的命运。有些战争狂人至今仍在扩军备战，进行核讹诈。他们企图用死亡来威胁革命人民，阻挡革命人民前进。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有些人确实是被吓破了胆，他们自己不敢革命，也不许别人起来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却决不会被战争的叫嚣和死亡的威胁所吓倒，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任何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都不能改变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改变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注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越是具有革命的不怕死精神，越是敢于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越是能够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积累经验，愈战愈强，最后必然取得革命的胜利。

至于说到个人的生和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的人不一定不死，不怕死的人也不见得就很容易死去。肯尼迪是属于怕死的人的，他的国家是靠原子讹诈过日子的，他出门总是前呼后拥地有一大批特务当保镖，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把他的命保住。我们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他们有些人身经百战，身上多次被子弹打穿，“死神”不止一

次地向他们招过手，但是他们并没有死。中国革命正是依靠他们的英勇斗争而取得了胜利。由此看来，死确实是没有什可怕的，怕也是没有用的。何况同是一死，往往有显然不同的意义。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①这些话是在战争年代说的，但在今天仍然十分鼓舞人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让我们再重复地说一遍：一切革命者都应该有大无畏的、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应该用不怕死的哲学武装起来。这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有了这种精神原子弹，就可以打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挑衅和讹诈，就可以真正地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可以做到在任何艰苦复杂的条件下都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帝国主义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我们一定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地予以消灭。胜利是属于正义的不怕死的革命人民的。

写于 1965 年 7 月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

回忆“上海社联”斗争片断

1933年我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当时上海反动市长吴铁城派兵包围大学，搜捕革命学生，我因刚参加“社联”不久还未暴露，得以逃脱魔爪迁往法租界；这时我参加“社联”的预备党团，第二年（193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正式的党团成员。当时参加党团的还有马纯古、陈开泰等同志，许涤新同志是领导。

当时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出版一些内部刊物（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内容宣传马列主义和分析国际形势，在内部发行，其中一部分由交通员送到内山书店（日本进步人士开的）出售。此外，搞飞行集会，我曾领导过几次飞行集会，首先通知各区负责人，指定集合的时间地点，摔电灯泡为记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散发传单，就分散各自绕道回家。事后我到各区检查有无被捕的。另外还组织到街头写标语。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不利于对敌斗争。实际上是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但当时不了解是路线问题，后来我到延安学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1935年上海“文委”，“文总”被敌人破坏后，许多领导同志被捕，如许涤新同志也被捕；但下面没有受损失，我和陈开泰同志共同维持这个局面，当时与上面领导失去了联系，只靠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英文版，在外国书店有出售）来指导工作，我了解到党的指示，还把其中好的论文以及工农红军的消息翻译过来，用笔名登在“社联”出版的内部刊物上。不久，上海又重新成立“文总”，主要领导人有周扬、夏衍等同志。“文总”通知解散各联盟（“社联”、“左联”、“语联”、“教联”、“剧联”、“记联”等）；尽管当时有少数同志有不同意见，有过争论；但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这是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转变斗争方式；“上海社联”就改为“上海著作人协会”，公开出版《现世界》（钱俊瑞是主编，我与柳乃夫是编辑）和《时代论坛》（我是主编，金则人是编辑），还利用公开报刊发表我们的文章，如曾替《申报》写过社论，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等，主要是宣传抗日，也分析国际形势。我们还到一些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学校（无锡中学）作报告，开座谈会（在上海第三中学），扩大我们的影响。我在这一时期写了几百篇文章，宣传抗日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了宣传抗日，我还写过几个小册子，如《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日本》，《由广田内阁到林田内阁》等。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早已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还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文化围剿，发布密令，查封我们出版的刊物，我们许多刊物被封；他们又逮捕杀害我们的同志；但我们也有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这时我们转变了斗争的方式，不再搞飞行集会，不到马路上写标语，而是采取写文章，写书，公开出版刊物，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半公开的斗争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被封了的刊物，换个名字又再出版；有一次我们在旅馆里开

座谈会，忽然英国巡捕来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但有一个同志的皮包里有秘密文件（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英国巡捕看见了这个皮包，问是谁的，有个同志用英语回答他说：“这个皮包的主人出去了。”英国巡捕走了，换了中国巡捕来，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立刻用各种方法迅速毁掉了所有的文件和信件，等中国巡捕来到，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又继续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写文章宣传抗日等问题；这样紧张的场面反复遇到过多少次。还有一次，无锡市一个中学邀我去作报告，被特务盯上，我手上当时拿了一份《申报》，在上火车时，盯梢的特务交待火车上的特务时，错把旁边手里也拿《申报》的曹聚仁逮去了，因曹是一般的文化人，他们得不到什么只好把他放了。这事是我在无锡作完报告，还游了太湖，安全回到上海后才晓得的。这时期，上海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敌人还利用叛徒出卖革命同志，我们许多同志被捕了，在许涤新同志被捕之后，陈开泰同志也被捕了，他们坚强不屈，敌人得不到什么，陈开泰同志牺牲了，陈开泰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个好同志。我们又继续战斗下去，对敌人的斗争没有停止过。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央派冯雪峰同志来上海，冯到上海后，最初找到鲁迅。后来通过鲁迅找到我，成立文化支部，当时不适应形势需要，后来改为成立“上海临时党委”，参加的成员有胡乔木、王翰、徐雪寒等同志，我被指定为临委书记，主要领导各界救国会；这时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就更多了，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抗日的声势更大了，不久我听到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我就向组织要求去延安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得到组织同意，就离开上海到延安去了。

183年5月31日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的回忆

我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上海第一批到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到延安后，只过了两三天，毛主席就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接待处接见我们。毛主席穿一身很朴素的灰色军装，很亲切地和我们握手，诙谐的谈话。从白区到革命根据地，到处是亲人，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几天后，党中央分配我参加《解放周刊》编辑部的工作，同时要我到红军大学（“抗大”的前身）讲课。后来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人愈来愈多，为了适应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把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并在1937年底在延安开办陕北公学。“抗大”主要培养军事干部；“陕公”主要培养地方干部。陕北公学总校校长成仿吾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治学严谨，作风朴素，和蔼可亲，特别能联系群众，关心同志，许多同志都亲切地叫他做“妈妈校长”。我在“抗大”和“陕公”都是担任社会科学课方面的教员。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欺骗了许多同志，对党危害很大。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从理论上肃清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在“抗大”成立了高级干部研究班，毛主席经常亲自来

“抗大”研究班讲课。我虽是教员，但主要还是学生。我也在“抗大”研究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毛主席都来“抗大”研究班讲课，主席很平易近人，大家开玩笑地跟主席讲：“教员，跟我们讲讲形势吧。”主席讲的很多，讲形势、政治、哲学……在讲哲学中，主席开始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说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我是第一次听到的，主席先讲唯物论，唯心论，后讲《实践论》、《矛盾论》，后两篇收在《毛选》之中。这段时间我是每天下午听毛主席讲课，主席生动、丰富的讲话，吸引着我们每一个人。我听完毛主席的课，又去跟学生上课。这样我得到了提高，为以后的教学与工作奠定了基础。

陕北公学的教学，与旧学校是根本不同的。旧学校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我们是革命的学校，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当时主要是为培养抗日战争的干部。旧学校的教学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我们的学校则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少而精和通俗化，注意联系群众。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与旧学校完全不同，我们的学生主要是从敌占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其次是边区工农干部，大后方来的青年学生也不少。学生中也混进了个别国民党特务，经过一段学习教育，思想觉悟提高了，就主动向我们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揭发国民党的罪行，决心跟共产党走。

“陕公”后来也分为高级研究班和普通班。

“陕公”的课程主要有统一战线课，政治经济学课，中国革命问题课，社会发展史课，军事课等，总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前两门课由我讲，其它课由何干之、陈唯实等同志讲。

在延安时，毛主席也常来“陕公”总校讲课，做上前线的动员报告，休息时就到校长成仿吾同志办公室来，我们也能经常见到主席，听主席谈各种问题，得益不少。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陕公”总校也容纳不了，中央决定在陇东地区枸邑县“看花宫”村子（传说历史上杨贵妃看过花的地方），成立“陕公”分校，开始由李维汉同志代理校长，他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有坚强的组织才能，在干部和同学中也有很高的威信。后来李维汉同志被调回中央，仍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我到分校仍当教员，后来任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要教好书，首先就要自己很好学习，这时我重读《资本论》，起草了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经过集体讨论，写出讲稿。这样，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当时参加社会科学研究室的同志，有尹达、温济泽，李唯一等同志，经过党的培养和实际锻炼，现在都成为社会科学战线比较负责的干部了。

在讲政治经济学课时，为了联系实际，还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情况作过一些调查研究。“看花宫”村是个老革命根据地，1938年已经搞过土改，农民积极性极大提高，农村经济比较繁荣，二角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老母鸡，物价低而且也很稳定。我们还把边区人民的生活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做了对比。边区人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生活有保障，人民有自由，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拥护边区政府，积极支援抗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多是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真是两种制度两重天。

讲形势时，就联系抗日战争的情况，分析敌我友的情况，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把“抗大”，“陕公”搬到敌后。“抗大”搬到晋东南。“陕公”与鲁迅艺术学院等搬

到晋察冀，改为“华北联大”。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江隆基同志任教务长，我是副教务长。后来在“联大”统一领导下，又成立社会科学院，文艺学院和教育学院等，我任教育学院副院长，离联大校部有十里路，都在阜平县。学生主要是地方干部，我除了作行政工作外，有时也给学生上政治课和哲学课，讲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了做好理论联系实际，在校长成仿吾同志同意下，我曾带领几个干部和教员到晋察冀四分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时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去了十余天，回校后进行了总结，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当时我们是在敌人心脏里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干部，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虽然很紧张，但大家充满了信心。敌人常来扫荡，敌人来时，我就和几个教员还有行政干部带着一百多学生打游击，与敌人周旋，学生中许多地方干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部队又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给我们。途中，也常常得到群众的帮助和拥护，在反“扫荡”的间隙，结合当时实际上政治课、军事课，就这样，我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战斗中学习。

我们教学在联系实际的，还特别注意要讲得少而精和通俗易懂。比如，我们把边区货币与国民党统治区银元作对比，银元因物价高涨而不断贬值，国民党还滥发纸币，物价每天不一样，边币很稳定，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能扎根群众之中，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总结我们在“陕公”和“华北联大”的教学经验，首先，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为革命实际斗争需要培养革命干部；同时，在贯彻执行教学方针上，第一，在斗争中学习，“陕公”的校

歌中有一句歌词是“战斗的学习”，就概括了当时学习的特点。学习的时间短；但学生收获却很大。这就是在敌人心脏中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的特点；第二，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注意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使理论为更多群众所掌握，在讲课中，要常常举些生动的例子，使学生更高兴，更容易接受。

有很多同志，经过学习。在结业后不满足于已得到的一点初步的知识，还注意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以便学得更好，做得更好，希望对革命和新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的教学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以上所说只是简单的回忆，作为抛砖引玉而已。希望有关同志作更多的补充和提出宝贵的意见。

（《陕公联大老校友回忆录》，1980年10月）

由“联大”到“抗大”

最近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由“联大”来到了“抗大”，适逢“抗大”五周年纪念，我既无珍贵的献礼，也不善写美丽的祝词，但朴素的实际情形的记录，往往有它本身的价值。因此，略述两校近况和个人在敌后的生活和感想，聊表纪念与庆祝之意，并藉以告慰关心这两个学校的各方人士，以及因交通远隔而久未得通信的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是两个兄弟学校，同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学校，而且同是实施国防教育而为广大人民所爱护的学校。

“联大”的历史虽不算长，是在1939年夏天成立于延安，但她不是重新草创，而是由有名的“陕公”、“鲁艺”、“青训班”、“工校”等联合而成，她继承了这些学校的优良传统。所以她一成立就开展了惊人的事业。在成仿吾同志率领之下，随着“抗大”总校，“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到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联大校歌）

这是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以一群艺术家、社会学者、工人、青年，以及几百个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不怕任何危险与困

难，不怕敌人的截击与包围，经过了三个多月的长途行军，终于胜利的达到了目的地。以一个“文”学校，在战争烽火如此激烈的时候，它不向安全的地方搬，而偏要向危险的敌人后方去。你想，这在中外历史上，可曾有过？那时，我是以“联大”教职员的一份子参加了这个“文人”的队伍，一同到了晋察冀边区。

我们这次行军最显著的收获，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锻炼。从我自己说，过去不会爬山，不善走路，现在不只会爬会走，而且还能爬得高，走得远。过去不会骑牲口，现在不只会骑，而且还懂得喂养牲口的方法。过去完全不懂军事，现在对一般的军事常识，也多少懂得一些了。总之，这是一次极有意义而且是非常愉快的行军，是每个亲历者所终身难于忘记的。

晋察冀边区是以战斗的胜利来欢迎我们。我们分三个梯队组成的一“文”一“武”两个大学的大队伍，先后抵达晋察冀后，便完全会合，共同参加了“陈庄战斗”胜利的祝捷大会。我们初次看到了军容甚盛的边区子弟兵，看到了精神饱满的党政军的负责同志，并听过了他们充满了胜利信心而又毫不夸张的报告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我们尤其高兴的是：看到边区广大群众本身的进步，和军民融洽的情形，我们随便问一个老太婆，她也懂得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懂得如何空舍清野，军民是一家人等等的道理，原来现实的边区比我们未到来以前所想象中的边区，是更为美满了。

两个大学到敌后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坚持华北的抗战，但是他们却有了很好的分工：“抗大”是培养党军的军政干部，而“联大”则是培养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在华北有了这两个学校，当然更使敌人震惊和嫉妒，怪不得它要想尽千方百计来截击我们，包围我们，想一口吃掉我们，但是胜利毕

竟不是属于敌人，而是属于我们。

我们是在紧张的战斗的环境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十月，“联大”正式开课了。工作，在“妈妈”（成仿吾同志的别号）正确的领导与耐心的帮助下，猛烈的开展着。可是不久，敌人的冬季“扫荡”来了，我们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从后方带过来的大部分学员分散出去，积极参加了反“扫荡”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增强了边区反“扫荡”的力量，同时使这些对边区情形尚未了解的学员得到实际生活的锻炼，至于留下来的一部分少数队伍，就转移于群山之间。游击战争的风味，我们初次尝到了。

当反“扫荡”结束，我们也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期的工作，开始了第二期的工作。在第一期，主要是完成在陕甘宁边区所未完成的教育计划；而到了第二期，则是更坚实的踏上建校时期。为了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我们要重新搜集材料，改编教材，培养更多新的教员和干部。

1940年春天，正当“抗大”总校从晋察冀向晋东南转移的时候，“联大”却派遣大队考察团，去深入了解边区情形，我和沙可夫同志也参加了考察团的工作，分别到了一、三分区。当我们考察完毕，在三月间回到学校时，从冀中，从平北，从平西，从边区各地来的新学生已经不少，“联大”是更加扩大了。除了原有的社会科学部、工人部、文艺部、青年部以外，又增设了师范部。师范部的任务是专门培养中学、高小教师和教育行政的干部。是年由春天到秋天，学校周围没有什么战争，我们得以从容地完成了第二期教育计划。到了冬季，敌人又开始了所谓“毁灭的扫荡”；敌人这次“扫荡”的目标，是找寻边区的后方机关，特别是“联大”和“抗大”二分校；但是我们此时对敌后的情形更为熟悉，对反“扫荡”更有经验了。所以当敌人被八路军的新战术——麻雀

战术打得筋疲力竭，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学校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害，从容地回到了原驻地。当我快要离开“联大”的时候，学校正计划着第三期的工作——开始办正规化的大学和筹设分校。其初步计划是把原有各部改为三个学院——政法学院，文艺学院和教育学院，各院又分数系；学生修业期限将延长到二至四年，在作风上则要更加养成民主与自由的风气，并打算从各方面聘请中外知名教授，增设新的科目。我离开“联大”不觉数月了，这些计划也许已经完全实现，也许还有更大的发展，我等待着他们胜利的捷音。

我是在去年冬季反“扫荡”结束后，才匆匆就道，又一次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晋东南“抗大”总校。“抗大”，对我是并不生疏的。在抗大的第二期，我曾担任过一些课，所以认识的人颇不少。从陕甘宁到晋察冀的途中，“抗大”的军事干部对“联大”有很多帮助，我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了不少的教益。当然，我在“联大”工作时间比较长，干部多数都熟悉了，这在工作上自然有很多有利条件；但是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也可能推动一个干部去想新的办法并得到更多的锻炼。

来此不久，滕副校长对我说：“这里的生活可能比别处艰苦一些。”我说：“这里的生活总比大后方好一些吧，戏剧家洪深教授不是因为生活无法和政治无出路而自杀吗？”

是的，在敌后方工作，首先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说起来也颇觉惭愧，每天三顿小米饭，定期会餐，按时发新衣服、鞋袜与津贴……这样的物质生活，比起那些专门靠发国难财和剥削别人剩余劳动的阔人们的生活来，当然是太坏了；但是比起今天大后方的一般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的生活来，则似乎是“马马虎虎”过得去了。

我在没有来“抗大”以前，听到人们对“抗大”有这样的批评：“抗大的工作，重量不重质，重形式不重内容。”我来此以后，就很客观的加以观察，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事实上是重量也重质，既重形式也重内容。总校与分校一年要培养数万个干部，其量殊为可观，在质的方面我所看到的是教育计划的力求切实，检查工作的力求严格，干部一天到晚，紧张地学习，紧张地工作……这不是为了工作的质的提高，不是为了培养质量更好的干部，是为的什么呢？作为一个军事学校，有许多工作，须采取一定的形式，当然也是必要的，如命令的颁发、军容风纪的遵守、一定工作制度的执行、全体人员军事化的要求等等，这些“形式”的被注意，也反映着工作内容的发展，反映着正规化。过去干部不一定无例外地穿着整齐的军装，打裹腿，上早操；过去许多课程不一定都有提纲；许多工作不一定都有一定严格的制度；现在却都有了大大的改进了。所有这些方面，在校首长正确的领导与严密周到的督促检查下，是日益向着正规化，向着充实方面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抗大”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无须再求进步了。而是说“抗大”是在进步中，而且自实行新编制后各方面已有了显著的成绩。

我是由一个“文”学校到一个“武”学校来，对于这两个学校的特色也很容易看到。因为学校性质的不同，作风上自然也不一样，如果说“联大”是更注意了民主与自由，那么“抗大”则比较严肃和紧张，“联大”是集中了更多的艺术工作者、群众干部、女同志、儿童以及各种多才多艺的人物，所以在作风上自然表现得活泼一些；在对外宣传和群众工作上自然能采取更多样的方式。在社会教育、宪政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教育的宣传和实际工作方面，也做了不少；差不多晋察冀边区的各种运动，“联大”是莫

不派人参加，而靠近“联大”的各机关也常来学校请求“援兵”，我们的“妈妈”是没有不答应的。所以，“联大”在晋察冀全边区广大群众中的影响非常大，老百姓都说“联大可粘！”而“抗大”的影响，则主要是在部队中，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抗大”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学校，除总校外，已有分校八个，而总校在各方面都能起模范的与领导的作用，首先在干部的团结上，无论上级与下级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这里，“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特别有成绩。其次，总校生活的朴素、艰苦与节约，也成了习惯，无论上级首长以至一般干部，都莫不如此。我尤其敬爱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是那么直爽坦白，和蔼可亲，使人感到愉快。

因为“联大”与“抗大”都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学校，都接受了共产党与八路军许多优良的传统与作风，所以她们自然有许多相同之点，这里是无暇一一细述了。

在晋察冀边区，因为有了“联大”和“抗大”二分校的存在，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促进与充实，因此我期待着：在还没有巩固而又极待巩固与发展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都普遍的建立起“抗大”和“联大”的分校来！

两年来“抗大”与“联大”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中，但是中国客观环境的需要，还要求这两个学校，要有更大的发展与提高，这个责任是首先放在这两个学校干部的身上。今天，作为“抗大”教职员之一的我，在纪念“抗大”五周年的时候，只有益加努力，忠诚地工作与学习，为“抗大”的巩固与发展，为革命教育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1941年4月25日

(原载《抗日生活》第三期)

本文发表时，该刊编者曾加如下按语：“六月一日，为‘抗大’五周年纪念，本刊特发表李凡夫先生此文，藉表贺忱，并祝‘抗大’全体教职学员健康！”——编者

回忆《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 一书的编写经过

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一本《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当时我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接到这个任务，感到很光荣又很艰巨。我首先从当时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有关的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同时尽可能地找当时在延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请他们详细地谈当时的情况。我先后主要访问了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和陈赓等领导同志。我在王家坪访问了朱德同志，朱总司令在院里接见了，他很谦虚地说：我的贡献不很大，许多同志把功劳记在我的身上。接着他就向我介绍了当时八路军抗战的情况。之后，我又访问了刘伯承同志，在杨家岭他的家里，他拿出笔记本，他的笔记本是用俄文记的，他看了一下后，详细跟我谈了作战的经过。后来我又访问了陈赓同志，他正在午睡，知道我来马上起来，滑稽地讲了几句广东话，然后详细地谈了作战的经过。我又访问了周恩来同志，记得那是快吃饭的时候了，周恩来同志不顾开饭，很和蔼地接见了，认真地向我谈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指出写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些话，使我感到很亲切。之后，

我认真地整理了这些宝贵的材料，编写了《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经党中央审查后，在延安出版。

我访问了以上的领导同志，深感他们对革命工作的认真负责，而又热情、谦逊、平易近人地对待同志，很值得我们学习。

1979年10月24日脱稿

(编者注：本文是为人民出版社第3次印刷《抗战八年来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时写的，未赶上付印)。

为纪念广州六烈士题词

白云山上埋忠骨
浩气长存留千古

编者注：李凡夫同志与温盛刚、谭国标、郑挺秀等六位烈士曾在中山大学一起战斗过。1932年李凡夫同志因发表革命文章与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出校。他转到上海暨南大学继续读书，后来参加上海的革命文化活动。六烈士（温盛刚、谭国标、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何仁棠）则在广州开展革命文化活动。被反动军阀杀害，牺牲于1934年8月1日。

附录一：

李凡夫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休养干部李凡夫同志，因病于1990年10月16日18时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李凡夫同志，原名郑锡祥，1906年7月生于广东省中山县濠头乡一个贫苦的华侨工人家庭。1926年至1929年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到日本留学，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逐步使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毅然回国，一出日本海在轮船上召开反日本侵略大会上，被推举起草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因发表革命文章，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之后，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1933年夏，在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社联”常委、党团书记。1936年，因斗争需要，“社联”改为“上海著作人协会”，成为公开的文化组织，编辑出版《现世界》和《时代论坛》，他用“李凡夫”的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百篇，并专著有《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日本》、《由广田内阁到林

田内阁》等小册子。是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著名学者。

1937年初，在上海建立中共文化支部，后组成上海临时党委，李凡夫同志担任临时党委书记。“七·七”事变后到达延安，担任《解放周刊》编辑，又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被公认为名教授之一，桃李满天下。1939年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教育长、教育学院副院长。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2年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经受了遭人诬陷的考验。1943年初至1945年秋，先后担任总政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间，根据中央的指示编写《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在延安出版，解放后又经人民出版社再版。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抗日军政干部，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5年至1946年4月任中央军委干部队第二大队队长，由延安开赴东北，积极参加了土改、反霸和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1946年5月至1949年6月，任辽吉省、吉林省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党校副校长。1949年随军南下，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在党的宣传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忘我工作，为建设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1958年在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兼调查研究室主任期间，由于如实向上级反映当时浮夸风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危害等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安徽大学当教授。1962年得

到平反后，任安徽省常委兼宣传部长。1964年9月任安徽省副省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著有《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为安徽省的宣传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林彪的“顶峰论”等谬论，遭到打击迫害，被军管六年，身心受到摧残。粉碎“四人帮”之后，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因长期患病，调到北京在中央组织部休养。

李凡夫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在病中仍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始终关心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关心国内外大事。

李凡夫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进行忘我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他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坚持真理，疾恶如仇，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好学到老，坦荡立言，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他在病重时曾留下遗嘱：要教育好子女后代，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举行任何仪式。再一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我们悼念李凡夫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进行到底。

李凡夫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风范永存。

李凡夫同志永垂不朽。

1990年10月26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供稿)